



蜀江水碧蜀山青，孕育世纪一伟人（1）

- 牌坊村邓家添长子
- 邓家老院子
- 父母的希冀
- 伟人之初
- 入塾启蒙
- 农家子弟的好伙伴
- 爱国思想的萌芽
- 制止“割肝敬母”救学友
- 企盼去到广安以外的世界

从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奔向狂啸的海洋（26）

- 蜀人吴玉章与留法勤工俭学
- 川江通海万里船



雪山草地见证浓浓乡情 (42)

- 西蜀雪山下，喜逢川籍老战友
- 水草地上精神会餐：“还是四川回锅肉才好吃”
- 对西蜀各族父老乡亲的真情告白

率师回川，勋业彪炳青史 (59)

- 毛泽东指示：“西南的重心是四川”，“小平准备入川”
- “小平和我陈毅都饿了，吃的丹阳‘糊抄手’比成都‘龙抄手’还香”
- 运筹帷幄 决胜西南
- “养子不怕娇，西、秀、黔、彭走一遭”
- 小平倡议下，组建西南服务团
- 润育启导青年的良师问：“你们摸摸背上，有没得包袱”
- 蒋介石在夕阳沉树、黄叶扫阶、日暮钟声里来到重庆
- 刘、邓一挥手：军事的、政治的各种斗争都展开
- 小平有多少沉甸甸的回忆
- 成都战役旨在把胡宗南集团歼灭于成都地区
- 二野指战员虽已能望见成都城郭，刘、邓命令“二野任何人均不得入城”
- 布满点点星光的川江水，引起小平无限遐想
- “仗打完了吗”
- 梁漱溟向毛泽东汇报：“小平迅速把混乱的四川变成稳定的四川”
- “菩萨兵”进军世界屋脊，小平要求部队学藏语
- “二呀嘛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

两年圆了蜀乡人半个世纪的梦 (107)

- 《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书》与受屈辱的历史
- 青年朱德、刘伯承深受“保路斗争”影响，孩提时代小平会唱“保路运动歌”
- 广安人蒲殿俊《哀告全川伯叔兄弟书》与少年小平目睹身边发生事
- 一个梦游弋蜀乡人中半世纪，一块巨石压在小平心上几十年
- “请你为四川家乡为成渝铁路物色一批专家”
- 成都战役第一枪尚未打响，小平主持会议决策修成渝路
- “成渝路一开工就可带动四川的经济建设，四川人民渴望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 小平为发掘成渝路沿线文物的老教授准备了滑竿
- 小平与轰动世界的“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发现
- 蜀乡人欢歌《四唱成渝路》，近半个世纪美梦终成真

“四川的石油工业会跑到前面” (136)

- “四川勘探出石油”的喜讯使小平夜不能寐
- 小平知道蜀人在世界上最早使用石油天然气
- 老夫聊发少年狂，“好安逸哟！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 “这次我在四川龙女寺定了30口井……四川的石油工业会跑到前面”
- “中央同意你们关于威远气田建设的方案”



“多么雄伟的剑门关” (156)

- “我们从上头来，到下头去”
- “尚昆呀，剑门拐杖在北京可以卖个好价钱哟”
- 对大女儿说：“画好雄伟的剑门关，让世人都知道我们四川的美景多得很”

“第二个都江堰”的建成 (166)

- 邓小平对司马迁曾来过和记述过的都江堰情有独钟
- “这么好的坝子占了太可惜了”
- “我的家乡有个水利工程，引涪江水，是第二个都江堰嘛”

“自贡是出盐巴的，要为盐巴找出路” (180)

- 自贡本身就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
- “开门七件事，盐巴排在第二位，重要哟”
- “在天安门看到的焰火，也有我们四川的原材料”
- “你姓‘党’，那么一生下地就成了我们党的人了”
- “全国像自贡鸿鹤这样的厂还有好多？”
- “我是四川人，吃鱼要多放点辣椒才出味”

“莫要把云贵川的腊肉搞失传了” (193)

- “你们绵阳抽了110多万农民大炼钢铁，你那个农业有啥子看头”
- “莫要把云贵川的腊肉搞失传了”

“我是广安叫花子，最恨江青几爷子，小平同志快出来，
免得我们饿肚子” (200)

- “金广安”街头的树皮，几被饥民全剥光
- 十万广安难民爬火车下渝州逃荒
- “哪个是小平同志的舅舅，请到前面来割肉”

小平磨难，蜀乡人情更深 (209)

- 天下未乱蜀先乱，蜀人先乱了“四人帮”的方寸
- “为了国家利益邓小平舍得他的官，白智清舍得我的命”
- 同乡们和小平心心相印
- 蜀乡人特别关注蒙难的小平
- 尘埃落定，蜀乡人惊喜万分

四瓶成都大曲酒提到在江西蒙难的小平手中 (228)

- 为见小平大哥，二妹和三妹夫成都约定“暗号”
- “小平大哥接过成都酒后说，只有你有条件‘大串联’，把一大家人串在一起了”
- “小平大哥没按照约定的‘暗号’发电报到成都，硬把我急惨了”

“我上峨眉不许封山。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245)

- 一个四川省委书记工作变动，三位中央副主席轮流谈话，可见小平对四川的重视
- 登峨眉是邓小平的夙愿
- “你们去检查，看与我们同进万年寺的几百游客吃



住问题解决没有”

- “使不得，老太太快起来，我俩同岁是老庚”
- 领袖和人民无拘无束融为一体，峨眉美景又添亮丽风景线

“不要老让人家觉得我们四川人是土包子” …………… (257)

- “不要老让人家觉得我们四川人是土包子”
- 小平倡议组建四川省诗书画院

“到成都不去杜甫草堂，等于没到成都” …………… (265)

- “到成都不去杜甫草堂，等于没到成都”
- “这两个杜甫的像太胖了”
- “盖碗茶和薛涛干都是四川特产，四川的名小吃过去集中在一条街上”
- “成都和灌县可以连起来，20美金一个客位”
- “这位就是参加布置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的老花工”

“武侯祠有些塑像对四川人太不公平了” …………… (273)

- 读史使邓小平知孔明首称四川为“天府”
- “这有个倾向，我认为应该把四川人放在前面一些”
- “刘备是儿坏孙子好，诸葛亮是三代都好”
- 和毛泽东“英雄所见略同”，小平同样赞赏“攻心联”
- “这样塑像，对四川人太不公平了”

蓉城初会故里人 …………… (290)

- 小平笑容满面招呼故里人：“大家随便坐”

- “广安今年情况怎样？我离乡时广安60多万人口，现在是百万出头”
- “回去带话给县委，把农业搞上去，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抓好”

总设计师一锤定音：“四川是改革之乡” (298)

- 蜀乡是总设计师改革的试验田和根据地
- “曾经沧海难为水”，引蜀乡农谚纠“左”，肯定“包产到户”
- “我是四川人，经常听到家乡人反映菜少肉少”
- 大寨斥江青：“四川倒数第二，人均一年九十几块钱，这行吗？”
- “我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四川被选为改革试验田
- 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
- “愿‘改革之乡’更上一层楼”

小平关怀下，川剧壮川魂 (325)

- 对妹妹和女儿说：“看不懂川剧的人，就是没有文化”
- “川剧演员只管唱戏，若硬要弄到乡坝头劳动，莫把田土踩板了”
- 1978年初来川看川剧，使全国戏剧都解禁
-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代表演川剧，“那我也再看一场”
- 问浙江省委书记：“你看过川戏不？”
- 小平重视川剧，是重视蜀乡文化传承

“蜀道难，要搞就搞个西南航空” (349)



“回到四川，我就回家了” (355)

- 一进金牛坝宾馆就说：“我回家了”
- 与各族家乡人在家乡过虎年
- “终于见到了家乡的父母官”
- “幺舅，我两个难得见面，合个影吧”
- “幺舅曾写信给小平大哥：‘你要好好教育老婆卓琳，莫把钱寄丢了’”
- “在成都省见到了小平外甥，就是‘嘎嘎’（肉食）吃得太少了”
- “你们要研究将川菜推向市场，让川菜的名气更响”
- “回到四川，回到家乡，才能吃上真正的豌豆尖”
- “都是四川老乡，就大家一起照相嘛”
- “我还是再写个‘金牛宾馆’，比‘芙蓉宾馆’名气大”
- “金牛宾馆也要对外开放，不能还是老样子，搞封闭式服务”

自贡龙灯会在北京展出：“这是家乡的龙” (386)

- 对孙孙说：“这是家乡的龙，好好看一看家乡来的龙”
- “你们自贡在北京搞灯展，应该与北京实行分成”

剪不断白云缠绕的蜀乡情 (394)

- “我不想改我的籍贯，我还做我的四川人”
- 带动王震、杨尚昆、刘华清、宋任穷也爱上四川布鞋

蜀乡的一草一木都成为他魂牵梦萦的回忆 (400)

- 西子湖畔也是纯正的川音：“这娃儿长得好胖哟”
- 在杭州岳王庙：“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
- 在上海，他乡遇老乡：“川扬菜好嘛”
- “从我们四川家乡来上海建设的同志们，我问候你们”
- 在南京植物园：“哦，这是我们四川峨眉山的東西”
- “我是四川人，你们深圳悄悄从我们四川引种，我要罚你的哟”
- “我说四川的柚子最好，但我家里统一不起来”
- 从浙江省委书记的话中听出四川口音：“我们可是老乡哦”
- “是我选拔了四川的大地主刘文辉当中央政府的部长”
- “以后退休了，我还是要回四川养老，我喜欢家乡四川”

本书主要参考和摘录书目 (420)

后 记 (423)

蜀江水碧蜀山青，孕育世纪一伟人

牌坊村邓家添长子

广安，是四川东北部丘陵地区的一个古老的县份。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是四川东北部的的主要粮食产区，尤其



邓小平故居。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在这里。



盛产玉米，故有“金广安”之称。广安城则有“地枕巴山，城环渝水，东岭茶铁之乡，西溪鱼虾之出”的美誉。广安这一名称，取“广土安辑”之意，始自公元969年（宋朝开宝二年）设置的广安军。

出了广安城北洗脚溪，沿山而上向北约八公里，就到了协兴场。距协兴场约两公里的姚坪里（今牌坊村），有一座宽敞、白色、坐北朝南的马蹄形宅院，周围竹林茂密，翠绿欲滴，与白墙灰瓦相映，使人感到亲切自然。院中是用长方形石板铺成的石坝，沿石坝向下的东西两侧种有桑麻等作物。院子对面是一个不大的池塘，间或传来几声蛙鸣。秋天，院子背后的土丘上长满了柑橘，一片金黄。沿土丘下来是一条小溪，碧水潺潺，长年不断。院子四周到处是梯田和坡地，种满了水稻、玉米等农作物。

公元1904年8月22日（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在姚坪里这个宽敞的庭院内，一个30岁左右的青年汉子烦躁不安地时而在院中踱步，时而蹲在石阶上盯着院中匆忙进出的女人们。他感到这几年来事情颇不顺心：县城里已经盖起了第三座外国教堂，信教的乡民越来越多，尤以不务正业的地痞恶棍为甚；协兴场街上已经没有往日赶场的热闹气氛。洋纱、洋布、洋油、洋烛已经冲击到这个小小的场镇，土纱、土布卖不出去，桑麻之利越来越薄，原计划与他人合办的丝厂也只好暂时作罢。加之这年大旱，谷子只能收三成，更难有余资去扩大经营了，粉坊、酒坊的生意自然要受到影响。他想到这里，叹了一口气，觉得自己似乎老了，近几年少了许多自信和力量。随着这种感觉的出现，内心中的企盼就越发强烈起来。这个青年汉子就是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他走到西厢房廊下，向房中张望着。

只听“哇”的一声，房中传出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它宣告了邓家第二个孩子的诞生。这清脆的哭声既给他带来了喜悦，又增加了几分犹豫和迟疑。这时，从屋里走出的接生婆边擦手边喜滋滋地告诉他：“恭喜了，大少爷，是个男娃。”

这一消息扫去了刚才的愁云和愤懑，他大步走进房内，直奔床前。刻有龙凤图案的紫红色雕花木床上躺着产后虚弱的女人，青年汉子紧盯着孩子那细嫩的面颊，嘴里喃喃地说：“儿子，我的儿子。”一时间，他身上又重新恢复了自信和果决，站在廊下，他吩咐帮工马上去淡家坝的岳父家报喜，并按照乡俗准备酒席汤饼打三朝。然后，来到正房堂屋内，在邓氏昭穆的神位前燃香，心里暗暗祈颂：列祖列宗在上，绍昌今得一子，邓家有后了。祖宗在天之灵，保佑他长大成人，光宗耀祖，重振门庭。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对已婚男子来说，得到一个儿子无疑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他有了血缘、姓氏和财产的继承人。同时也是他对祖先对家族和家庭应尽的一份社会义务。邓绍昌虽然在成都法政学校读过几年书，接受了一定的新式教育，但同样企盼着儿子的降生，而且应当说这种企盼是十分强烈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本人是三代单传的独子，更主要的是20世纪初的动荡年代，使邓绍昌深深感到光复祖业、重振邓家门庭责任的重大和自己的力不从心，他迫切希望通过下一代来实现。

邓家老院子

邓绍昌，出身于广安世族邓家。邓氏家族在广安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明朝。

邓绍昌的父亲邓克达是一位勤劳忠厚的老实农民，也是当地著名的织布机匠。他靠织布渐渐地积攒了一些钱，并在岳父家的帮助下，慢慢置办了一些家业，买了一些田地。到邓绍昌出生时，邓克达已经成为当地一名拥有200多挑土地的中等地主了。

邓绍昌大约出生于光绪初年。当时邓克达和妻子戴氏都已年过40了，这个年龄得到一个儿子，按照传统的看法，可以说是老来得子，更何况是唯一的儿子。所以邓绍昌从小就很得父母亲的疼爱和三个姐姐的照顾。当他12岁时，邓克达去世。戴氏独自承担起家中的担子，并把邓绍昌送到成都法政学校去读书，希望儿子能求学取仕，为日益清寡的邓家争光。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一切都在动荡之中，传统的、旧的东西正走向没落和死亡，而新的、进步的东西尚未有足够的力量确立和巩固下来。经过一番新学洗礼的邓绍昌未能在外面找到他的位置，只好回到家乡，成为邓家新的主人。

邓绍昌回到邓家老院子后，母亲戴氏和亲友们就开始帮助张罗亲事。经过选择和例行的乡间手续之后，举行了婚礼。邓绍昌的妻子淡氏，出身也是广安世家，祖辈曾任过知府，门第相当。结婚时带来了很可观的嫁妆，尤其是那雕龙刻凤的紫红色大木床，更是引人注目。一年之后，淡氏怀孕了，生下一个女孩，取名为邓先烈。又过了两年，淡氏生下了邓家第一个男孩邓先圣。以后的几年，淡氏又相继生育了次女邓先珍、次子邓先修和三子邓先治。1926年，淡氏病死。以后，邓绍昌又娶了夏伯根为妻。

邓绍昌早年参加了“哥老会”，还是广安“哥老会”的小头

目。“哥老会”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在四川近代史上，它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有着相当大的作用和影响。邓绍昌和广安“哥老会”的其他人一起，曾参与了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起义。西方宗教势力侵入四川由来已久，成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反对者。1898年，在余栋臣领导的大足县人民反洋教起义的鼓舞下，广安“哥老会”也积极行动起来，将平日作恶多端的城东观音阁教堂一举焚毁，为长期受欺辱的广安乡民出了一口恶气。起义失败后，邓绍昌加深了对清政府腐朽无能的认识，也要想树立自己在乡间的权威，他还要发展新式教育，培养出一批懂得洋教、能与洋人论理的青年娃儿。

他经常出现在茶馆、酒肆，去倾听佃户、短工、轿夫和苦力的忧愁痛苦，去调解他们的纠纷，充当一名权威的调解人；他仗义疏财，只要别人遇到难处，求他帮助，他总是会满足他们的要求；他办事公正，讲话直率，爱打抱不平。利用他的社会影响，他往往成为穷苦农民的代言人，也成为官家办事不可缺少的臂膀和依靠。

平心而论，邓绍昌比他的祖父邓心早、父亲邓克达要能干得多。他除经营着祖业外，还间断地从事一些酿酒、粉坊和缫丝生意；他上过新式学堂，有时还到协兴场新式小学堂去教书。他在协兴场一带颇受乡民的尊敬，有着相当的权威。然而，正由于此，在他那半新半旧的思想中，在他那自信的性格中，先祖的赫赫功业激励着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鼓舞着他。他不满足于眼前得到的一切，他希望建立更大的影响和权威。但是近几年来，他脚下的这片古老的土地也开始动荡起来，乡间的权威开始受到外国传教士势力的挑战和破坏，他的生意和生活也受到了冲击。他本能地感到了一种古

老传统的没落和新的力量的崛起，然而却无从去掌握这种新的力量。这使他感到愤懑，也对自己产生过犹疑。然而今天，当他的儿子诞生后，他似乎看到了一线光芒，捕捉到了他的力量和希望之所在，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像先祖那样建功立业，希望儿子能超过先祖成为“贤才”、“人圣”。“邓先圣”，这个刚刚落地的婴儿的名字，以及以后取名：邓希贤，包含着邓绍昌的苦心和希冀。

父母的希冀

邓绍昌在有了一个儿子——也就是邓家的血缘得到延续、财产有人继承后，他开始把精力投注于社会活动之中。这是因为在广安也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富裕的中等地主的他，不需要为衣食温饱而奔波，他的兴趣在于社会活动，希望能干点事业出来。他关心乡村的教育，自己有时也到协兴小学堂去当一名临时教师。他殷殷寄期望于自己的长子，送他到协兴小学堂读书，以后又托人送到县立高等小学堂插班学习。他在外面很宽容和善，在家里却很严厉，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其家长的权威。对子女们尤其严格，近乎于苛求。邓小平在协兴小学堂读书时，有一次学业考试，因为连续几天生病没有能去上课，考试成绩列在第二名。邓绍昌闻得此事，异常生气，回家后将儿子狠狠打了一顿，直到邓小平的祖母出来解围才罢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邓绍昌认为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有几分淡淡的喜悦之后，他有更多的企望和关切，希望中国能从此开始走向强盛和稳定。然而，事实却是一切依然如旧。广安几座教堂依然耸立

在那里，而走向教堂投入上帝怀抱的人似乎越来越多。百姓们的生活依然贫穷。所不同的是，一下子多出了许多军队，整个四川陷入军阀混战之中。与此同时，盗匪横行，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稍有产业者，今日被派款，来日又催粮，负担累重，生计日坠，还要提防土匪的袭劫。在这种情况下，邓绍昌认识到，维护乡间的秩序和相对稳定与安全，不仅是一种感情、意气和自身权威的需要，更是一种生存的需要，于是他开始谋求致力于地方稳定的途径，同时也是进一步实现他在家乡干些事业的抱负。

对邓绍昌来说，一方面，作为“哥老会”在协兴乡的首领，他所辖区会众在增多，他的领导基础在扩大，多年来他苦心经营并在乡间树立的权威形象，这时显得十分突出和重要；另一方面，由于他在乡村的地位，使那些盘踞在广安的军阀对他也不能小觑，需要借助他来维持这一地区的统治。这样，邓绍昌在广安继续从事社会活动，与以前不同的是他已进入中年，更加成熟和自信，并逐渐成为广安团练头目，有了公开的社会职务。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邓绍昌曾先后担任过协兴乡团总、广安县团练局长、八县联防副指挥等职。其中1928年2月至1929年4月任广安县团练局长。他蓄着弯弯的八字胡须，威武有力地奔走各地，充当地方保护神的角色。乡民对他一般是敬而远之，这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对他的威严的承认和尊敬。

正因为邓绍昌尚能主持公道，终不为军阀豪绅所欢迎，他担任广安县团练局长不到两年就被撤换。1936年春，邓绍昌在外出返乡的路上，坐在滑竿中被冷枪击中。当时的广安，各种政治力量斗争十分激烈，地方实力派正在积极武装，占地称雄

反蒋；军阀杨森也在谋求夺取广安；同时，蒋介石也派一个师的兵力进占广安。再加上经过多次军阀混战遗留下的散兵游勇，以及华蓥山上的土匪也在伺机活动。因此，邓绍昌为何被枪杀，有意还是无意都不清楚。邓绍昌死后，被埋在一荒丘地。现在看到的“邓绍昌之墓”几个大字的墓碑，是1986年新立的。

邓小平的生母淡氏，是广安县望溪乡淡家坝人。淡家也是明代入川的世家大族。淡氏在家居长，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淡氏虽然没有读过书，但人很机敏，很懂事理，嫁到邓家后，成为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当时邓绍昌很少在家，对家中事务也不太关心，所以家中的大事小事都是淡氏一个人操劳。除了将田地佃给农民耕种外，家中其他生产劳动如织布、养蚕、喂猪以及洗衣、煮饭等家务都由她一手操持着。每天从黎明开始，淡氏就在屋里屋外忙碌，上照顾年迈的婆母，下哺育幼小的子女，有事总是先和婆母商量之后再办，将家里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对子女也十分疼爱，当时广安境内军阀混战，盗匪颇多，为了使孩子不受惊吓，一有风声，她便急忙将家里安顿好，带着年幼的子女到村外土沟或竹林中去躲藏，或是将孩子送到亲戚家中暂避一时。每当邓绍昌打骂孩子时，淡氏总要出来为孩子说情，有时搬请婆母来劝止。淡氏性格爽朗，待人热情，周围的邻居百姓都愿意和她接近。特别是那些贫苦的农民有什么难处，都乐于向她求助。

邓小平的母亲是一位情操高尚、勤劳俭朴的农村妇女。母亲的这些美德对少年邓小平有着很大的影响，邓小平对母亲的感情也很深。1920年邓小平到法国勤工俭学后，淡氏对远在异国他乡的长子十分思念，她时常埋怨邓绍昌：才10多岁的娃儿，就弄到那么远，怎么忍心啊。长久的思念和辛勤的劳作，使她

在1926年过早地去世了。

伟人之初

幼年的邓小平生活在一个和睦的家庭之中。由于邓小平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三代都是独子单传，所以邓小平从小就很受全家的宠爱。特别是祖母和母亲，不管做什么事，哪怕家务再忙，也总是把小平带在身边，形影不离。5岁以前的邓小平是在祖母和母亲身边长大的。稍大以后，虽然与父母分开居住，也还是由祖母带着睡觉。

幼年的邓小平是一个聪明、活泼而又懂事的孩子。祖母和父母虽然十分喜欢他，但也从不娇惯，所以在他身上从小就没有一点少爷习气。5岁以前，他主要是和姐姐在一起玩耍，打碰钱是姐弟俩玩得最多的一种游戏。每逢年节或是跟父母去走亲戚时，小平经常会得到一些压岁钱和挂挂钱，大都是几枚铜板。没事的时候，他就把这些铜板拿去和姐姐一起玩打碰钱。小平将铜板分一半给姐姐，然后与她一起打碰钱，看谁先输完这些铜板，输了的就要挨手板。姐姐往往玩不过弟弟。当姐姐输了伸出手掌让弟弟打时，小平总是一面笑一面轻轻拍打。到了过年的时候，他家的院子里总是十分热闹，除了父亲的朋友出进之外，就是小平的小伙伴们。周围的孩子们都爱和小平一同玩耍，当玩得高兴时，这些孩子们便拿出各自的铜板压岁钱来打碰钱。小平的手十分灵巧，每次掷出去的铜板几乎都能打中目标，其他小伙伴都玩不过小平。但如果一个小伙伴的铜钱全部输光了，小平会将铜板还给他，再一同来玩。

在家中，小平同姐妹们相处得也十分融洽，感情很深，对



弟妹非常关心爱护。他小时候，有时祖母或母亲给他一些吃的或玩的东西，他从不独自占用，总是拿出来与姐妹们一同享受。他上学读书以后，每天回到家中，便把姐妹叫到一起，并让她们坐好，自己则站在她们对面学着学堂老师的样子，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不停地挥动比划着，小脑袋一边摇晃着，嘴里不停地背诵着他刚刚学会的诗文，逗得姐妹和周围的人哈哈大笑，小平由此得名“小先生”。11岁时邓小平在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每天吃住在学校，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母亲经常给他一点零用钱，让他在城里买点自己需要的东西，但小平从不花这些钱，总是在回家的时候，给祖母、母亲和姐妹们买点乡下不容易见到的东西。小平特别喜爱小他几岁的妹妹先珍，经常从城里买些糖果给妹妹吃，妹妹也很爱哥哥。1919年，邓小平离家去重庆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时，全家人都舍不得他走，母亲和姐姐、妹妹流着泪送他一程又一程，妹妹更是哭得特别伤心。小平拉着妹妹的手，流着泪说：“妹妹，你不要哭，哥哥还要回来的，你一定要等到哥哥回来才出嫁啊！”……谁知，这竟成为至爱兄妹的最后话别。

入塾启蒙

1909年初春，农历正月十五刚过。一天，不满5岁的邓小平被招呼到父亲面前，邓绍昌严肃地对儿子说：贤娃儿，今天送你去发蒙。从今天开始，你是个大孩子了，你要听先生的话，好好读书。邓小平盯着父亲，认真地点点头，母亲又招呼他换上一身新衣服，然后跟着父亲来到一家私塾馆。

这是一处设在塾师家中的散馆。进门后，父亲点燃香烛，

引导邓小平先向孔子的神位行跪拜礼，然后向坐在一侧的塾师行礼。塾师在受礼时，照例说几句发愤读书，显亲扬名的吉庆话，向这位新学生祝福。接着父亲一揖，送上用红纸包好的礼封。按当时的习俗，发蒙是儿童读书的第一天，礼封必须从优，以示尊重。因此，这沉甸甸的红纸包中至少有800文铜钱。塾师收了礼封后，拿出一本《三字经》翻到后页八句，用红笔圈出，然后教小平跟着他来读：“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读了三遍之后，把书收起，随即让小平入座，把着他的手填写“幼学壮行”四个红模大字，又工整地写上“邓希贤”三个字，然后用红笔加上四个大红圈。全部礼成，邓小平又随父亲告辞回家。

一年之后，6岁的小平正式进入私塾读书。开始了他人生的

邓小平5岁起在这里读私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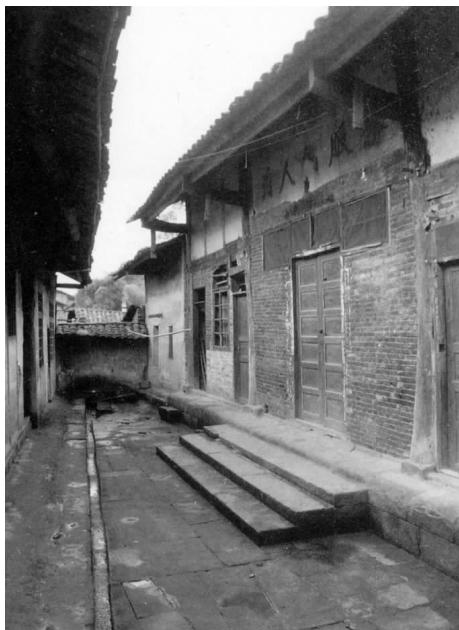


启蒙学习。私塾的功课主要有三项，即读书、写字和作文。读书是私塾的主要功课，首先是从读杂书开始。所谓杂书，是指那些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字幼仪》等儿童启蒙读物。对这类书，塾师照例是不讲的，只要求学生照背便是。这种死记硬背，对年幼而活泼的小平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但好在他聪明、伶俐，先生教过之后，他马上就能记住，背诵也很流畅，颇为塾师喜欢。写字也是私塾的主要功课。早晨入塾后，先读书、背书，然后写字，字写完后交到塾师桌上，塾师在写得好的字旁加一个大红圈，孩童戏称为“大盐蛋”，如果有错就打上一个红“×”，称为“红筷子”。临到午饭前，儿童要领到习字本，才能回家吃饭。小平写字很认真，每天放学回家后，还要坐在小桌前反复练习。因此，他的字进步很快，得到的“大盐蛋”越来越多。放学后，他回到家里，会让母亲看又得了几个“大盐蛋”，母亲也总是高兴地给他煮一个鸡蛋作为鼓励。经过私塾写字课的严格训练，邓小平的书法有了良好的基础。直到晚年他的字依然刚劲有力。这可以说是他童年时代私塾学习的最大收益。

小平7岁的时候，就结束了私塾的学习，进入了协兴小学堂，开始接受初步的新式教育。协兴小学堂在距离小平家约1.5公里的协兴场上，是由一所祠庙改建的。由于当时新式教育刚开始，从教师到教学内容都很不统一，也很不正规。

小平不但学习勤奋，而且不畏困难。从小平家到协兴小学堂之间，是一条约1.5公里的乡间小路。一遇下雨天，路面泥泞不堪，很不好走。但小平总是风雨无阻，雨再大路再烂再滑，也要披件蓑衣去上学。几乎每次下雨天，都会滑倒在泥水中，浑身都是烂泥。祖母和母亲心疼小平，就劝他下雨天不要去学

堂了，在家中自己读书写字。但小平不肯，一定要坚持去上学。没有办法，母亲就想出一个主意，一遇雨天，母亲就用一个小布袋装上一合米，再给小平两枚铜板，叫他带到学堂去，中午就不要回家了，就近找户人家或店铺搭一顿饭，这样就可以少跑两趟泥路。但谁知他从没有把米和铜板拿去搭伙，而是不吃午饭，饿着肚子去上课，下午放学回家后，将带去的米和钱原封不动地交还给母亲。母亲心疼地责怪他，叫他不要这样节俭，要注意爱惜自己的身体，小平总是笑着点点头，但下一次还是把米和铜板又带了回来。母亲没有办法，以后遇到下雨的时候，总是在家里早早把午饭做好，再托人送到学校去给小平吃。



协兴乡小学堂旧址。1910年至1915年，邓小平在这里读初小。

邓小平童年时代，家中虽然不愁生计，但由于父亲邓绍昌很少关心家产的经营，而且仗义疏财，所以家中也少有积蓄，日子过得也相当的紧张。祖母和母亲一面要亲自操劳繁重的家务，一面还要养蚕来增加一部分收入，小平在这样的家庭中逐渐长成，从小就养成了勤劳节俭的品质，是一个热爱劳动的孩子。平时，尽力帮助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到了养

蚕的季节，他更成为母亲的得力助手。这时候，母亲更加忙碌了，除了繁重的家务外，还要抽时间来照看“蚕宝宝”。白天忙一天家务，晚上侍弄蚕苗，每天到了夜里还不能休息，尽管祖母和姐姐一同帮着做，母亲仍经常忙到深夜。小平年纪虽小，但很懂事，看到母亲这样操劳辛苦，十分心疼。于是，他不再去玩泥巴仗了，放学后直接跑回家，争着帮助母亲做些事情，不是背着背篓去采摘桑叶，就是帮着捉小蚕换桑叶，总是忙个不停。入夜了，母亲总是再三催促小平先去睡觉，但小平总是要坚持到最后，等母亲、姐姐把所有的活干完了才肯去睡，这时往往是深夜了。

农家子弟的好伙伴

童年的邓小平十分活泼顽皮，像其他孩子一样，他放学以后，就常和一些农家子弟玩耍，从不在这些孩子们面前称王称霸，而是帮他们放牛割草，同他们一起下水摸鱼、打泥巴仗，从来没有少爷的派头。

小平家背后土丘脚下的神道碑是小平和小伙伴们最喜爱玩耍的地方。神道碑是两块很高的石碑，碑底是两个很大的乌龟，为“螭首龟趺”的样式。碑下是一种形似龟而头部像龙的怪兽，叫赑屃，传说系龙之九子。每到春夏时节，小平和小伙伴们常到神道碑旁边的小溪中去摸鱼戏水、一起玩打水仗，衣服打湿了，便拿到石坝上去晾晒。这时候，小平就和小伙伴们爬到石龟背上去玩。这两块神道碑是清朝乾隆年间朝廷赐造的，是为了表彰两名广安籍的高官邓时敏和郑人庆的功德而立的。在当时，广安人对两个大人物很尊崇，以至在当地一直流传着一个

神话，说邓时敏是仙人下凡投胎到人间主持正义、惩恶扬善的。所以一般人不敢随便攀玩这两块石碑，尽管有的人对此不满，但也只是在背后发些议论，说点牢骚话。小平与几个小伙伴在小溪沟中摸鱼戏水后，来到石坝上玩耍，看着硕大的石乌龟，小平对其他小伙伴说：“我们爬到乌龟上去玩好不好？”这一说，小伙伴们吓了一跳，纷纷拒绝说：“听大人讲，这样做是会得罪神爷的”，“家里要遭大难的”。都不敢听从小平的鼓动。邓小平却壮起胆子说：“别人骂他们是两个龟儿在一堆，都没有遭到报应，我才不信他们有那么大本事。你们不敢爬，我先试试。”一边说着，一边跑过去爬到了石乌龟探出的脑袋上，坐在上面，踢打着两腿，拍手喊叫着：“快来哟，真好玩，真好玩。”其他小伙伴见小平这么大胆，都惊叫着跑过来说：“贤娃儿，快下来，你要惹祸的！”小平还是若无其事地玩着，扭转身来向乌龟背上爬去说：“惹祸就惹祸，就要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小伙伴们只是又惊怕又羡慕地注视着邓小平，也无可奈何。以后，其他小伙伴们慢慢地胆子也大了起来，也不害怕了，便跟着小平一起到乌龟背上去玩耍。

除了戏水摸鱼、打碰钱以外，童年的邓小平与小伙伴们玩得最多的就是打泥巴仗。由于小平生性活泼，友爱朋友，无论什么样的孩子都愿意和他在一起玩耍。

小平不但自己学习努力，而且还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对那些家境贫寒、学习吃力的同学，他更是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由于受过私塾先生的严格训练，小平的毛笔字有了相当的基础，因此到小学堂读书后，他的毛笔字进步很快，字写得也比同学们要好。当时与小平同桌的同学胡德银，写毛笔却很吃力，每次写的字老师都不满意，经常受到训斥。见此情形，小平便主



动帮助这位同学，帮助他纠正写字的动作，掌握要领。在小平的帮助下，胡德银写字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与小平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几十年后，胡德银在谈到这段经历时，总是对小平那种诲人不倦的精神称佩不已。

在协兴小学堂的同学中还流传着小平“偷钱”、义助伙伴的动人故事。那是有一天在放学的路上，一个同学突然哭了起来，小平和其他同学急忙围上前去询问原因。这位同学流着泪说，妹妹病重，正发着高烧躺在床上。如果没有医生的治疗，妹妹可能会死的。“那快去请医生呀！”有的同学急忙建议说。听到这话，那位同学哭得更伤心了。小平在一旁默默地听着，知道这位同学家境贫寒，是没有能力拿出一大笔钱去请医生的。小平默默地走向自己的家，一路上还想着这件事情。第二天一早，小平还没踏进教室就跑到那位同学身边，悄悄地塞给他5个银元。这一笔钱在当时可以买到500斤谷子，这是小平从父亲那里“偷”出来的。几天后，父亲发觉丢了钱，这是从前不曾有过的事情。他非常气愤地把全家召集起来，还没等邓绍昌说出威吓的话，小平就主动站了出来，承认是自己拿的钱，并且递给盛怒的父亲一根棍子。在接受父亲一顿呵打之后，小平含着泪离去。当怒气稍平息之后，父亲开始感到困惑不解：这娃儿平时节俭得很，给他钱都不花，怎么突然拿这么多钱，莫不是有什么事情？于是，他试探性地向儿子提出这个疑问。儿子告诉他，自己朋友的妹妹就要病死了，却无钱就医……未等小平把话讲完，邓绍昌就一把将儿子搂在怀里，连连称赞儿子做得对，然而他还想知道，为什么小平在遭受惩罚时一声不吭，也不替自己申辩。儿子回答说：不管为什么，随便拿家里的钱是不对的，挨打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他为什么要哭，那是因为自己不能挣

钱去救别人而感到羞愧。父亲被感动了，通过这件事他看到了儿子的倔强性格和强烈的责任感、义务感。同时，也看到了在儿子身上也有着他那样的坚强与自信，他决心要使儿子受到更好的教育，相信自己的儿子将来会有更大的出息。

爱国思想的萌芽

如果说在私塾的一年多学习，使童年的小平识写了一些字，算得上是文化启蒙的话，那么在协兴场小学堂读书时，所受的教育和外界的影响，对小平才算是真正的启蒙，思想上的启蒙。在协兴场小学读书时，对邓小平思想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师是邓俊德。邓俊德系邓小平相隔五代的远房堂叔，由于不满清廷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因此无意于功名，平时读书自娱，并担任了协兴小学堂的国文教师。他在课堂上和休息时经常向学生们宣传反清、革命的思想。有时他会指着远处的教堂，向学生们讲述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有时会激动地给学生们读上一段四川同乡邹容的《革命军》，慷慨激昂。虽然这些内容的讲授是零散而不成系统的，但却在邓小平的幼小心灵中埋下了爱国思想的种子。由于小平与邓俊德先生是远房叔侄，而且读书聪慧，学习优异，很得邓俊德的喜欢。所以他经常到邓先生家去玩，有时去翻弄书房中的各种书籍，或是听邓先生讲故事。童年的小平从邓先生那里开始接受了一些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

就在邓小平来到协兴小学堂读书的那一年——1911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与其他地方相比，四川人民对这场变动的感受要深切得多，这就是全川人民掀起的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遍及全川的反清武装起义。广



安协兴场这一偏僻的小镇，也同样卷入了保路的风潮，最初是一些号召参加保路运动的宣传品，如《来日大难歌》等流传。学堂里的孩子们把这类歌谣唱了起来。全川罢市罢课风潮掀起后，协兴场的一些店铺也关门闭户，小学堂也放假了。但小平和同学们并没有在家呆着，而是经常跑到协兴场上去听消息、看热闹。今天听到某地贫民暴动，捣毁了自治局；明天又是某地农民与巡警发生械斗，砸了巡警分署；不时还传来攻击外国教堂的消息。9月7日，川督赵尔丰制造了“成都血案”，惨杀群众数十人。以“成都血案”为转折点，四川保路运动发展成为由同盟会领导的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在协兴场上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并不时传来某县独立的消息。人们聚集在路边、茶馆，议论纷纷，都感到清王朝的气数已尽，盼望着革命能尽快来到身边。

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全国闻风响应，各省纷纷独立。11月22日，川东北起义民军攻下了广安县城。当天即在广安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很快协兴场上就出现了蜀北军政府的旗帜十八星旗和有着“兴汉灭满，建立民国”的告示。而且男子纷纷剪去发辫，女子也开始放脚。接着，协兴场的一些哥老会成员也纷纷参加起义军。当时似乎每天都传来新的消息，每天都有新的变化，使这偏僻沉寂的乡村顿时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振奋之中。后来军政府领导集团内部开始分化，再加之因为急于招兵扩军，新兵中的会党分子较多，带来了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和浓厚的封建思想，他们劫掠各种捐税会款，抢拿店铺的东西，使广安的乡民感到失望。皇帝被推翻了，广安人的辫子也剪掉了。但他们周围的世界依旧，那些曾经令人激动关切的动荡不安的日子不过是平静生活中的一个

小插曲，一场梦罢了。小平读书的学校依旧，教师依旧，以前上课下课下讲授的那令人激动奋起的反清、革命的故事，现在却很少听到了，或许是因为革命已经实现了，清朝已经推翻了，这曾经激动人心的东西再也唤不起人们的热情，那激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小平依旧在协兴小学堂读书。少年小平目睹了在他身边发生的一切，由动荡到沉寂，虽然他不清楚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变动的具体过程，也不了解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委，然而在他的幼小心灵中却萌发了一种关切，一种对外面世界的关切。同时在他心中开始萌发了爱国思想的种子，当然这种爱国思想还是幼稚的、感性的，它是通过一些启蒙和经历一场大变动之后，在对外面世界关切的基础上的一种自我的肯定，一种对自身以外的民族、国家的关切和责任感。这是他关心同学、救助朋友的思想品德在更深更广范围的发展和提高。

制止“割肝敬母”救学友

邓小平是1915年下半年来到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的。学堂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理科（理化知识）、史地和修身等。各科不但没有教科书，连教学大纲也没有，每门课程都是由教师自定内容。当时学堂开设有理科课程，主要是介绍一些生活中的物理化学知识，如现在小学生所学的《常识》课。教理科的老师读过几天洋学堂，上课时手拿一本翻译过来的国外类似课程的教科书，照本宣科。有一次，他给学生们提了一个问题：白的东西反光不吸热，黑的东西吸热不反光，那么为什么夏天人们要用黑布伞遮太阳？这个问题使一向死气沉沉的课

堂活跃起来，学生们在下面小声议论着，交流着。但当问到谁来回答这个问题时，全课堂却鸦雀无声，没有一个学生敢站出来回答。当问到年龄较小的邓小平时，他不慌不忙地回答道：夏天太阳很大，空气中的温度也很高，人们把黑布伞撑起后，黑布伞要吸收很多的



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旧址。1915年至1918年夏，邓小平在这里读高小。

热量，这样伞布的温度就要升高，而伞周围的空气温度就会略低一些，因此伞布与周围就存在温差了，由于有温差，空气就要对流形成风。因而当夏天人们打起黑伞时，伞面下不时产生空气对流，风就在伞顶下面盘旋，人们自然会感到凉快了。当小平回答完，先生连连称赞：答得好！不仅运用了以前学到的知识，而且还有发挥，不简单！周围的同学们也都向小平投去了敬佩的目光。现在看来，小平这个回答未必完全科学准确，但在当时科学知识十分落后、比较闭塞的县城小学中，十二三岁的邓小平能运用学到的一点自然科学常识作出这样的回答，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邓小平在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有一天从家里返回学校后，听到学堂到处都在议论着李再标割肝敬母的新闻。李是小平要好的同学，于是他急忙向同学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李再标

是家里最受母亲宠爱的孩子，他对母亲也十分孝顺。不久前他母亲得了重病卧床不起，李再标十分焦急，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由于他读了不少旧书，受传统封建礼教的毒害比较深，一些孝子的故事启发了他。为了表示自己是孝子和挽救病重的母亲，他决心剖腹割肝敬母。幸好被及时发现，刀子只在胸脯上划了一个口子。小平听到李再标出事了，马上去探望他，并严肃地对李说：“你割了肝，难道你母亲的病就能好吗？既然你母亲如此爱你，而她又重病在身，如果你割肝而死，你母亲也可能会为你的死而伤心以致命归西天，这种结果你想过没有？”小平这番直率而又入情入理的话，说得李再标羞愧无言。见此情形，小平又耐心地安慰道：“你也是读过新学的学生，要相信科学，今后再也不要做这样的蠢事了。你还是先请几天假回家，请医生给你母亲治治病，好好照顾她老人家几天，这才是你做儿子的真正孝心。”

企盼去到广安以外的世界

1918年夏，邓小平结束了在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近4年的学习，随即进入广安县立中学堂读书。中学堂开设的课程主要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博物、化学、物理、体操等课程。然而这些课程已不能完全吸引邓小平了。他一面读书，一面开始从当时国内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思索着，并开始探索自己要走的人生道路。

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向传统的封建礼教、迷信和八股文展开了全面的毫不妥协的斗争，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相对



于北京、上海这样的都城商埠来讲，广安偏僻闭塞，然而《新青年》的声音也同样激荡着小城的青年学生们，使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青年和少年学生明确了要做一名新青年，那就是要生理上身体健壮活泼；精神上斩去做官发财的思想，而去学习掌握一门本领，来“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要以自力创造自身的幸福，而不损害国家社会。总之，做一个身体好、有本事、能发展、有贡献的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安县立中学堂学生响应全国学生爱国运动，5月底召开会议，成立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并发出《公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希同胞转相劝勉，或助以言论，藉励民气，而图救我国危局。”之后，广安县立中学堂又组织了游行和罢课，在这些活动中，邓小平虽然只是参与者，但是这对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一助力，也是一次政治锻炼。从记事时候起，邓小平印象很深的就是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多，眼界的开阔，邓小平进一步了解到，不唯广安如此，不唯四川如此，整个中国都如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少年的邓小平无力解答。但是他有一种朦胧的希望，那就是将来中国富强了，这些问题或许能解决。而中国的富强，在于每一个新青年。只有每一个新青年都掌握一种本领，共同富强中国，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使中华民族不受帝国主义的欺辱。于是在年轻的邓小平心中逐渐萌发出了一种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

随着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在全国范围内爱国学生开始了罢课运动。由于从5月下旬以来一直处于罢课的局面，正常的学习、生活都无法进行，又加上已经接近暑期，于是邓小平就离开了广安县立中学堂，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这一次离开广安

县立中学堂，就永远结束了他在这个学堂学习的历史。邓小平回到家后不久，父亲邓绍昌也从重庆赶回家来，他带来了重庆准备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他主张儿子去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到法国去学习。邓绍昌做出这样一个在当时颇不同凡响的决定，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思想渊源和现实考虑的。他在成都读过书，也见过一些大世面，对乡间的落后很不满意。他认为只有到大地方去读书，才能学到一些真本事。但他虽是一个中等地主，家境却并不十分富裕。将儿子送到大地方去读书，这对他来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留法预备学校的开办，使他不必拿出一大笔费用，就可以让儿子到重庆进而到法国去见世面学本领。同时，他对遥远的法国有一种既恨又畏的情感。在广安，最早的外国传教士是法国人；最早的外国教堂是法国天主教堂；最多的教徒是法国天主教会的信徒。他本能地感到法国人（及同他们一样的外国人）的厉害和先进。对于父亲的决定，邓小平十分高兴。他很愿意通过这种机会学些本事，增长见识。通过在县立高等学堂学习4年、在广安的最高学府县立中学堂学习1年，大大开拓了小平的视野，丰富了他的学习内容，增长了知识。然而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和求知欲望的强烈，也使他感到一种深深的不满足。他开始希望能够到大地方更像样的学堂去读书学习。同时他也盼望能有机会到广安以外的世界去看一看。另外，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的作者们对法国文化推崇备至，陈独秀明确提出，青年学生如有条件应去法国留学。这种主张对当时的青年学生有相当大的影响，相信邓小平也不例外。再有，和当时的许多青年学生一样，邓小平也认为中国的贫穷落后和政治上的黑暗混乱的原因就是工业文明落后。因此只有发展实业，

使国家富强起来，才能改变这种面貌。受这种“工业救国论”的影响，邓小平也很希望有机会出国去学点本事，回来办工业，为国家富强出力。由于这种种想法，当父亲谈到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招生，并建议他去报考时，他高兴地同意了。虽然出于不同的思想和考虑，然而在到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读书这个问题上，父子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一决定，影响了邓小平一生的命运。

暑期结束后，邓小平没有再回广安县立中学堂去上课，而是踏上了一艘开往重庆的货船。当货船从广安县城东门口码头缓缓驶出的时候，邓小平的眼中流出了眼泪，他的眼前浮现出那熟悉的邓家老屋，浮现出母亲和姐姐妹妹哭着送他离家的情景；他想起了童年的伙伴们，想起了协兴小学堂、县立高等小学堂和广安中学堂的同学和老师们，想起了在广安县城求学几年的一切。他最后望一眼渐渐模糊的小城，暗暗下了决心：一

广安东门码头。1918年暑期结束后，邓小平从这里乘船去重庆，后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



定要再回来，学好本事再回来。他没有想到，从此一离七十八载，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

邓小平在广安生活了15个春秋，在这里，他从一个牙牙学语的稚童，成为一名接受过一些新式教育的中学生；在这里，他感到了20世纪初的风云激荡，目睹了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在广安引起的震波，体会到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在这里，他初步形成了朴素的爱国思想，正是在这种朴素的爱国思想的激励和支配下，年仅15岁的邓小平告别了亲人，告别了故乡，乘船东下，沿着滚滚翻腾的渠江，穿过乱石险滩，向着新的目的地进发。

（本文根据“邓小平青少年时代和邓氏家谱”研究专家、广安市委宣传
部原副部长蔡世武的专著改写）



从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奔向狂啸的海洋

蜀人吴玉章与留法勤工俭学

在四川荣县吴玉章故居,有一张1940年1月24日延安《新中华报》的复印件。该报刊载了毛泽东在中央为吴玉章补办六十寿辰庆祝会上宣读的《祝词》全文。毛泽东在《祝词》中赞扬吴玉章: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毛泽东给吴玉章的这段祝词后来被收入



吴玉章故居门口的纪念碑上，有邓小平题写的 30 个大字。

“文化大革命”中全中国人民都要背诵的《毛主席语录》，以后又被收入《毛泽东文稿》，在国内国外影响极大，使两三代中国人都耳熟能详。

在吴玉章故居门口，耸立着一尊吴玉章半身塑像的纪念碑，纪念碑上镌刻着邓小平亲笔题写的30个大字：

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
历史学家、语言文学家 吴玉章

邓小平



平常不轻易题字的邓小平为什么一下子就题写了30个点划舒展、笔力雄健的行楷呢？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吴玉章和他倡导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邓小平不可能去法国勤工俭学，有关邓小平的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可能会改写。

笔者在担任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联合摄制的《邓小平与四川》电视片的两位总撰稿之一和策划人之一时，多次采访了吴玉章的外孙蓝其邦。这位从小在吴玉章家里长大、一直受吴玉章言传身教、自14岁起就投身革命、现已年逾古稀的老人，向我谈起过邓小平几十年来对吴玉章的特殊感情，他特别讲到了“关键时刻见真心”的事。蓝其邦说，“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常常到北京东四“六条胡同”吴玉章的家里去看望，有时与刘伯承（吴玉章是刘伯承的入党介绍人）、陈毅、叶剑英一起去，有时他一个人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老也受到冲击，最后于1966年12月12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早已被打成“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在吴老病逝的次日，什么样的风险也不顾，即赶往医院去见吴老最后一面，而且在吴老的遗体前伫立良久、默哀沉思。蓝其邦说，一些与吴老过去关系还可以、“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像小平同志那样被打成“第二号走资派”的人，因种种原因，没有前去；而邓小平当时的处境那么困难，当他从他视为“兄长”的周恩来那里得知吴老病逝的消息后，立即前往，可见吴老在小平同志心目中的地位。

吴玉章原名永珊，号玉章，1878年12月30日生于四川省荣县双石镇蔡家堰。吴玉章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清王朝腐败无能、列强入侵。吴玉章曾就读于成都尊经书院、贡井旭川书院等校。

他20岁时，正值戊戌变法，便立即投入了这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运动，极力宣传新政。戊戌变法失败后，吴玉章深感“改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为求富国强兵之策，于1903年走出蜀乡，东渡日本留学，接触到孙中山、章太炎等人。

1906年，吴玉章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并被选为评议部议员（后在执行部工作）。次年，他在东京主持“鼓吹革命”的《四川》杂志。“使此黑暗世界大放光明”的《四川》杂志被日本警视厅封禁后，吴玉章又被判处半年徒刑（缓期执行）。1910年6月，吴玉章回国参与筹备广州起义，并于次年3月参加起义。

1911年7月，吴玉章回到故乡四川荣县，于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率先在全国建立了第一个县级资产阶级政权——荣县军政府。11月26日，他又组织领导四川内江独立。1912年1月，吴玉章应孙中山之约，任总统府秘书。

也就在1912年，吴玉章便成为这时刚刚成立的全国“留法俭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这一团体虽未重视“勤工”，但却是最早从事提倡和组织中国青年赴法留学的机构。作为四川人，吴玉章不仅在全国奔走鼓吹，而且尤为关心蜀乡青年的前途。1912年6月，他便与朱芾煌等人一道发起组织了“四川俭学会”，



吴玉章在日本东京留学时留影



开始了留法俭学运动的先声。他认为：“欲求利国福民之术，非学莫由。国内求学未备，势非留学不可。”1912年11月，从北京出发赴法留学的四川籍的著名人物有后来的数学家何鲁（邓小平故里广安人）等，他们首开四川赴法勤工俭学之先河。

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后，吴玉章参加了反袁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明令通缉”的吴玉章于1913年11月流亡法国。法兰西是巴黎公社的故乡，是“平等、自由、博爱”等民主思想的故乡。吴玉章在法国期间，入法科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他关心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并对法国社会作了考察，知道法国工厂大量需要劳动力，而此时外国去法人数不多，华、法双方都很重视中国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遂与蔡元培等组织“华法教育会”于巴黎，还担任会计职务，以具体负责组织旅法事宜。

1916年反袁称帝的斗争在国内爆发，吴玉章被护国军政府“托以外务”，负责在欧洲各国多方活动，禁阻袁世凯政府向外借款。吴玉章并在法国《人道报》等报刊上撰文，动员舆论支持民军、反对袁世凯。袁世凯暴毙后，吴玉章从法国回到国内。他除向北洋军阀政府交涉华工赴法条约的批准事宜外，并着手重建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不久，吴玉章回到四川。他以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卓越的活动能力、组织能力，邀请了四川的当权者及各界名流，诸如省长、高等法院院长、督军等分任“华法教育会四川分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会”的名誉赞助员、评议员和执行部正副会长等职，以取得社会各方的支持，并且制定了以“勤于工作，俭于求学，以促进劳动者之知识”为宗旨的《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会简章》。他还亲自发电报或写信给上海华法教育会联系四川勤工俭学学生出国事宜。吴玉章的组织和号召，对于全国和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涨起



吴玉章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16年秋在法国出版的《旅欧教育运动》就刊载了吴玉章等人“发起四川俭学会、设预备学校于成都少城济川公学，办法与北京者略同”等内容的文章。

1917年2月，吴玉章回到北京，同李石曾、蔡元培（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等又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即法文专修班）。

作为全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的吴玉章，在四川更是积极倡导和组织这项运动，使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迅速发展。全川共有98个县的511人（其中女生14人）赴法勤工俭学，其学生总数及女生数均为全国各省之冠。其中仅成都县就有54人，巴县51人，江津县44人，就连当时比较闭塞的邓小平家乡广安县也有6人赴法勤工俭学。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曾这样写道：“四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由吴玉章亲自倡导和领导的。1918年，成都和重庆两地分别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是1918年春天创办的，校址设在爵版街。吴玉章任该校名誉校长，志诚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和四川高等法院院长先后任校长。学校第一届招收了包括当时不足17岁的陈毅在内的80余名学生。1919年6月1日，该校第一届毕业生61人由成都启程取道重庆赴上海到法国。

1919年9月12日，成都《国民公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前次成都赴法学生取道重庆时，重庆总商会会长汪德薰（云松）观此盛况，即与法国‘博领士’磋商在渝设立留法勤工俭

学分会”。

汪云松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亲眼目睹了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意气风发地登上轮船、取道上海，深受感染，便筹备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邓小平后来就在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邓小平就读的这所学校，不但受到吴玉章动员四川各界人士的支持、赞助，而且当邓小平从该校毕业要去法国时，吴玉章也正在重庆法国领事馆附近的“仁爱堂”医院住院治疗痔疾。由于住院治疗，吴玉章便不能去送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上船。

川江通海万里船

1919年9月，正是蜀乡大地处处流丹、桂花飘香的季节，邓

小平与他的远房叔叔邓绍圣、另一位亲戚胡伦一起从广安东门码头乘船，沿渠江而下，到了重庆。比邓小平大4岁的胡伦又叫胡明德，邓小平是他的堂姐夫。邓小平的父亲与胡伦家曾在广安共同操办起“协兴小学”。当年辈分各异的邓小平与邓绍圣、胡伦一起在协兴小学读书，以后又同是广安县中学的学生，这时又一起来到了重庆，要进由汪云松任董事长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邓小平和他的远房叔叔邓绍圣1921年3月在法国合影。

汪云松字德薰，比吴玉章年长4岁，1874年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其父汪在椿，经

营济兴隆商号，做布匹、棉纱生意，几十年从未迁地易业，在重庆城声望日高。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汪云松从小就喜欢读书，青年时考选上贡生，入北京国子监深造，由此有机会与京师的皇亲国戚交往。1905年，他到江苏出任知县，后保升道台，奏调吉林先后任省官银号总办等职。尽管当时盛行“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之说，但辛亥革命成功后，汪云松携眷返回重庆时，除了带回一些古玩字画和在吉林十分便宜的皮衣外，便再没有其他财产。此后，他见重庆城缺医情况十分严重，便与几位乡贤筹办起了巴县医学堂，后改名重庆存仁医学校，并一直担任董事。此间，汪云松除协助父亲经营济兴隆商号外，还于1919年与人创办了大中银行，亲任总经理。鉴于他的名望与人品，当时被推为重庆总商会会长，连任三届，并任重庆市参议会议长。

俄国十月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欧洲革命风暴，以及中国国内在此前后发生的改良、维新直至五四运动，进一步促使了四川人民的觉醒，也促使勤工俭学运动在四川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入。当年在清朝为官时，汪云松就赞成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主张（他还珍藏了康有为手书的横幅）。吴玉章在四川倡导和领导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又使崇尚实业救国的汪云松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之后，汪云松在吴玉章的支持下，多方奔走，向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集资数万元，并请法国驻重庆领事担任名誉赞助员，与朱芾煌等人发起（如前所述，朱芾煌和吴玉章早于1912年共同在成都发起成立了“四川留法俭学会”），于1919年8月28日，正式成立了四川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汪云松任会长。这以后，他们又积极着手筹备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在四川工商界及社会名流捐款数万元的赞助下，到1919年9月中旬，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正式开学，从四川18个县共招收学生110人。根据学生的文化程度，学校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分班上课。

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由汪云松任校长，学校设在重庆市中心的重庆孔庙（俗称“夫子祠”）内（今重庆市第29中学校所在地）。当时仅在孔庙明伦堂前的泮池周围建造了几所简陋的房子作为上课的教室，因陋就简，设备很差。学校的组织比较松懈，学生们上课就来，下课就走，没有宿舍、体育场所。邓小平和其他学生一样，在校内主要学习法语、数学、工业知识等4门课程，目的是要粗通法语并掌握一定的工业技术常识，为去法国勤工俭学作些准备。其他课程和活动等是很少有的。在该校教法文的教员有二人，一是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翻译王某，一是曾经留学法国的张某。

与邓小平同在该校读书的四川江津人江克明1980年回忆说：“邓小平同志是稍晚才进入这所预备学校的。他那时就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江克明还回忆说，他们课余经常“去浏览重庆的名胜古迹，漫步在长江、嘉陵江岸边，欣赏这座古老的山城，深感祖国的伟大和可爱。那时，我们还不懂得革命的道理，但却为祖国不断遭到列强的蹂躏而愤慨不已。重庆早已是通商口岸，设有各国领事馆，有一条街就叫领事巷（在打枪坝），外国人还开办了不少的洋行、公司，享有涉外法权，外国商船兵舰在大江中任意往返。看到这些情景，使我幼小的心灵，感到沉重的压抑。有时就和同学们一起高唱当时富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歌曲《中国男儿》，互相倾吐重振祖国声威的抱负”。

江克明的回忆文字，也应该是他的同学邓小平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邓小平和他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其他同学一道，为了抵制日货，反对卖国贼，曾经集体到重庆卫戍司令部去示威请愿，并在那里坚持了两天一夜的斗争，得到了初步结果。他们回到预备学校以后，就自动把带有日本商标的牙粉、脸盆等日用品摔在地上焚烧，把洋布衣服也撕毁，表示再也不用东洋劣货。邓小平的同学江克明回忆说：“当时，时代的脉搏，爱国的思想，在冲击着我们的头脑。广大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高昂的爱国热情，给了我深刻的教育。”

是年11月，重庆警察厅长郑贤书挪用公款4000多元，廉价购买信孚洋行的日货80多箱，以警察厅的名义公开拍卖。该举激起了学生们的抗议。11月17日上午，川东师范、重庆联中、巴县中学、商校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1000多人先到卫戍司令部、镇守使署、道公署，然后到警察厅示威，强烈要求郑贤书交出日货。郑贤书吓得不敢出见，于是学生们将警察厅紧紧围住，彻夜不归。学生们的爱国行为，得到市民的声援，送来稀饭、馒头等食品，慰问、声援学生。重庆卫戍司令部和商学联合会也派人前来支援，向郑贤书施加压力。面对激愤的学生和各界的压力，郑贤书被迫在黎明时分答应交出日货。

18日上午，邓小平和他所在的预备学校的全体同学与其他学校共1000多名学生，不顾疲乏和饥饿，整队到商会，等候郑贤书交出日货。不料背信弃义的郑贤书却带着几十名卫兵气势汹汹来到商会，勒令学生散去。抗议郑贤书不讲信用的学生和卫兵发生冲突，卫兵开枪打伤两名学生。愤怒的学生与卫兵展



开搏斗，将其武装解除。郑贤书见势不妙跳窗而逃。当天下午，邓小平与他的同学们在重庆朝天门怒烧郑贤书所购部分日货。这场斗争最终以四川当局被迫撤销郑贤书重庆警察厅长职务而告终。

虽然邓小平参加了这一系列斗争，但十五六岁的他的思想尚且处在幼稚当中。这正如他的女儿毛毛所说：“父亲曾回忆，由于参加了这个运动，爱国救国思想有所提高。但是，所谓的救国，无非是当时在同学中流行的所谓工业救国思想。”

经过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近一年的紧张学习，通过考试、体检，有83名学生获准赴法，邓小平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名。这83名赴法学生中，邓小平的远房叔叔邓绍圣等46人取得公费生（也称贷费生）资格，公费生由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提供300元路费和其他费用。胡伦和他的堂姐夫邓小平等37人则为自费生。自费生获重庆工商界捐款资助每人100元现洋，自筹200元。

正当邓小平和他的82名同学忙碌地进行着奔赴异国他乡的准备工作时，从学校筹划、集资、选址、聘请教员、考试、办理签证，直到最后要送走毕业生都极尽热心的汪云松，把邓小平找到一边，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300元送给他，并热情地勉励一番。汪云松为何给邓小平如此优待呢？过了多年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当刘邓大军推进中原、威震四方时，汪云松就带着几分自豪地对思想进步的外侄孙杨钟岫（时任重庆《新民报》记者，现为重庆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说：“这个邓小平原名邓希贤。他有两点我最喜欢：一是稳而灵活，干啥子事情都很有主见；二是爱国有正义感。当时我就觉得，希贤这娃娃将来一定有出息！”



汪云松

汪云松不但帮助了邓小平，还帮助过聂荣臻。

1919年12月，在四川江津中学读书的聂荣臻和其他同学因反对签订“二十一条”、组织“外交后援会”、参加抵制日货等行动，为地方军阀所不容，聂荣臻便与钟汝梅等21人，每人自筹300元，由江津到达重庆，欲直接自费去法国勤工俭学。因聂荣臻他们这批学生与法国领事馆不熟，于是找到在

重庆《商务日报》当编辑的熟人刘颖彬。刘便找到与法国领事馆十分熟悉的汪云松，委托他为聂荣臻等21人代办护照。汪云松自然热心应允。几经奔走，终于使聂荣臻一行于12月19日顺利地朝朝天门码头启程取道上海去法国。

比邓小平和聂荣臻先期到达法国勤工俭学的四川乐至县人陈毅，因被法国当局以“过激党”和“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强行囚禁并于1921年10月13日强制遣送回国时，经济极度困难。汪云松闻知，又想办法筹备了一笔经费汇去，解了陈毅等34名四川籍勤工俭学学生的燃眉之急。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1950年第二届全国政协开会时，汪云松应邀前去列席。他回来讲，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宴会，头一桌的主人是毛主席，第二桌有小平同志，他也坐在第二桌。小平和陈毅分了工，小平同志请客，陈毅宴会后用自己的车子送他回招待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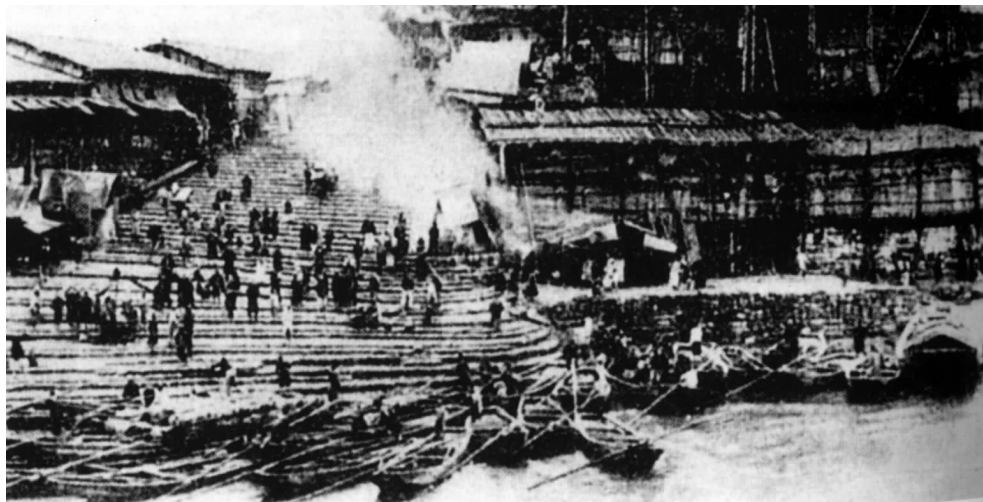
毛毛还写道：“当时在重庆统战部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说，后来邓小平同志还说过，汪云松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副总理——指小平同志和聂荣臻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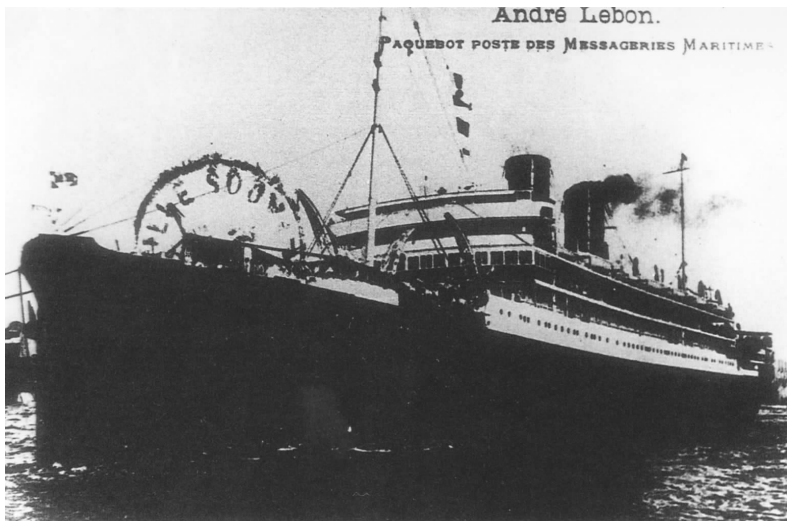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亚洲6国后，从昆明乘飞机到了重庆，也曾当面夸奖汪云松：“你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

汪云松的大孙女汪毓秀讲过这样一件事：1950年爷爷从北京回到四川后曾经谈到，政协会议结束的当天，在怀仁堂和中央领导人合影时，他拿到照相站队的号票一看，不由得心头一热——这号数和他的年龄一样，都是76，便猜想，这可能是邓小平的有意安排，因为只有邓小平知道他的确切岁数。

1920年7月19日，邓小平与他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另外82名同学在重庆商会举行毕业典礼。

20世纪20年代初的重庆朝天门码头。邓小平就是从这里登上“吉庆”号客轮，东下上海，转赴法国。





法国邮船“塞特莱蓬”号。1920年9月，邓小平登上这艘邮船从上海赴法勤工俭学。

1920年8月27日（农历七月十五日），刚刚过了16岁生日三天的邓小平，与82名预备学校的同学、再加上未进预备校的江津学生熊之章一起，整队出发，出太平门，登上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号客轮，宿船一夜，准备东下。

1920年8月28日，“吉庆”轮在朝天门码头提锚启航，破浪东下。

抱着“工业救国”思想要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邓小平，和其他83名川东弟子一道，坐在“吉庆”轮上，在曲曲弯弯、波涛汹涌、一泻而下的川江中乘风破浪。这84名川东弟子，都是第一次出远门离开四川。他们一面聆听着川江岸边那雄浑激越、亢奋高昂的川江号子声，一面饱览着川江两岸山势突兀、群峰矗立、旖旎秀美、令人陶醉的层峦叠嶂美景。当他们仰望了耸立在云雾中的巫山十二峰的神奇、欣赏了举世闻名的天险三峡

的壮美、绕过急流险滩以后，就看到了开阔的江面。他们中的不少人，通过沿途这一亲眼所见，从朦胧中开始领悟到了曲折人生之真谛：面前的道路犹如滚滚长江一样，不会是径情直遂的，会有急流、有暗礁、有险滩，会有“两岸猿声啼不住”的“万重山”；不过，只要认定了奔向狂啸的大海这个目标，急流险滩后，总会看到开阔的海面——“万重山”是遮不住的。

邓小平和他的同学们到达宜昌后，途经汉口、九江、南京，

到达了上海。经华法教育会办理了手续，大约一个礼拜后，便乘坐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徐徐开出杨树浦码头，奔向那狂啸的海洋。

与邓小平同船的同学江克明回忆说：“我们从上海出发，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路过科伦坡，渡过印度洋，到达红海，又通过苏伊士运



1921年3月，16岁的邓小平在法国的留影。

河。”

生在蜀乡、长在蜀乡的邓小平，第一次看到了大海，第一次亲身体会到了“海纳百川的胸怀”之含义，第一次领略了蜀人常说的“入浅水者得鱼虾，入深水者得蛟龙”的意境。他多次在船头放眼眺望，眺望那潮起潮落、变幻莫测的狂啸大海，眺望那狂啸大海中沉浮的舟船，他似乎还听到了自己的胸中也有了汹涌起伏的潮声，他似乎从潮声中由混沌里看到了光明，看到了他希冀的“工业救国”的美好憧憬。

随着轮船向着法兰西的方向每靠近一海里，邓小平对蜀乡故土的眷恋便增加一分。无论走到哪里，广安古城那千家灯火映着的弯弯渠江水，协兴乡那阡陌纵横的农田和翠绿欲滴的竹林，牌坊村那一座马蹄型宅院中埋怨父亲“把十五六岁的娃儿弄到那么远的地方”的慈母，那洒泪送别哥哥到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去读书的妹妹……总是令邓小平魂牵梦绕，心驰神往。



雪山草地见证浓浓乡情

西蜀雪山下，喜逢川籍老战友

1920年8月，邓小平离开四川，奔向那狂啸的大海，去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15年以后的1935年，邓小平随同长征的红军将士一道，又回到了四川。

邓小平的女儿曾问过父亲：“长征时你干什么工作？”

邓小平只用四川乡音回答了三个字：“跟到走！”

大约距此860多年以前，一位名叫苏轼的蜀乡眉山人在一首《水调歌头》的词中写道：“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红军长征之前的1933年，邓小平被冠以

“江西罗明路线领袖”的罪名第一次被打倒。那时，邓小平先后被撤销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在政治上蒙受了不公正待遇。长征开始以后，邓小平那顶“右倾错误”的帽子还没有摘。遵义会议后，邓小平随部队于1935年1月底一渡赤水河，从贵州境内进入了四川。“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曾指挥过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曾问毛泽东，在你所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等三大决定性战役中，你最看中哪一个？毛泽东的回答是：这三个都不是，在我一生的军事战略中，我最看重的是红军四渡赤水的胜利，这是我一生中最得意之笔。当年长征时在川黔边的较量，毛泽东把对手蒋介石玩于股掌之上。对于毛泽东率领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在赤水河兜圈子的迂回战，邓小平这个四川人曾用四川农村的俗语说：“那好比猫捉老鼠，老鼠捉猫。”即数倍于红军的敌人欲“捉”红军，不想却被红军引得晕头转向地团团打转，受到重创：大猫想捉小老鼠，反倒被小老鼠着实地捉弄了一番。

1935年6月中旬，邓小平随部队来到了四川宝兴县夹金山下。一扫包括邓小平故里广安在内的四川盆地的阴沉与压抑，川西北高原给邓小平一种深邃与高远的感觉。他在夹金山下看到了蓝天、白云，看到了红日、雄鹰；他在夹金山上，感受到了高原的山风总是那么强劲。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在过夹金山之前，他的马死了，所以过雪山时，别人还有马尾巴可以拉着借劲而行，而他却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地向雪山顶峰爬去。在夹金山顶峰，邓小平放眼望去，只见雄奇壮美的积雪山峰，兀立在寥廓澄澈的天幕下。明

净的苍穹下雪峰的积雪，在阳光照射下熠熠发光，晶莹夺目。邓小平仿佛从一个喧嚣的尘世来到了一个没有世俗纷争，没有尔虞我诈的清幽世界。雪山上既没有浊尘，也没有瘴风。

翻过夹金山以后第二天，邓小平到了懋功县城。懋功县城坐落在一个长长的高山峡谷中。山谷里隆起一座扁平的山，县城就建在被重峦叠嶂包围着的扁平的山上。小金川河围绕县城深深的谷底流过。就在懋功县城，邓小平终于见到了与他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一起去苏联、一起从事革命活动、朝夕相处的老战友傅钟。这位川籍老战友，这时正担任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副主任。

1984年，笔者在主编《红军长征在四川》一书时，曾经采访过傅钟上将（1955年，毛泽东授勋时，四川籍的元帅有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4人，而上将只有张爱萍、陈伯钧、傅钟3人）。当时笔者向傅钟上将主要采访有关红军长征在四川方面的内容，有关他在红四方面军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情况，有关他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在川西北高原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情况，有关红军四渡赤水路过他的家乡四川叙永时，叙永城郊营盘山上橘子正红，但纪律严明的红军虽饥饿难忍却秋毫无犯，1981年他为叙永县家乡修建的红军长征纪念碑题写“营盘山上橘子红”碑名的经过等等。采访之前，笔者刚好读到过一篇20世纪50年代徐承武同志访问整理的傅钟上将回忆他和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文章（该文还注明“1980年4月8日经傅钟同志本人审阅、修改”），也就顺便请他谈了这方面的情况。笔者20年前采访傅钟上将有关他和小平同志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内容，想不到竟能在20年后派上用场。



傅钟上将

平易近人、没有任何架子的傅钟上将，提到他和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这件事，特别高兴，他说：“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傅钟上将便侃侃而谈，让他的思绪，上溯岁月之河，因为最美好的回忆总是与最细微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

傅钟比邓小平大四岁零两个月零一天，1900年6月23日生于川南叙永县一个书香门第家庭（邓小平生于1904年8月22日）。傅钟的父亲经营蚕桑，思想开明，仰慕维新。傅钟在孩提时代，母亲就以唐诗、四书启蒙。四川的“保路运动”和在武昌发生的起义，给少年傅钟和他开明的父母都有影响。傅钟的哥哥在父亲支持下进了成都陆军军官学校。以后，傅钟通过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成为叙永县抵制日货运动委员会的干事。也是为了寻求救国之真理，傅钟去到思想比川南山区小县叙永活跃得多的上海。在上海预习法文时，认识了周恩来。

傅钟和邓小平一样，也是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只是那个时候，傅钟和邓小平互不认识。傅钟去法国，没有与邓小平同乘一条船，而是和周恩来一块去的。

到了法国较长一段时间，傅钟和邓小平才认识。一经认识，两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不久，邓小平和赵世炎、傅钟、刘伯坚等100多名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都相继进入法国南



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梭市（Creusot）的施奈德工厂（该厂为法国最大的军火工厂）。邓小平与傅钟住在一起。他们的住地离工厂较远，要坐火车上下班，早上3点左右就得起床，迟到了进不了工厂，次数多了就有被开除的危险，由于极度疲劳，不少人下班后在火车车厢里就睡着了。邓小平与傅钟在厂里的工作不但不轻松，而且还有一定的危险。1922年5月的《工学月刊》记载了傅钟这样一件事：

“此种工作轻则折手断脚，重则生命不保。四川有个姓傅的同学，作这种工未小心，被车轮压了足指，幸不甚重，没两月就医好了。”

邓小平与傅钟住的是木板工棚，睡的是双层床，几个人共用一个汽油炉，吃得极省，因为每人每天只有10至15法郎，还得从中积蓄学费。邓小平后来曾经回忆说：“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

邓小平认为，他身材矮小，可能与正在长身体的青年时代，却在法国经常吃不饱饭有关。邓小平的女儿曾经对笔者说过一件事——她有一次问父亲：“为什么二叔（邓垦）长得那么高，而你那么矮呢？”邓小平就对女儿作出了这样的解释：“那个时候我十六七岁、十七八岁，正在长身体，却经常连饭都吃不饱哟！”

由于邓小平、傅钟和四五百名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的莘莘学子，所得收入只够勉强糊口，经济十分拮据。1921年，经“旅法四川勤工俭学同乡会”（后改名为“旅法四川勤工俭学同学会”）数月间几十次函电回四川求援，再加上因进占里昂大学而被驱逐回四川的陈毅等100多位勤工俭学学生在国内的奔走呼吁，四川成都和重庆各界捐款30多万法郎汇至巴黎，救助陷于

困苦之中的数百名川籍勤工俭学学生。邓小平、傅钟也才与其他川籍同学一样，领到了400法郎。

1921年4月，邓小平与傅钟回到了巴黎。几个月后，傅钟由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邓小平也于1922年加入共青团，1924年正式转党。

1922年6月，由赵世炎、周恩来、傅钟等人发起，成立了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川籍）、周恩来、刘伯坚（川籍）、李富春和傅钟（川籍）5人先后担任书记，邓小平则担任过该组织的执委和团支部负责人。“少共”成立不久，便创办了一份机关刊物《少年》。邓小平那时即为《少年》刻蜡板和油印。以后，《少年》改名为《赤光》，邓小平与傅钟等人都参与了《赤光》的工作。“油印博士邓希贤”即是那个时候被人叫出来的。“油印博士”既是对邓小平辛勤劳动的肯定，也是对这位年轻的革命者的鼓励。（“1980年4月8日经傅钟同志本人审阅、修改”的20世纪50年代徐承武同志访问整理的傅钟上将回忆他和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文章也说：“小平、[李]富春和我都搞过《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

1925年6月30日，旅欧共青团临时执委宣告成立，傅钟任书记，邓小平、毛遇顺任委员。邓小平与傅钟还同时在党团刊物上担任投稿人。中共旅欧支部和共青团的活动愈有战斗性，法国政府就愈紧张。法国警方先是秘密监视、跟踪，继而发展到搜捕旅欧党团的负责人。1925年8月20日，邓小平和傅钟因革命工作的需要，搬到了巴黎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5号房间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几个月后的1926年1月8日早晨，当巴黎警方去到邓小平和傅钟住的5号房间要对他们实行逮捕时，才发现扑了个

空——邓小平与傅钟已于7日坐上北去的火车，取道柏林、华沙，到苏联去了。就在邓小平和傅钟离开巴黎几个小时之后，法国警察在邓小平和傅钟住的5号房间发现了“大量的共产党中、法文宣传小册子，两架带钢板和滚筒的油印机和几包印刷纸”。巴黎警察局在这次搜查后的报告中写道：“这些人似乎感到自己已被怀疑，就仓促出走了”。10天后，巴黎当局签署了驱逐傅钟、邓小平等人出境的命令，并注上“有待通知”的字样。巴黎当局不知道他们永远也不会通知到被“通知”的邓小平和傅钟了。

当邓小平和傅钟到了莫斯科以后，两人一道先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不久又一道转入新办的“中山劳动大学”。中山大学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和学生总支部局副书记由傅钟担任，而邓小平则担任第七班的党组书记。

1926年底，邓小平奉命回国，而他的同室战友傅钟则因工作需要留在莫斯科，直到这以后4年才回国。

傅钟1930年春天正准备回国时，在莫斯科街头与周恩来不期而遇。周恩来得知他即将回国很高兴，颇有感慨地说，你是海外10年呀！国内正需要你们回去参加斗争。周恩来还向傅钟谈起他的同室好朋友邓小平回国4年来的大概情况。

傅钟回国后，先在上海负责中央军委干部和兵运工作，后进入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苏区军委政治部部长。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通江、南江、巴中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后，傅钟担任川陕革命根据地临时省委书记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务。

傅钟和邓小平分别了将近10年，他们朝思暮想，都想要与老战友重逢。

当邓小平所在的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傅钟与另一位川籍干部、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代表红四方面军总部，随红三十军南下迎接中央红军。

在红四方面军刚刚同中央红军会师的时候，傅钟就打听邓小平的下落。

中央红军肖华带的部队断炊了，傅钟便将红四方面军一个营的全部粮食给了他们。傅钟腾出了自己住的房子给毛泽东，把自己的一匹能驮善走的骡子给了周恩来。

那么，傅钟送了什么给邓小平呢？

关于这件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是这样写的：“在懋功，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父亲遇到了与他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傅钟。他们两个一起在法国，又一起在苏联学习，交情可不算浅。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来，兵强马壮，实力雄厚。傅钟那时候在四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按，应为副主任，主任为陈昌浩），颇有点权，他看见他的老战友的马死了，

纪念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的达维会师桥



便立即慷慨解囊。父亲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样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

和邓小平这位老战友在川西北懋功重逢以后，傅钟兴奋地说：“当年在法国我们住一个房间时，你常常给我做川菜吃。今天，就由我给你做四川回锅肉吃，要不要得？”

与老战友喜相逢后兴致很高的邓小平听后，接连说了几个：要得！要得！要得！

20年后的1955年，邓小平的老战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被毛泽东授予上将军衔。

50年后的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李先念邀请包括傅钟和何长工、李井泉、夏衍等在内的21位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老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欢聚

邓小平与傅钟于1985年9月又相会



一堂并共进午餐。当邓小平向老战友傅钟敬酒时，傅钟对邓小平说：“老战友，我今年85岁，你81岁，希望你活到2000年，那时你96岁。”

邓小平说：“我希望我们大家、今天在场的每一位，都活到100岁。”

水草地上精神会餐： “还是四川回锅肉才好吃”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邓小平被调到红一军团任政治部宣传部长，他原来担任的中央秘书长一职由张闻天夫人刘英接替。刘英回忆说，当她接到通知到中央报到时，毛泽东对她讲：小平同志要上前方了，他的工作由你接替。刘英回答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毛泽东笑着回答：“你做得了！这次调动小平同志的工作，是因为前方需要加强，他很有才干，调他去前方，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以后，不但努力工作，而且非常关心干部、关心战友。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也是四川人）有一段在川西北雪山草地难忘的回忆。

当时，李伯钊任红一方面军战士话剧团团长，积极响应红军总政部关于筹备粮食准备过草地的号召。总政治部要求无论上级、中级、下级或是连队的士兵，全体总动员，想方设法筹粮，并规定每人一天必须筹够5个馒头的粮食，无一例外。有一天，李伯钊与黄镇等3人在河边洗粮食时，拣到河边漂浮着的麦粒，多做了几个馒头，没有“交公”。后来，别的同志把此事报



告了管粮食的同志。管粮食的同志找到李伯钊郑重其事地说：“不管你们怎样弄到麦粒，既然做成了馍馍，你们应该一律交公，不得私存。”李伯钊只好把多做的几个馒头交出来了。当时，李伯钊不太高兴，坐在地上生闷气。

正在这时，邓小平提着一个小布袋走了进来，坐在地铺上，慢慢地从小口袋里拿出几个馍馍说：这几个馍馍是交公的。留在口袋里的则不是交公的。

然后，邓小平从口袋里取出一个馍递给李伯钊：你饿了吧？给你！

李伯钊说：“我不要。你留着自己吃吧！”

邓小平急忙说：这是我送给你的，不要你还。

李伯钊接过馍馍，心里忽然一酸，扑簌扑簌的眼泪直往下滴：“小平，你对人真好，在困难时候这么关心人，多么难能可贵。”

邓小平说：不要生气了。你想想，不久以前，当我们刚刚翻过夹金山，在懋功县达维的大坝子举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联欢的晚会上，你这个一方面军战士剧团的团长带领剧团的演员，为两个方面军的同志演出了那么多反映红军战斗生活、歌颂长征的话剧和歌舞，你还带头指挥两个方面军的同志高唱用《二次全苏大会歌》曲调编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

邓小平还没有说完，李伯钊就笑了起来：“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小平，我听你的，不生气了。”

邓小平曾对他的女儿说：“爬雪山、过草地，历来被同视为长征艰难的象征。殊不知，过草地，比爬雪山还要艰难。川西北的大草地，上面是野草无边，下面是黑水弥漫。”



邓小平长征中翻越的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

有人把川西北大草地比作一个妖艳的女人，因为它有着美丽诱人的外貌，又可以用深不可测、吞没人马的泥潭把人诱向死亡。邓小平与他的战友们来到这里时，正是降水量特别多的8月。

8月是川西北草地繁花似锦的季节，但对红军指战员来说，鲜花之下却隐藏着死亡的威胁。这里无路可沿，部队只有在向导的指引下，踏着掩盖千年沼泽的草甸缓缓而行。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无日不雨。雨水不仅淋透了战士们的衣衫，也淹没了前进的路线。有些地段连续几十里水深没膝，使向导难以寻找过去放牧留下的痕迹，有的战士也因此而偏离了部队的路线，陷身淤泥，为沼泽所噬。8月也是草地冰雹肆虐的季节。有时，面对铺天盖地的冰雹，战士们连藏身之地也找不到。草地上许多地方的潴淤之水，因陈年衰草腐蚀其中，不仅不能饮用，且若伤口染之，则立刻感染肿溃，重者使人致残。有时虽遇溪流小河，却因无柴，连开水也喝不成。茫茫草地里，除偶有堆堆簇簇的灌木丛出现于缓坡平岗，却连一株参天栖鸟的大树木也



红军长征经过的镰刀坝水草地

没有，常常使人方向莫辨，部队有时艰难地行进了几个小时，才发觉仍旧回到了原地。

行路之难阻滞着部队的行动，缺食之苦也威胁着战士的生命。过草地前，部队虽开展了筹粮工作，但“物产不丰”的川西北高原，难储数万大军之食。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这样写道：“当时红军所在的川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虽然远离敌人控制的中心腹地，但人口稀少，地贫人穷，交通给养都很困难，十多万人的大军根本不可能在此久驻。”

草地荒无人烟，根本谈不上沿途补充，加之高原的寒冷又削弱着红军的力量，昼夜温差达 25°C 以上。夜晚，战士们尚未从白天的日晒雨淋、饥饿疲劳中解脱，寒冷便又袭来。强劲的高原风吹向露宿于草坡上的战士，寒彻体肤。红军系远征之师，战士衣单体弱，疾病交加，内无果腹之食，外乏御寒之衣，饥寒交迫。每当黑夜过去，宿营地便留下许多长眠的英灵。

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无比艰难的沼泽行军中，邓小平与战士、干部打成一片，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和鼓舞广大战士和干部。邓小平善良随和，善于联系群众，谁都愿意跟他在一起。邓小平“摆起龙门阵”（四川话，“聊天”之意）来，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草地上没有吃的，邓小平就和同志们在“龙门阵”中“大摆”四川菜的“吃经”。一有机会，他就用浓厚的四川口音讲四川的回锅肉、鱼香肉丝、麻婆豆腐、辣子鸡丁、东坡肘子、东坡鱼如何好吃，说得大家直咽唾沫。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长征中，我们常常凑在一起，开玩笑，吹牛，成立了一个“牛皮公司”，陈云是“总经理”，邓小平是“副总经理”。没有吃的，就吹吃的，精神会餐。邓小平处处讲四川菜好吃。到了四川边界，那里穷得要死，我就对邓小平说：“四川有什么，只有醪糟！”邓小平说：“这里是边区，反正四川菜好。二天有了条件可以打牙祭的时候，我一定请你吃四川回锅肉。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嘛！”

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回忆说，过草地时，邓小平特别爱和大家吹牛。吹牛吹什么呢？就是在没有吃的时候说什么最好吃。邓小平说辣椒好吃，他一说辣椒大家就直流口水。说到回锅肉，湖南人罗荣桓就说湖南回锅肉好吃，而四川人邓小平则说“还是四川回锅肉才好吃”。反正没有吃的，就精神会餐嘛！那时候他们没有烟抽，就沿途找点破纸，找点干树叶子，拿纸包上树叶子当烟抽。邓小平还自豪地说：“我是香烟厂制烟的。”有一次，邓小平外出归来，兴冲冲地对已睡觉的罗荣桓说：“老罗，起来，我搞到烟叶了。”罗荣桓起来一看，原来是干树叶子，俩人相视而笑，立即将树叶搓碎，装进烟锅，悠然自得地抽了起



来。

有一天，民运干事肖望东搞来一些真正的烟叶，分给邓小平、罗荣桓各一把。邓小平喜出望外，看到这金灿灿、黄橙橙、货真价实的烟叶，立即揪下一块，搓碎，装进烟袋，然后放了一点碎烟叶在烟锅里，和罗荣桓一口一口、仔细品尝起来。这两个人，一个来自蜀乡，一个来自湘乡，笑容满面，心里美滋滋的，甭提有多痛快。

时任红一军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回忆说：在四川毛儿盖，当时我们一师刚刚得到了一点烟丝，邓小平对我说：“你给我烟，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问他：“什么好消息？”他说：“你不给我烟，我就不告诉你。”我说：“那个简单！”就从衣袋里摸出个洋铁盒子递给他：“抽吧！”小平同志笑着说：“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升官了！军委决定调你到红四方面军去担任三十一军参谋长，命令已经下来了。”那时候一方面军干部多，四方面军战士多干部少，所以向一方面军要干部。

对西蜀各族父老乡亲的真情告白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对于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翻越雪山是长征开始以来最艰苦的一关。其艰苦程度超过湘江之战，超过翻越五岭，也超过四渡赤水。比起只有少数人参战的抢渡金沙江或飞夺泸定桥来，更是艰苦得多。”

1936年至1937年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的杨定华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红军自诞生以来，从来未遭遇过在经过雪山草地时所遭遇

的那样的困难。其实在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也恐怕没有这样‘怪’的地方吧！”

可是，就在雪山草地这样“怪”的地方，邓小平与其他红军将士一起，在革命信念的激励下，以顽强的精神和阶级友爱，用革命乐观主义，与大自然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使红军部队这个革命大家庭，始终充满了温暖与欢乐——世间纵有天大的困难，也阻挡不住他们前进的步伐。

经过7天的艰难跋涉，被称为“鸟儿也飞不过”的川西北草地天险，终于被红军所征服。为了这一胜利，许多红军指战员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邓小平当时所在的红一军团总人数不过万，却有500多人牺牲。据统计，红一、二、四方面军共有上万名红军指战员，被川西北草地吞噬。

邓小平深知，红军能够战胜雪山草地，川西北高原上藏羌回汉各族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羌族聚居的茂县当时总人口不足2万人，就有1000多人参加了红军。藏族聚居的绥靖（今金川县）当时人口不足1万人，也有750多人参加了红军。而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十多万人马，先后在“人烟少、产粮不丰”的川西北雪山草地一年零四个月，每天食用的粮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可以说：川西北高原各族人民忍饥挨饿腾出来的粒粒米粮，是他们支援红军长征的颗颗红心。

邓小平“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从来没有忘记过川西北高原上四川少数民族老乡对红军的深情厚谊。

1951年初春，身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重庆盛宴招待来自川西北高原的70多位藏羌回汉族的代表时，



特别激动地举杯敬酒：

“过去，我们红军走过雪山草地，吃了你们不少牦牛和青稞啊！你们对革命的帮助和贡献是很大的。将来国家会从生产建设各个方面来补偿的！”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也记载有他在另外的场合，于1950年就在四川讲了内容相同的话：

“红军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那时饥荒了、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

这些情真真、意切切的话，既是邓小平对西蜀少数民族父老乡亲的情结，也是他对蜀乡各族人民的真情告白。

率师回川，勋业彪炳青史

1920年秋天，邓小平乘船离开重庆，离开四川，告别桑梓，奔向那狂啸的海洋，去法国勤工俭学。

29年后，邓小平又回到了重庆，回到了四川，他29年的人生弧线宛如画了一个圈，又落归起点。

1949年秋天，正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日子，正是天府之国收获的季节。当年的一介书生邓小平，这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前委书记，和他的亲密战友——刘伯承，率领龙吟虎啸之师——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挥师大西南的“重心”——四川。



毛泽东指示：“西南的重心是四川”， “小平准备入川”

早在1949年3月，于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在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渡江战役问题时，就亲口对3月14日刚刚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渡江作战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说：“交给你指挥了。”

邓小平掂得出毛泽东这句话的分量，也知道他自己的担子是多么沉重，自己的职责是多么神圣。在中国历史巨变的弯弓上，他要带领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像脱了弦的响箭，继续朝着人类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彪炳勋业的远方飞去。

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结束了渡江战役。接着，马不停蹄，人不卸甲，继续挥戈猛进，摧枯拉朽，扫荡残敌。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的第二野战军是按中央军委命令，于1949年2月上旬由中原野战军改称的。

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命令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要求二野在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歼灭由秦岭退入四川的胡宗南集团主力及西南地方军阀部队，“解放并经营四川、贵州、西康三省”（后又加上云南共四省）。6月2日，由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央军委，电示第二野战军：“小平准备入川。”毛泽东在稍后发出的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中，又强调指出“西南的重心是四川”，应“迅速扩占四川”。

1949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西南局，由邓小平担任

第一书记。同日，中央军委命令第二野战军主力于9月向湘西开进，待广州解放后，进军川、黔。二野广大指战员纷纷议论，认为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都是四川人，对四川情况熟悉，现在中央又决定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的第一书记，所向无敌的刘邓大军一定能出色完成解放四川的神圣使命。战士们一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一步跨到四川去，好痛痛快快地打几个漂亮仗。为此，各部队请战、求战的情绪极为高昂。这时，二野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根据二野司令部指示，专程去南京向刘伯承、邓小平汇报部队情况。邓小平听了陈锡联汇报，感到战士们的每句话都是滚烫滚烫的，他为战士们高昂的求战情绪感到欣慰。他格外兴奋地说：“我们的战士很有战略眼光嘛！”然后走到墙边，指着地图说：“我军渡江作战后，蒋介石已经无路可退了，他的残余部队主要盘踞在中南、西南、西北和台湾等地区。军委命令三野解放华东，一野解放西北五省，命令我们二野进军西南，在第十八兵团的协同下，解放西南各省。”

刘伯承听到这里，插话说道：“不过还要告诉同志们一点，由于我军现在处于绝对的优势，敌人就千方百计要避免与我决战，以求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对头！”邓小平非常赞赏刘伯承缜密的分析。“现在的国民党军队，完全成了惊弓之鸟。因此，军委、毛主席指示我们，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先断敌逃路，尔后聚而歼之。这是非常绝妙的一着棋。这着棋走好了，蒋介石就没得啥子戏可唱喽！”邓小平的话语铿然有声。

在陈锡联临走时，邓小平又叮嘱道：“前委很快就要下达进军西南的指示，希望你们抓紧准备，特别是想办法解决好个



别战士不愿到西南去的思想。要告诉部队，西南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立足之地，我们绝不能让蒋介石蹲在大陆。一定要在部队中，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叫得响响的。”

“小平和我陈毅都饿了，吃的丹阳‘糊抄手’ 比成都‘龙抄手’还香”

时已担任上海市长的三野司令员陈毅，特意请刘伯承、邓小平到上海，一方面对二野担负新任务表示祝贺和送行，一方面商议对二野进军西南的物资支援问题。陈毅对刘伯承、邓小平说：“我也是四川人，要不是中央让我当上海市长，上海有很多工作要我去做，我还真想亲自参与解放四川家乡的战斗、打完大陆上这最后一仗呢！”

接着，陈毅向刘伯承谈起了他和邓小平在丹阳吃“面条糊抄手”的故事。

那时南京刚刚解放，为了适应指挥上海战役和加速训练接管的干部，总前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移驻江苏省丹阳县城。1949年5月3日，陈毅从南京来到丹阳，并告诉有关人员：“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两天后将来到丹阳。”到了5月5日中午，陈毅等人就在驻地等待邓小平的到来。陈毅按照从南京到丹阳的公路里程计算，邓小平乘坐的汽车中午就应该到了，可是一直不见踪影。从中午等到下午，从下午又等到晚上，依旧没有半点消息，陈毅便焦急不安了。当时南京解放才十几天，杭州刚刚解放，上海还有国民党汤恩伯集团几十万大军守着，分散在各地的散兵游勇

更不可能一时肃清。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陈毅更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他担心邓小平一行人的安全。

他们焦急地等到后半夜，陈毅才听到汽车的马达声。待汽车停下来，陈毅看见邓小平终于安然无恙地从汽车里钻出来，才松了一口气。同车人员向陈毅解释说，他们的汽车差点开到杭州方向去了，后来看见路边歪着、翻着许多有国民党标志的汽车、大炮，才调转头来。当陈毅听说邓小平等人还没有吃晚饭，便带上他们在丹阳街头找四川人爱下的小馆子吃“宵夜”。

那时候已经是三更半夜了，又是打仗的日子，店家早已关门，哪里会有小馆子还开着呢？陈毅陪着邓小平走了许多条街，只碰到一个卖馄饨的挑子正准备打点回家。由于饥饿，他们稀里糊涂地吃了顿由仅剩馄饨皮子、馅子和碎面条煮糊了的大杂烩。

陈毅对刘伯承说：“我们在丹阳吃的这顿‘糊抄手’，硬是香得很哟！小平饿了，我陈毅也饿了，我看比成都有名的‘龙抄手’还香呢！”

陈毅的谈吐似行云流水，还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平时，身为司令员的陈毅，啃两个烧饼就当一餐饭，这次为了尽地主之谊，给刘、邓两位四川老乡率领大军去解放家乡送行，陈毅吸取了在丹阳邓小平肚子饿了连个烧饼都没有给他充饥的教训，特地叫伙房多做了几个四川菜，准备了一瓶好酒，与刘伯承、邓小平捧杯痛饮。而受命于毛泽东“交给你指挥了”的邓小平，却一面慨然饮酒，一面在冷静地思考着怎样出敌不意，猛打猛追，断其逃路，粉碎蒋介石凭借西南一隅建立所谓“光复基地”的阴谋。



究竟应该如何去谱写解放家乡、解放祖国大陆的最后一大片土地的雄壮凯歌？一直在呼唤着邓小平。

运筹帷幄 决胜西南

当时，国民党在西南的正规部队有8个兵团、37个军。蒋介石认为解放军进军西南，将以攻取西南的心脏四川为重点。而入川路线，不外乎川东、川北两个方向。川东方向，地形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且有白崇禧等部几十万人在湘、桂地区把守，解放军由此入川的可能性不大；而川北方向，则是入川捷径，且背靠共产党领导的老解放区，有陇海铁路，交通畅通，补给方便，解放军主力极大可能由此入川。蒋介石基于这样的判断，遂形成了“以四川为核心”和“以陕南、甘南方向为重点”的设防部署（蒋介石在这里提“以四川为核心”，而毛泽东则向“准备入川”的小平提示“西南的重心是四川”，可见四川在毛泽东与对手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邓小平与刘伯承一道，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方针，为部队制定了周密的部署：针对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的计划，蒋介石还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美梦的情况，必须从南面切断敌人企图利用川南及川西南孔道逃往黔、滇的退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除以贺龙指挥的第十八兵团向秦岭实施佯动，给国民党军造成错觉之外，活动在鄂西地区的湖北军区部队，也对防守川、鄂边境的宋希濂部，积极展开佯攻，叩击东面入川门户巴东；活动在汉水中游的陕南军区部队，两次进攻防守大巴山之线的胡宗南部，给敌人布下“迷魂阵”。

后来，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指挥机关并第三兵团由南京北上，到达郑州车站时，新华社还发表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准备西进的新闻报道，造成第二野战军主力由陕西进入四川的气氛。邓小平说：“毛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这很好。”而第二野战军主力，则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隐蔽前进。

1949年7月18日，邓小平签发了《第二野战军前委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8月3日，刘、邓向第三、第五兵团下达向西南进军规划的指示。8月19日，刘、邓向二野下达《川黔作战基本命令》。9月13日，邓小平与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关于部队情况和进军西南准备情况》。10月23日，刘、邓下达《进军川黔的补充命令》，要求全军完成解放西南的神圣使命。

当邓小平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运筹帷幄的时候，他似乎又看
人民解放军进入四川境内





到了四川家乡，那冒烟的大地，那骨瘦如柴的幼婴，那千万双期待着刘邓大军前去解放他们的焦灼的目光。

“养子不怕娇，酉、秀、黔、彭走一遭”

二野第五兵团和第三兵团十军，按刘伯承、邓小平的命令作为左翼部队挺进贵州。进军途中，刘、邓首长又指示：在川黔敌人主力向黔滇边退却的情况下，隔断宋希濂4个军和罗广文3个军向云南的退路，并力求在长江南岸予以歼灭乃是战役的中心。

10月28日，刘、邓率二野领导机关进抵武汉，与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会合。后来，在刘、邓指挥下，二野主力及四野一部，经过充分准备，开始发起川黔作战，揭开进军西南的战斗序幕。二野第三、第五兵团在四野第四十二军、四十七军、五十军配合下，对辖两个兵团、共约10万兵力的国民党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集团实施钳形合击。二野第五兵团和第三兵团第十军开始向贵州进击，迂回进攻四川。

这样，在北起巴东，南至天柱，宽约千里的地域内，多路向敌人发动攻击。

11月8日，刘、邓率二野领导机关由武汉经长沙进抵常德。3天后，二野第三兵团十二军攻占酉阳。

川东南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4县境内，一座座大山兀立在寥廓的天幕下。这里地形复杂，山势险要，山峰陡峭，耸入云霄，道路崎岖，加上雨霏霏，雾蒙蒙，上山下坡都很困难。仅一四一师行军带的90多匹马，一天一夜就在高山险路中跌伤、跌死80多匹，到达彭水时，只剩下6匹。当地的民谣说：“养子

不怕娇，酉、秀、黔、彭走一遭。”从1933年12月起，贺龙曾率红三军战斗在这里。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又曾在这里举行过著名的“南腰界会师”。现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着二野三兵团和四野第四十七军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踏着当年红军的足迹，用“这点苦不算苦，红军走过二万五”的顺口溜来激励自己，克服重重困难，以每日百里以上的速度，在先期解放了秀山、酉阳之后，又于11月13日攻占了黔江，16日攻占了彭水，并且在白涛场活捉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

小平倡议下，组建西南服务团

西南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条件艰苦，敌情复杂，又有较多少数民族。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现有的队伍必须扩大。为了准备一批接管地方、建设新西南的干部队伍，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邓小平在二野前委会上提议，在南京、上海、苏南一带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到西南去服务。邓小平的提议获得了前委会议的通过。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开始组建，邓小平任命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宋任穷为西南服务团总团主任。

西南服务团的成员，除一部分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四川籍、云南籍、贵州籍为主的老区干部（有从东北调来的，有从平津南下的，有从晋冀鲁豫和豫皖苏来的），数量最多的是上海、南京和苏州、无锡等江浙一带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当一听到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号召，许许多多青年奔走相告，争先恐后，踊跃报名，渴望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迅速



西南服务团从南京出发

掀起汹涌澎湃、波澜壮阔的参军热潮。很快，一支由一万多名青年学生和六千多名老区干部（其中县级以上干部一千多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正式宣告成立。西南服务团团员佩戴人民解放军胸章、帽徽，享受军人待遇，家属发军人家属证，由地方按军属优待。

润育启导青年的良师问：
“你们摸摸背上，有没得包袱”

为指挥千军万马解放大西南，邓小平正置身于戎马倥偬之中。可是，既然二野西南服务团是他倡议组建的，他不能不多次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对刚刚参加革命队伍的青年人进

行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

邓小平除了在南京军大给西南服务团的成员讲了“过三关”的问题之外，又在“国民大会堂”作辅导报告，讲授当时刚刚发表不久的毛泽东的新作《论人民民主专政》，还于1949年9月中旬，在原南京“中央大学”操场上给青年们作报告。

那时，虽然早已立了秋、过了“白露”，长江以北许多地方已是“秋扇见捐”了，但作为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的南京，却仍然溽暑蒸人、挥汗如雨。邓小平作报告的讲台是临时放置的普通两抽桌。桌上，除了麦克风外，只放了一个热水瓶、一个搪瓷茶盅和一包蓝色盒子的普通纸烟，没有台布或花瓶。讲台后面，临时挂起了一块蓝色的旧布档。邓小平蓄着平头，上身穿件粗白布短袖衬衫，下身着一条草绿色军裤，神采奕奕，双目炯炯，对在草坪上席地而坐的青年人，用他那特有的清晰、地道的四川话说：二野奉命解放川、康、云、贵四省，是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进军西南是八千里路的小长征。然后，邓小平吸了一口烟，望着黑压压坐满了人、却鸦雀无声的操场继续说：今天，我报告的题目是《论忠诚与老实》，就是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一个革命者，是不是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就看他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对党要老实，对群众要老实，老老实实说话，老老实实办事，老老实实做人。

邓小平的报告严肃而诙谐，认真而风趣，步步深入，娓娓动听。他教导青年人如何实事求是地处理好个人和党、和群众的关系。他说：看到你们这些天真活泼的青年，使我想起了抗战初期，五台山一带的青年人。他们见到八路军开来了，抗日救亡有希望，就请八路军去作演讲，甚至把我们部队的炊事员、马夫也拉去了。不过，干革命不仅仅是扭秧歌，作演说。青年



要真心实意接受党的领导，就应该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比如我们到西南去，第一件大事就要征粮剿匪，这是斗争的需要。一个革命者，应该老老实实地对待革命的需要。

邓小平说：青年是我们的未来，但不要给青年戴高帽子，否则对青年人没有好处，容易产生自以为是的思想。你们青年人要尊重老区来的干部。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可能不高，但实际工作能力比你们强。要承认他们比自己强，才会团结一致。

邓小平拿起茶盅，呷了一口茶，接着风趣地说道：“知识青年刚刚参加革命时，往往背着各式各样的包袱。你们摸摸背上，有没得包袱？”

大家面面相觑，“哄——”地笑了起来。

没得吗？不见得。我看，有些人可以因为自己有某些知识，有某些专长而背上包袱；有些人可以因为其家庭出身不好，有自卑感而背上包袱。其实，家庭出身不好和犯错误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老实说，我就是小地主出身嘛，我的家庭出身并没有注定我非犯错误不可。对我们革命者来说，重要的是要老实，要放下包袱。精神上获得解放了，自觉性增强了，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就能不犯或者少犯错误。

邓小平的报告深入浅出，切中要害，理论紧扣实际。他讲话的声音从南京“中央大学”操场两侧的高音喇叭传出，洪亮而浑厚的四川话回荡在草坪的上空。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邓小平却镇静自如地平视着秩序井然的会场，继续侃侃而谈：“蒋介石在大陆的日子不长了，他在进行最后的挣扎。我们要迅速消灭敌人的残余力量，解放大西南，解放全中国。”

接着，邓小平讲了西南地区的情况。他说，西南有七千万

人口，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无论工业、农业、商业都有相当的基础，将来是中国大工业基地之一。他讲了好的、有利的一面，也讲了不好的、困难的一面。邓小平说，西南历来是封建割据，地方军队多、土匪多、袍哥多、枪支多，封建势力大。再加上蒋介石十多年的统治和经营，现在蒋介石又退缩在那里，妄想把西南作为复辟基地。西南是全国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一切困难都落在西南。所以，要充分估计进军西南的艰巨性。

邓小平说，进军西南的正确态度是：准备吃苦，再加上好好学习，向西南人民学，向周围同志学，向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学。

邓小平的话使青年们产生了强烈的感情激荡，并由此感到了心灵的震撼。

报告中途休息时，不少青年都拥到讲台前，围着这位驰骋疆场、叱咤风云、威名赫赫的伟人，向他提问题，与他交谈，拿出笔记本请他签名。当邓小平为满足青年的要求，正在签名时，忽然看见好几个男女青年爬到停在草坪旁边的飞机上玩，便马上走过去，很关心地叫他们下来，以免一失脚从飞机上摔下来跌伤了。

休息以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对青年们说：“到西南要过的第一关是吃饭关，要抓财政经济，战斗队要变成工作队。”邓小平说，西南是祖国的一块宝地，四川是天府之国。这次进军大西南的同志来自四面八方，共同的任务是解放西南地区的人民群众。四川将来要分为四个区党委。人民解放军要和地下党、游击队会好师。到西南后，先搞好接管，然后进行土地改革，再进行建设。邓小平还讲了统一战线工作。

邓小平谙熟青年人的思想情绪，他的报告针对性很强，道



理割切，言简意赅，以严密的逻辑力量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过去没有见过面，却早已仰慕邓小平的青年学生，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聆听着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那是真正的“真知灼见”。而曾经听过“邓政委”讲话的来自二野军政大学、“四川干部队”、华东支前司令部、东北局、华北革命大学、华东革命大学和苏南的西南地区籍贯的干部，更是欢呼雀跃，掌声如雷。因为这不只是听一般那种亲切的家乡口音，而是在听邓政委亲自布置打回家乡去、解放大西南的战前动员。

西南服务团的1万多名青年学生作为新鲜血液，融合到浩浩荡荡的刘邓大军中去。他们按照党的指引，记住“邓政委”的话，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迈着坚实的步伐，唱着“大西南呀好地方，金银财宝地下藏”的歌曲，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小长征中，在硝烟弥漫、炮火纷飞的战争环境里，走向大西南，接受火与血的严峻考验。

以后，参加西南服务团的1万多名青年学生，与早年投身革命的老同志一道，在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宏伟事业中，献出了青春和热血，其中一些人还英勇捐躯。

历史证明，党中央决策、邓小平倡议组建西南服务团，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举措。

蒋介石在夕阳沉树、黄叶扫阶、 日暮钟声里来到重庆

山城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和政治、经济中心。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曾在这里建立了“陪都”。现在，当1949



蒋介石在重庆军事会议上，部署“固守四川，确保大西南”。

年4月23日南京被解放军攻占以后，蒋介石及其逃亡政府，猬集重庆，又妄图在此建都。一年以前的4月28日，刘邓大军在中原某地举行的庆祝延安光复大会上，刘伯承司令员在演说中曾预言：“在中原战场上，我们打下了蒋贼的行都洛阳，将来我们还要打下蒋贼的陪都重庆、首都南京。”看来，解放重庆的时刻指日可待，刘伯承司令员的预言，很快就要全部实现了。邓小平和刘伯承一道，指挥刘邓大军向着重庆挺进。多少年来，剪不断白云缠绕的思乡情，邓小平一直盼望着回到四川，去深深呼吸家乡的空气，去嗅那家乡泥土的芳香。

当刘邓大军向重庆挺进时，蒋介石突然飞来重庆。这一次，蒋介石带上了钱大钧、蒋经国、顾祝同、毛人凤、张群一大批



随员。此行极为秘密，不准见报，不准宣扬，连到机场迎接也不准安排。因为这一次，他是在夕阳沉树、黄叶扫阶、日暮钟声里来到重庆的。一下飞机，蒋介石便直奔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立即召集杨森、王陵基、刘文辉、谷正伦、罗广文、徐远举、卢汉、刘宗宽前来开会。胡宗南则因“军务”吃紧，便由参谋长沈策代表他来到重庆，“聆听”蒋介石的指示。蒋介石为了摆脱被动的局面，令罗广文兵团火速开赴川东，配合宋希濂集团凭借天险固守，阻止解放军西进，以掩护胡宗南集团自秦岭地区南撤；另令孙元良兵团由万县地区西撤至重庆外围布防；同时，将防守川北地区的胡宗南第一军调往重庆，以加强重庆的防守。

蒋介石作了部署调整后，仍不放心，又派他的大儿子蒋经国带着他写给宋希濂和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的亲笔信，亲临宋希濂的指挥所江口镇督战。蒋介石在给宋希濂、陈克非的信中，要求他们“矢勤矢勇，必胜为忠，彼此协力，与川东战线共存亡”。

刘、邓一挥手，军事的、政治的各种斗争都展开

在向重庆挺进时，刘伯承、邓小平除命令各部队发扬勇敢战斗的作风外，还强调对敌人进行政治攻势，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于是，军事的、政治的各种斗争同时展开。

1949年11月21日，刘、邓向川、黔、康、滇国民党军政要员发出四项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改过自新，保护公共财产，维持地方秩序，立功赎罪。刘、邓首长并指示各部队，注意争取、瓦解敌军和乡、保武装，力求减少抵抗，

对起义投诚的武装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以便集中力量，解决主要敌人。

刘、邓还在21日这一天命令所属部队，迅速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之退路，指出此乃当前作战的关键。因为，其时蒋介石急令胡宗南加速南撤，并调其第一军去重庆；令孙元良兵团由万县西撤，妄图利用乌江天险，掩护胡宗南撤退。

刘、邓命令五兵团除留十七军接管贵阳外，十六、十八军和三兵团之第十军在占领毕节、遵义后，迅速攻占叙水、赤水、宜宾、泸州一带；命令三兵团主力和四野第四十七军，立即强渡乌江，力争合围宋希濂、罗广文两敌于南川以东地区。

乌江又名黔江，发源于贵州北部，从龚滩入四川，向北在涪陵附近入长江，是四川境内长江南岸唯一的大支流。两岸山势陡峭，水深流急，波涛汹涌，暗礁丛生。沿岸索道被国民党军破坏，船只早被敌人抢走、烧毁。二野第三兵团和四野第四十七军，发扬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精神，由白马等地强渡成功，向南川地区追击。

1949年11月23日，由邓小平担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正式成立。这以后两天，二野三兵团解放了南川县城。

11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向二野第十一军、十二军，四野第四十七军发出“速歼长江南岸之敌、相机占领重庆”的指示。

11月27日，二野三兵团第十二军解放了离重庆不远的綦江县城。三兵团主力及四野第四十七军在南川以北山区，歼灭宋希濂和罗广文部3万余人。这时，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李井泉：为协调一致，全歼四川、西康地区之国民



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市区

党军，第十八兵团归第二野战军建制指挥，军委不再直接指挥，以免分歧。接着，贺龙、李井泉向其时正在秦岭地区的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一部发出入川作战命令。

1949年11月30日晨，曾计划以川、云、贵为后方、割据西南、建都重庆的蒋介石，从官邸坐汽车直奔重庆白市驿机场，乘飞机逃往成都。由于连日来刘邓大军神速的行动和中共重庆地下组织的有力配合，使重庆守敌顷刻土崩瓦解。

11月30日下午，二野三兵团主力及四野第四十七军解放了重庆市。

1949年1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冒雨在山城重庆举行入城式，受到全市人民的热烈欢迎。

由于刘伯承、邓小平指挥英明，部署正确，在重庆解放的当天，刘邓大军另一部又占领川南重镇叙永县城，歼敌第六编练司令部，俘中将司令官肖以觉及其所带2000余人。到12月7日，赤水、泸县、富顺、自贡、隆昌、纳溪、江安、荣县、内江、资中等县城均获得解放。

小平有多少沉甸甸的回忆

12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领导机关进驻重庆市。

29年前，邓小平与留法勤工俭学的其他83名川东学子一道，从重庆走出，从四川走出；29年后，邓小平率领浩浩荡荡的解放军又回到了重庆，回到了四川。在重庆朝天门码头，邓小平倾听着滔滔江水正伴着战士们的欢歌笑语在歌唱，听着市内处处可闻的亲切的家乡话，真是百感交集，无比兴奋。

邓小平有多少沉甸甸的回忆！29年前的重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缩影。它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早已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从1890年至1904年，英国、法国、日本、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就在重庆强占码头，设立兵营，强占租界，还以办商务、侨务和外交为名，向四川派遣领事，于重庆设立领事馆。米字旗、三色旗、太阳旗、星条旗等在重庆领事巷的楼廊上如群魔乱舞。在重庆的各国领事组成的领事团，与卖国政府勾结，压榨剥削人民，残酷地镇压四川人民的革命斗争。重庆海关大权也被英国人操纵。后来，英帝国主义通过订立《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又强迫中国政府增开万县为通商口岸，将川东门户万县划归重庆海关管辖。英帝国主义后来又冒天下之大不韪，竟悍然从他们在川江上横冲直撞、多次肆意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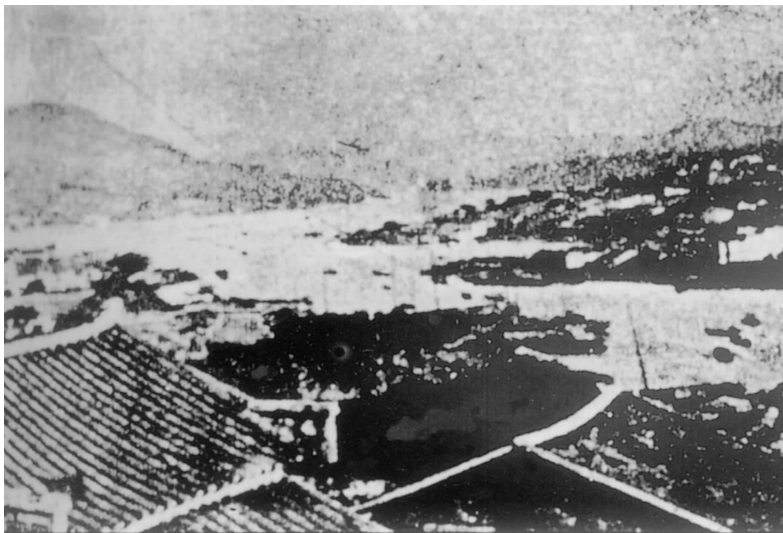


重庆日本领事馆

沉中国船只、溺死无数中国人的舰只上，向万县市区开枪开炮，使中国军民死600多人、伤近400人，财产损失2000多万元，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入四川、在四川犯下滔天罪行的同时，四川的封建军阀又进行着全国各省军阀割据混战中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混战。自民国以来，四川军阀之间的混战达到470多次。各个军阀割据一方，以致逐渐形成“防区”制度。所谓“防区”，就是各个军阀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所占据、设防的区域。军阀在自己的“防区”内，不仅主管军事，控制财政，把持税收，而且行政、司法、教育等权力均为其掌握。四川广大的穷苦百姓在各种反动势力的压迫、剥削下，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

历史的脚步艰辛地走了29年。

29年间，绕山城重庆而过的长江没有改道，嘉陵江也没有



20 世纪 20 年代初，川江洪水泛滥，重庆沿街水深数丈，图为被水淹没的房屋。

改道，滔滔的江水依然日夜流淌。同样的山城，同样的江风拂拂、星月依依，然而，斗转星移，景象大变。邓小平看着已经回到人民手中的山城，山格外青，水格外秀，重重叠叠的楼房瓦舍，从山脚镶嵌到山顶，美丽壮观。一天晚上，刘邓大军的解放军战士和四川地下党的同志们联欢。地下党的一些同志，是从渣滓洞、“白公馆”里死里逃生出来的。参加联欢会的解放军战士和地下党的同志，放开歌喉，尽情地歌唱。歌声犹如长江水一样奔腾，倾吐他们诉不尽的兴奋；歌声打破了夜空的沉寂，震荡在长江两岸，盖过了江水声，响彻云霄，腾空向远方飞去。

邓小平听着歌声，那是雄浑激越、亢奋高昂、深沉悠远的歌声，那是时代捧给历史的动人诗章。他一面听着欢歌笑语，一面饱览山城的夜景，一个崭新的重庆、一个崭新的四川展现



在他那坚定、深邃、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家雄才大略的目光下。

成都战役旨在把胡宗南集团歼灭于成都地区

1949年12月3日，刘、邓命令各部队乘胜前进、急速进军，开始成都战役，以便把胡宗南集团歼灭于成都地区。同日，刘、邓另电第十八兵团加速南下四川，以形成对胡宗南部南北钳攻形势。12月4日，刘伯承、邓小平电示二野第五兵团第十八军：“我已占领重庆，今后作战重点在西南，占领泸州、宜宾后，应力求迅速占领乐山、夹江、峨眉三县，完全截断敌向南退却的道路。因此，十八军应取捷径直出宜宾。”

12月6日，刘、邓命令第三兵团和第五兵团：“必须控制垫江、邻水、大足、内江、荣县、井研、乐山之线，才算完成第一个战役。这个战役的竞争在于占领乐山，完全截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指示第三兵团第十军和第五兵团第十六军，“在富顺、南溪地区休息时间不宜过多”，尔后“协力指向乐山、井研、荣县地区”。指示第五兵团第十八军为第二梯队，占领犍为；以第三兵团的十一军、十二军自内江、铜梁继续西进，首先攻占彭山、籍田铺等地，尔后以十二军主力占领邛崃、大邑，十一军主力占领新津及其以东各要点；以第四野战军之第五十军进至遂宁地区，为战役预备队。各部队在进占上述指定地区后，准备会同自川陕边入川的由贺龙司令员、李井泉副政委率领的十八兵团及一野七军等部，围歼胡宗南集团于成都地区。

还在邓小平抵达重庆的第二天（12月9日），在党的政策和刘伯承、邓小平于11月21日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的四项



刘文辉

忠告的感召下，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宣布起义（因在彭县的电台不明确中共中央的呼号，不能直发北京，乃由刘文辉在雅安一直与延安有联系的电台转发）。同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

公署主任卢汉，也在昆明宣布起义。时在成都的蒋介石，于12月10日乘飞机逃往台湾。12月11日，当刘、邓指挥的刘邓大军进至合江、泸州、自贡三线后，与共产党早有联系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郭汝瑰率所属第七十二军大部2万余人在宜宾宣布起义。

这些起义，加剧了国民党军的恐慌动摇，促进其内部分化。胡宗南眼看成都难保，决定向西昌撤退。刘伯承、邓小平判断胡宗南在突围不成时，将在成都地区作困兽之斗，而且该敌又相当集中，绝非一两次攻击所能歼灭。因此，当即调整部署，加强围攻成都周围地区的准备。刘、邓命令二野三兵团十二军位于邛崃、大邑地区，十军位于彭山地区，十一军位于简阳以西至籍田铺之间，五兵团十六军位于眉山、蒲江、丹棱地区，十八军位于青神、眉山地区，四野之五十军进到简阳，并指示各部队迅即调集炮兵，整顿队势，多方恢复部队的体力，加强侦察，研究战术。要求部队越在胜利的时候，越要兢兢业业。指出今后对成都地区胡宗南集团作战，仍用集中兵力先打弱兵、



一口一口吃的战法，各个歼灭敌人。指示各部队要同时进行政治瓦解工作，争取敌人放下武器。这样，刘、邓在对全局形势进行了准确分析、作出了分割围歼的正确部署以后，便从四面八方把胡宗南集团和川境残敌共数十万人，全部关死在成都盆地。

1949年12月21日，成都战役开始。刘伯承、邓小平向成都地区守敌发出最后忠告：只有起义或放下武器才是出路，如果拼死顽抗，只有死路一条。同日，由贺龙、李井泉率领、从陕甘南进作战的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一部进至绵阳、巴中、江油等地。

二野指战员虽已能望见成都城郭， 刘、邓命令“二野任何人均不得入城”

成都战役开始后，二野司令部得知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杜义德率领的第十军已打到新津机场附近的狮子山，敌主力李文兵团顽强固守，第十军第三十师连续攻击两天不克，并受到一些损失。为此，二野参谋长李达拟了一份电报，提醒杜义德和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注意攻敌战术。电报拟好后，李达将其送刘伯承、邓小平过目。刘、邓都认为不能硬攻，应该放开敌人，让敌人逃跑，在运动中予以分割围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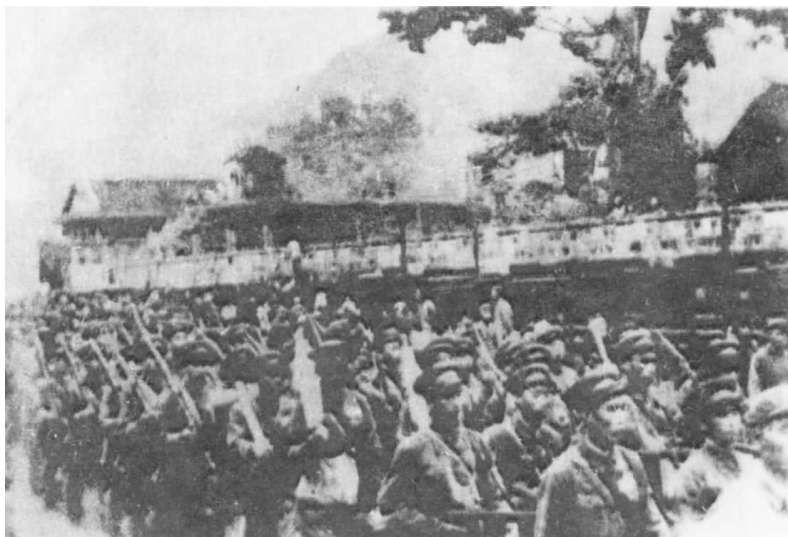
邓小平说：“这个电报我写吧！看来，杨勇、杜义德他们是急于想进成都，打下狮子山，控制成都。……要告诉杨勇、杜义德，我们有言在先：二野一兵一卒不能进成都，要把敌人从成都放开，在外边分割歼灭。”原来，邓小平和刘伯承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进军大西南用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战术，此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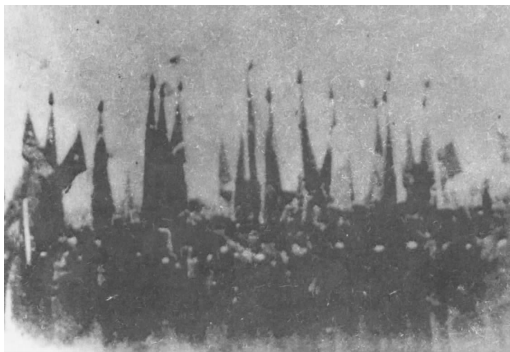
人民解放军解放自贡

电告率十八兵团南下的贺龙：在二野未全部切断胡宗南集团的退路、完成在成都地区的战略包围之前，由陕甘入川的十八兵团不宜尾追胡宗南部太快，以免将其赶跑。十八兵团便绕道到成都侧背兜击胡宗南部。刘伯承、邓小平从两个野战军的协作关系上考虑：虽然二野部队会比十八兵团先逼近成都，但二野已占领了重庆，那么，成都就应该留给贺龙率领的十八兵团了。这是因为十八兵团在进军大西南、解放四川的战役上功不可没，应与二野“平分秋色”。于是，刘伯承、邓小平于12月25日致电向中央军委报告，并同时致电贺龙、李井泉，报告第二野战军在新津至简阳堵击可能南逃的胡宗南部，请贺龙、李井泉率十八兵团向成都及成都以东地区前进，围歼可能向川东北逃窜的胡宗南部。

在解放军严密的军事包围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川陕鄂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和十六兵团副司令曾甦元，四十一军军长张宣武，四十七军军长严笠，绥靖直属纵队司令刘景泰等，都在12月11日这一天，分别于什邡、金堂、广汉等成都附近地区宣布起义。他们的起义，使驻守成都的敌人极为混乱。蒋介石为了保住他在大陆的军力，从台湾发来电报，命令胡宗南集团突围。12月22日，胡宗南在江津召开军长以上军官参加的会议，决定分路向西昌方向突围。胡宗南眼看多数军官已丧失信心，便把指挥权交给第五兵团司令长官李文，于23日乘飞机逃往海南岛。眼看胡宗南本人已逃跑，该部下属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于当天（23日）在德阳起义。裴昌会起义后，国民党军内部更加混乱，士气更加低落，上上下下更处于徘徊状态。24日，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



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在宜宾起义



国民党第七十二军起义庆祝大会

克非率残部在郫县地区起义。26日，国民党第五兵团在与解放军战至黄昏、完全丧失战斗力的情况下，该兵团司令长官李文率5万余人投降。同日，国民党第十八

兵团司令李振也派人到简阳与解放军二野第九十四团商请起义。次日，李振率该兵团在成都以东地区起义。

成都战役结束。成都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包括起义、投降）30余万人。战役一结束，刘、邓立即下达命令：成都由贺龙、李井泉率领的第十八兵团负责接管，二野任何人均不得入成都城。这样，第二、第五兵团的指战员们，虽然已能望见成都的城郭，真想进城去看看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但还是按刘伯承、邓小平的命令离开了。

12月30日，解放军在成都举行隆重的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图为群众欢迎解放军入城。





入城式，贺龙、李井泉亲率第十八兵团机关并第六十军进驻成都，受到成都市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以后，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二野第四兵团第十四军、十五军和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二军在西昌地区歼敌1万多人，全部肃清了残留在西南的蒋介石正规部队。

四川和整个西南回到了人民手中，这是邓小平期待已久的辉煌。他与他的亲密战友刘伯承指挥的刘邓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为解放四川、解放西南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欢庆胜利的时刻，邓小平考虑得更多的，是在解放四川、解放西南的战斗中，其他兄弟部队对二野的支援。1949年的最后一天，邓小平亲自起草了《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率第二野战军全体同志致各战略区感谢支持电》，对各兄弟部队的支持表示感谢。邓小平在感谢支持电中写道：“我们在西南地区取得的胜利，这个胜利来之不易。一方面是我们全体指战员战胜各种困难英勇作战得来的，同时也与各战略区党政军民的支援分不开的。我们应该给各战略区发个感谢电，也是向他们祝贺新年。”

新华社全文播发了邓小平起草的感谢支持电。新华社的红色电波，把邓小平对各兄弟部队和各战略区党政军民的诚挚谢意，传遍了神州大地的三山五岳、九江八河。

布满点点星光的川江水，引起小平无限遐想

为了庆祝四川和西南回到了人民的手中，邓小平与刘伯承等人作了安排，在20世纪50年代来临的第一个元旦的这一天，在中共中央西南局驻地、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山城重庆，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大会。这一天，重庆主要街道的商店门



庆祝四川解放、庆祝西南解放的大会在重庆市中心举行。

前，都庄严地挂出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大街的墙上、门上、电线杆上，到处贴满了“感谢救星共产党！感谢亲人解放军！”、“庆祝重庆解放！庆祝四川解放！庆祝西南解放！”的红绿标语。人们手执彩绸和彩纸做的各种彩旗，簇拥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扭着秧歌，跳着邓小平多年没有见过的四川特有的“采莲船”，兴高采烈地跑啊！唱啊！欢呼啊！那响彻云霄的欢呼声，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激动人心的歌声笑声，在山城的大街小巷回荡，在环抱山城的长江和嘉陵江的上空回荡。庆祝活动从白天进行到晚上，江水屏息了滔滔的呼号在谛听，繁星闪烁着惊奇的眼睛在观看。这一天，邓小平和数百万山城人民一样，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十万重庆军民庆祝四川解放、庆祝西南解放大会结束后，在街头游行欢呼。

第二天（1950年1月2日），西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在重庆召开。作为西南军区的政治委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早已准备好的报告，讲了三件大事：（一）平衡收支，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渡过难关；（二）实行土地改革；（三）整训干部，克服官僚主义。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对与会人员讲：“这三大问题，都是关键。都做好了，特别是第三件事做好了，困难就容易渡过，人民民主专政就会大大巩固。”

邓小平作完报告，回到住所以后，乘着兴会，挑灯夜战，提笔向中共中央、向毛泽东报告重庆解放1个月后的四川和整个西南的情况。

这个夜晚，是一个无眠的长夜。邓小平写完了给中央的报告以后，点燃了一支烟，凝眺着远处的江水。长江，是一条慷慨的河流，它把天空的星光都呈现出来，把山城的街灯都汇聚

江面。邓小平似乎听见了江面上滚滚波涛向东逝去，一路呢呢喃喃，一路滔滔不绝。昨天，重庆十万军民欢庆西南解放的盛况似乎又出现在他的面前。

西南解放了，邓小平直接指挥的二野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战，算是基本胜利结束了。但是，是不是就可以高枕



1950年7月，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

无忧了呢？是不是就可以使部队的少数干部战士产生的享乐思想发展下去呢？远处，那布满点点星光的川江水，又引起了邓小平无限的遐想。

突然，邓小平想到了一件事，又回到写字台桌前，翻出了一封信。这是他的部下、二野参谋长李达写给他的报告。李达在报告中说，有一位同志在重庆街头发现了一个因病掉队、却无人照顾、痛苦呻吟的解放军战士。这个同志就把因病掉队的解放军战士送到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谁知军事管制委员会具体处理这件事的人并未将因病掉队的战士送到就近的该部队去，而是仍将其推出门外，使他带着病痛，匍匐在大街小巷，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到司令部李达那里，向李达讲述了他的遭遇。



读了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感触很深。接着，邓小平又想起了部队入城以后，在重庆有一些团以上干部，不愿意驻乡村，不愿意到小城市，不愿意住没有电灯的房间。——这不是享乐主义思想在作怪吗？任其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不是很危险吗？

于是，邓小平提笔起草了《二野前委关于克服享乐思想、迎接新任务给杜义德（川南军区司令员）同志并川南区党委的信》。为把在克服享乐思想方面该讲的话全讲到，邓小平把信起草好了以后，不是马上发出去，而是放了两天，进行修改，才送刘伯承等人过目，于1950年1月8日发出。邓小平在信中写道：“根据在重庆了解，部队现在正发展着享乐思想，实际上是团以上干部的思想”，“如果以为西南战争业已结束，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极端危险的思想。”邓小平指出：“各高级首长能否以身作则关系尤大。……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多余房子用来出租，增加国家收入。如果区党委、省委、兵团和中央局、大军区几级领导同志严格律己，办到了这一点，就一定会使风气一新，也才有资格去领导克服一切享乐腐朽思想，领导全党全军向前看向前进。”“西南真正的战争还在后面，还要剿匪反霸、减租减息。”

为了引起二野各部队对克服享乐思想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1月12日，邓小平又和刘伯承一道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克服享乐思想以迎接新任务的指示》。

“仗打完了吗”

1950年1月17日，邓小平在重庆召开的二野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向他的老部下讲话。老部下们都很熟悉自己的老首长，知道



1950年初，邓小平（右一）、刘伯承（右三）、贺龙（右四）、王维舟（右五）在重庆。

老首长讲起话来向来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多余的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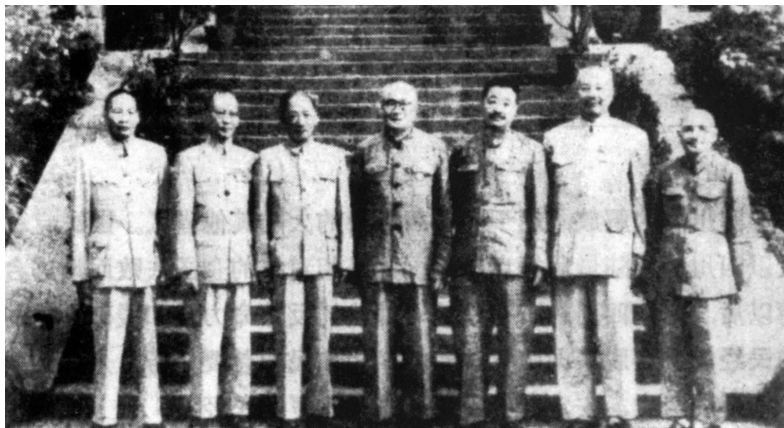
这一次，邓小平讲话一反惯例，他先问部下：“同志们，你们说仗打完了没有？”

台下坐着的团以上干部们面面相觑，弄不清楚老首长问这句话的目的。不少干部回答说：“仗打完了！我们胜利了！”

邓小平等会场静下来以后，笑着对大家说：“你们说仗打完了，可是在我看来，仗，还没有打完。”

台下便议论了起来。待大家议论了一会儿以后，邓小平便侃侃而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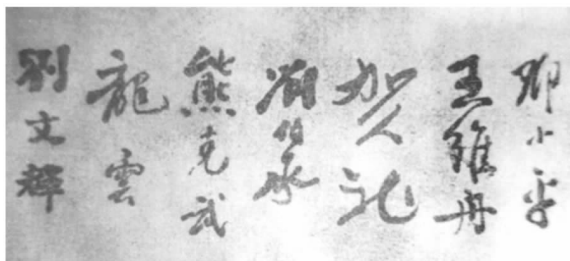
“为什么我说仗还没有打完呢？虽然四川解放了，大西南基本解放了，但是，今后的斗争，要比普通的军事斗争、比打几个仗要复杂和艰苦得多，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西



1950年7月，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主席、副主席的合影（从右至左：邓小平、王维舟、贺龙、刘伯承、熊克武、龙云、刘文辉）。

南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保留着，手里还掌握着武装，这意味着更尖锐的阶级斗争还在面前。这一斗争，要到完成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阶级后才能获得基本的胜利。这个斗争极其复杂，表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还包含着流血的斗争，比如剿匪和对付可能发生的叛乱。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不仅要坚定勇敢，更要有智慧、策略、方法，也就是要用党的政策安定一方。”

邓小平在讲话中，把当时的政治任务概括为“九十万”、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副主席合影后签名。

“六千万”和“六十万”。他说，第一个任务是“九十万”，即教育与改造在解放西南作战中起

义、投诚与俘虏的国民党军队九十万人。要下苦工夫，对他们做工作，把这“九十万”改造过来，有的改造成人民军队，有的经教育后，安置到家乡去生产，不使其流为游民和土匪。第二个任务是“六千万”，即如何发动西南7000多万人口中的90%的基本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春耕，完成减租退押，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生产，恢复经济。第三个任务是“六十万”，即提高现有六十万部队的质量，要把战斗队变为工作队，提高素质，加强纪律，去创造和建设一个新的大西南。“九十万”和“六千万”的任务都靠这“六十万”去完成，要引导大家向前看，在改造“九十万”和发动“六千万”的斗争中磨炼，使部队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邓小平不愧是经文纬武之才。他的一席讲话，震撼了与会者的心扉，使二野团以上干部豁然开朗，人人目的明确、任务明确、方法明确。

梁漱溟向毛泽东汇报：“小平迅速把混乱的四川变成稳定的四川”

1950年2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正式成立。邓小平任政治委员，贺龙任司令员。西南军区下辖西康、川西、川北、川东、川南、云南、贵州、西藏8个军分区。西南军区一成立，邓小平与贺龙立即发出《第1号剿匪指示》。

四川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祖国大陆的最后营垒。早在国民党军队面临崩溃的前夕，蒋介石就一面组织残余部队进行正面抵抗，一面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派遣大量特务发展土匪特务武装，企图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进行长期游击战争，从而



造成严重的匪患。潜伏下来的敌特武装和“棒老二”（土匪），乘四川刚刚解放、人民政权刚刚建立、立脚未稳之机，进行各种破坏甚至发动叛乱。年仅19岁的成都市女子中学毕业生丁佑君，在西昌征粮中惨遭匪特杀害。1950年2月6日，成都市郊区龙潭寺、石板滩的匪特，一次就将26名解放军和4名地方干部杀害。邓小平于次日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指出：“剿匪已成为全面的中心任务。反革命武装川东区约有3万人，川南区约有两万人，川北、川西、西康、贵州更猖獗。”

在剿匪斗争中，小平同志制定了“军事进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的方针，作出了《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在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人士参加的清匪委员会。在剿匪过程中，集中主要兵力，采取分散与集中，驻剿与清剿，奔袭与合围的战术，在追剿土匪顽敌的同时，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分化争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川西剿匪部队仅从1950年2月26日至5月，就毙、伤、俘、降匪特4万余人，使成都平原猖獗一时的匪特迅速土崩瓦解。

1951年春天，知名人士梁漱溟根据毛泽东“到南方去看看土改”的建议，随章乃器领导的土改分团到了四川。梁漱溟从四川返京后，专门向毛泽东汇报：“年轻有为、精明能干的小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迅速把一个混乱的四川变成一个稳定的四川，实在出乎人的意料。”梁漱溟还为邓小平正确处理四川“袍哥”而赞叹不已。

毛泽东听后，笑着说：“梁先生看得蛮清楚，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西南军区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和邓小平、贺龙领导下，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取得了重大胜利。西南



1952年7月2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部分领导人邓小平、宋任穷、胡耀邦、李大纲等在新都桂湖留影。

军区各部队共歼灭国民党匪特116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700余门，各种枪支60万支。后来，毛泽东于1951年1月28日给邓小平及西南军区的电文中说：“你们路线正确，方针适当，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电所属予以嘉奖。”应该说，毛泽东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菩萨兵”进军世界屋脊，小平要求部队学藏语

刘邓大军解放了四川，解放了西康，解放了贵州，解放了云南，还不能说整个西南都解放了。因为，还有一块面积为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没有得到解放。世界屋脊下勤劳、智慧、勇敢的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教合一的农奴社会中，受尽了反动统治者的奴役和欺凌，他们盼望着“菩萨兵”解放



军去解放他们。

1949年12月底，毛泽东作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

1950年1月初，邓小平在重庆收到了一封由北京中共中央转来的毛泽东发自莫斯科的电报。毛泽东这封电报是发给“中共中央并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的。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在这封电报里提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由西南局担负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

此前，毛泽东曾提出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主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当时主持西北局工作的彭德怀给毛泽东回电说，从青海、新疆等地“北路进藏”困难很大，短期内难以克服。于是，毛泽东才在这后一封电报里提出改由西南局担负此任务。

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等人根据毛泽东的电报指示，立刻进行研究，决定由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的第十八军执行进军西藏的任务。

1950年1月8日，邓小平与刘伯承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拟定以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核心。”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当时已在中共川南区党委任职，要他率部进藏，他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这一决定。

1月10日，毛泽东复电同意邓小平、刘伯承意见，并指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措一切”。

1月1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重庆曾家岩向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和十八军师以上干部传达中央指示，布置进藏工作。刘伯承首先讲话，他说：“你们都很年轻，是进军西藏

的各路诸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处处体现出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

邓小平在讲话中，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的纵横比较中，作了深刻的阐述。

邓小平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需要一定数量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问题；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如唐朝和番。以后用兵均未成。解决西藏问题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原则是民族自治，政教分离，团结达赖、班禅两派，要靠政治走路，靠政治吃饭。我们需要相当兵力，但力量过大，则引起以后问题不好解决，兵力确定入藏3万人，力求精干；补给线1万，加强兵站线。为什么要十八军干，主要由于干部问题。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指出，必须“要解决补给之公路问题”。为了使十八军重视从政策上解决西藏问题，他指示部队“成立政策研究室”，大力加强为西藏政策制定工作所需的调查研究，并进一步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重要原则。

他要求进藏部队：“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去把康、藏的广大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邓小平指示起草进军（西藏）守则，要求进藏部队模范遵守纪律，执行党的政策，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邓小平并要求部队学习藏语。

以后，邓小平又专门为十八军题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的无上的



光荣。”

1950年1月18日，刘、邓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进藏工作计划、支援措施及西藏工委组成名单，还向中央提出“自康、滇、青、新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

1月24日，中央致电西南局、西北局，赞同刘、邓“多路向心进兵”建议，批准了由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陈明义、天宝等人为委员的西藏工委。

为了配合、支援十八军进藏，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从军事、政治、后勤等方面都作了周密的安排。1950年1月22日，邓小平等领导人决定组成规模大、等级高的“支援司令部”。后又决定“支援司令部”与“西南军区工兵司令部”合并，成立统一的“支援司令部”，由张国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统一指挥修路和运输。

1950年2月2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用西南局、西南军区的名义，电请中央军委，建议西北加派骑兵入藏，军委回电表示同意。2月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及二野联合发出《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要求进藏部队亲密团结西康、西藏地区的藏族同胞，忠实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和决心。

究竟应该怎样去解放西藏？毛泽东根据西藏的特点，提出了“和平解放”的基本方针：“要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争取西藏政治变化”，“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毛泽东的指示和邓小平的思路不谋而合。

1950年2月25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电示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这一电报向西南局具体提出

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电报并指示西南局、西北局认真研究西藏情况，物色适当人选去拉萨做争取工作，并拟定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

邓小平担任第一书记的西南局和彭德怀担任第一书记的西北局一样，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1950年5月11日，西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拟定的解放西藏的四条方针：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实行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这四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提出还应起草“可以作为和平谈判基础的若干条件”。邓小平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又亲自主持起草并向中央呈报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两天后，中央复电表示同意。

6月2日，西南局正式发出《关于以十项条件为和平谈判及进军基础给西藏工委的指示》。由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十条政策，具有伟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用邓小平当时的话来说：“这个政策影响很大，其力量不可低估。”这十条政策既成为不久后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十七条协议的基础框架，我们也可从中看出它略有32年后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伟大理论的端倪。

这十条的具体内容是：“（1）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2）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3）西藏现行各种政策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4）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

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5) 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6) 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7) 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8) 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9) 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10)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这十条体现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推动力。32年后的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1951年4月，邓小平和各界群众欢迎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途经重庆前往北京。

时，完整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内容主要包括：（1）在一个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里，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国家主体地区——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2）由统一国家的全国人大及中央政府行使国家的权力，台湾、香港、澳门按宪法规定设立特别行政区，行使地方政府的权力，并在外交、国防、宣战、媾和方面服从中央。（3）在祖国统一后，特别行政区现行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并享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的高度自治权。台湾特别行政区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4）国家宪法和法律保障“一国两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保证大陆地区和特别行政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伟大理论的理论起点，可以追溯到1949年和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之一的邓小平，在西南局工作期间的许多精辟见解和伟大建树，是这一理论同过去的历史经验的联系和继承的一部分，是这一理论后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渊源的一部分。“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形成的。1950年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政策已略见其端倪，这一构想的正式提出是从台湾问题开始、而被首先用于解决香港问题的。

1973年才复出的邓小平，于1974年10月2日在会见台湾同胞、海外华侨时说：解放台湾有和平方式和非和平方式两种，即使台湾解放，我们也不会把大陆的政策搬过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与此同时，



停止了长达20年的炮击金门的行动。同年1月30日，邓小平在美国宣布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两天后，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客人时说：这个“九条”，是我们根据现实情况提出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合情合理的方针政策。

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外一位朋友时又说，“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一国两制”的构想要归功于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面临用和平方式还是非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

从1950年邓小平用“和平统一”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十条政策，到32年后正式完整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缜密的逻辑联系，其基本思想都是“中国的实际情况”与“和平统一”。都是高瞻远瞩的同一伟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都把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的统一问题，都体现了照顾历史实际和现实可能的灵活性，也都坚持了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

当1950年邓小平亲自主持制定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政策时，他就说过：“我们对西藏的十条，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所以他反复强调：“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力量不可低估。”当时他还说：“我们确定，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能

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以后才能进行。”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外国反动势力的怂恿支持下，西藏噶厦政府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妄图用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和平进藏。从1950年10月6日至24日，邓小平和贺龙命令西南军区第十八军及第十四军一部，在西北军区骑兵部队的配合下，发动昌都战役，歼灭西藏地方反动政府藏军主力5700多人，叩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

“二呀嘛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

1951年春天，西藏地方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取道重庆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

1951年4月16日，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到达重庆。3天后，邓小平和贺龙等西南党政军领导亲切接见并宴请了阿沛·阿旺晋美一行。邓小平向他们讲述了共产党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政策，坦诚而又坚定地向阿沛·阿旺晋美等人表示：“我们是要认真执行的”。邓小平还讲了争取达赖从亚东回来与解放军和平进军的好处，希望他们消除隔阂和猜疑，使谈判成功。邓小平还高度评价阿沛·阿旺晋美在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从西藏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主张和平谈判的历史性选择。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使西藏在未经激烈的武装斗争、西藏地区未受巨大震荡的情况下，达到了和平解放的目的，同时



促成了藏族内部的和解，收到了维护西藏民族内部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双重成果。

1951年8月，邓小平等西南军区领导人，命令十八军开始向世界屋脊进军。

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远征之师，攀登终年白雪皑皑的高山峻岭，涉过汇集冰川融雪、奔腾湍急的怒涛激流，越过黑压压的原始森林，穿过泥泞滞水、掩盖着千年沼泽的茫茫草地。十八军经过的许多地方，渺无人烟，常常使人方向莫辨。西藏高原空气稀薄，许多解放军战士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不少人均有高山反应。白天，他们迈着艰难的步伐行军；夜晚，从雪山峡谷中刮来的凛冽的高原寒风，夹着雪花，多次袭向露宿于草坡上的战士们。为了藏族兄弟的解放，不少指战员长眠在进军途中，为和平解放西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经过两个月左右在极端险恶的自然环境里进军，这支沿途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解放大军，按照邓小平制定的方案，终于在1951年10月、11月间进抵拉萨。

千百年来，高山连绵、雪峰重叠、地势高峻的康藏高原，交通极不方便。康藏高原的运输主要靠人背畜驮。西藏的马匹多为领主所骑乘，牛皮船是藏族特有的水上交通工具。虽然这里有体大毛长、耐寒负重的“高原之舟”——牦牛，作为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还是远远不能适应部队补给的需要。为了切实解决大部队进军西藏的补给问题，邓小平决定修建从四川进入西藏的川藏公路。在邓小平一声号令下，筑路官兵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人迹罕到的荒山野岭，修筑通往世界屋脊的公路。

当年，筑路官兵是没有今天这样的现代化筑路工具的。他们硬是凭着一锄一锤，在空气稀薄、条件恶劣的冰天雪地中，

一寸土、一寸土地向西藏首府拉萨推进的。他们在那终年积雪的皑皑雪山上，在那曾多次吞噬人们的茫茫草地中，餐风饮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修筑川藏公路时，首先遇到了位于泸定县与天全县接壤处海拔3000多米的二郎山。

二郎山拔地千仞，山势险峻，绝壁森森，危崖处处，岩洞交错，怪石嶙峋。当年有一首风靡一时的歌曲——《歌唱二郎山》，就这样唱道：“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但是，邓小平的部下“不怕那风来吹，不怕那雪花飘，起早睡晚忍饥饿，个个情绪高，开山挑土架桥梁，筑路英雄立功劳。……”筑路官兵不畏艰辛，在“正（月）二（月）三（月），雪封山；四（月）五（月）六（月），淋得苦；七（月）八（月）九（月），稍好走；十（月）冬（月）腊（月），学狗爬”的荒山秃岭，牢记邓小平政委的嘱咐，高唱：“二呀嘛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誓把公路修到西藏”的壮歌，挥镐打锤，流血流汗，终于使汽车在二郎山上奔驰。

位于今四川德格县境内、属沙鲁里山脉的雀儿山，海拔6100多米，是四川通往西藏公路的又一座拦路虎。虽然雀儿山有仪态万千的冰山风貌，是世界屋脊上的一座雄关，可是，邓小平的筑路官兵无暇去欣赏那一幅幅雄浑、淳朴、优雅的高原奇观，他们得在这渺无人迹、严重缺氧的雪线之上，打通雀儿山，开辟通向拉萨的幸福之路。不少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南征北战的英雄指战员，为打通雀儿山又洒下了他们的热血，甚至留下了他们的忠骨。

从邓小平决定修建进入西藏的公路、刘邓大军进驻西藏以



来，以解放军筑路官兵为主的各路筑路大军，终于开辟了川藏公路（1954年建成）、青藏公路（1954年建成）、新藏公路（1957年建成）和滇藏公路（1976年建成）等重要公路干线，将西藏与四川、青海、新疆、云南连接起来，与北京、与全国连接起来。

川藏公路和其他进藏公路的开辟，对于加强西南边防战备和发展西藏地方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四川和西藏的藏民们，将川藏公路比喻为“一条金色的哈达，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雪山点头笑，彩云把路开”，“我们跨上金色宝马哟，哈达身上带，到北京献给毛主席，感谢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带了幸福来……”

两年圆了蜀乡人半个世纪的梦

《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书》 与受屈辱的历史

1950年6月15日下午4时，山城重庆下着细雨。邓小平与1万多军民一道，冒雨在重庆浮图关下的西南军区操场，出席由西南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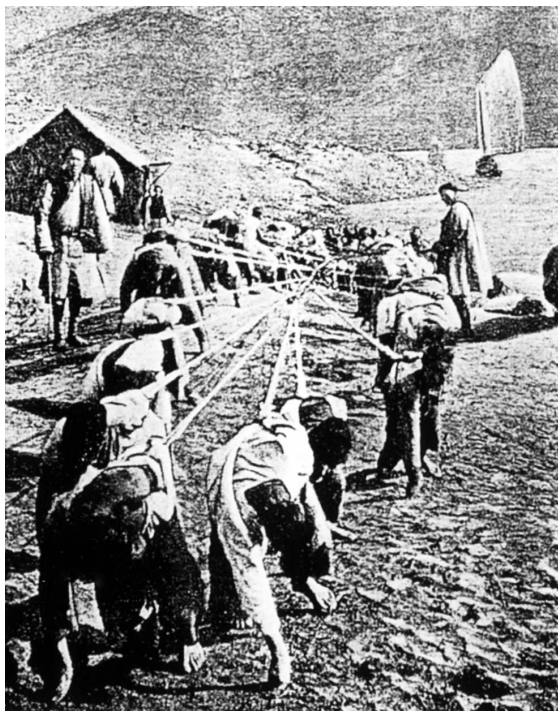


1900年2月，川东道关于保护英国人在川勘测铁路的飭令。

区与西南铁路工程局联合举行的成渝铁路的开工典礼。成渝铁路是新中国建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成渝铁路全长505公里，东起重庆，西到成都。修建成渝铁路是四川人民近半个世纪的愿望。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深渊中的近代中国，从19世纪中叶起，就被西方列强剥夺了国家主权，连经济命脉也被外人控制。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还把掠夺中国的铁路权作为扩大侵略、输出资本、宰割中国的重要手段。天府之国四川这块宝地，一直为帝国主义国家垂涎和争夺。有的侵略者把四川看作是必得的“中国的花园”，有的则视为扩张

势力的“第一注意之地”。但四川僻处祖国西南内陆，自古“蜀道难”，交通不便，帝国主义不能畅通无阻地倾销商品和资本。四川盆地内部虽然是海拔350~700米的丘陵，但四周却被1000~3000米以上的高山和高原所环绕，除了东有长江与外界沟通之外，其他三



20 世纪初川江边上的纤夫

面基本上是封闭的。帝国主义首先夺取川江航行权。从19世纪末年起，帝国主义以兵舰、轮船突破了四川东部的屏障——长江三峡，控制了川江轮船航运。但是，帝国主义在这一时期对川江航行的开拓、经营，还远不能满足它们的贪欲。因为川江滩多水急，航行时间长，载货少而风险大。于是，他们在继续探索改善川江航运的同时，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夺取四川铁路权方面。1863年英国人就拟定了一个以汉口为中心的铁路建筑网，网线之一，是“西行经过四川、云南等省直达印度”。1897年，英国人更提出“任何铁道设计之最终目的”，须到达“物产丰富、人口稠密之四川省”，将“汉口（经重庆）至成都线相连”。同年，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也提出修一条“展筑至人口稠密的四川省省会成都、达扬子江上游重庆”的铁路。与此同时，日本、沙俄、美国、德国也想染指四川铁路的修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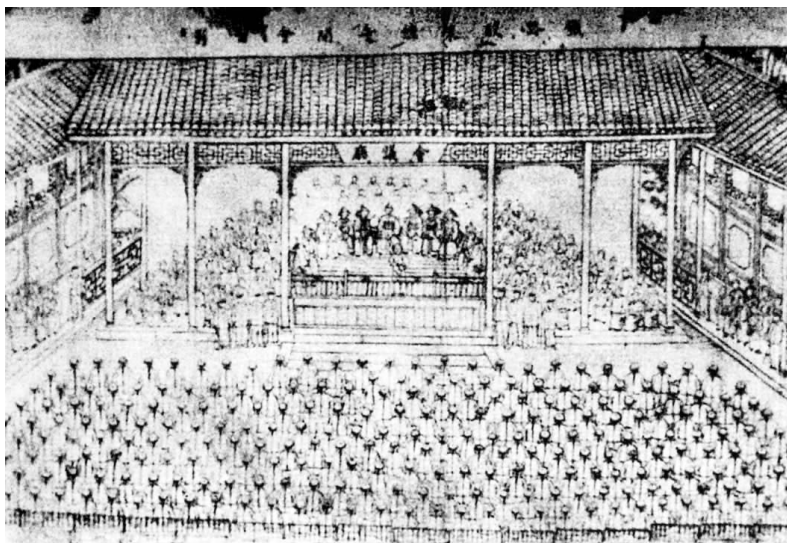
面对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虎视眈眈，四川人民提出了自主筑路的要求。1903年，正当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收回利权非常热烈的时候，四川人民正式开始了以人民自己的力量来修筑川汉铁路的运动。1904年1月，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这是全中国最早成立的铁路公司。川汉铁路预定线路自汉口起，经宜昌、夔州、重庆、永川、内江、资阳以到达成都，全长1980公里。建筑费用需银5000万两以上。成渝铁路属川汉铁路的西段。为了修筑成渝铁路，爱国知识分子纷纷走出四川盆地去国外学习铁路工程和路政管理，成都和重庆开办了铁路学校。“按租集股，因粮认摊”的集资办法，使全川大小田户都成了铁路股东。可是，腐朽、卖国的清王朝在中华民族濒临毁灭的情况下，任凭帝国主义瓜分中国。1904年11月，四川留日学生发出《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书》，在陈述列强瓜分中国的政



1905年1月,《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公布。

策中,“最坚牢而又惨烈者莫若其掠夺铁路”政策。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面对四川人民的强烈不满,迫不得已于次年奏请官绅合办川汉铁路。名义虽有改变,实权仍由锡良操纵。1907年赵尔丰任四川总督后,虽故作姿态,推詹天佑为川汉铁路总工程师,但仍然是“万变不离其宗”——卖国求荣。1908年,清王

朝执行“利用外资,开发实业”以强化中央集权的方针,与帝国主义国家勾结,决定大借外债修筑川汉等铁路。四川人民痛斥清王朝是“务国有之虚名,坐引狼入室之灾祸”,强烈反对其卖国行为。而在四川人民自主筑路、筑路救亡的爱国行动中,来自邓小平家乡的蒲殿俊(1875-1935),起了重要的作用。蒲殿俊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担任由300多名四川籍留日学生组成的“川汉铁路改进会”的正干事(会长)。他于1908年回国返川后,更是利用担任四川谘议局局长及利用谘议局机关报《蜀报》等舆论工具,谴责弊政,抵制和揭露清王朝的卖国卖路行为。以后,蒲殿俊担任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会长,并在成都聚集3000余人到督署请愿。但是,卖国卖路的清王朝仍不顾四川



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图

和全国人民的反对，竟以“铁路国有”为名，攫占川人路款，于1911年5月将四川人民好不容易争得的筑路权，再次置于帝国主义集团控制之下，把已归商办的川汉铁路筑路权出卖给英、法、美、德四国银行集团。

受屈辱的历史，既会使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

商办川汉铁路公司股票



留下深深的创痛，也会激起志士仁人的爱国热忱和强国之志。围绕由川汉铁路修筑权而出现的四川各阶层、各民族群众都卷入的“保路运动”，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铁路主权和清王朝卖国卖路为开端，发展成为全川人民参加的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专制统治的“保路同志军”武装反清爱国运动。四川各地愤怒的群众，拿起刀枪戈矛，层层围困成都，迅速在全川范围形成气势磅礴的革命战争，为中国引来了新的革命高潮，推动了各省革命斗争的高涨，成为以武昌起义开始的中国革命的导火线。

青年朱德、刘伯承深受“保路斗争”影响， 孩提时代小平会唱“保路运动歌”

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四川籍的革命家，如吴玉章、朱德、刘伯承等都会受到过“保路斗争”的影响。邓小平的亲密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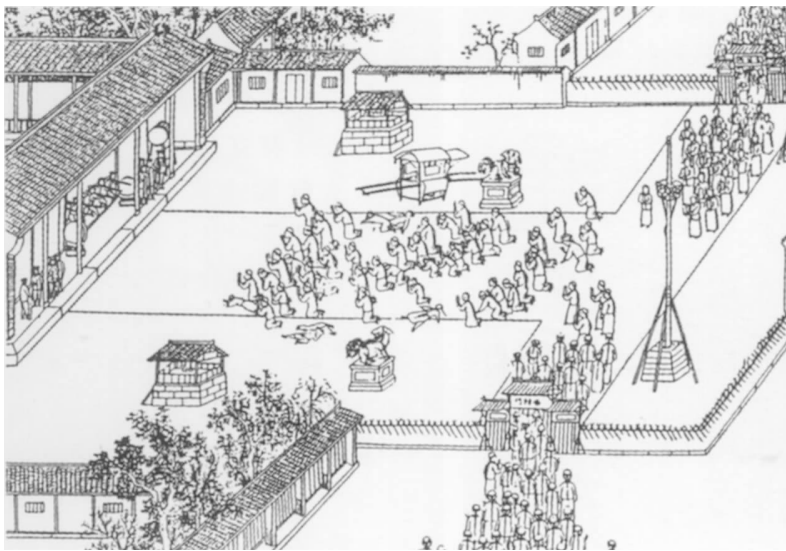
友——亲历辛亥革命的刘伯承曾经说过：“四川人民为了一条铁路发动了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没有成功，而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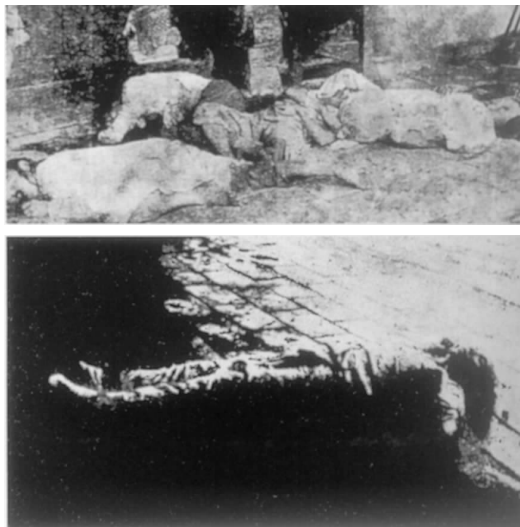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以《蜀报》增刊的形式出版。图为该《报告》报影。

铁路连影子也见不到。”

1911年6月17日，由广安人蒲殿俊担任会长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时，邓小平还差两个月才满7岁。已读了两年私塾的邓小平其时来到了离家约3华里的广安协兴场小学堂读书。协兴场这一偏僻的乡村小镇也同样卷入了“保路风潮”。邓小平和协兴场小学的孩子们，当时都会唱一首宣传“保路”运动的歌《来日大难歌》。歌中唱道：“来日难，来日难。要顾来日，莫顾眼前。况且作难的日子就不远，休把来日来当玩。作难的日子是哪件，外国人占了财政路政权。财政路政被他占，国民都要受熬煎。……要不作难还须定主见，废合同就是生死关。打起锣鼓催起板，同志会个个有志男。就是女界亦勇敢，大家都把名字签。喊起排子劲莫软，这股劲定要硬过山。齐把合同来扳转，那时节齐唱太平年。”在“保路运动”中，全川掀



川督赵尔丰诱捕保路运动领导人后，成都群众从四面八方齐奔督署请愿。



川督赵尔丰制造的“成都血案”中枪杀的请愿群众

起了罢市、罢课的风潮。协兴场的一些店铺关门闭户，协兴小学堂也放假了。但少年小平没有在家中呆着，而是经常跑到协兴场上去听消息、看热闹。这一年的9月7日，川督赵尔丰制造了“成都血案”，枪杀请愿群众32人，诱捕蒲殿俊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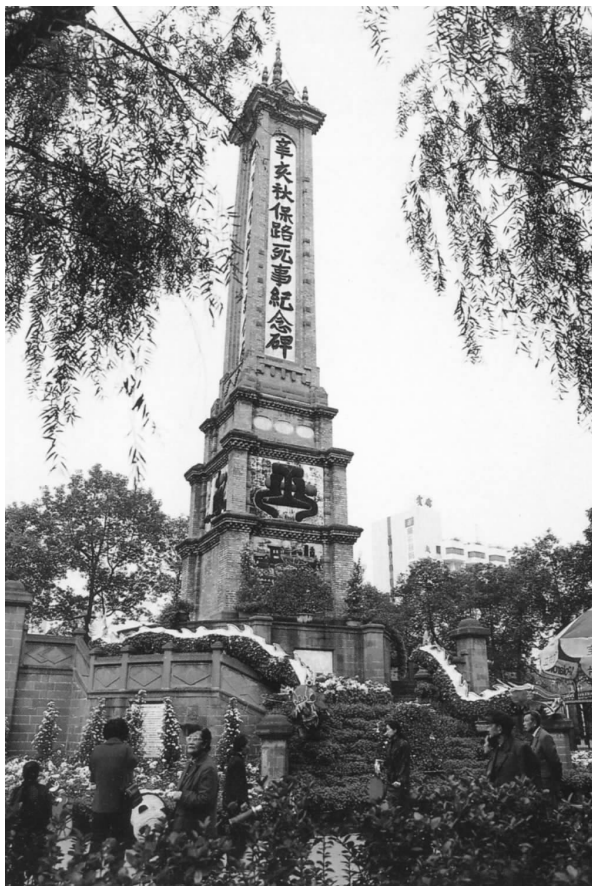
9名保路运动领导人。后来，四川人民为了悼念“保路运动”的捐躯者，在成都少城公园内，修建了《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以“成都血案”为转折点，四川保路运动发展成为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武装起义，各地“保路同志会”改名“保路同志军”。当时流行在成都和广安等许多地方的一首《保路歌》中唱道：“废约保路兮，吾头断，志不移！”9月9日，成都与周围各县的20万革命党人与清军在城中展开激战。接着，全川各地的同盟会员、哥老会众都与清军展开战斗，武装起义已经发展到全省全民的空前规模。在广安协兴场上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并不时传来某县独立的消息。人们或聚集在路边，或聚集在茶馆议论纷纷，都感到清王朝的气数已尽，盼望着革命能尽快来到身边。

清政府为镇压四川因“保路斗争”而爆发的武装起义，慌

忙从湖北调集军队入川，造成武昌兵力空虚。这样，四川人民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使武昌守敌兵力非常薄弱。四川的“保路斗争”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孙中山曾经感慨地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起义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孙中山还在《祭蜀中死难诸义士》中写道：“泱泱岷江，峨峨蜀山，惟蜀有才，奇魂磊落。”

武昌起义成功以后，成立军政府，全国响应，各省纷纷独立。川东北起义民军，于11月22日攻占了广安县城。当天，起义民军在广安召开群众大会。很快，协兴场的男子纷纷剪去发辫，女子也开始放脚。接着，协兴场的一些哥老会成员也纷纷赶赴县城参加起义军。当时每天都传来新的消息，每天都有新的变化。可是不久，军政府领导集团内部开始分化，已经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同时，由于急于招兵买马，新兵中的会党分子较多，带来了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和浓厚的封建思想，破坏了起义军的纪律。清王朝被推翻了，辫子也剪掉了。但周围的世界和以前没有多大差别。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广安人蒲殿俊《哀告全川伯叔兄弟书》 与少年小平目睹身边发生事

少年的邓小平目睹了他身边发生的一切。但他当时还不清楚，在保路运动中风云一时的广安家乡人蒲殿俊，在被囚禁70余天后又被囚禁他的川督赵尔丰“礼请出署”。当蒲殿俊被赵尔丰聘为“高等顾问”后，又曾写过一封《哀告全川伯叔兄弟书》，请求全川人民停止保路斗争，息事归农，暴露了立宪派的致命弱点。而这以后，蒲殿俊又顺应势不可挡的革命潮流，从鼓吹立宪转而迎合革命，担任了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大汉四川军政府”的都督。可是，蒲氏虽为川中名士，却只“优于文学”，而“细于行政”，更不懂军事，当发生兵变时，只有逃跑，所以仅仅当了12天的“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少年邓小平不清楚他的这位同乡蒲殿俊的具体情况，也不清楚社会和国家变革的具体过程，只是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萌发了一种对外面世界的关切和向往：在协兴场以外，在广安县以外，有一个广大而神秘的世界，有一些很有本事的人物，在影响和改变着协兴场的一切。他要到广安县以外的地方去，甚至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寻找“真谛”。古老的东方大国备受屈辱，穷苦百姓在各种反动势力的压迫、剥削下，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每遇灾年，就更是只有卖妻鬻子，靠野菜、野草、树根、树皮充饥，甚至食白泥聊以“饱”腹。与邓小平的家乡广安县相邻的邻水县，几天内就饿死300多人。天府之国的座座高山为之哀痛，天府之国的条条江河为之呜咽。这哀痛，这呜咽，化作流不尽的川江泪，掀起前仆后继的川江浪。那时的邓小平，亲眼

目睹了四川人民怎样在深重的灾难中挣扎，亲眼目睹了滔滔川江水那流不尽的眼泪和酸楚。为了解救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大众，为了寻找济贫救世的道理，当年邓小平才渴望远涉重洋、去到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一个梦游弋蜀乡人中半世纪， 一块巨石压在小平心上几十年

成为辛亥革命和武昌起义前奏的四川“保路运动”，一直是邓小平心中一个沉甸甸的回忆。1921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参加反对北洋政府出卖修路权的“拒款斗争”，也与“保路运动”有联系。辛亥革命以后，“成渝铁路筹备处”或“成渝铁路工程局”的招牌挂了几十年，历届反动政权以修路为名派款又拉夫，四川人民被搜刮去的钱财早已超过了寸土寸金。虽然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直到刘邓大军挺进四川时，铁路只完成全部建筑安装工程量的14%，线路标准很低，整个成渝线连一根枕木也没有铺，一根钢轨也没有安。修筑成渝路竟成了

20世纪初川江上的峡谷





四川人民的一个现代童话，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这个无法实现的愿望，不仅有血泪斑斑的故事，而且有铸造在背后积淀着的艰辛。

作为生在四川、长在四川的邓小平，对川人近半个世纪渴望修筑成渝铁路的历史，是从来没有忘记过的。就在他离开四川去法国勤工俭学和回国从事革命活动这些年来，他似乎常常看见四川家乡那一个个父老乡亲在哭泣，芸芸众生在祈盼，他们虔诚希望能圆成渝铁路这个梦。这个梦几十年来一直游弋在四川人民之中，也像一块巨石压在邓小平的心上。经过几十年血与火的锻炼，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已经渗入邓小平的骨髓，共产主义的思想已经融合于他的血肉与灵魂之中，“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座右铭随时都在提醒他一旦条件成熟就要圆巴蜀人民的这个梦。在他为国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时候，历史的脚步艰辛地走进了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一年。

“请你为四川家乡为成渝铁路物色一批专家”

1949年6月和7月，邓小平在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家里，两次见到了陈毅的堂兄陈修和，也两次与陈修和谈到了修成渝铁路的事。陈修和早年曾在四川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和黄埔军校五期炮兵科毕业，蒋介石对他很器重，他曾任过蒋的侍从副官，后被派到法国学习兵工，后任国民党联勤总部兵工署沈阳兵工厂中将厂长。在解放军解放东北时，为了保护沈阳兵工厂，陈修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次，陈修和来到上海，是受朱德总司令派遣，协助上海市市长陈毅联络那些未随国民党走的兵工技术人才。

邓小平对陈修和说，将来四川解放后，接管、安置、恢复生产的任务很重，也很需要技术人才。邓小平还请陈修和介绍一些他所知道的四川的情况。陈修和首先介绍了当年全国最大最新式的汉阳工厂迁到重庆的情况。陈修和说，重庆钢铁厂完全可以年产4万多吨铁路钢轨，可是国民党最终还是把成渝铁路的修建让给法国人来搞。后来，蒋介石打内战，修建成渝铁路的计划又停了下来。

邓小平很关切地问陈修和：成渝铁路的准备工作原来搞了多少？

陈修和说：“搞了一些。铁路线已经基本勘定。不少段的路基已经筑成。内江铁路桥的大桥墩已经修出水面。这些都可以利用，工期可以缩短。”

邓小平邀请陈修和这位时年50多岁的高级知识分子回家乡四川去参加接收和建设。陈修和说：“邓政委如此看重、信任我，四川人民是我的父老兄弟，我作为一个四川人，本当欣然从命，但是，我已接到朱总司令通知，要我8月下旬回北平参加将于9月召开的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所以这次不能回家乡报效父老兄弟。”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便对陈修和说：“请你为四川家乡为成渝铁路物色一批技术人才和专家。另外，请你个人再写一份关于修建成渝铁路的意见书。”

同年9月，当邓小平在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上见到陈修和以后，非常感激地对他说：“你关于修建成渝铁路的书面意见书，我早已收到并且认真学习了，很好，很不错。你为我邀请的几十位兵工技术专家，也早已全部到四川报到。我们还组织他们学习了政策。这些留法留德的同志，跟我们有共同的语言：爱

国!”然后，邓小平对陈修和说：“我们决心把成渝铁路很快修起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成都战役第一枪尚未打响， 小平主持会议决策修成渝路

邓小平9月在北平对陈修和讲了“把成渝铁路很快修起来”的话两个多月以后，当重庆才刚刚解放一个多星期，成都战役的第一枪还没有打响的时候，邓小平就主持西南局开会，作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要决策。

1950年1月2日，邓小平在向中共中央报告重庆解放1个月后的西南情况和汇报建设新西南的计划时，又特别提出“着重于修成渝铁路”。这以后不久，由邓小平担任副主席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作出的第一个重成渝铁路开工仪式





由部队指战员组成的筑路大军开赴筑路现场

大决策，也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

从“保路运动”发生到这个时候，整整40年了；若从巴蜀人民准备用自己的力量修筑川汉铁路（包括其西段成渝铁路）算起，快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以来，绕成都而过的府河与南河没有改道，绕重庆而过的长江与嘉陵江也没有改道，滔滔的江水依旧日夜流淌。同样的蓉城，同样的山城，同样的江风拂拂，星月依依，然而，斗转星移，景象大变，在巴山蜀水游弋了近半个世纪的美梦快要成真了！

1950年3月，西南铁路局成立于重庆嘉陵新村。4月，第一批工程人员分赴工地沿线，按铁道部的部颁标准重新对成渝铁路进行勘测。随后，由邓小平担任政治委员的西南军区首批调集的4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开赴工地。以后，在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安排下，西南军区从各部队总共抽调了3万多人，组成5个修建成渝铁路的军工筑路队。加上四川各区招收的1.8万余名失业工人，全面展开路基土石方施工。军工筑路队的主要成员，



都是在刘、邓指挥下南征北战的英雄指战员。他们牢记刘、邓首长的指示，高举“开路先锋”的大旗，在成渝铁路工地上洒下他们的热血。四川人民和民工筑路队赞扬军工筑路队“不愧是英雄的刘邓大军”。1950年7月10日，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成立，刘伯承、邓小平决定由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担任主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和西南铁路局局长赵健民担任副主任委员。

“成渝路一开工就可带动四川的经济建设， 四川人民渴望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为什么在恢复四川和整个西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百业待兴、百废待举的情况下，邓小平和他的亲密战友刘伯承等人要作出修建成渝铁路的决定呢？还在成渝铁路正式开工以前，邓小平就对这一问题作了解释。邓小平说：“我们还面临着很大困难。我们只好集中力量办一两件事，绝不能百废俱兴。现在中央批准我们修成渝铁路了，这对西南和四川人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成渝铁路一开工，不但可以带动四川的经济建设，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四川人民渴望四十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在1950年6月15日修建成渝铁路的开工典礼上，邓小平在致词中又说：“我们进军西南就下决心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做起。我们今天建设成渝铁路，是在经济及设备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因此，人民对建设的希望是花钱少，事情办得好，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替



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在审查成渝铁路方案。

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建设起来。我们今天订出修路计划，开始兴工，并不等于问题解决了，真正的困难是在开工之后才能发现，所以今天不能盲目乐观，许多的困难问题必须要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逐步地求得解决，求得克服，并防止官僚主义的倾向发生。”邓小平在致词中还表示：修筑成渝铁路，只要遵守劳动纪律，学会掌握修路技术，紧密团结，努力工作，许多问题都能够逐步地求得解决。

成渝铁路开工后碰到的困难，除了山高水恶、自然险阻之外，更主要的在于新中国、新四川所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民生困苦，失业众多。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的既成局面。四川又是全国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匪患特别严重。在成渝铁路工地沿线，东迄巴县、永川，西至简阳和成都市郊区的龙潭寺、石板滩，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土匪武



装同地主恶霸势力相勾结，大肆进行骚扰破坏。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3万西南军区工兵部队，既是修筑成渝铁路的主力军，也是保护工地安全的武装力量。

邓小平在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发表讲话40天以后，朝鲜战争爆发了。以后，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再以后，侵略军直逼朝鲜北方，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从1950年10月19日首批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以后，修筑成渝铁路的工兵部队大都奉命北调抗美援朝。他们留下的任务，为四川的川西、川北、川东、川南四个行政区从各城镇招募的失业工人和沿线动员的农村民工所接替。这样，数以十万计的民工，分散在千里成渝线上，为自己修铁路。当时筑路机具极少，主要靠手工劳动，直到1951年8月，才逐步配备部分桥梁隧道用的机械。因此群众感叹地说：“成渝铁路是肩膀挑出来的。”筑路材料主要用国内产品，多数是就地取材。除大中型桥梁使用钢梁外，其墩台、基础以及中小型拱桥、涵洞都尽量利用沿线所产的石料，共建成石拱桥827座。资阳县境内的王二溪石拱桥，外形美观，修好后行车至今几十年仍十分坚固。全路5.6万吨钢都是由重庆钢铁厂轧制，所需钢锭由鞍山钢铁厂供应。

小平为发掘成渝路沿线文物的 老教授准备了滑竿

为了使筑路队伍建好成渝铁路、尊重技术人员的指导，邓小平还提出，对专家要大胆使用，让专家有职有权，并在工资待遇上尽量给予从优照顾。许多修建成渝铁路的专家，当年去外国学习铁路修筑技术的时候，正是铁路风潮在巴山蜀水激荡

的年代。当他们学成回国后，却报国无门。现在共产党在四川百废待举中，率先修筑成渝铁路，这就遂了他们的心愿。铁道选线专家蓝田（子玉）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生于四川郫县郫筒镇的著名工程师。其父、兄都是当年保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的家中还保存过惩戒有“屠夫”之称的川督赵尔丰的军刀。这位著名的老一代铁路工程专家早年在成都府铁道学堂和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就读毕业。1917年2月即开始从事铁路工作，先后在四桃、沈海、成渝、浙赣、赣粤、湘桂、叙昆等铁路担任技术和组织工作。几十年来，蓝田工程师几入成渝铁路工程局又几次退出。在反动派统治的年代，他因痛心于成渝铁路寸轨未见，便封存了技术书籍，从念佛读经中去寻觅精神寄托。邓小平决定修筑成渝铁路，才使这位年事已高的老技术人员重新焕发了青春。尽管已年过花甲，为了精测线路，他从重庆沿长江步行到朱杨溪，又从内江沿沱江走到金堂。成渝线成都段原来决定出成都沿沱江姚家渡、赵家渡至乱石滩，蓝田工程师以主人翁的精神，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了节省国家的施工费用和铁路建成后的运营与维修费用，经过反复精测和比较，提出了将此段线路改为出成都经洪安乡、越柏树坳，沿小溪至沱江边接乱石滩的方案，缩短线路23.8公里，提早完成工期，替国家节省150亿元的材料和施工费用。援华的苏联专家后来指出，蓝田工程师为修筑成渝铁路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如果在苏联，他完全可以获得“红旗勋章”。

在建成成渝铁路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都虚心听取专家建议，对各个方面都考虑得周到细致。比如为了保护成渝铁路沿线的古迹和即将出土的文物，邓小平特派秘书前往重庆大学请来张圣奘教授。



张圣奘教授是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由周恩来介绍认识的著名学者。

邓小平虽然与张圣奘分别了28年，但知道这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在欧美留学的10年中，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博士、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医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的史学博士，精通英、德、日、俄、西班牙、葡萄牙等9门外语。邓小平还知道，张圣奘在回国后、入川前曾在上海5所大学担任教授。

正在重庆大学执教的张圣奘接到邓小平的邀请，十分兴奋地随邓小平的秘书来到浮图关西南军区所在地。张圣奘和邓小平分别得太久了。当年的邓小平，这时已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张圣奘见到当了“共产党大官”的邓小平时，难免显得十分拘谨。一见面张圣奘只喊了一声：“邓政委。”邓小平笑着和他握手：“我们是老朋友了，就喊我小平算了。”张圣奘发现面前这位与自己地位悬殊太大的老朋友没有丝毫架子，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原来紧张的心情，顿时一扫而空，便向邓小平叙述了自法国分别后几十年的往事。邓小平也简略地介绍了与张圣奘分别后进行革命活动的经历。

在两位老朋友像拉家常一样，共同回忆了在法国相聚的日子以后，邓小平才对张圣奘说：“这次请你来，是有一件苦差事，请你出马。”张圣奘回答说：“只要我能做到的，再苦再累都不怕。”邓小平说：“你知道，成渝铁路已经动工了；你更清楚，四川历史悠久，又有好些皇帝在四川建过都城，古迹和地下文物很丰富。参加筑路的多是部队战士和民工，怕不识文物。若文物遭到损坏，就是我们这辈人的罪过。因此，想请你们专家到成渝铁路工地沿线寻宝，鉴别出土文物，以免文物丢失和

损坏。我们还请你担任考古团长。”张圣奘忙摆手说：“参加考察我算一个，我当不来领导。”

邓小平笑着说：你是鼎鼎有名的大学者了，这个考古团长就莫推了。

张圣奘很感动，作为一个学者，没有比实际考察更让他兴奋的了。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到四川住了几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又来到四川，这以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四川，他的大半辈子都是在四川度过，四川成了他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他对巴蜀历史文化太熟悉了。仅他长期居住的历史文化名城成都，在四五千年的历史中，从两汉之交的公孙述“成家”，到三国刘备的蜀汉；从十六国时期的成汉，到五代时期的前蜀都曾建过都城。这在张圣奘这样爱国爱家乡的知识分子心目中，都自然而然地占据了一席特殊的地位：保护巴蜀文物，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张教授欣然同意邓小平的安排，决心带着邓小平的重托，率领文物考古团去成渝线上进行艰苦的工作。出发之前，张圣奘去了陕西街军政委员会住地向邓小平辞行。邓小平这位驰骋疆场、叱咤风云、威名赫赫的刘邓大军的一名统帅，又再次叮嘱张教授“花大力气发掘成渝铁路沿线的地下文物，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灿烂文化”。张圣奘再次听了邓小平这样关心祖国文物的一席话，真有痛快淋漓之感，打从心里佩服邓小平不愧是经文纬武之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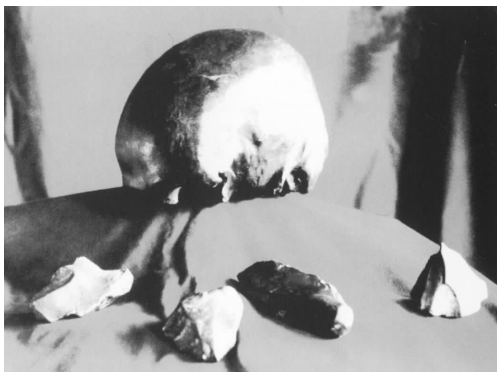
邓小平考虑到张圣奘年事已高，身体不是很好，且蜀道本身就难行，加之成渝铁路沿线都在施工，老教授行动不便，便专为张圣奘备了一乘滑竿。



小平与轰动世界的“资阳人” 头骨化石的发现

1951年2月，张圣奘率考古队经过数月沿成渝线建筑工地的跋涉、考察，来到了资阳。资阳县长向他介绍了成渝铁路资阳筑路工地贯彻执行《加强保护文物的通令》情况后，着重介绍了在资阳城西九曲河工地发现龟化石、鱼化石的情况。张圣奘听了很高兴，立即去到九曲河成渝铁路工地，详细查看了已出土的一堆零星动植物化石，认定这里会有更完整的化石，便决定在这里住下来长时间认真考察。考古团有的同志因长期在成渝铁路沿线奔波考察，深感疲惫，加之不了解张圣奘对此项工作这么重视的原因，便向考古团长张圣奘请假。张圣奘回答说：“我是邓小平政委叫来搞成渝铁路沿线的文物出土考证工作的。据我初步考察，资阳估计有重要文物，希望大家在这种情况下暂时不要请假。”张圣奘随即向邓小平报告了资阳的初步考察情况和考古团有同志要请假的要求。邓小平收到张圣奘的报告后，立即回电：“同志们很辛苦，现在军管无假期。”邓小平的回电安定了考古团所有人员的心思，增强了大家在张圣奘带领下不辞辛劳、夜以继日搞好工作的信心。

工夫不负有心人。1951年3月9日，张圣奘从成渝铁路资阳九曲河大桥工地泥泞的基坑里，挖到了一个距今几万年的人头骨化石。他立即将这一特大喜讯电告邓小平。邓小平一面回电嘉奖考古团，一面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名义上报政务院。当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得知是他20年前在上海的老朋友张圣奘发现了具有世界重大意义的人头骨化石后，心中十分高兴，回



“资阳人”头骨化石及石器

电西南军政委员会派专人将人头骨化石送北京鉴定。1951年6月，中国科学院裴文中教授（1929年在周口店亲手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古脊椎动物研究专家）

率队，前往资阳，与

张圣奘一起作了30天的考察。后经郭沫若和裴文中教授、中科院吴汝康教授等学者几年的考证和研究，认为成渝铁路资阳工地发现的人头骨化石，是我国唯一早期真人类型、属旧石器晚期的人类化石，距今已有3.5万多年历史，是继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之后的重大发现。1951年12月，西南文教部秘书邓少琴写道：“（资阳）人头盖及龙骨化石……于此层掘出人头盖骨之左耳骨、额骨连眉骨、头盖骨、上颌骨共四块。”这是至今能查到的有关“资阳人”的最原始的记录。

至于对这一人头骨化石的定名，1951年4月13日，张圣奘教授面见邓小平时，曾建议命名为“资阳人”。邓小平说：“考古工作成果不少，可喜可贺，张教授辛苦了！资阳我晓得，曹荻秋市长的老家，成都南边的一个县嘛。至于是否定名为‘资阳人’，还是与考古专家商量了再定。”后来，国务院把资阳出土的人头骨化石正式定名为“资阳人”。这一重大发现随着红色电波，很快传遍了神州大地，也很快轰动了全世界。

张圣奘教授为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功不可没。当人们赞扬他时，这位后来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委以“四川省文物管理



委员会主任”的教授，却永远也忘不了邓小平，忘不了邓小平那坚定、深邃、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家雄才伟略的目光，忘不了邓小平圆川人近半个世纪的梦，决定修建成渝铁路的战略举措和对蜀乡文物的高度重视及保护。

修建成渝铁路的很多技术人员，也和张教授一样，过去“报国有心，请纓无门”，现在邓小平尊重他们，关心他们，他们便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祖国，报效家乡。负责成渝铁路全面技术领导的专家刘家熙，只要听说哪个工地上遇到技术难题，就赶到哪里去考察解决。当人们赞扬他这个留学生谢绝美国波阿铁路公司的聘请，回到贫穷的祖国来修铁路时，他说：“准确地讲，我是庚子赔款学生。庚款就是八国联军镇压了义和团起义之后，又向中国勒索四万万五千万两银子的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头上就要摊一两。这么多银子别说打造我这样一个人，就是铺一条纯银的成渝铁路也够了。花这么多学费学到的知识，能不用在国家富强上吗？”有些技术人员在解放前曾经筑过一些路坯、修过一些桥涵。现在，为考察这些桥涵还能不能利用，就匍匐着，不怕脏，不怕苦，一个涵洞、一个涵洞地钻进去检查，为成渝路节省了大量开支。

蜀乡人欢歌《四唱成渝路》， 近半个世纪美梦终成真

成渝铁路修筑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困难，筑路大军中的各级领导干部，硬是遵照邓小平在铁路开工典礼上讲的那样去做：“许多的困难问题，必须要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逐步地求得解决。”每当工棚地下回潮，指导员便推干就湿，把稻草给民工多



邓小平、贺龙、王维舟在研究建设成渝铁路方案。

铺一些，让民工劳累一天后睡得好一些；遇到塌方，指导员总是叫民工先离开，自己最后出洞，把危险留给自己。“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好的指导员、好的干部，带出了好的筑路工人队伍。隧道里放炮后，常常是硝烟还没有散，工人就冲了进去干活。为了修好成渝路，不少人将家藏的寿板、房料，无偿捐献出来作铁路枕木。特别是在实行了土地改革的地区，工地需人更是一呼百应。翻身农民带上干粮，自备锄、镐、筐、杠，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干活。筑路工地请他们吃饭，他们推辞说：“又不是给别人做活路，我们是在为自己修铁路嘛！”一片衷情，溢于言表。整个筑路沿线，处处都有催人泪下的场面。

成渝铁路是四川的大动脉，近半个世纪以来，它一直牵动着四川老百姓的心，现在为自己修铁路，还有什么不能贡献出来呢？成渝铁路所需的129万根枕木，就是沿线群众在极短时间内备齐并送达工地的。

成渝铁路于1950年8月1日由重庆101厂开始铺轨，年底到达江津；1951年“七一”通车到永川；1952年6月13日到达成都。共完成路基土石方4211.3万立方米，隧道43座，架设大中型桥梁84座，修建房屋23万平方米。

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自己修筑的，全部采用国产器材，四川军民用智慧和生命，在中外铁路建筑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52年7月1日，成都和重庆两市同时举行了庆祝成渝铁路通车典礼。贺龙司令员和铁道部滕代远部长分别在成都、重庆主持盛大的通车剪彩仪式。上午10时，两列装饰一新、满载筑路工人、各界代表和少先队员的客车分别从成都和重庆两站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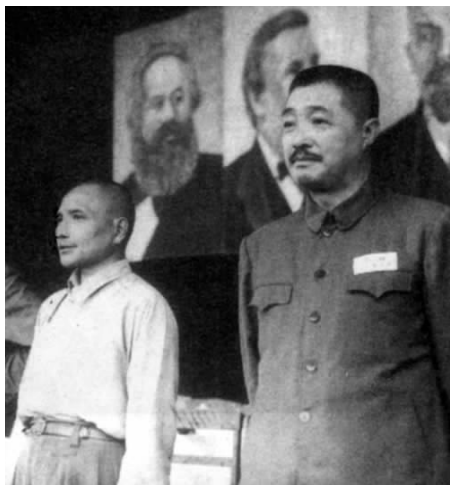


铁道部长滕代远在重庆庆祝成渝铁路通车时剪彩



贺龙在成都庆祝成渝铁路通车典礼时剪彩

邓小平与王维舟等人一道参加了成都的通车典礼。在庆典上，邓小平挥毫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题词以后，坐在主席台上的邓小平神采奕奕，目光炯炯。贺龙在一片欢呼声中剪彩以后，一列彩旗招展的火车，缓缓启动，驶出成都站，奔向远方。邓小平似乎看见了蜀乡的山今天格



邓小平与贺龙在成都庆祝成渝铁路通车典礼的主席台上

外的青，蜀乡的水今天格外的碧。不一会儿，庆祝成渝铁路通车的联欢会开始了。修建成渝铁路的解放军指战员、筑路民工和参加联欢会的蓉城人民群众一道，都放开了歌喉，尽情地歌唱。歌声犹如锦江水一样奔腾，倾吐他们诉不尽的兴奋；歌声震荡在锦江两岸，盖过了江水声，响彻云霄，腾空向远方飞去。欢歌笑语，此起彼伏。其中一首名叫《四唱成渝路》的歌唱道：

“一唱那成渝路，有话说从头，四十多年来修路，派款又拉夫，刮尽了人民的血汗钱，只见他们盖洋楼，‘成渝路’不是‘成渝路’，是反动政府的摇钱树，人民的愿望付流水，成渝路变成了人民的血泪仇。

二唱那成渝路，人民喜心头，西南解放才半年整，修路就动了工，人民政府的好领导，坚决要把路修通。十万军工和民工，风里雨里不休停，为人民自己来修路，一个个争取立功当

呀当英雄。

邓小平在成都出席成渝铁路通车典礼。
图为他在纪念册上签名。



三唱那成渝路，困难万万千，建设祖国的意志坚，不怕一切困难。人民的力量钢铁一般，劳动创造新西南。河上架起了千洞桥，铁手劈开了万重山，英雄的事迹到处传，大西南（的）生产建设有了重要开端。

四唱那成渝路，通车到成都，四十多年希望实现了，鞭炮响连天。

城乡交流有保证，工业更要大发展。火车头冒着烟，带着幸福直向前，男女老少齐欢唱，永远跟着共产党，幸福万万年。”

邓小平听着歌声，那是雄浑激越、亢奋高昂、深沉悠远的歌声，那是时代捧给历史的动人诗章——巴蜀人民近半个世纪的美梦，终于成真了！



“四川的石油工业会跑到前面”

“四川勘探出石油”的喜讯 使小平夜不能寐

1958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不久，邓小平在迎接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收到了令他喜不能寐的、来自家乡的好消息：四川勘探出石油了！万分兴奋的小平真恨不得立刻飞到四川去看一看。可是，由于中央将要在南宁开会，他便只有等到会议结束以后，才能去四川了。南宁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中央领导同志和九省二市的负责同志出席，主要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会议从1月11日至22日举行。虽然会议开得比较长，使邓小平有些着急，但毛泽东给了他一个任务又使他很惬意——南宁会议后他要赴四川，去筹备计划于3月初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月31日，处理完了南宁会议所有善后工作的邓小平，终于乘火车回到了四川。

2月1日这一天，春寒料峭。茫茫蜀乡大地刚刚下过雨，空气特别清新。回到家乡的邓小平，一下了火车，便直奔黄瓜山气田。

陪同邓小平到黄瓜山气田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刚、四川省公安厅副厅长刘景周、四川石油管理局书记王合林，都很纳闷：为什么总书记到了四川，气也不歇一口，就要直奔黄瓜山气田呢？

他们不知道，促使邓小平这样做有一个原因：邓小平当时分管石油工业，当时我国的石油工业很落后，而1958年正值第二个五年计划开端，国家需要大量的石油。这个时候，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除了几个人造的油厂之外，还没有一个油田。全国已建成投产的也只有玉门、克拉玛依、延长等几个规模不大的油田，而且都偏于西北一隅。1957年，全国原油产量只有145万吨，其中，天然油产量只有86万吨（而到了2002年，全国原油产量则高达1.7075亿吨，而全国石油消费量则为2.4亿吨。可见石油工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

尽管人造油成本很高，但在20世纪50年代，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人造油仍然是我国重要的油品来源。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原油产量只能满足国家计划最低需要量的三分之一，大部分要靠从苏联和罗马尼亚输入，航空油品则完全依赖进口。石油产品的极度短缺，严重影响着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了四川石油探区。

当邓小平去南宁开会之前，他在北京办公室的案头上，已



经看到了四川石油管理局送来的一份报告。四川石油管理局的这份报告说：为了加强四川的石油和天然气建设，四川石油管理局于1957年底就确定了1958年的勘探任务。首先，要加强川中地台勘探，除南充、蓬莱、龙女寺构造继续钻井外，另选择7个构造进行预探，在川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排成一个十字剖面；其次，开辟川东新探区，继续探明川南天然气区，选择11个构造进行钻探；第三，大规模钻探侏罗系浅油层。

邓小平把四川的这份报告，反复看了几次，认为是花了工夫才写出来的。

家乡的喜讯一个接着一个。过了两天，邓小平又收到另一则捷报：“四川石油普查大队在四川盆地中部武胜县龙女寺构造‘龙4井’钻获油流！”

重视四川石油工业的邓小平真是高兴极了。他对于四川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并不是到中央工作、特别是在中央分管石油工业以后才重视的。当他和他的亲密战友刘伯承率师解放了四川以后，就专门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一个“石油勘探处”，从事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工作。1949年12月，邓小平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接管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四川油矿勘探处，恢复巴县石油沟“巴1井”和隆昌县圣灯山“隆2井”的天然气生产以及“隆4井”的钻井工程。也是在同年12月，才回到四川十几天的邓小平，就任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为中国石油工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世界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筹建西南地质调查机构。不久，黄汲清负责的西南地质调查所成立，迅即在四川龙门山、乐山、富顺、龙泉山等地开展石油天然气勘探。



黄汲清

黄汲清和邓小平既同岁，也同乡，1904年诞生在四川省仁寿县一个书香之家。黄汲清从仁寿一中毕业后，去成都读书，于1924年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1929年，黄汲清率调查队越秦岭入川，对四川进行地质调查，著有《秦岭及四川之地质研究》、《四川峨眉山地质研究》等6本专著，引起地质界的广泛注意。1932年，黄汲清被选派到瑞士学习，获取博士

学位后于193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兼职教授、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首批院士。黄汲清与人合作，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玉门油田。黄汲清和邓小平一样，对于四川家乡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工作相当重视。1938年，他带队调查四川隆昌县圣灯山的地质构造，并亲自出马布置钻孔，在四川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工业气田——隆昌县圣灯山气田。随后3年里，他带队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1:10000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发现威远大气田打下了基础。他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等经典著作中确立的两大理论，突破了国际上喧嚣一时的“中国贫油论”的束缚，为在神州大地找油，指明了方向。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黄汲清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当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自1956年分管石油工业以后，黄汲清这位为中国石油工业奋斗终生的院士便和早已结下了缘分的邓小平



有了更多的接触。担任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技术负责人的黄汲清，建议先在准噶尔、吐鲁番、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松辽、华北等大型陆相沉积盆地进行石油普查。1957年，他具体领导了松辽平原、华北平原等地的石油勘探工作，是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从四川到玉门、到大庆，再到后来的辽河、胜利、大港、江汉等油田，黄汲清没有辜负邓小平对他的期望。“文革”中被关180多天的黄汲清，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两次向邓小平写信，邓小平两次作出重要批示和支持。1982年，国家对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作出贡献的23名科学家进行褒奖，黄汲清名列第二（第一为李四光）。黄汲清知道，那也是他的四川老乡、特别关心中国石油工业的邓小平对他的褒奖。与邓小平同岁同乡、一生为祖国寻找石油的黄汲清于1995年3月在北京安详辞世的时候，邓小平特地送去了花圈。

1950年初，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编制了四川天然气的勘探开采规划。1951年6月27日，邓小平关注的隆昌县两道桥矿区，生产出了“圣灯牌碳黑”，在西南工业展览会上获特等奖，为四川石油天然气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途径。

邓小平曾经与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和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一起，详细研究过川中和川南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问题。邓小平对这两位副部长说：四川这么大个省，国家要建设，没有石油怎么行呢？在四川盆地，哪怕拿到1吨石油，也算有了我们自己的石油工业了！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要从战略方面考虑问题，要选择突击方向，尽快打出石油和更多的天然气来。你们两位副部长都知道，中国古代的石油业是领先于世界的，而四川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石油天然气的地区。

小平知道蜀人在世界上最早使用石油天然气

谙熟家乡历史的邓小平知道，古代的石油业中国领先于世界，而四川则是世界上最早的盐井和石油与天然气钻探发源地。从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起，四川就开始使用天然气，比西方早了1400多年。世界上最早、钻凿最深的油井也在四川。蜀人在开采利用井盐和天然气的同时，于油气伴生的油气井中采取并利用石油。四川自流井大气田的开发、管理、使用，在当时也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邓小平在广安读书时，就曾阅读过中国最早的地方志——晋朝蜀郡江源县（今四川省崇州市）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该书写道：战国时，“李冰为蜀郡守，冰识其水脉，穿广都（今四川省双流县华阳）盐井诸陂池。蜀于是咸有养生之饶焉。”公元前277年，李冰担任蜀郡太守，除组织蜀人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外，还在治水过程中，了解到蜀人在制盐的基础上，掌握了地下盐卤水有脉络可寻的规律。于是，李冰根据民间“依山可作井，隔沟不同脉”等经验，提出一套凿井、汲卤、煮盐的方法，并在广都开凿了我国的第一口盐井——广都盐井，取得成功。广都盐井的开凿，揭开了中国井盐生产的序幕。李冰在四川大开盐井时，是公元前256年~前251年之间。以后，秦始皇建朝不久，蜀郡临邛（今四川邛崃县）又发现了“火井”。“火井”即天然气井。西汉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成都人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在《蜀都赋》中，就将“火井”的奇特景色与壮丽秀美的风光媲美。《华阳国志》也记载：“临邛县有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须许隆

隆如雷声，火焰出，通跃数里。以竹筒盛其火藏之，可棧行终日不灭也。”《华阳国志》还记载，因为临邛有“火井”，有铁矿，有盐业，秦始皇便下令由前赵国等地迁来许多居民进行开采。汉朝时临邛发展成“火井镇”，三国时发展为“火井县”。晋朝张华所著《博物志》中说：“临邛有火井，纵广五尺，深二、三丈。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亮）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盆盖井上，煮水得盐。”以后，蜀人就将诸葛亮到现场视察过的火井称为“诸葛井”。在今邛崃县城西31公里处的火井镇，今人还专门在“诸葛井”旁边树起了高耸的“世界第一火井纪念碑”。

邓小平记得，他读晋朝著名文学家左思在其有名的《蜀都赋》中，曾见到过描写“火井”的脍炙人口对仗佳句：“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根据文献记载，那个时候，蜀郡人民就会用猪膀胱或皮囊贮存天然气，用之于照明。当时，蜀人称石油为“膏油”或“膏”。西汉扬雄在《太玄赋》中，就写到蜀人用的“膏含肥”。因石油易燃、发火猛，且遇水不灭，诸葛亮、周瑜等军事家，巧妙地把石油用于水上火攻，如著名的“火烧赤壁”。魏晋间史学家、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陈寿（公元233年~公元297年），在所著《三国志》中说：“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尽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众。”曹操80万大军，竟在浩浩的江水之上无法扑灭进攻之火，最终导致溃不成军，这就是“膏油”（石油）发挥的作用。石油在古代除被称为“膏油”之外，还因为是从油井里采出来的，所以也被称为“井油”。《志异续编》说：“井油亦四川出，相传昔诸葛武侯烧腾甲兵曾用此油。”

“石油”一词最早出现在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成书的《太平广记》中。中国正式命名“石油”，也比西方早500多年。西方一直到1556年，才在德国矿物学家阿格里克拉的论文中第一次见到“石油”这一名称。

邓小平读过的《三国志》、《诸葛武侯集》等古代文献，都分别记载了四川许多地方，皆用天然气做成“以竹筒贮而燃之”的“燃灯”、“照明筒，一筒可行数里，价减常油之半，光明无异”等情况。曾写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等名句而被《三国演义》采撷为卷首诗的明朝第一流大学士、四川新都人杨慎所著《丹铅总录》中说：“火井在蜀之临邛，今嘉定、犍为有之，其泉皆油，人取为烛。”

邓小平读过的明朝曹学佺所著《蜀中广记》里，对四川石油的开采有了更具体的记载：“通志云，国朝正德末年，嘉州（今四川乐山）开盐井，偶得油水，可以照夜，其光加倍，沃之以水，则焰弥甚，扑之以灰则灭之，此是石油，但出井尔。”

邓小平知道，早自北宋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以来，蜀人借助机械冲击钻小深井的一套钻井技术，改革了从前用人工挖掘的大口浅井，成功地开发了钻凿井筒口径只有碗口大的“卓筒井”技术，这是向钻探小口径的深井过渡的标志，是世界钻井技术一次质的飞跃，是世界钻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四川先民在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技术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促进了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

邓小平阅读过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当时在世界上，中国的钻井技术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中国发明的钻头与钻具，要比世界上其它的国家早1100多年。”随着四川钻井技术的发展，自贡、富顺一带的井可打到1200米



的深处，为当时世界上最深的井。到公元1129年前后，在四川的30个有钻凿井的州中，就有17个州推广了“卓筒井”。川人在“卓筒井”的技术方面，首创了世界上钻井中的第一只钻头，比美国的钻头早750多年。“卓筒井”的发明，是世界钻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第一次取代了以往的人工凿井方式，揭开了人类开发深处矿产资源的历史序幕，不但导致了西方近代石油旋转钻井方法的诞生，而且在凿钻盐卤深井中发现了更多的石油矿藏，引起了世界上较大规模的勘探开发和世界能源的重大变革。

邓小平“管一行、钻一行”，当他在中央分管石油工业以后，又阅读了国内不少有关石油、石油钻探史和美国、苏联等国家出版的《石油工业的历史》、《石油钻井史》、《黑色的金子——石油》等许多书籍，进一步了解到中国（走在前面的是四川）在世界石油工业史上的地位。美国塞内卡石油公司于1859年8月钻成了深度为21米多的油井，自认为钻成了世界上“第一口深井”。后来他们才知道，他们钻成的这口井，比中国四川于公元1521年用顿钻所钻成的真正“世界上第一口深井”，晚了300多年。

老夫聊发少年狂，“好安逸哟！ 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既然一个月以前，邓小平在北京欣闻了“四川勘探出石油”的消息，现在又正踏在家乡的土地上，当然就顾不上休息，“下车伊始”，就直奔黄瓜山气田去了。

到了黄瓜山气田，邓小平先听取气田负责同志的汇报。当邓小平听说这里已经打出了几口高产气井，而且“黄10井”在

钻探过程中，还喷出了少量的原油时，那种兴奋劲，就不用提了。听罢气田负责同志的汇报，邓小平便与他们一道，踏着雨后的泥泞小道，来到井场。在井场，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观看了“黄5井”的天然气放喷点火情况和“黄10井”的出油情况。接着，他来到了气田机修车间，与那里的技术人员和石油工人交谈起来。石油工人向邓小平汇报说，当他们刚一看到原油从“黄10井”喷出的时候，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听到这里，邓小平欣喜地笑了。

黄瓜山气田的党委书记看见邓小平十分兴奋的样子，当即把“黄10井”喷出的两小瓶油样送给邓小平。邓小平接过油样，仔仔细细端详着，然后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高声对周围的石油工人和陪同人员说：

“好安逸哟！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总算看到家乡的原油了！”

邓小平盼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亲眼见到了家乡的原油。他真是欣喜若狂，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说出了无比自豪的这句话。

这句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高声从心底喊出来的话，声如洪钟，周围的蜀山群峰，似乎都响起了洪亮的回声；这回声，似乎又要随着那浩荡的春风、那得意的春风，传遍神州大地的三山五岳，九江八河。

时年54岁、双鬓微白的邓小平，这个时候豪情满怀、意气风发的兴奋劲，完全可以用他八九百年前的一位四川同乡苏轼的一首词来形容。苏轼于1075年写了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的词。词中写道：“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手，右擎苍。”“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白，又何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邓小平叫随行人员把“黄10井”喷出的两小瓶油样保管好：“你不要给我打烂了，这可是比啥子都宝贵、都值钱哟！”然后，邓小平来到黄瓜山气田探区前线的天然气炉旁。他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取暖用的天然气炉和它的燃烧情况，并询问天然气的民用前景。特别关心天然气综合利用的邓小平，还接连提出了好几个问题：

“1000立方米天然气能生产多少化肥？”“1000立方米天然气能提取多少种化工原料？”“怎样用天然气进行发电？”……

工程技术人员对邓小平的提问，一一作了回答。

在黄瓜山气田一个简易棚子搭成的临时会议室里，邓小平与气田的石油工人，用家乡话亲切地拉起了家常。当邓小平从气田的石油工人那里得知，矿区的水源有一定困难时，他便向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刚交代，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正在这时，恰好有人端来两盆洗脸水，请小平和夫人洗手。



邓小平立刻走上前去，风趣地用四川话说：“我们俩口子有一盆水打伙洗就对了，一家人嘛，不讲究那么多哟！”邓

1958年2月，邓小平视察隆昌气矿。

小平这句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这就是家乡的石油工人，目睹到的和蔼可亲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这次我在四川龙女寺定了30口井…… 四川的石油工业会跑到前面”

四川的石油工人，没有辜负邓小平的期望。邓小平刚刚离开四川不久，川中就传出好消息。仅在3月中旬的7天时间里，武胜县龙女寺构造“女2井”、南充县南充构造“充3井”、蓬溪县蓬莱构造“蓬1井”等都喷出了大量原油。

2月14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和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来到川中石油矿区视察。视察后，决定武胜县龙女寺构造由四川石油勘探局负责勘探，邓小平故里广安的广安构造由地质部部署勘探。

2月27日至28日，刚刚从四川回到北京的邓小平接连两天在中南海，会见了石油工业部即将卸任的部长李聚奎和即将担任部长的余秋里以及石油工业部其他一些人。邓小平对李聚奎和余秋里这两位部长说：

“这次我在四川龙女寺定了30口井。现在看，后不后悔呢？我看是不后悔的，因为资料已足够说明可以打钻，迟早要打那么多的钻，为什么不早打呢？”

“如果四川龙女寺钻出油来，四川的石油工业就会跑到前面。东北搞好了，也会跑到前面，就是苏北、四川等地的储量不大，也要先搞。”

“这次我在四川的石油探区，看到……四川钻机月速度低，



跟硬石头有点关系。”

“四川黄瓜山一口井每天可以出3吨油，就要把它搞起来。四川搞一个5000吨天然气合成油厂，一年就可以把本收起来。”

“四川如何促进？四川天然气如何利用？要好好考虑。你们搞一个规划送来。”

“对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花费一些精力，好好考虑。”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四川能不能赶过柴达木，四川能不能先发挥一些作用呢？现在原油就是需要很多，要把进口原油和自己的油比较一下，看哪一个上划算。”

“原油生产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降低成本问题。四川也是个布局问题。川中要搞起来，可以有两种搞法：有五年才搞出A+B级储油面积，也有一年搞出A+B级储油面积，现在的力量可以集中在川中钻探的。”

“四川的天然气，搞一个年产5000吨到10000吨的氮肥厂，或者由天然气搞塑料，搞一个年产1000吨的厂子试验嘛。不这样，天天叫也搞不起来。事情要做才做得出来。刚搞时可能成本高，要贵一些，但以后可以搞出经验来。如果结果不好再放弃也没什么，并且厂子还可以转到其它产品的生产。”

“四川的五年计划，不加投资的情况下，要三年完成，四川的同志说可以。”

“四川的钻井成本能不能拉到和玉门一样呢？你们考虑一下，应该降到300元一公尺。问题还是昨天的那五条，请你们回去研究。”

——上面这些邓小平的谈话，都是原石油工业部的同志向笔者提供的。在这些第一次披露、绝对准确无误的内容中，邓

小平对四川石油天然气的钻探、开采了如指掌，对四川石油天然气的综合利用提出了前瞻性的意见，对四川石油天然气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他不是说“四川的石油工业”会“走”到前面，而是说会“跑”到前面），说明了日理万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四川石油工业、对全国的石油工业是多么重视！

不久，石油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由副部长康世恩亲自出任总指挥，成立了“川中石油会战总指挥部”，下设5个指挥部（总指挥部设在南充），在川中展开了石油大会战。川中石油会战打响以后，完成87口，又新开钻井12口，发现南充、龙女、蓬萊、合川等油田，开创了四川石油工业生产的新局面。

邓小平针对四川的石油开采，首次提出了“要从战略方面考虑石油问题”和石油工业以发展天然油、天然气为重点的主



1965年11月，邓小平视察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张，对我国原油产量迅速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后，我国石油工业开始进行战略转移，它直接引发了举世闻名的大庆石油会战，从此一举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

“中央同意你们关于威远气田建设的方案”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要想掌握邓小平对四川石油天然气工业无比关心的第一手资料，最好能找到当事人。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了解有关邓小平关心四川石油天然气工业方面详细情况的许多人，到21世纪时已经过世。笔者经过多方了解，得知石油工业部原常务副部长、20世纪60年代川中石油大会战总指挥张文斌同志至今健在。但笔者只知张部长离休后一直住在北京，却不知他在偌大的京城之具体地址，虽去了多次北京，都是无功而返，不能找到。多亏笔者20多年的老朋友、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李振刚局长鼎力相助，才终于在北京一个四合院找到了石油工业部原常务副部长张文斌同志。

张文斌部长的客厅正中，挂了一张放得很大的20世纪80年代他向邓小平敬酒的双人照片。在这张照片下，他向笔者这个晚辈谈起了有关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张文斌是硝烟弥漫的疆场上的一名解放军师长。建国后，他们整整一个师的指战员，军装未脱，便奉毛泽东的命令改编为解放军石油师。张文斌也便成了石油师的师长。从那时候起，他就和石油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石油战线上一直干到离休。从邓小平1956年在中央分管石油工业起，他就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新疆石油大会战、川中石油大会

战、大庆石油大会战他都参加了。张部长知道我最想听的，还是有关邓小平关心四川石油天然气工业方面的详细情况，便直奔主题。

1964年9月16日，在川南偏僻山区的威远县曹家坝，由3215钻井队钻获了第一口天然气井（威基井），首次在四川盆地发现了震旦系气藏。紧接着在威基井同一井场又钻获另一口天然气井（威阳7井），发现二叠系阳新统气层。接着，又钻获另外几口储量丰富的天然气井。四川盆地发现了全国最大的单个气田，进一步显示了四川天然气开发的良好前景，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更引起了主管石油工业的党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

1965年11月7日，邓小平从成都来到了离威远气田比较近的自贡市。8日，邓小平视察了自贡市鸿鹤化工厂。

11月9日一大早，雄鸡引吭，鸣声破晓，盐都自贡从睡梦里醒来了。一会儿，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这一天是农历十月十七



1965年11月，邓小平视察威远天然气一号井。



日，虽立冬已10天了，但冬日和煦的阳光，照得人暖洋洋的。邓小平起了个大早，他要和另外三位副总理一起去看威远气田。邓小平一行在下榻的自贡市檀木林招待所用过早餐后，分乘10余辆小轿车，沿着贡连公路弯弯的山道，顺着起伏曲折的丘壑，向着威远方向前进。

上午9时过，车队到了威远县城。威远县委书记蒋东和、副县长朱祥等人坐上威远县委的吉普车，在前面带路，向威基井所在地曹家坝进发。

10时正，车队到达了曹家坝。邓小平第一个走出车来。紧接着下车的是国务院另外三位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还有国防部副部长粟裕，铁道部部长吕正操，西南局第一书记、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程子华，四川省公安厅厅长秦传厚等。

早已等候在威基井的石油部副部长、川中石油大会战总指挥张文斌看见来了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深感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张文斌立即和川中石油大会战副总指挥陈李中、秦文等人，迎上前去向邓小平等领导人握手问好。

邓小平见到张文斌的第一句话就是：把你这个建国初期的石油师师长从大庆油田调来，当川中石油大会战总指挥，看起来是我明智的选择。你张文斌在新疆石油大会战、大庆石油大会战都有丰富的经验。你们又在我的四川家乡发现了全国最大的单个气田，真是可喜可贺！

四川盆地丘陵地带千年沉寂的不毛之地，而今高耸的井架林立，各式车辆穿梭，人声鼎沸，一派石油大会战的沸腾景象。

邓小平看到这种人欢马叫、令他心旷神怡的景象，非常惬意。张文斌陪同老领导邓小平等人，来到威基井钻台。邓小平

指着井口详细询问：“井有好深？每天可以产好多气？”张文斌一一作了回答。然后，张文斌陪同邓小平等人来到距井场不远的一个小山丘上，观看“放喷”。只见一位操作工人熟练地打开井口控制阀门。顷刻，井口喷出一股强烈的气流，发出“呼呼呼”的响声。另一位工人手持一根一米多长的引火棒伸向气流，只听“砰”的一声，一条熊熊燃烧的火龙冲向天空。邓小平一面观看，一面听张文斌介绍情况。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在十分认真地听张文斌的介绍时，还不断提出一些问题，张文斌都作了解答。

一会儿，张文斌带邓小平等人走进了威基井会议室。这个会议室很小，不足30平方米。邓小平被会议室墙壁上挂满标有箭头和红旗的图表吸引住了。他一面观看，一面指点着询问。大家已经走了好些路了，感觉有点累了，便在值班室的藤椅和条凳上坐了下来。邓小平刚坐下，马上又站了起来，转身从藤椅上拾起一颗图钉。张文斌感到不安。邓小平却不以为然：“一颗图钉，有什么关系。”说着，轻轻把图钉放到桌上。

在值班室里，张文斌代表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汇报威远气田的开发情况。张文斌说，威远气田是目前发现的全国最大的单个气田。据初步勘测，油气构造地表面积1900平方公里，储量约1000亿立方米。从气质来看，这里的天然气含有多种稀有元素，其中氦、锂等元素还是国防技术和航天工业急需的，有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上半年，已经为威远地区会战作了许多准备工作，修建井场15个，平整场地38879平方米，在气田各重要部位选层开钻14口井。同时，修建了一批公路、桥梁、涵洞等配套设施。目前，正加紧开发。邓小平听了张文斌的汇报，十分高兴，对石油工人创造性的劳动和对国家作出的贡献，给



予了充分肯定。邓小平还说：“中央同意你们关于威远气田建设的方案，你们可以据此施工设计。现在的关键是要加紧建设，把四川建成让党中央、毛主席放心的可靠的战略大后方。要搞好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多产些气，支援国防和三线建设；多生产尼龙，出口；多办些化肥厂，支援农业。”

邓小平和好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来到威远气田，石油工人异常兴奋。

工人们议论开来：中央领导同志好不容易来一次，我们这个山沟里条件差，生活艰苦，拿什么来招待呢？不知道是谁提议：“干脆上山去打几只斑鸠吧！”大家正准备行动，小平同志知道了，就叫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快去制止。

走出威基井值班室，张文斌又陪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威七井施工现场，与井队职工交谈。当邓小平听张文斌介绍说，井队长闵志荣利用空气钻新工艺钻井制服了“气老虎”时，立刻快步走到这位石油英雄的面前同他握手。闵志荣连忙将自己沾着油污的双手在工作服上擦了一擦，紧紧握住了小平同志的手，激动地说：

“总书记，您好！”

小平同志说：闵师傅，你们辛苦了！你们制服了“气老虎”，真了不起呀！

然后，小平同志对一位随行人员说：“来，给我们和闵师傅他们照个相。”

11点过，小平同志要离开威远气田时，对送行的张文斌说：希望你们多酸化几口井，再拿下几口井，取得更大的成绩！

张文斌说：“请总书记放心，我们一定打好威远气田这一仗！”

威远气田没有辜负小平同志的厚望。

根据邓小平要求威远气田“要搞好天然气的开发利用”的指示，威远气田一直进行着天然气的开发利用。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威远碳黑厂在早年发展了具有四川特色的炉法碳黑生产炉型结构和生产工艺之后，成功利用火房余热浓缩卤水制盐，实现了槽黑火房热能的综合利用，这是碳黑生产上的重大突破。

到1990年，威远气田共建成井口装置63套，年产天然气2亿~3亿立方米；卤水60万立方米；天然气集气干线19条（66.5公里）；集气支线63条（138.63公里）；威远到成都、泸州、乐山五通桥、青白江输气管线4条（534.62公里）。建成天然气脱硫厂2座，碳黑厂、天然气化工厂、石油机机械厂各1座。形成了天然气开采、利用的综合配套网络，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张文斌说：“当我以后到北京，向小平同志汇报威远气田没有辜负他的厚望，为四川、为全国的石油天然气工业做了我们该做的一些事的时候，小平同志还是那句话：把你这个建国初期的石油师师长从大庆油田调来，当川中石油大会战总指挥，看来是我明智的选择，希望你们在四川省党政部门和四川人民的支持下，取得更大的成绩，为我国的石油天然气工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多么雄伟的剑门关”

“我们从上头来，到下头去”

1958年10月29日，农历九月十七日，刚刚过了“九九艳阳天”几日，天气晴朗，秋高气爽，邓小平一行披着灿烂的阳光，来到雄伟而幽深的剑门关下。这里丹岩壁立，林岚掩映，岩下激流奔涌，白浪相逐。

邓小平两次来过的剑门关



陪同邓小平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以及绵阳地委第一书记李林枝和第二书记彭华等人，共30余

人，分乘6辆轿车，由广元方向来到这里。

下了车以后，邓小平一行从剑溪峡谷过老公桥，上七里坡，登高一望，剑门雄关美景尽收眼底：百里悬崖，百丈峭壁，锯齿般的山峰高低突兀，有如碉楼，有如烽火台，横亘云天，阻断南北，真是鬼斧神工造，令人心旷神怡。

剑阁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向邓小平介绍说：“那就是大剑山72峰。”

随即，邓小平一行站在大峡谷口上。只见峡谷两边的摩天石壁拔地而起，中间只有20~50米宽的一条通道，形似门巷。剑阁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向邓小平一行介绍说：“因为大剑山如剑倚天，峭壁中断处的这条通道像似门巷，‘剑门’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了。剑门关险而秀丽，雄而幽深。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杜甫也曾有《剑门》诗中惊叹：‘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在历史上那么多次征战杀伐中，没有一支军队是从正面攻上剑门关的。它确实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险。古代有谚曰：‘打下剑门关，犹如得四川。’三国时，魏国三路大军攻蜀，在夺取汉中后，直逼剑门关。蜀汉大将军姜维坚守剑阁，在此扼险守关，使魏将钟会率领的大军屡攻不克，束手无策，相持一两个月。1700多年来，剑门关屡建屡毁。清代曾经再次整修，有‘关楼’三重，上书‘天下雄关’四个大字。可惜1936年修筑川陕公路时，关楼被毁。这里三国遗迹俯拾皆是，有关的传说也相当丰富生动。剑门关有姜维墓，有姜维城，有魏将钟会屯兵处，有邓艾墓。今天，首长们时间比较紧，当然路也不好走，要不是还可以从关口沿着环崖小道，慢行12华里的石阶，上去看一看。”



邓小平放眼望去，只见森森翼墙，有云岩藤蔓，有小桥流水，不愧是“听溪水淙淙，发思古悠情”的好地方。

剑阁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向邓小平介绍说：“那边翠屏峰周围，有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常有山鸟飞翔，猴群出没，景致更好。不过，路不好走。”

接着，剑阁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又指着姜维庙和姜维驻兵的营盘咀，详细向邓小平介绍了姜维守剑门的故事，还介绍了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路过剑门关时，与驻守剑门关的国民党军队激战。红军奋起攻关，歼敌4个团。

邓小平听着这饶有风趣的历史掌故，兴致勃勃。一面听，一面点头。

离开剑门关后，邓小平一行来到汉阳公社四合大队（今剑门双合村）时，社员们正在抢种小麦。在这里，邓小平访问了一个老农民：“老大爷，你叫啥子名字？”

这个脸上布满皱纹的老农民回答说：“徐芝海。”

“今年好大岁数？”

“61岁。”

“能做些啥子活路？”

“背粪、看牛都得行。”

“你辛苦了！”邓小平取出一支香烟请他抽。

“不辛苦，你们才辛苦了！”徐芝海被这位素不相识的领导干部的真情实意感动了，他没有推辞，接过香烟便抽了起来。随行记者相机的镁光灯闪亮了一下，拍摄下了他在邓小平总书记面前抽烟的镜头。

看着徐芝海悠闲地吸着烟，邓小平又问他：“这里是啥子地方？”

“银窝子。”

“硬是银窝子啊！你们的生产搞得咋样？”

“现在已播种百分之七十，如不雨隔，都快种完了。”

“要克服秋雨造成的困难！”邓小平的话中，有估计、有肯定，也有鼓励。

“你们一年收入多少？”

“除公粮、口粮外，每人每年还要分部分现金。”

“你们应当苦战与休整相结合。”

当握别的时候，邓小平对徐芝海说：“我们要走了！”

老农徐芝海望着这位和蔼可亲的领导干部，便问：“你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邓小平风趣地用纯正的四川乡音回答：“我们从上头来，到下头去。”

老农的问话和邓小平的回答引起了围观社员的一阵笑声。但住在偏远山区的社员们，都不知道与他们在一起“摆龙门阵”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只知道是个“很客气的当官的，而且可能官还不小”。只有在这里参加“四秋劳动”的剑阁县中学的老师，知道这是“邓总书记”。

当邓小平离开时，剑阁县中学的师生给总书记一行送来了7份《四秋战报》。

“尚昆呀，剑门拐杖在北京 可以卖个好价钱哟”

邓小平一行离开了汉阳公社四合大队以后，来到了著名的翠云廊。

剑阁县的工作人员向邓小平一行介绍了翠云廊的来历。翠云廊是指剑门蜀道上一条由古柏组成的行道树景观。据《剑州志》记载：“自剑阁南至阆中，西至梓潼，北至昭化，三百余里官道，古柏树十万株，明（朝）李壁植。”形成了“三百长程十万树”、“如苍龙蜿蜒，夏不见日”的壮观景象。民间则传说是三国时蜀将张飞所栽：刘备平定益州（四川）后，张飞领巴西太守（治所在今阆中）。当时军务频繁，必须随时传送文表羽书。但因阆中至剑阁、剑阁至梓潼一带山势险峻，道路不易辨识，张飞便命令众军“植柏表道”，即用柏树作路标。于是一条长达几百里的柏树林带就形成了，人称“张飞柏”。现在剑阁县境内统一编号的古柏共有8000多株，主要分布在剑门关到剑阁县城一段，或穿插在川陕公路上，或保留于原来的驿道中。供游览的翠云廊长约1000米，青石铺路，翠柏夹道，浓阴蔽日，千姿百态的各种柏树幽静壮观。千百年来，这里行人络绎，马蹄不息。

剑阁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引导着邓小平一行在生意盎然的翠云廊，参观“松柏常青树”、“腰盆树”和“阿斗树”等。

看见邓小平对于“阿斗树”的故事最感兴趣，剑阁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便详细介绍了这棵柏树的传说：“你们看，这一棵柏树，有干无枝，中间有一个洞，有被烧焦的痕迹。传说蜀汉后主刘禅（乳名阿斗）投降魏国后被押往洛阳，途经这里突然雨如瓢泼。刘禅看到这棵柏树有个洞，便一头钻进去躲雨。老百姓痛恨刘禅昏庸亡国，便砍掉树枝，剥去树皮，放火烧焦，使它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邓小平听后笑着说：有意思！一个传说故事，使人领悟到民心所向，正气所在。

然后，他对杨尚昆说：“像翠云廊这种保存完好的近万株古柏，我是第一次亲眼看见。”

邓小平叮嘱绵阳地委和剑阁县委的负责人，要好好保护这些古柏。回到成都以后，邓小平还叫秘书给剑阁县委打电话，再次强调这件事。

离开翠云廊，邓小平一行来到剑阁县城。

剑阁县城的卫生在四川全省都是搞得好的。邓小平来剑阁的5个月前，四川省卫生检查团到剑阁检查验收，剑阁被评为省级卫生红旗县；邓小平来剑阁的两个月前，中央爱国卫生检查团一行18人由吴玉章带队，来剑阁县视察以便推广剑阁的经验。

邓小平一行在县委会议室，看到墙上挂了许多奖状和锦旗，既有国务院以周恩来总理名义颁发的“奖给农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单位——四川省剑阁县”的奖状，也有中央爱国卫生委员会和四川省爱国卫生委员会颁发的奖状和锦旗，更有绵阳地区颁发的“粮食‘四无’县”、“冠军县”等奖状。

邓小平便对随行人员说：你们看，剑阁真不错，各方面都是先进县。

就在这个县委会议室，邓小平向杨尚昆说：你看，我发现了一个自动化。

原来，在会议室墙边有两个脚踏揭盖的木制痰盂，邓小平用脚一踩，痰盂的盖子就打开了，一放又关上了。杨尚昆也来亲自试了一试，看到揭盖自如，也用四川乡音夸奖说：“硬是一个自动化。”邓小平风趣地对杨尚昆说：你是从北京来取经的，这种痰盂很好，拿一个回北京去嘛！

当邓小平一行用过餐以后，又回到县委会议室。剑阁县拐杖厂送来一些拐杖，供邓小平一行选择。杨尚昆见邓小平选了



一根自然弯曲、很素雅的拐杖，便说：“应该选那种有雕花的呀！”

邓小平说：“我不要那一种，我喜欢朴素大方的，我要的这根是在森林里自然弯曲的，很安逸哟！尚昆呀，剑门关特产的这种拐杖，是精工制造的，这些剑门拐杖，在北京可以卖个好价钱哟！”

总书记诙谐风趣的谈话使在场的人都开怀大笑起来。

对大女儿说：“画好雄伟的剑门关， 让世人都知道我们四川的美景多得很”

1963年6月下旬，邓小平第二次来到剑门关。

根据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达成的协议，由总书记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将于7月5日在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代表团会谈。邓小平一行赴莫斯科之前，由中央安排，在四川等地游览考察20多天。这样，邓小平得以到“天下雄关”剑门关旧地游。

与邓小平同行游剑门关的，有中共中央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刘宁一、吴冷西等和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公安厅负责人秦传厚、绵阳地委第二书记彭华等人，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和大女儿邓林同行。

邓林酷爱中国画，酷爱用她手中的画笔再现祖国的大好河山。她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以后，成为了一名画家。邓小平1958年第一次游剑门关以后，将剑门关的雄姿美景给画家女儿讲了以后，女儿便向父亲提出来希望能到剑门写生。由于此次到剑门关没有政治任务，只是游览考察，邓小平便答应了女儿

的这一要求。

接连几天，泱泱蜀乡大地细雨绵绵，邓小平一行30多人冒雨从剑阁县白田坝来到剑门关。

邓小平一下车，便高声说：你们来看嘛，这就是剑门关！

细雨之中的大剑山72峰，高低突兀的山峰被云雾缭绕，虚实实，更显出那种仙山琼阁特有的神秘色彩。

在大家赞叹剑门关美景的时候，绵阳地委第二书记彭华给邓小平介绍了一个人：“总书记，这位是剑阁县第一书记赵文定。”

邓小平和赵文定握手：你看起来很年轻嘛，好多岁了？

赵文定回答说：“32岁。”

邓小平笑着说：很好嘛，这下子有年轻干部当县委书记了。我们的干部要年轻化，地方化，当然，首先是革命化，共产主义化。你们剑阁的形势怎么样？

“我们主要是1960年最困难，1962年便逐渐好转，今年就更好了。”

邓小平听后很高兴：这不错嘛。要保护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把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转过身，对正在写生作画的大女儿邓林说：“看，多么雄伟的剑门关！林林，你说雄伟不雄伟？”

邓林说：“当然雄伟！”

邓小平很爱这个长女。

邓林是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在太行山出生的。因为当时邓小平在战场上指挥打仗，刚刚出生7天的大女儿就被托付给一个贫苦的农民抚养。两年以后，营养不良、疾病缠身的大女儿才回到了父母身边。以后在延安保育院，邓林又被火烧伤了胳膊。



膊，至今还有烧伤的疤痕。

邓小平看着邓林画的“剑门雄关”很高兴地笑了：“林林，你能不能把剑山72峰也都画进去？好好画，画好雄伟的剑门关，让世人都知道我们四川的美景多得很！”

然后，邓小平反客为主，向他的随行人员当起了解说员。

邓小平指着姜维庙和姜维驻兵的营盘嘴，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蜀汉征西大将军姜维的历史，讲起了姜维死守剑阁、魏军只好绕道100多里从阴平进军的情况。当邓小平介绍红四方面军在剑门关与守关的国民党军队激战时，问剑阁县委书记赵文定：

“红军歼敌是几个团呀？”

“歼敌4个团。”

一会儿，毛毛细雨稍微大了一些。作画的邓林只好到汽车里去完成她给自己定的“剑门雄关写生任务”。

对剑门关美景赞不绝口的吴冷西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要是路好走，要是不下雨，要是我们能够上山去看一下该多好啊！”

邓小平笑着用四川乡音说：冷西，还是毛主席常常爱引用的俗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硬是没得办法哟！

剑阁县委书记赵文定对邓小平说：“总书记，请给我们的工作作指示。”

邓小平笑着说：这次，是中央批准我们休息。我几年前看了剑门关，的确太雄伟了。这次就把他们都带来了，让他们都来看一看我们四川的“剑门天下雄”，都知道我们四川的美景多得很！过几天，我们就要出国了。我没有什么指示。就是刚才给你说的，要保护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把生产搞好。

雨愈下愈大。

邓小平把手一挥，高声喊道：走啊！走啊！快上车哟！今天晚上我们住绵阳。到了绵阳，我还要给你们摆三国时刘备为取西川和刘璋在富乐山“涪城相会”的龙门阵、摆唐朝诗人刘禹锡陋室铭佳句“西蜀子云亭”的龙门阵。



“第二个都江堰”的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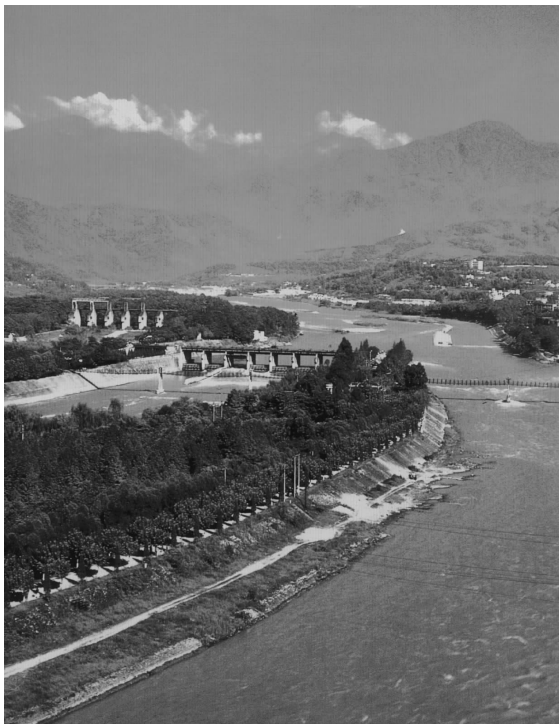
邓小平对司马迁曾来过和记述过的都江堰情有独钟

在蜀乡的名胜古迹中，邓小平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有武侯祠、杜甫草堂，还有岷江上游举世瞩目的无坝引水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这几处，他都先后去过五次。

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年轻时曾在成都法政学校读过几年书，也曾去过几次都江堰。当邓小平还在孩提时代，父亲就多次给他讲过岷江和名垂千古的都江堰的故事。

生在渠江畔的邓小平，幼小的心灵就对美丽的岷江和神奇的都江堰充满了憧憬。

邓小平在广安中学读书时，对岷江和都江堰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知道明末徐霞客勘察金沙江以前，中国历史上人们都把岷江的源头当作长江的源头，所以岷江的名气自



都江堰水利工程

古就很大。一次，他在学校读到孙中山为纪念四川保路运动的死难者而写的一首题为《祭蜀中死难诸烈士》的诗中也提到岷江：泱泱岷江，峨峨蜀山。惟蜀有才，奇魂磊落。以后，随着知识的愈加丰富，邓小平对都江堰的了解也愈加详

细。他进一步了解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含义。他通过阅读《史记》、《后汉书》、《华阳国志》、《蜀王本纪》、《蜀中广记》以及《水经注》、《竹书纪年》、《太平御览》、《舆地纪胜》等中国古代文献，知道了古蜀国的先民很早就开始治水。

四川盆地的地势是西北高而东南低，川内几条大江都发源于川西北，如岷江、涪江、嘉陵江等。远古时，蜀地常闹水灾，当地人民为了获得必要的生存条件，同洪水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华阳国志·蜀志》关于“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的记载，是指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蜀人就在今灌县城南开



凿了一条人工河，分引岷江的水流入沱江，减轻川西平原的水患。由此，蜀地产生了开明氏、李冰父子、文翁等治水英雄，带领蜀地人民取得了治水的胜利。其中，李冰则是闻名于世的佼佼者。公元前277年左右秦昭襄王命李冰取代张若为蜀郡第三任郡守。李冰在古蜀国治水的基础上，利用和改造原有的水利设施，动员组织蜀郡人民修筑了都江堰水利工程。

熟知蜀乡历史的邓小平知道，正因为都江堰的修建，不仅当时“灌田万余顷”，使蜀乡广开稻田，而且使岷江中下游逐渐形成灌溉网和航运道。一改昔日水患频繁的川西平原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绿海”，使四川成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2000多年来，都江堰一直发挥着作用。而战国末期水利家郑国，在关中平原北部，主持开凿西引泾水、东往洛河，修建的“郑国渠”水利工程，“自中山西邸瓠口，并北山，东往洛，三百余里”，曾使关中平原“溉泽卤之地四万余亩”，却因没有像都江堰那样自动排沙，致使泾河大量泥沙淤积，到西汉时便淤堵萎缩，最终消失。

邓小平也清楚，“李冰治水，蜀人得其利，遂奉之为川中水神，称为‘川主’”。在岷江上游各地，以及蜀乡许多地方，都修建有“川主祠”，以表对其尊敬与纪念。李冰儿子二郎，因助父治水有功，因此在“川主庙”外也有“二郎庙”。

闻名于世的都江堰，一直引人注目，使“无数英雄竞折腰”。距今2100多年，大历史学家、文学巨人司马迁，于汉武帝元鼎七年（公元前111年），也曾“到此一游”，驻足于水流湍急的岷江之畔，离堆之上，成为有历史记载的游览考察都江堰的第一名人。少年小平在阅读《史记·河渠书》里，就曾读到司马迁为人类留下的对李冰和都江堰最早记载的句子：“蜀守冰，



1980年7月，邓小平视察都江堰水利工程。

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飧其利。”“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亩。”

多少年来，邓小平连做梦都想到，要去亲眼看一看都江堰。

1935年长征时，邓小平虽然到了四川宝兴和懋功（今小金）两个与都江堰相邻的县，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欲去都江堰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1952年夏天，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成都永兴巷小住时，终于第一次去了都江堰，亲眼目睹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综合性大型无坝水利工程。

都江堰的工作人员向邓小平介绍说，当年李冰修建都江堰时，是将渠道枢纽工程施工筑堰的地点选择在岷江上游急流险滩转入河槽地段，以利于分水和引水。在凿玉垒山时，以火烧

石，用热胀冷缩的原理使岩石爆裂，凿出宽20米、高40米、长80米的山口。李冰广泛利用当地所产的竹、木和鹅卵石，以竹篾编成长笼，中间盛满鹅卵石，形成堰埂，使其减轻水的冲击力，成功地解决了建堤、分水材料问题和技术问题。“深淘滩，低作堰”，修建了飞沙堰溢洪道、鱼嘴分水堰和宝瓶口进水口三大主体工程，使岷江水流一分为二，其中之一引入成都平原。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量等问题。都江堰的修建，不但解决了灌溉问题，而且兼收排洪、航行之利。都江堰灌区北达安县，南到井研，东至蓬溪，西迄邛崃，整个灌区控灌面积突破1010万亩，达2.25万平方公里。灌区粮食产量占四川全省的六分之一。

这一次到都江堰，是邓小平第一次对2000多年前修建的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的最直观的认知。当时，邓小平也参观了为



1982年9月，邓小平陪金日成在都江堰安澜索桥上。

纪念李冰父子而修建的二王庙。在二王庙，邓小平看到了络绎不绝、扶老携幼的善男信女在李冰像前顶礼膜拜。邓小平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本人不会去烧香膜拜，但他认为那是蜀乡父老在寄托他们延续了2000多年的对李冰的崇敬之意。

亲眼目睹了都江堰，邓小平更清楚了它是中国古代水利史、科技史、文明史的突出成就，是高水平的科技。

无独有偶，一直被邓小平“看作兄长”的周恩来，1972年在主持葛洲坝水利工程时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中国）水利至少有3000年的经验，这是科学的事，都江堰总算个科学，有水平、有创造，2000多年前就有水平。”

1978年1月底2月初，运筹良久、准备打破中国“万马齐喑”的局面、计划在神州大地实行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场新的大革命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到了四川。他这次来川的目的，除了去缅甸、尼泊尔访问之外，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成都点了一把火”。在他“点火”成都的同时，又第二次去了都江堰。邓小平又一次看了都江堰的分水鱼嘴、人字堤、内江、外江和木马槎截流，又一次俯视了宝瓶口水流湍急、涛声裂岸的壮观，又一次目睹了滚滚岷江波涛汹涌、挟雷掣电的气势。

邓小平第二次来都江堰以后十个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二次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从此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滚滚向前。

1979年、1980年，邓小平又两次来都江堰。1982年9月20日，

邓小平在都江堰伏龙观





邓小平第五次到都江堰。这一次他是陪金日成，来看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举世闻名的都江堰。

“这么好的坝子占了太可惜了”

都江堰是引岷江水，而后来被邓小平称作“第二个都江堰”的武都引水工程，则是引涪江水。岷江和涪江都是发源于岷山脉。岷山脉的主峰是四川松潘县城东侧53公里处的雪宝顶（海拔5588米）。岷江和涪江分别纵贯蜀乡西部平原和中部浅丘地区，孕育着茫茫蜀乡大地，然后又分别在乐山和合川与大渡河和嘉陵江交汇，最后又分别汇入了滚滚的长江。

1958年10月下旬，邓小平来到江油。这个时候，地处四川盆地北部的江油，正是几阵秋风飒飒、枫叶又红的时节。平坝山谷，溪边路旁，黄澄澄、金灿灿、红殷殷的各色秋菊袅娜开放着。清澈的涪江水一泻千里，似乎在秋日的阳光下放声歌唱。

此前，邓小平刚刚结束了对广西柳州和云南昆明的视察。

10月27日上午10点过钟，江油县委院子里出现了4辆小轿车。当时，整个江油没有一辆汽车，县委院子里一下就出现这么多汽车，使当地的机关干部感到很惊奇。虽然此前人们已被告知，会有重要客人要来，但究竟谁要来？根据当时的纪律，他们不便细问。他们只是听说，这4辆轿车是用火车从成都运到江油来的。

江油县委负责人吩咐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罗昌文说：“你去给上面来的客人带个路，到武都。”罗昌文被安排在最前面的一辆车上，坐在前排驾驶员旁边，他的后面坐着两位大个子中年人。中年人不断向罗昌文询问沿途的地名。汽车开了好一阵

以后，其中一人对罗昌文说：“到一个能看得见你们武都水库的地方停车。”

听到这句话，罗昌文一下子明白了：他们要看武都水库。

罗昌文对武都水库的修建情况太了解了：川西平原因为都江堰的修建而旱涝保收，可是就在都江堰灌溉区东边，即涪江以东、嘉陵江以西的绵阳、江油、三台、梓潼、盐亭、射洪、剑阁、南部等县的200多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片十年九旱、许多地方连人畜饮水也十分困难的干涸的大地上，流传着一首民谣：“十里挑水不觉远，夜里偷水不顾廉，抢水操戈不顾亲，头破血流也争先。”

为解决因水资源短缺而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人畜饮水的严重问题，绵阳地委在省委支持下决定修建武都水库。1958年2月，国家水利部、四川省水利厅的领导、专家和苏联专家一道，来涪江进行考察，对水库的坝基进行地质抽样化验。不久后，水库正式上马修建。但后来由于库区要淹没几万亩良田，要搬迁几万名居民，加之不久又掀起了“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高潮，省委决定暂停修建武都水库。

既然这些“上面来的人”要看武都水库的大坝，罗昌文便请驾驶员把汽车开到离武都镇7华里的一个叫“七里坡”的山坡下。前后4辆车上的人都陆陆续续下了车。罗昌文扫视了一下其他3辆车上下来的人，除了当时常来江油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阎秀峰之外，他全都不认识。罗昌文带路爬上了“七里坡”。他对与他同坐一辆车的人说：“这里比较高，最好看武都水库。”一行人纷纷上了“七里坡”。他们站在“七里坡”上鸟瞰，山川、河流、农田、坝子一览无余。带路的任务完成了，罗昌文就在离“上面来的”一行人十几米远的地方站着。只见



他们面向北面武都方向，有说有笑，还不时比划着。不一会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阎秀峰向罗昌文招手：“小鬼，你过来一下。”罗昌文疾步走到几位首长模样的人面前。一位首长问罗昌文：“那前面的两座山叫什么名字？”罗昌文回答：“左边的叫观雾山，右边的叫窦圉山。”

当一位操北方口音的大个子专家向几位首长介绍武都水库的大坝位置后，有人就问罗昌文：“这一带的农民烧不烧石灰？”罗昌文回答：“这一带历来就有人烧石灰。”直到这时，罗昌文都还不知道首长中有一位就是邓小平总书记。

罗昌文回忆说：“我对几位操外省口音的领导的问话一一作了回答。突然，此前不曾说过话的一位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首长问：‘漏水的问题好不好解决？’这时，我才抬头仔细端详这位首长——这不是邓小平总书记吗？在那个没有电视的年代，我们这些基层工作人员除了从挂像上认得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之外，对中央其他领导的形象都不太熟悉。到了党的‘八大’和八届五中全会以后，我们江油县委会议室挂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和林彪的画像。有时看电影，放映正片前，一般要加映一点新闻纪录片。我是从画像和新闻纪录片里才认识了邓小平的大致模样，想不到今天他就站在我的不远处。

那位操北方口音的大个子专家继续给邓小平总书记介绍情况，话中有不少专业术语，加上我不熟悉北方口音，就听得似懂非懂。但是他话中多次说到‘喀斯特’这个词我听懂了。因为我曾经读过《徐霞客游记》，知道喀斯特就是石灰岩溶，是形成溶洞的地质结构，这时，我才明白了他们问我烧不烧石灰的缘故。

邓小平总书记在听那位专家讲解时，眼睛始终盯着脚下城塘和阳亭两块大平坝子，不时抬头看看观雾山和窦圉山。他看着从两山之间流出来的哗哗奔腾的涪江，凝神沉思。在那位专家的讲解结束以后，邓小平总书记只说了一句话：

‘这么好的坝子占了太可惜了！’

随即，小平同志转身就往坡下走了，其他人也跟着下了坡。”

人们都知道，邓小平一般不多说话，但只要他说起话来就“一锤定音”，既然他现在讲了“这么好的坝子占了太可惜了”，那就说明他并不同意修武都水库。

四川省委的同志后来回忆说，当时小平同志是这样考虑的：如果在这么好的一马平川中修建水库，就会把3万多亩良田淹没，还要拆迁3万多城乡居民。而2000多年来一直发挥作用的都江堰，却没有占那么好的坝子，是建的无坝水利大工程。

笔者为了编写《小平蜀乡情》这本书，采访了时任绵阳地委第一书记的李林枝。90多岁高龄的李林枝思路仍然敏捷。他回忆说，当时他也曾向小平同志汇报了，绵阳、遂宁、广元等地广大干部群众，都迫切要求解决水源、水利灌溉和人畜饮水问题，小平同志回答说：“修武都水库，现在条件还不具备，等以后条件具备了再上嘛。”

“我的家乡有个水利工程，引涪江水，
是第二个都江堰嘛”

虽然1958年邓小平到江油实地看了武都水库大坝，不同意修水库，但他并没有忘记涪江以东、嘉陵江以西几百万亩干渴



的土地，没有忘记川东北地区近十个县几百万盼水如盼甘泉的父老乡亲。

邓小平去了几次都江堰以后，特别赞赏这个2000多年前修建的无坝水利工程，非但不占用良田（更不说数万亩），反而能灌溉几百万亩农田，又能解决排涝问题。他认为，要搞水利工程，就要搞成像都江堰那样，也就是“第二个都江堰”水利工程。

“第二个都江堰”的水利工程蓝图，逐渐在邓小平头脑里形成。

1963年8月20日，邓小平在中央一个会议上发言时指出：“为工业、为农业、为国防建设的更快发展打下基础。在这个过程中，第一要抓吃、穿、用的问题。农业除开化肥、农药以外，要着重解决水利问题，包括排涝在内。”邓小平这个发言，后来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6页。邓小平在发言中强调的是：“着重解决水利问题，包括排涝在内。”川东北地区的水利问题，当然包括在内。

在邓小平的关注下，要淹没3万多亩良田、要拆迁3万多居民的“武都水库”不修了，而效益更好的“武都引水工程”，却在原拟建“武都水库”大坝上游15华里的峡谷中，动工修建了。原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回忆说：1982年9月，邓小平陪同金日成访问四川。小平同志在成都两三天的紧张活动中，除专门陪金日成去亲眼目睹了2000多年前修建的无坝水利工程都江堰之外，还专门听取了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农业大省四川的水利建设汇报。

省委第二书记、省长鲁大东重点向小平同志汇报了引涪江水搞武都水利工程两上两下的情况。鲁大东专门汇报了小平同



1982年9月，邓小平陪同金日成游览都江堰。

志1958年到江油实地考察后，曾指出“这么好的坝子占了太可惜了”，现在就准备不占那3万多亩良田，不拆迁3万多城乡居民，而是在原拟建“武都水库”大坝上游15华里的峡谷中修建。邓小平听了很高兴。

接着，鲁大东又汇报：如果在原拟建修水库大坝上游15华里的峡谷中把武都引水工程修好了，可以解决川东北地区工农业和城市发展经济一系列问题，具有防洪、灌溉、发电、航运、水产养殖、工业和生活供水等多种功能，会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有利于加快川东北地区和涪江中、下游灌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邓小平听到这里，心里乐滋滋的：“真有那么好吗？”

鲁大东说：“我亲自去调查研究过。”

邓小平回京后，就派水电部的专家到江油实地考察引水工



程。水电部的专家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省水利厅的密切配合下，完成了对武都引水工程的考察、论证工作。

邓小平在北京听取了水电部专家返京后的汇报以后，向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讲：“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我的家乡有个水利工程，引涪江水灌溉好几个县，要积极准备上。这是第二个都江堰嘛！”

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的邓小平，一言九鼎。根据他对“第二个都江堰”的宏伟构思，原规模小又要占3万多亩农田的“武都水库”设计方案，变成了一个大型的水利骨干工程——“武都引水工程”。1987年6月，国家计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正式行文，批准“第二个都江堰”正式上马。1988年10月，由于邓小平的直接关怀，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第二个都江堰”打响了第一炮。

这以后，武都引水工程的设计、施工、建设、监理各方协同作战，涪江两岸广大群众积极为工程建设投工投力，每年都开展“十万人马战武引”的大会战。

也是在邓小平的关怀下，“第二个都江堰”又成为四川省第一个使用世界银行贷款近7000万美元的大型水利工程，使工程建设年平均完成投资3.5亿元人民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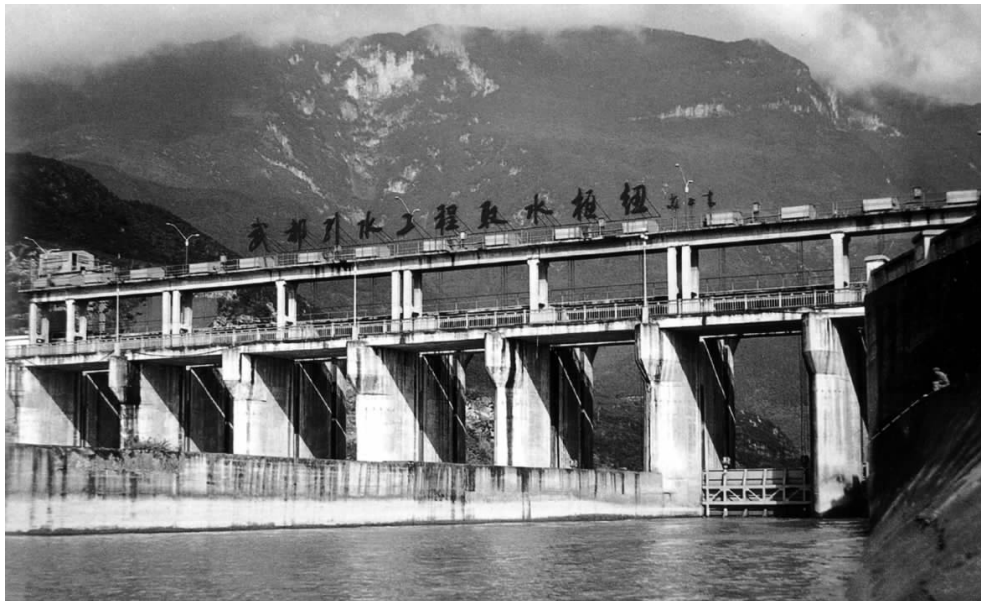
经过多年的奋战，2000年5月18日，以武都引水工程68条渠道全线开闸放水、各渠系配套工程全线通水为标志，宣告被邓小平誉为“第二个都江堰”的武都引水工程建设第一期全面完成，使128万亩良田得到灌溉。

清澈的涪江水，沿着一张巨大的输水网浇透了过去干涸的农田，为千百年来饱尝缺水辛酸的川东北人民送去了甘露。使灌区6县市的千年老旱区，变成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鱼米之

乡。灌区贫困人口下降了90%，百万农民快步跨入小康。

2004年金秋十月，江油武都观雾山下彩旗飞扬，车水马龙，炮声阵阵。被邓小平誉为“第二个都江堰”的武都引水第二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虽然第一期工程解决了川东北大地一半耕地的灌溉问题，但还有一半旱区和100多万农民仍在干旱中苦盼。第二期工程建成后，可保灌绵阳、南充、广元、遂宁4市的江油、游仙、梓潼、三台、盐亭、射洪、南部、剑阁8县（市、区）的300多万亩良田，受益农民达500万之众。

全面完成小平之托，千秋造福于民，“第二个都江堰”第二期工程建成后，那清澈的涪江水，将滋润整个古老的川东北大地，滋润整个川东北父老乡亲的心田。



被邓小平称为“第二个都江堰”的大型骨干水利工程武都引水工程终于建成。



“自贡是出盐巴的，要为盐巴找出路”

自贡本身就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

1958年2月初，盐都自贡时而细雨，时而艳阳，未抽芽的柳枝在春风中抖动。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第一次来到自贡。

陪同邓小平的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刚、省委秘书长阎秀峰、省公安厅副厅长刘景周，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和小女儿邓榕（毛毛）也一同随行。

当时，自贡市的交通条件很差。自贡市委到火车站去接邓小平一行人，只有4辆吉普车。其时负责安全工作的自贡市公安局负责人岳学纯向邓小平的警卫秘书报告说：“我们市委没有轿车，只有吉普车。”

一旁的邓小平听后笑着说：好啊，吉普



19 世纪开始使用的自贡“燊海井”，深度超过 1000 米。

车也不错嘛！解放战争初期，我们连吉普车也没有坐的。不错嘛！

邓小平上吉普车之前，很兴奋地向前来迎接的自贡市委负责人说：“自贡是出盐巴的，要为盐巴找出路，还要大力发展盐化工业。”

虽然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到自贡，但他对盐都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早已通过阅读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和《华阳国志》等古代文献和近现代史、志书籍，有了深刻的了解。

对四川历史烂熟于胸的邓小平知道，自贡本身就是一部厚重的历史书。翻开它，可以触摸其延续2000多年历史的繁荣的盐都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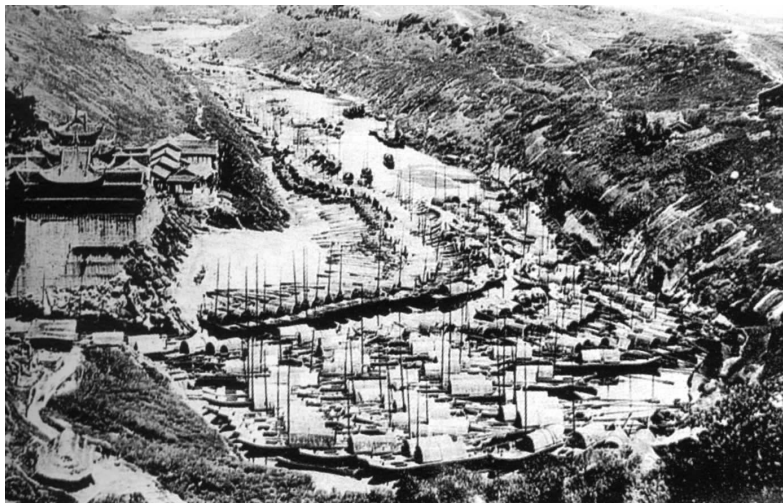
四川井盐，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代，蜀地先民就已经开始利用自然盐泉和裸露地面的岩盐。2300多年前，秦统一巴蜀后，随着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和大批移民入蜀，使盐业在蜀地有了长足的发展。公元前311年，张若为蜀守时，由于盐铁商业在

蜀已具规模，故于成都“置盐铁市官并长丞”，管理盐铁交易。

自贡即自流井和贡井的合称，盐业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公元1世纪，东汉章帝时期（公元76~88年），这里的居民就开始开发大型的地下盐水洞穴，其中最浅的只有地表下几米。人们把水煮沸，就能得到结晶状的盐。不久，他们钻井取卤，用火井（天然气）熬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大规模工业性开采天然气和凿井取卤制盐的地方。

自贡是盐都，盐造就了自贡。历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一整套独特的井盐生产技术和工艺，走在当时世界前列。昔日的自流井，那高峙云天的木制井架，蜿蜒山野的竹制笕管，鳞次栉比的煎盐灶房，帆樯如林的运盐船只，展示着人类的勤劳智慧所创造的高度文明和不断创新的进取精神。

早在北周武帝时（公元561~578年），就因自贡富世盐井，而专门设立了富世县（今自贡市富顺县）。1835年在自贡凿成的



20 世纪 20 年代自流井濠溪河上的运盐船

燊海井，开钻到地下1000多米，深度是世界第一，它采用中国传统的冲击式（顿钻）凿井法凿成。燊海井的凿成，被称为“石油之父”。燊海井被列为考察和研究中国古代、近代火井开采技术的典型实体。以燊海井为代表的自贡盐井，是中国古代钻井工艺成熟的标志，它综合体现了中国古代钻井技术发展的水平，是世界科技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自贡就这样从工业中发展起来，并迅速成为盐的中心产地。竹管将盐水和天然气导入城市，大型的脱水设备设在釜溪河畔。1915年，四川盐务稽核分所设于自流井。1945年，全川盐产量占全国的63.9%，盐税收入占全国的44.23%。1952年9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在自贡成立四川盐务管理局，以后又在自贡成立中国盐业公司四川省分公司。全川盐产量占全国井矿盐产量的一半以上，占全国产盐量的10.7%。

“开门七件事，盐巴排在第二位，重要哟”

沐浴着春风的邓小平一行人，从自贡火车站上了吉普车以后，没有进入市区，而是直接到大安盐厂井灶生产现场，去听取盐厂基层干部和工人的情况反映。

邓小平对陪同的自贡市委负责人牟海秀、李唐基、王富源说：

古话讲，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盐巴排在第二位，可见盐巴重要哟！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不管是在井冈山，还是在长征中，盐巴可宝贵呀！现在有些年轻人不晓得这些。所以，1949年11月底，我们解放了重庆，刘伯承同志和我就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刻接管了设在重庆的



“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指示军事代表接管了设在自贡的“国民政府川康盐务管理局”，以及自贡各个盐场公署、盐井分署、关外稽查处和盐警队的全部人员财产。干革命，盐很重要；搞建设，盐更重要，而且现在还要大力发展盐化工业。

“在天安门看到的焰火,也有我们四川的原材料”

邓小平一行看过大安盐厂井灶生产现场以后，来到了张家坝化工厂视察。

进入化工厂，工作人员向邓小平介绍了该厂的历史。

张家坝化工厂原名“制盐化工厂”，是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由天津迁入四川的久大精盐公司在张家坝购地建成的。久大精盐公司的技术人员，从他们在天津制盐时起就知道，盐都自贡在世界上久负盛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市场钾盐紧缺，军火制造必用的钾需求量很大，促使英国联华银公司于1918年派员到自贡考察，取样化验，分析出鹼巴之类皆含有钾盐。钾可用于制造炸药、染料、肥皂、农肥、皮革、电池，并能用于消毒、防腐、医药、消防、焊接、装饰、照相等。天津久大公司迁到自贡几个月后，“中央工业实验所盐碱实验室”也内迁到这里，开展盐业的科学研究。同年，川康盐务局在自流井设立川盐技术改进委员会，这是四川省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盐业研究机构。1939年，为开辟化工原料，满足抗战需要，盐业研究所用科学方法生产各种化学工业品。抗战期间到建国前夕，自贡先后建立食盐副产品15家。这些厂集企业与科学研究机构于一体，研制生产各种盐卤化工产品，生产氯化钾、硼酸、碳酸镁、碳酸钙等多种盐化工产品。

建国初期，国家轻工业部派技术人员在张家坝自贡制盐厂筹备处，用了3年半时间，进行硼、钾、溴、碘生产工艺改进试验，以其研究成果建立了硼钾镁产工艺与溴碘车间。1956年，该厂建立科研机构，对盐卤天然气的综合利用开展一系列研究试验，使川盐化工产品首次打入国际市场。以后，该厂发展成为我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产品最多、体系最完整的井卤综合利用的盐化工企业。

听完介绍，邓小平一行人到厂里几个车间视察。

邓小平问张家坝化工厂党委书记饶宗翰：“碳酸锶拿来有啥子用？”

饶宗翰回答说：“碳酸锶是一种银白色的结晶，燃烧时会发出红色的火焰。我们生产的碳酸锶主要用来制造烟火。北京放焰火，也要用我们厂的碳酸锶。”

邓小平听后说：“那就是说在天安门看到的焰火，也用上了我们四川的原料啰！”

接着，邓小平一行来到氯化钡车



1965年11月，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视察自贡天然气化工研究所。



间，饶宗翰向邓小平汇报说：“几个月以前，我们厂生产的氯化钡的水平 and 产量都已经超过英国，溴素回收率则赶上了美国。”

邓小平心情十分激动，接连说了几个：“很好嘛！很好嘛！”

“你姓‘党’，那么一生下地 就成了我们党的人了”

参观了张家坝化工厂以后，邓小平回到了他下榻的檀木林招待所。

在檀木林招待所下了汽车，邓小平就和夫人卓琳，带上女儿毛毛，在檀木森森的林中散步。他们很欣赏这个招待所的环境，这里有亭榭，有楼台，有池塘，有小桥，有喷泉。春风徐徐，阳光和暖，空气中弥漫着檀木和花草芬芳清新的气息。

看了盐都自贡的几个地方，邓小平很惬意，更觉得檀木林招待所，处处都是叹为观止的美景。夕阳西下时，邓小平一行在檀木林招待所一号楼餐厅就餐。

招待所服务员党清华负责从厨房端菜上桌。当党清华端来自贡名菜之一的蒸笼牛肉时，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对邓小平说：“牛肉蒸笼，牛肉蒸笼，你喜欢的川菜来了。”

看见邓小平要给小女儿毛毛夹蒸笼牛肉时，服务员党清华把邓小平坐的餐椅向后挪了一下，以便邓小平好夹菜。这是服务员的一项本职工作、分内工作，但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却对服务员党清华说：“谢谢！谢谢！”

然后，邓小平又问她：“小姑娘，你贵姓？”

党清华说：“首长，免贵姓党。”

邓小平又问她：“是不是我们共产党的党？”

“是。”党清华回答说。

邓小平说：“你姓我们共产党的‘党’，那就是说你一生下地，就成了我们党的人了。”

谈吐诙谐的邓小平总书记一席话，引得整个餐厅的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直到今天，党清华回忆起这件事，都觉得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是那么平易近人，那么和蔼可亲。

“全国像自贡鸿鹤这样的厂还有好多？”

1965年11月8日，邓小平乘专列第二次来到自贡市视察。

陪同邓小平视察的有李富春、薄一波、吕正操、李井泉以及邓小平夫人卓琳。

据当时负责警卫工作的自贡市公安局四科马熙超回忆，1965年11月邓小平一行来自贡视察的人比较多，有小车14辆（而1958年2月邓小平一行来自贡时，4辆吉普车就坐下了）。

邓小平在自贡火车站下了专列以后，问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你那个鸿鹤化工厂搞得怎么样了？”

李井泉回答说：“有一定规模了。”

邓小平说：“那我们就先到鸿鹤化工厂去。”

说起来，鸿鹤化工厂的建立和邓小平还有一段渊源。

1958年2月初，邓小平第一次视察自贡后，提出“自贡是产盐巴的，要为盐巴找出路，还要大力发展盐化工业”。



1965年11月8日，邓小平在自贡鸿鹤化工厂视察。

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自贡市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充分利用自贡市丰富的盐场盐卤和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兴办了以盐和天然气为原料的大型现代化的化工企业——鸿鹤化工厂。该厂生产的甲烷氯化物，产品总商品量长期位居全国第一位；生产的氯化铵、小苏打在全国同行业中分别排名第二位和第三位；生产的纯碱，成为西南的“排头兵”；生产的19种主要化工产品，都形成了“拳头”产品，畅销国内外。

自贡有盐化工生产企事业共计59个单位，化工产品12个大类189种，成为我国重要的充分综合利用盐卤、天然气资源，生

产基本化工原料及化学肥料的生产基地。

邓小平等领导同志，首先来到鸿鹤化工厂会议室。

待邓小平一行几十个人坐好以后，化工厂负责人汇报了工厂的概况、建厂简史、生产过程和主要产品。

邓小平一边认真听，一边连连点头。

听完汇报以后，邓小平满意地笑着说：

“你们搞得很好，很不错嘛！”

接着，邓小平肯定了鸿鹤化工厂已经取得的成绩，鼓励化工厂戒骄戒躁，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从会议室出来以后，邓小平一行由化工厂负责人带领，到整流室视察。

见到当班的工人，邓小平向他们招手致意。

到了电解厂房，邓小平视察了电解槽，听取了有关烧碱生产工艺流程的介绍。邓小平对电解后的氯气、氢气、电解液的去向看得很专心，问得很仔细。

从电解厂房出来以后，邓小平问李富春：

“全国像自贡鸿鹤化工厂这样的厂还有好多？产量有好多？”

李富春一一作了回答。

然后，邓小平一行参观了氯压机房。

参观过氯压机房后，邓小平在二氯甲烷车间外的公路上，听取了二氯甲烷的生产情况汇报。

在和鸿鹤化工厂的负责人一一握手告别时，邓小平再一次鼓励他们：

“你们搞得好，成绩很大，但是，不能满足，要戒骄戒躁。以后有机会，我再来你们厂。”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邓小平视察鸿鹤化工厂，已近40年了。鸿鹤化工厂的6000多干部工人没有忘记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期望。鸿鹤化工厂这颗璀璨闪耀的西部“化工之星”，早已初步形成了以“两碱”（烧碱、纯碱）为代表的基础化工、以甲烷氯化物为代表的精细化工、以医药原料为代表的医药化工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鸿鹤化工厂拥有总资产19.58亿元，是国家520户重点企业、全国大型工业企业和四川省26户重点企业之一。2002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3亿元，实现销售收入10.8亿元。

“我是四川人，吃鱼要多放点辣椒才出味”

邓小平1965年11月第二次到自贡期间，对自贡市委第一书记李唐基和市委书记王富源说：“你们给我找三四位年龄在30多岁的年轻干部来摆摆龙门阵。我们党可要注重培养年轻干部啊！”

李唐基和王富源便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安排了时年32岁的张家坝化工厂党委书记饶宗翰，时年31岁的大安区委副书记黄效焜，时年33岁的大安盐厂厂长张显德，时年40岁的市郊区委书记李伯群等几位年轻干部，与党的总书记“摆龙门阵”。

被通知的这四个人，由市委书记王富源把他们带到与市委相邻的檀木林招待所的小会议室。

李唐基和王富源把四位年轻干部一一向邓小平作了介绍。然后，四位年轻干部各自将工作进行了汇报。听了四位年轻干部汇报以后，邓小平就开始提问了。

邓小平先问郊区区委书记李伯群：

你们郊区的社员，一年分配好多斤粮食？

李伯群答道：450斤。

邓小平说：你这个450斤是原粮，太少了。起码要有个600斤就好了。

接着，邓小平又问了黄效焜有关大安区的情况。

最后，邓小平问了大安盐厂厂长张显德、张家坝化工厂党委书记饶宗翰关于工业生产方面的问题，张显德和饶宗翰分别作了回答。

“龙门阵”摆谈得差不多了以后，邓小平对几位年轻干部说：

难得跟你们见一面，我们一起吃一顿饭，四菜一汤。在吃饭的时候，还可以继续“摆龙门阵”。

然后，四位年轻干部与邓小平等人一起到了餐厅。

邓小平说：你们是年轻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未来。我今年61岁了，你们中两个人的年龄相加，才抵得到我一个人的年龄。今天你们要多吃一些。

可是，这四位年轻干部在用餐的时候都有点拘束，因为此前他们从来没有和中央领导一起吃过饭。

邓小平就对他们说：

咋个搞的嘛，你们四个年轻人只吃饭，不吃菜？你们自贡的菜这么好吃，咋个不动筷子喃？

这时，服务员端了一盘豆瓣鱼来。邓小平先拿起筷子尝了一块鱼，然后对这四位年轻的干部说：

你们四个年轻人来尝一尝，今天这盘豆瓣鱼辣椒太少了，吃鱼要多放些辣椒才出味。可能大厨师不晓得我是四川人，老家在川北广安县，特别爱吃川菜。所以他没有在豆瓣鱼中多放



些辣椒。

然后，邓小平“下命令”，叫这四位年轻干部不要拘束：
来哟！都给我动筷子吃菜哟！

“莫要把云贵川的腊肉搞失传了”

“你们绵阳抽了110多万农民大炼钢铁，你这个农业有啥子看头”

1957年以后，党内“左”的错误抬头，并且很快占了上风，继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1958年神州大地上急风暴雨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冲击着中国的各个角落，蜀乡大地也未能幸免。

实话实说的邓小平曾经坦言，作为党的总书记，对1957年以后“左”的错误他“有份”。但与此同时，他又在若干方面与毛泽东等领导人表现出一些不同的思路，表现出一些不同的见解。比如，邓小平当年到四川绵阳视察，就批评过绵阳“抽了110多万农民”去大炼钢铁。当时担任绵阳地委第二书记的彭华请邓小平去看看农业时，邓小平说：



“你们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全部在砍树子、炼钢铁，你这个农业有啥子看头？”

为了弄清当时的详细情况，笔者采访了彭华同志。其时，笔者过去在四川社科院的老领导、彭华的夫人吴儒玢还健在，所以联系采访很顺利，他们爽快地答应了。

一个旭日东升的早晨，蓉城的天空披上灿烂的霞光，朝阳的光辉洒满了绕城而过的锦江，江面上金波粼粼，笔者来到了彭华的住地。

岁月已经久远，许多历史往事在渐渐地被淡忘，但是彭华对于邓小平当年在绵阳与他的对话情景却好似发生在昨天。彭华从那一次与邓小平的对话中，领略了一位既实事求是、不追风赶时髦，又时时处处把老百姓装在心中的伟人特有的风度和气质。

彭华打开了回忆的闸门，让记忆之线伸向如烟如云、似影似梦的往事。

1958年9月，四川省绵阳和遂宁两个地区合并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地区——绵阳地区。彭华担任绵阳地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李林枝担任。这个时候，“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由于绵阳是全国人口最多（以后达到1000多万）的地区，省里下达的大炼钢铁的任务就很重，要求全年完成10万吨钢铁的生产任务。当时绵阳根本不具备这种条件，只好从农村里抽调了110多万从来没有炼过钢铁的种田农民，组成“钢铁大军”，开往江油至广元、旺苍一线，使川陕公路上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人流。这种110多万人流动大军的流动，一直持续到邓小平到达绵阳。

1958年10月27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

昆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绵阳，视察了德阳、江油、昭化、梓潼、剑阁等地。李林枝和彭华考虑当时中央号召全民大办钢铁，这时全国最时髦的口号是“以钢为纲，钢铁是最大的政治”，便向邓小平汇报了：“我们新成立的绵阳地委领导班子，抽调了110万农民组成的炼钢大军，坚决完成省委给我们下达的10万吨钢铁的生产任务。”

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听后连声说：“好！好！”但是，邓小平却一直不插话、不答话。

过了一会儿，邓小平才说话，可是他非但不问有关绵阳地委如何贯彻落实“以钢为纲，钢铁是最大的政治”、有关绵阳大炼钢铁的事，反而要李林枝和彭华给他汇报：你们绵阳地区农民的生活怎样？有好多收入？有好多口粮？

李林枝汇报说：“口粮一般是400斤左右。”

李井泉听后，很高兴地说：“好家伙，400斤，这么高的水平！”

邓小平却马上摇头：啥子高水平哟！400斤还是高水平吗？太低了。400斤是原粮，如果是小麦，100斤才打多少面粉！如果是谷子，100斤才碾多少米呀！

李井泉说：“他们绵阳还有森林，可以卖很多钱。”

邓小平说：我晓得木头可以卖钱，但是又有好多木头可以砍，砍下来又能卖几个钱呀！你没有听他们两个地委书记讲的，绵阳条件这么好，在全国都称得上是上等条件，可是一个农民一年的平均收入才60块钱左右吗？

从四川农村参加红军的李林枝，建国后也主要是从事农村工作，对于大炼钢铁确实是外行，便问邓小平：“总书记，上头正在推广炼大窑铁，说是把树木砍了，在山沟里堆满木头和矿石一起烧。我和彭华都不晓得这个办法好不好，硬是拿不



稳。”

邓小平听后说：“我也是外行。”要李林枝问杨尚昆。

杨尚昆说：“我还是拿不稳。”

李林枝对杨尚昆说：“我和彭华商量的，如果我们要想完成10万吨钢铁的生产任务，就要虚心地学习其他地方的经验。杨书记，北京是咋个完成钢铁任务的呢？”

杨尚昆回答说：“北京把大门上的铁皮都弄下来炼铁了。”

彭华一听忍俊不禁，笑了起来：“大门上的铁皮好端端的干吗要取下来？取下来又能炼多少一点铁呀？”

杨尚昆也忍不住笑了起来，用纯正的四川话说：“炼政治铁嘛！”

彭华发觉，听到杨尚昆的话以后，一直默默抽烟的邓小平这时脸庞上也出现了笑意，但饱经人事沧桑的彭华能分辨出来，那是一种苦涩的笑意。

彭华想转换一下话题，便对邓小平说：“邓政委，是不是看一下农业？”

邓小平说：“你们抽了110多万农民在大炼钢铁，而且都是农村的主要劳动力。主要劳动力全部在砍树子、扛树枝炼钢铁，田坝头没得啥子人在耕地种庄稼，你这个农业有啥子看头？”

第二天，邓小平一行人到了昭化。他从昭化火车站下车以后，到地里去看了一看，发觉只有很少几个人在干农活。邓小平便当着李井泉的面对李林枝和彭华说：“你们这个地方搞农业是大失败，大垮台，明年大减产！”

邓小平的话不幸言中了——第二年，绵阳地区和四川、同全国很多地区一样，粮食大减产。加上当时盛行的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说假话，饿死了很多人。

讲到这里，很小就参加革命的硬汉子彭华，流出了伤心的眼泪……

“莫要把云贵川的腊肉搞失传了”

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公社社员生活集体化，全国各地都办起了公共食堂，所谓的“吃饭不要钱”。

“刮共产风”的初期，公共食堂还有较多的粮食可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食堂就愈来愈难办下去了。四川新都人田家英，其时任毛泽东的秘书。恰好这时他经毛泽东同意，回四川新都他舅舅家乡蹲点。根据田家英调查研究，除了知道亩产580斤被报为亩产1000斤之外，还知道新都许多公社食堂经常只有稀饭吃，没有干饭吃，而且菜里见不到一滴油。田家英回到北京以后，向毛泽东如实汇报了这一情况。



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四川农村的一个公共食堂。



在这同一时期，刘少奇也曾为公社食堂的问题向毛泽东提过比较尖锐的意见：

“吃食堂是在吃饭问题上把群众卡起来，那比捆绑还厉害。”

但毛泽东听了田家英和刘少奇的意见以后，并没有改变他对公共食堂的态度。直到这以后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仍然认定：“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

当时四川是被毛泽东表扬过的三个“左派省”之一。

稍后，邓小平却在北京市郊顺义、怀柔调查后，对这两地的基层干部说：

“你吃食堂叫社会主义，你不吃食堂也叫社会主义。”

1958年10月27日至11月初，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后补书记杨尚昆和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陪同下，在四川和川黔边及贵州视察。在四川德阳，邓小平听取了当地负责人程占彪的汇报，针对人民公社化以后，社员的生活出现了单调和千篇一律的情况，指出当时有50万城市人口的德阳：“是不是划几个县进来，以便解决副食品、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将来各个镇、居民点、文化、教育、商业、卫生事业等样样都有，连口红也不缺，以后农村的妇女也要用口红的。”

邓小平当天在德阳还同时指出：“四川……还应该要在甘孜、阿坝地区内搞畜牧业基地，以后吃奶品、穿皮毛是个大问题。将来工作8小时、睡眠8小时，还有8小时干什么？那就是下棋、跳舞、看戏、看电影、打球和看打球。”

杨尚昆插话说：“还要坐茶馆。”

11月4日，邓小平在川黔边指出：“将来高跟鞋、胭脂、口红也可以用。办食堂，现在是办啥吃啥。可不可以个人有点机



1965年11月，邓小平到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受到工人的热烈欢迎。

动？各个人口味不同，自己搞点咸菜，腌点腊肉，自己加一个菜，不可以吗？是生活越搞越单调，还是越搞越丰富？共产主义是把大家搞成一个口味，还是允许各人有各人的口味？”

当看见川黔边的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时，邓小平提出每家喂一两头猪，腌点腊肉：“莫要把云贵川的腊肉搞失传了！”

在那个高呼“人民公社万岁！公共食堂万岁！”的年代，邓小平讲出了这些倡导实事求是的话，强调了干革命、搞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改善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生活不能越搞越单调，而要越搞越丰富。

因此，人民群众打从内心尊敬“我们的小平同志”，不无道理。



**“我是广安叫花子，最恨江青几爷子，
小平同志快出来，免得我们饿肚子”**

**“金广安”街头的树皮，
几被饥民全剥光**

广安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煤炭等矿藏丰富，是四川东北部的主要产粮区，尤其玉米曾远销苏俄、印度，故有“金广安”之称。

清朝编修的《广安州志》写道：广安“地枕巴山，城环渝水，东岭茶铁之乡，西溪鱼虾之出。”

民国初年编修的《广安县志》也写道：“广安厥土饶沃，无旷土，无闲田，无沃瘠之别，无水旱之忧。树以桑麻榆枣，畜以牛马鸡豚，植以葱韭蔬果，延以瓜瓠薯葛。广安物产特饶，凡山林竹柏之材，山洞药石之宝，畜产皮角之富兼而有之。兹地所产之稻米、包谷香尤滋润，号称金羹玉版；所出产

之蚕丝品质特优，黄白莹然；所识之寘布，汉赋有载，谓为简中黄润，一端数金（‘寘布’是指‘寘族’人织的布，广安先民为秦汉间四川一带‘寘族’人）。”

千帆竞发的渠江把广安分割成东西两大块，广袤的大地上是阡陌纵横的农田。广安的三月，田野里金灿灿的油菜花让人赏心悦目；麦田宛似嫩绿的地毯，被春风掀起绿色的波浪；农家屋檐后的果树花开得热热闹闹；小鸟的啁啾，似是炫耀自己高兴的心情。春华秋实，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古树参天，翠竹成阴的村子里，各家各户的房梁上吊着金色的玉米棒，地坝里、房顶上晒着黄闪闪的稻谷和红辣椒。广安农民在收获的季节把最好的玉米送到粮食部门，以便远销国外。

这就是“金广安”的农村景象。

但是，即景生情的人们，有谁又会想到，在十年“文革”时期，在从金广安走出的邓小平，先被打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后被打成“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的时期，在有关《决议》里定性“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的时期，昔日的“金广安”，邓小平的百万故乡人却承受着大饥饿的煎熬。渠江呜咽，华蓥（山）落泪。

封建社会动不动就“诛九族”，比封建势力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四人帮”，欲将邓小平置于死地而“永世不得翻身”，使邓小平的故乡广安成了“重灾区内重灾区”。

在饥饿和半饥饿的状态下煎熬的许许多多广安人，衣衫褴褛，蓬首垢面，所有的感觉集中起来只有一个字——饿，他们的最大奢望就是能吃一顿饱饭。

笔者采访了当年担任广安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的邓欲治。



邓欲治说：“在那个年代，我们广安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娃儿，不管是男娃儿还是女娃儿，都在喊肚子饿。十几二十万广安人外出逃荒，不能外出的年老体弱者，竟把广安县城的梧桐树皮都给扒光了。我们广安的这种梧桐树，不像成都街上的梧桐树，我们的梧桐树树皮炕干之后打磨成粉，可以吃，可以充饥。有些广安人饥慌了，先去吃观音土、白鳝泥，可是观音土、白鳝泥吃进肚皮以后却拉不出来，大家就把广安大街小巷的梧桐树皮基本上全都剥光了。最后，饥民拥到县委门口来，要剥全城剩下的四棵梧桐树的树皮。我见状马上给他们做工作，说这四棵树子要保下来，好在这一批饥民还是通情达理就走了，没有剥这四棵树的树皮。我担心另外一批饥民又会来找充饥的树皮，就拿出办公室的油墨，把这四棵树的树皮全部涂上了厚厚的一层油墨，才使树子保存至今。”

邓欲治讲到这让人不堪回首、不愿回首的心酸事，布满了皱纹的脸上流下了眼泪。邓欲治和“满屋座”听他讲往事的笔者和其他人当时的状况，可以借用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几句名诗：“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就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十万广安难民爬火车下渝州逃荒

“金广安”按往年惯例，每年应向国家交纳公粮（农业税）和余粮（按比例必须卖给国家的粮食），一共是1200万斤。可是1976年不但颗粒未交国家，反而由国家给广安县拨出960万斤返销口粮。

这批返销粮，主要是从东北黑土地运来的玉米。

被倒行逆施的“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就这样开了一个玩笑：昔日，金广安种的粮食吃不完，玉米还要远销外国；而今，饥饿中的广安人靠东北玉米，维持奄奄一息的生命。

也许，在一般人的眼里，尤其是在没有亲身经受过在饥饿中煎熬的人的眼里，这960万斤粮食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他们会想，广安人这一下可以吃饱肚子、过上“幸福生活”了。因为960万斤玉米，要多少火车车皮才能从东北运抵四川，又要多少汽车拉到各乡镇村庄，还要有多少人负责分发这960万斤粮食。

可是，广安是一个百多万人口的大县。960万斤返销粮，每人平均八九十斤。饥民既然连饭都没有吃的，当然就不会有肉和油吃了，用饥民的话来说：“肚皮里头连一点点油水都没得，吃饭当然得行得很。”有的饥民让他“敞开肚皮吃”，一顿就可以吃上两三斤粮食，对百多万人口的广安来说，960万斤返销粮只能算杯水车薪。三几下把救济粮吃了以后，仍然饥饿难忍。

饥民们还是要顽强地活下去，但广安城里的梧桐树皮已基本上被剥光了，怎么办？

这样，就有大量的饥民离乡背井。仅仅去重庆的广安难民，就在10万人以上。重庆古称渝州，当年童叟皆知：“1976年十万广安难民下渝州。”

距1976年刚好1250年的公元726年，蜀乡绵州彰明县（今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县）的大诗人李白也曾写过一首诗讲他“下渝州”：“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李白“下渝州”的心情和广安饥民“下渝州”的心情可完全不一样。李白由蜀出游，经过四川乐山境内平羌等三峡（而



非长江三峡)，回忆在峨眉山同友人赏月时所见景色，触景生情，思念友人而“下渝州”。

可是，十万广安难民“下渝州”，是为了逃荒，为了寻找生的希望，以便生存下去。

广安人民要顽强地生存下去。他们知道，小平同志遭厄运，百万广安人饿肚子，一二十万人走出广安去当“叫花子”、“讨口子”，都是江青一伙造成的。他们同时更坚信，江青一伙要置邓小平“于死地而后快”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1976年4月的一天，一列火车拉着从黑龙江运来的几十吨玉米刚刚停靠在广安前锋火车站的站台前。几个广安人发现车皮上不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有人写了几个字：“打倒邓小平！”火车是在全国跑的，类似这样的标语，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日子里，全国到处都是。可是广安人眼里却容不得沙子。几个广安人用油漆在车皮上写下了更多更大的字：“江青的徒子徒孙，告诉你，我们的小平同志是打不倒的！你和你的主子江青肯定会完蛋的！”

邓小平的亲舅舅淡以兴，因邓小平1976年第三次被打倒又受株连，多次遭受迫害。但就是这个目不识丁又备受摧残的古稀老人，在他那清瘦的面容上留下的始终是坚定和刚毅。每次他被批斗时，都毫不示弱，都要挺起胸膛，高喊：“我们小平打不倒！”

“我们小平打不倒！”邓小平的亲舅舅如是说。

“我们小平打不倒！”邓小平家乡的百万乡亲如是说。

不久，在广安，在渝州，在重庆北碚火车站，出现了令“四人帮”最为头痛的大标语：“我是广安叫花子，最恨江青几爷子，小平同志快出来，免得我们饿肚子。”

这20多个字，字字掷地有声！

“四人帮”的爪牙到处去撕毁、去覆盖大标语，但他们在每个地方都是无功而返，因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笔者在采访闻名省内外的“邓小平青少年时代”和“邓氏家族”研究专家、原广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蔡世武时，问他为什么到其他地方的广安难民没有“下渝州”（重庆）的多。

蔡世武说：这有几个原因。首先，重庆市有几百万人口，十万广安难民到几百万人中去求生比较容易。其次，广安离重庆近，离北碚更近，才100公里左右，而离成都是300多公里。第三，渝州北碚有个西南制药厂，这个厂很大，他们生产的很多药都要用玉米。制药以后剩下的玉米糟，就成了饥民的“抢手货”。玉米糟经亚硫酸浸泡，有一股刺鼻的硫磺味，吃起来涩口。虽然不好吃，但比梧桐树皮、比观音土、比白鳝泥就“好吃”了，应该算是没有奢望的饥民的“高档食品”了。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十万饥民下渝州，还有数万饥民去其他地方求生。1976年广安汽车很少，主要的外出交通工具还是火车。

当时，广安前锋火车站天天都是人山人海，饥民们争相爬车。火车站根本谈不上“秩序”了。至于火车厢，岂止是“满员”——除了行李架上饥民，卫生间里挤满了饥民，连火车车厢外面顶上也爬满了饥民。

原广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蔡世武告诉笔者：

“我当时是广安县委的干部，县委担心十多万难民爬火车不安全，尤其是爬在火车顶棚外面的人更危险，往往会在火车进隧道时发生意外而死亡，因此便将我们百多名县委干部分成五路，分别去县境内的五个火车站劝阻饥民。县委书记杨钟去前



锋火车站当‘站长’，我们百多名县委干部天天在五个火车站‘上班’，劝阻老百姓。我们先是劝阻他们不要爬火车，但这根本无济于事，他们照样爬。后来，只能劝阻不要爬上火车顶棚外面，那样容易出事。有的难民却说：‘在广安等着挨饿是死，爬火车顶上面摔下来也是死，我们多把细一点（四川土话，‘小心’的意思），也不一定就会摔下来，二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了，我们可能会活着回来建设金广安。’”

广安饥民的求生欲就是这么强，因此，他们才无所顾忌地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我是广安叫花子，最恨江青几爷子，小平同志快出来，免得我们饿肚子。”

“哪个是小平同志的舅舅，请到前面来割肉”

邓小平的亲舅舅谈以兴，原来住在广安县望溪乡谈家坝，后来搬到邓家老院子居住。

谈以兴生于1900年9月26日，比外甥邓小平大4岁。

1976年，谈以兴76岁。对于数千里之遥的北京，在这一年春天发生的事，憨厚的谈以兴并不知道。

1976年1月8日，被邓小平视为兄长和挚友的周恩来去世。1月31日，北京召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会议。3天后的2月2日，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月3日，“批邓”运动正式在全国大规模展开。这一年的4月4日，是清明节。清明节是中国人清扫墓地，祭奠逝者，追念亡灵的传统节日。在清明节还没有到来之前的3月份，北京的市民就开始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清明节这一天，悼念“人民的好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达到高潮，先后有200

·206·

多万人会集天安门广场。“四人帮”及其党羽于4月5日镇压了人民群众自发的这一集会活动（以后称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并一口咬定“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重病沉病的毛泽东听了为“四人帮”效力的侄儿毛远新的汇报，作出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邓小平就这样第三次被打倒了。

北京，对于远在几千里以外偏僻小山村的淡以兴，是那样的遥远，那样的陌生。只是他家里那台老掉牙的收音机，这一年经常广播批判邓小平的口号和骂邓小平的话。他知道外甥邓小平的日子又不好过了。他只有去乡场上、县城里打听邓小平的消息。到了4月份，他听说“邓小平又被赶下台了”。

身体本身虚弱又连饭都吃不饱的76岁老人淡以兴，一下子病倒了。

淡以兴在床上躺了七八天，只有老伴照顾着他。

4月16日这一天，广安的天气很好，风和日丽，老伴要他下床到外面去晒太阳，去活动活动身子骨。

老实巴交、心地厚厚的淡以兴慢慢走出院子。在一条小路上，碰见好朋友金福生老人。金福生望望淡以兴的气色，说：“老淡，我好久没有看见你出来走动了，不要怏气，小平同志吉人自有天相，打不倒的！走，去龙溪场散散心！”

淡以兴叹了口气，看看天空，说：“我四肢无力，脚都拖不动，哪个去？”金福生说：“你是好久没沾油荤了。这样，我去龙溪街上给你找斤肉票，割点肉回去补补。”

两位老人到了龙溪街上屠宰场，案桌前买肉的人已排了一长串。金福生叫淡以兴把队排着，自己去街上找肉票。

淡以兴刚排上队不久，队列里有认识老淡的，说：



“那不是小平同志的舅舅吗？”

这么一说，买肉的人都调转头看谈以兴。正在卖肉的屠工老张看见队列里的骚动，又听说是邓小平的舅舅要买肉，便停下手里的刀问：

“哪个是小平同志的舅舅？请到前边来割肉！”

谈以兴老人双手颤抖，心里紧张，没敢上前。队伍中几位年轻人把谈以兴推到案桌前。老张望望谈以兴，对排队的人们大声说：

“小平同志为咱们群众，被奸臣陷害，他的舅舅割点肉不算开后门吧？”

群众激动地回答：“不算不算，给小平舅舅割吧！”

老张给老谈砍了两斤膘肥肉好的“宝肋”，可是谈老身上只有一元钱。

谈老望着排队的人们说只要一斤，硬要老张割去一斤，老张说：

“你什么时候带钱来补我就行了。”

谈老仍坚持只要一斤，老张没法只好剁了一小块出去。

老张递肉给谈以兴老人时，说：“谈大爷，我们早就想给小平去封信，叫他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我们怕他收不到。你是他舅舅，那帮奸臣再狠也狠不到拆小平的私人信件，你告诉他，我们心里装着他的！”

谈以兴捧着肉，颤抖着双手走出人群，转到房角，再也忍不住心酸，缺堤般的泪水流了出来……

小平磨难，蜀乡人情更深

天下未乱蜀先乱，蜀人先乱了“四人帮”的方寸

古人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还在“四人帮”欲将邓小平置于死地的“方寸”在全国“未乱”之前，蜀乡人已先走一步，从1974年起，将“四人帮”的“方寸”先乱了起来。

茫茫蜀乡大地的父老乡亲都知道，从蜀乡走出的邓小平，命运多乖舛，在他那三起三落、波澜跌宕的经历中，尤以第三次横遭打击、蒙垢受辱更令人悲切。因为当时重病沉疴的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汇报：“邓小平策划并指挥了4月5日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旋即，毛泽东便作出了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



邓小平被“赶出去”以后，“四人帮”加快了夺权的步子。他们利用毛泽东的表态，进行大批判、大镇压，全国城乡一片恐怖。仅北京市就拘捕“为邓小平卖命的反革命分子”388人，全市被隔离、被“追查”者达1万多人。神州大地“步调一致（甚至语调一致）同仇敌忾”地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蜀乡人爱讲一句俗话：“林子大了，啥子样的鸟都有。”

曾几何时，当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时，一些人对邓小平的赞美口若悬河：“我早就知道邓小平人才难得，柔中有钢，钢中有柔。”而当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以后，同样的这些趋炎附势的人，却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离邓小平远远的。甚至有的高级干部也拼命地“好不容易才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像候鸟一样翩然向“四人帮”飞去，信誓旦旦地向“四人帮”表忠心：“坚决与中国的纳吉邓小平划清界限，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进行到底！”

潮起潮落，阴晴圆缺。

而就在这人妖颠倒、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邓小平的家乡四川，一位29岁的成都小人物，早于1974年就以“心赤客”为匿名，“极不合时宜地”投出了数封鞭挞“四人帮”的信。在1976年北京爆发4月5日“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呼唤邓小平”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前一个多月，“心赤客”不再使用匿名，而是“胆大包天”地署上真名实姓“白智清”，分别于1976年2月18日和3月4日，在四川重庆市中心解放碑、文化宫和成都市中心盐市口，贴出了公开点名批判张春桥等“四人帮”的大字报，赞扬邓小平搞整顿使中国很快出现了生机，呼唤邓小平出来工作。白智清公开与“四人帮”、与“批邓、反

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运动”对着干。

白智清敢于在豺狼当道的日子挺身而出，不惧斧锯鼎镬，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污浊黑雨中为蜀乡人撑起了一把大伞，使蜀中父老乡亲们在寒流黑夜里看到了一丝曙光。

白智清的大字报，道出了蜀中父老乡亲之所未道，抒发了蜀中父老乡亲之所未抒。

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蜀乡人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已如鯁在喉，而对于高山仰止的蜀中人邓小平，一直抱着崇敬、仰慕的心情。特别是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时、第二次复出后，面对“文化大革命”人为造成的全国大灾难，坚决果断、大刀阔斧地在全国推行全面整顿，使经济形势很快开始好转，人民生活很快开始得到一定的改善。可是，一直欲置邓小平于死地的“四人帮”，利用周恩来逝世的“极好”机会，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眼看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邓小平搞“全面整顿”后出现的一线曙光很快就会被黑云湮没，邓小平本人又要遇到一次更大的劫难。

在这种情况下，千百万蜀乡人心中愤怒的火焰，以白智清的大字报为导火线，立即在蜀乡大地燃起了“悼念周恩来，保卫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熊熊烈火。

1976年3月5日，也就是白智清的大字报在成都贴出的第二天，5万多成都市民聚集在成都市中心盐市口一带，为白智清的大字报叫好，并对一小撮帮派分子挑起的事端进行反击。有的帮派分子在大字报前向支持大字报观点的群众动武，并提出要“坚决揪出白智清的黑后台邓小平”。

鲁迅先生说过：“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生。”

当时的《四川日报》报道：

“在党中央的关怀、指示下，公安干警和广大革命群众紧密配合，被公安部通缉的、要把邓小平抬出来‘当总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白智清很快被缉拿归案。”

“中共成都市委表彰了成都市公安局在侦破白智清反革命案件中的有功单位和人员，并给六个先进集体和十一个先进个人发了奖。”

以后，白智清多次被押上囚车，在成都和重庆游街示众，遭到轮番批斗。



20 世纪 70 年代的成都市盐市口。1976 年 3 月 4 日，白智清在这里贴出点名抨击张春桥的大字报。

“为了国家利益邓小平舍得他的官， 白智清舍得我的命”

在白智清被轮番批斗的同时，《四川日报》、《成都日报》、《重庆日报》分别公布了他的“累累反革命罪行”：

“2月18日和3月4日，我省重庆市和成都市分别出现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点名攻击党中央领导人、为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邓小平摇旗呐喊的白智清的反革命大字报。白智清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恶毒攻击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要抬出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邓小平，要让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政变的头子纳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白智清大肆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向邓小平表‘忠心’，吹捧邓小平是什么‘爱国爱民的老革命’，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什么‘邓小平当总理，我举双手赞成’。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这也恰到好处地说明了邓小平和白智清是反革命藤上的两个毒瓜，他们两个穿的是一条裤子。”

“白智清的反革命大字报3月4日在成都‘英雄口’（‘文革’时将‘盐市口’改为‘革命街道’名字）张贴以后，3月5日又发生了打伤成都硅酸盐厂写革命大字报、保卫张春桥等党中央领导人的工人同志的严重政治事件，一批反革命分子还在成都一些街道书写攻击党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同志的反革命标语、传单、诗词。有的反革命分子还和白智清一样，利用我省的灾情，制造和散布谣言，胡说八道地讲：‘救灾粮是邓小平给的，



铺天盖地的“批邓专栏”

邓小平垮了，救灾粮就吃不成了。’”

“反革命分子白智清狂吠：‘为了国家利益邓小平舍得他的官，白智清舍得我的命！’白智清公开叫嚣要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可见邓小平和白智清在政治上是互相呼应、相依为命的。白智清为了邓小平可以‘不要命’，表面上气焰嚣张，其实他和邓小平一样虚弱得很。他们唱的一个调，吹的一把号，走的一条道。他们的‘不要命’，正说明有反动罪行的邓小平和反革命分子白智清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在作垂死、绝望的挣扎。”

在当时的四川，凡召开批判邓小平的大会小会，必然要高呼“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白智清”的口号。

如果不是后来粉碎了“四人帮”，白智清必定会和当年辽宁省另一位反“四人帮”的勇士张志新一样，早已被杀头了。

在“四人帮”肆虐的年代，人们都必须反复地背诵一句话：“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所以，“十恶不赦”、“为邓小平卖命的反革命分子白智清”，在监狱里、在囚车中、在批斗大会上，身体是怎样经历磨难，心灵是怎样备受蹂躏，人的尊严是怎样受到侮辱的，便可想而知。但是，作为一名小小的技术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匹夫”，白智清没有屈服。正如宋朝人文天祥在《指南录》中所写的那样：“但愿扶桑红日上，江南匹士死犹荣。”

备受摧残的白智清是保卫邓小平的蜀乡人的代表。蜀乡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民族脊梁，才使历史之树常青。

同乡们和小平心心相印

1976年5月9日，《重庆日报》头版头条在《同仇敌忾深批邓小平坚决打击反革命》的大字标题下，公布了白智清的另外一条罪状：

“现行反革命分子白智清，一贯坚持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对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早在两年前，他就多次向中央投寄反革命匿名信，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并上书邓小平，要邓小平效仿拿破仑搞反革命政变。”

因为白智清是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亲自过问、公安部通缉的“大反革命分子”，所以，至今在公安部的档案馆里仍旧保存着白智清匿名“心赤客”于1975年3月20日写给邓小平的一封信：



敬爱的邓付（副）总理：

作为您的同乡和一个中国人，我给您抄来几句可能您早已熟知的蜀相诸葛亮的语录：“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命，而邪臣起于非功。……”

国家落到这步田地，难道不是忠臣死于非命，而邪臣起于非功么？

你们曾远离国土，出国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你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战场上出生入死。

……我想，对拿破仑，您一定不会陌生的。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后，在1815年3月1日开始的第二次政变，从厄尔巴岛出发时，只有为数极少的一千人，在儒安（一小港名）登陆后不久，不用一枪一弹，便推翻了当时掌握整个法国和几十万军队的波旁王朝。

这并非神话，结论只有一个：他代表着法国民族的利益，……得民心者得天下。

现在而今，全国人民的心、全军队的心、全民族的心，又向着谁呢？

……谁是人民的儿子，谁又是人民的罪人，人民都看清楚了。

当您任（解放军）总长（总参谋长）的消息传达后，全国、特别是军队，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多少人感动得热泪长流。

而对另一个（按：指张春桥同时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则非但没有什么声响，有的（只）是仰面叹息。

不甘心民族重遭奴役，国家重受破碎的中国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您和你们身上。

邓总长，“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要想自强，不除国贼，

终归妄想。

将军仁义著于四海，……我们深信，您能够救中国，救民族，也救自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为了祖国和中华民族，敬礼！

心赤客

1975年3月20日

写这封信的白智清，知道自己有几两几斤：只不过是一个
人微言轻的小小技术员而已。

但是，千百万蜀乡人和白智清一样，在这人妖颠倒、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在邓小平蒙难的日子里，照旧对未来充满信心，照旧寄希望于邓小平。为此，白智清和千百万蜀乡人，更加关注同乡邓小平的命运。

蜀乡人特别关注蒙难的小平

为了拍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联合摄制的大型专题片《邓小平与四川》，笔者作为两位总撰稿之一和策划人之一，在成都市泡桐树街白智清弟弟家中，采访了白智清。

白智清追寻了那段历史轨迹。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被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罪名予以打倒。那时候，刚刚20岁出头的白智清，和其他许许多多的蜀乡人一样，对此很不理解。他们除了在知己面前为非亲非故的邓小平鸣不平之外，是别无他法的。



以后，当不少人都在忙忙碌碌“打派仗”的时候，白智清和许多蜀乡人却正好忙里偷闲，去认真思考一些问题，认真读一读马克思的书，特别是要想方设法去打听邓小平的情况，关注正在蒙难的这位同乡的命运。他们日臻成熟的思考，终于使他们明白了一个真谛：这位正在蒙难的同乡的命运，就是蜀乡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命运——他们和邓小平心心相印。

从1969年10月24日就被押送到江西的邓小平，在江西磨难三年多以后，于1973年2月22日回到了北京。

1973年3月9日，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同时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以上各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作解释。周恩来并告毛泽东：小平同志已回北京。随后，毛泽东批复：“同意”。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1973年3月28日，周恩来、李先念和江青约见邓小平。这是邓小平近七年来，第一次见到他的兄长和好友周恩来。

1973年3月29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前，周恩来约邓小平先到毛泽东处。这是自1966年9月之后，时隔七年多，邓小平再次见到毛泽东。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出现在由周恩来举行的欢迎西哈努克的宴会上。这是他七年来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中外记者及时发布这一国内外关注的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并进政治局。



成都一些人举行誓师大会和示威游行，提出“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图为示威游行队伍。

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几天后，江青分别在两个“批林批孔”会上，对周恩来进行不指名的攻击。接着，“四人帮”操纵的报刊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吹捧女皇，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夺权制造舆论。此前一个多月，江青和张春桥为了“倒周”，就已经诬蔑周恩来“迫不及待”要取代毛泽东，并称这是“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就在“四人帮”攻击、诬蔑周恩来的这个时候（1974年初），远在四川的白智清第一次以“心赤客”为匿名，投出了数封赞扬“敬爱的周总理”、鞭挞“四人帮”的匿名信。为此，被公安部列为“心赤客反革命案件”。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10日，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引起了强烈反响和热烈欢迎。蜀乡人感到特别自豪。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行密谋。次日，王洪文到长沙市，向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现由“四人帮”组阁的阴谋。毛泽东批评了王洪文。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发展国民经济的设想。大会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

1975年2月2日，邓小平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8天后，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要把交通运输、煤炭、钢铁生产抓上去。

1975年2月中旬、下旬和3月上旬，邓小平接连主持几个会议，解决铁路运输问题。到4月底，全国铁路畅通，生产上升，运输形势基本改观，表明全面整顿初战告捷。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说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经验丰富的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认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随后，江青也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

1975年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一文，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用心险恶地鼓吹“打土围子”，影射周恩来、邓小平。

张春桥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二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身居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要职，红得发紫。可是，甘冒张春桥“大不韪”的无名小卒白智清，竟敢于“太岁头上动土”，在张春桥文章发表以后很快贴出大字报，开宗明义点名要批“张春桥写的文章”，而且这个小人物还对张春桥“新账老账一起算”，把张春桥17年以前（1958年）在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上写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一起进行批判，硬是要挖红得发紫的张春桥的“祖坟”。白智清的大字报除了“很不客气”，左一个“张春桥”，右一个“张春桥”，还引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等原著批驳“张春桥利用人民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利用极‘左’的口号来反马列主义”。白智清指出：“如果说张春桥文化低下，连马克思的名言的字句都不认识，那未免太笑话他了，肯定是另有原因的。”接着，白智清旗帜鲜明地又赞扬了被张春桥、江青攻击的周恩来、邓小平是“希望国家富强，希望民族昌盛”。白智清还写道：“张春桥是已经公开喊出不要马列主义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1975年5月8日，邓小平主持钢铁座谈会，解决钢铁工业存在的严重问题。与此同时，邓小平在文化、教育、国防工业、科技及党风党建等各个领域进行整顿，还解放了一批干部。

1975年6月1日，日理万机、心力交瘁、又患上癌症的周恩来，不得不住进医院。

1975年6月14日，一直想当女皇的江青，利用周恩来住医院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召集她的写作班子开会，明有所指地说，现在党内“有很大的儒”，即周恩来“是现代最大的儒”，



“要批儒”。

1975年7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最高水平。”铁的事实证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成绩斐然，使动乱了九个年头的中国出现了勃勃生机。

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1975年11月11日，当毛泽东在听取他的侄儿、为“四人帮”效力的毛远新歪曲事实的汇报后，对邓小平作出了错误的批评，并且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紧接着就开始了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5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当周恩来遗体送入宝山火化时，十里长安街上，上百万人伫立默哀送灵。周恩来的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沉痛哀悼，也使邓小平受到“四人帮”更猛烈的攻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火药味更浓。

1976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称根据毛泽东提议，并经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天，没有实现当总理野心的张春桥，写下了对中央关于国务院总理人选决定充满怨恨的《二月三日有感》。

1976年2月18日，白智清在四川省重庆解放碑贴出点名批判

张春桥的大字报。

1976年2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开会，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1976年3月2日，江青私自召集12个省、自治区的负责人开会，大骂邓小平。

过了两天的3月4日，白智清在成都盐市口贴出点名批判“四人帮”、赞扬邓小平的大字报。

尘埃落定，蜀乡人惊喜万分

时光流逝，岁月如梭。

当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以后，当拭去了灰尘留下的只是英雄本色的时候——只有尘埃落定，回望者的视线才会愈加明晰。



2003年春天，白智清与妻子、女儿合影。



1998年元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白智清写的书《冷眼看中国》。白智清在书中，作了自我介绍：

“本人白智清，曾是1976年初被公安部通缉的‘现行反革命’。在1980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记录中国‘四五运动’的文集《丙辰清明纪事》中，有一篇沈世鸣同志专写我的文章《巴山蜀水杜鹃红》。这篇文章较详细地介绍了我从一个技术员变为‘反革命’的经历。

笔者是成都人。成都平原因为有都江堰灌溉之利，无旱涝之忧，光、热、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物产丰盈，号称‘一碗泥巴，一碗饭’的天府之国。……但是，1960年冬天，在那叫苍天落泪、江河呜咽的大饥荒、大灾难、国家人民备受大饥饿煎熬的岁月中，有几个中国人和中国家庭没有让人不堪回首的心酸事？……

在十年浩劫中，当我听见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时，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当我听到小平同志那‘一切围绕四个现代化转’的讲话时，我全身的热血顿时沸腾。

1974年，当‘四人帮’丧心病狂地迫害周总理，破坏刚刚有了一点起色的国民经济之时，我以‘心赤客’为匿名，投出了数封鞭挞‘四人帮’的匿名信。为此，被公安部列为‘心赤客反革命案件’（匿名信现存公安部）。

我拥护邓小平同志的让国家见到一线生机的整顿，仇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在周总理逝世、邓小平挨批的1976年2月18日和3月4日，我写上真名实姓，在重庆和成都公开刷出了点名批判‘四人帮’、保卫邓小平的大字报，由此被‘四人帮’指令公安部全国通缉，被数十万人批斗。”



四川人民欢庆粉碎“四人帮”

恶到极时终有报。

天理昭昭，“四人帮”终于被粉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尘埃落定，被“四人帮”残酷迫害、并欲使其“死无葬身之地”的邓小平，终于第三次复出了！茫茫蜀乡大地又迎来了高照的艳阳。

蜀乡人尽情欢歌，兴高采烈地唱出了“太阳出来喜洋洋”。他们对邓小平更加崇敬爱戴，也更加深了对“四人帮”的理性认识——这是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邓小平才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有永不衰竭的喷涌着战斗豪情的博大胸怀，他历挫折而不沉沦，经磨难而能奋起。这



成都街头各界群众欢呼：“打倒四人帮”！

正如很多蜀乡人都知晓的、被马克思称为“现代哲学的鼻祖”培根（Bacon）曾经说过的那样：“世情如酒，使人越喝越醉。一种人志向高远，虽经世事磨难，人情愚弄，累遭困顿，却愈战愈精。困厄反成了奋起的动力。”



四川人民群众集会游行，批判“四人帮”。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作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

浩荡的春风已将蜀乡和整个神州大地上空的阴霾彻底扫去。

白智清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在他的书中写道：“我感到高兴，我感到惊喜！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我——甘愿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勇蹈地狱之门的中国人，我感到了中国的政策正在变化，经济正在好转。”

当邓小平在磨难的时候，同乡人与他心心相印，关注着他的命运，勇蹈地狱之门；当尘埃落定、邓小平开辟了改革开放的航道以后，千里川江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雄浑激越的川江号子唱出了“高兴、惊喜”的欢歌。

这就是蜀乡人对同乡邓小平的情结。这种情结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里人”，而是在特殊的年代铸就的特殊情结。

四瓶成都大曲酒提到 在江西蒙难的小平手中

为见小平大哥，二妹和三妹夫 成都约定“暗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联合摄制的电视片《邓小平与四川》摄制组，2003年8月在北京采访邓小平的二妹邓先芙后合影。

笔者在一次采访邓小平的二妹邓先芙时，因为时间不够的原因，没有能够涉及到有关她托三妹夫栗前明少将，给蒙难中的小平同志带四瓶四川酒去江西这件事。



过了一段时间，当她从海南岛回到北京西直门寓所以后，笔者与她联系，准备再一次采访她。她同意接受采访，提出采访地点改在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北京

办事处龙爪堰宾馆——一个被不少四川人称为“小钓鱼台国宾馆”的地方。由于从西直门到龙爪堰，就是从北京市西北角到市郊东南角，基本上绕了大半个北京城，距离太远了，笔者便提出，到时候找个车去接她。她说：“我比你更熟悉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我自己来。”

当时的北京正是溽暑蒸人、挥汗如雨、气温高达摄氏39度的日子。笔者在四川驻京办事处大门口迎接、等候她时，门卫见我热得不行，就把他用的电风扇对着我吹。

超过了约定时间近一个小时，邓先芙才坐一辆连空调都没有的、早就应该淘汰的车子到了大门口。她手上拿了一把四川竹扇摇个不停，汗水几乎湿透了她的全身。笔者感到很过意不去，她却反而表示歉意：“对不起，你等久了，路上几个地方都大堵车，汽车又抛锚，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这就是邓小平的妹妹！

我原来猜想她即使不坐高档车，起码也是中档车，结果……

笔者向她道歉：“邓婆婆，看把你这位七八十岁的老婆婆热成这个样子，晚辈心里怎么好受！”

她却说：“家乡人，莫要说那些哟！我习惯了。等一会儿，我再给你摆小平大哥穿件洞洞眼眼的烂汗衫，大热天在江西给我煮饭炒菜，也是热得不行的龙门阵。”

正式采访以后，笔者问邓先芙：“听说1972年，小平同志还在江西蒙难时，你的妹夫栗前明少将，从成都你家里带了几瓶五粮液给小平同志？”

邓先芙说：“那个时候，哪里有啥子五粮液哟，是成都大

曲，我都是存了多久才存起了的。那个年代物资欠缺，买啥子东西都要凭号票，买酒也要酒票，每个人只有二三两酒。我知道大哥爱喝酒，可是他到江西蒙难又找不到酒喝。我就在成都到处找朋友、熟人要酒票。人家本身也是只有二三两酒，但听说我要给大哥邓小平带酒去，他们也就很大方的把酒票给我，说：‘小平同志现在是蒙难了，被奸臣整了。我们盼望、我们也相信，小平同志会重新出来工作、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当我存上四瓶酒以后，我的妹夫栗前明恰好从天津到了成都，说他还要去江西出差，主要目的还是他自己想看大哥小平。我便把这四瓶成都大曲酒像包啥子宝贝东西一样，用软布、棉花、纸壳包了一层又一层，绑了一次又一次，托栗前明带到江西去。”

古人说：“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

邓先芙托栗前明提上四瓶成都大曲酒，从成都送到在江西蒙难的小平同志手中，其意义并非一般。

为了搞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笔者又按照第一次采访邓小平的三妹夫栗前明少将给的电话号码，又一次和他联系上，再次采访了他。

见了面，笔者对栗前明少将说：“栗少将，上次你讲是从成都带了五粮液到江西给小平同志，但邓先芙二姐又说是成都大曲酒。”

栗少将解释说：“二姐邓先芙怕我把带给小平大哥的酒不小心碰坏了，便包了一层又一层。我不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酒。加之我不会喝酒，把酒从成都提到江西小平大哥手里时，大哥说‘先芙又给我带家乡的好酒来了’。我想四川的‘好酒’，应

该首推五粮液，所以上次就给你讲我提了四瓶五粮液到江西。”

在邓先芙和栗前明共同回忆下，带四川酒到江西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便一清二楚了。

小平同志在江西蒙难的时候，憨厚老实的栗前明与妻子邓先群在天津七机部七院七所工作。夫妻俩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同学，毕业分配以后结为伉俪。邓小平被打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时，栗前明、邓先群受到株连，没有少受苦。栗前明1972年能够出差到江西，那是因其时政治气候起了一些变化，蒙难的邓小平日子稍微好过一些，受株连的邓先群、栗前明的日子也好过了一些。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机潜逃最后机毁人亡。这以后，被邓小平视为兄长和好友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原林彪把持的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也改由邓小平的亲密战友叶剑英主持。在这种情况下，仍在江西蒙难的邓小平被宣布“同意恢复组织生活”。

1972年4月，栗前明、邓先群夫妇给“恢复了政治生命”的大哥邓小平写信，提出先群妹妹将在9月生孩子，因生活拮据，无钱请保姆，希望先群生母夏伯根能从江西到天津照顾女儿，带带孙子。邓小平接信后，立即派小女儿毛毛送奶奶夏伯根于4



本书作者与邓小平妹夫、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原副司令员栗前明少将在北京合影。



月25日去天津。奶奶和毛毛到天津以后，栗前明、邓先群对于小平大哥的近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栗前明决心找个机会去江西看看小平大哥。

1972年6月初，机会来了。七机部七院的负责人同意栗前明和另一个同志到四川、湖北、江西等地出差搞外调。栗前明二人出差的第一站是成都。栗前明要向住在成都的二姐邓先芙和二姐夫张仲仁，讲邓小平大哥在江西的近况和妈妈夏伯根已经到了天津的情况。

邓先芙对笔者说：“栗前明到成都来以前，我才从西昌湾丘‘五七干校’回到成都，还是住在成都东城根街88号省档案局宿舍。小平大哥被打倒以后，我和原来在四川省档案局工作的丈夫张仲仁都受到了株连，因此，多年来凡是到我们家的人，我都特别警惕，不知道来人是不是又要找我们的麻烦。

有一天，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我便问：‘哪一个？有啥子事？’

结果听到门外回答：‘邓先群、栗前明。二姐，我是栗前明！’

我这才把门打开，看见只穿了一件汗衫的栗前明全身都是汗。他进屋后，我赶忙让他先洗个脸，退退凉。他一面喝水，一面给我和张仲仁讲，毛毛送夏伯根妈妈到了天津。他讲了毛毛和夏伯根妈妈谈的小平大哥在江西的一些情况，讲了他要去江西看大哥小平和大嫂卓琳。

我就把四瓶成都大曲酒托他给小平大哥带去，我还将大哥喜欢的四川汤圆粉子等也给大哥带去。

我给栗前明说，自己也想去看一见多年没有见到的大哥。如果他到了江西能见到大哥，而且如果大哥处境稍微好一点了，

我到江西去见大哥不会给大哥带来麻烦，就由栗前明马上给我发个电报来，电报就写两个字‘同意’；如果我到江西会给大哥带来麻烦，就在电报上写三个字‘不同意’。你看，我和栗前明就好像在做地下工作一样，把‘暗号’都商量好了。”

四川解放以前，邓先芙虽然年纪小，没有直接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但是和地下党组织有联系。她的母亲夏伯根就是因为掩护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同志，还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小小年纪的邓先芙，因此学会了一些从事地下工作的方法，当年她之所以能够知道刘邓大军快要打进四川了、能够知道刘邓大军的政治委员就是他大哥邓小平等等，都是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告诉她的。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也写道：“我和我的二姑姑邓先芙于1989年回了一趟广安。……我的二姑姑邓先芙，解放前夕的时候在念中学，当时和地方上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四川解放后，她进入西南局办的西南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一直从事机关的机要工作。她现在已退休，只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的职务。由于她长期在四川工作，人又是热心肠，又爱管闲事，一天忙于各项公益事业，所以四川的同志们都亲切地叫她‘邓大姐’或者‘邓娘娘’。她的丈夫叫张仲仁，曾任四川省档案局局长。我的这位姑父可真正是位实实在在的忠厚老实之人，不但工作勤勉，为人又勤快、又踏实，是我奶奶最喜欢的女婿。”



“小平大哥接过成都酒后说，只有你有条件 ‘大串联’，把一大家人串在一起了”

栗前明在成都“公干”结束，从邓先芙手里接过四瓶川酒和成都汤圆粉子等带给小平大哥的东西以后，和他们单位另一位出差的同志一道，先坐车到重庆“公干”。再乘船到武汉，他去武汉除了“公干”，更主要的是去找小平的亲弟弟邓垦（邓先修），看一看这位1937年参加革命，曾担任过重庆市副市长、武汉市副市长、湖北省副省长、因受株连也蒙难的二哥，结果没有找到。在路上耽搁了十几天，6月23日才到江西。

笔者便问栗前明这位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的原副司令员：“栗将军，从成都经过重庆、武汉到江西，你怎么用了十几天？”

栗前明少将作了解释。

原来，他是和本单位一位同事“因公出差”到四川、湖北、江西等地。而“因私”到成都看二姐邓先芙、到武汉看二哥邓垦（邓先修）、到江西看大哥小平，他都是背着与他一起出差的同事秘密进行的。虽然这个同事并不坏，但是在那个邓小平被打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年代，在那个“刘邓人还在心不死”、“刘邓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坚决和刘邓反革命修主义路线划清界限”的年代，在那个鼓吹“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人人自危的年代，栗前明生怕有个闪失，每到一地“公干”以后，他就把一起出差的同志，或者让他安排在招待所休息，或者让他参观当地的风景名胜。一直到他们两人出差结束回到天津，这位同行者一点也没有发现他“因私”的活动。



邓小平与胞弟邓垦（邓先修）

1972年6月23日，栗前明小心翼翼地提着四瓶川酒到了江西。他把同时出差的同志“安排好了”以后，一个人悄悄去找邓小平。

栗前明少将对笔者说：“既然小平大哥是‘全国第二号走资派’，六年来他一直没有人身自由；我们受了株连，也不会有自由。如果不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了，我连出差的机会都没有。虽然宪法早就规定有通信自由，我们就连通信这一点自由都没有。我们写给小平大哥的信，小平大哥写给我们的信，都要经过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秘书处转。林彪覆亡以前，江西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又是林彪的走卒。所以小平大哥派毛毛陪奶奶到天津我们家来之前，卓琳大嫂专门画了一张图，使我到了江西能很快找到他们。我到了江西以后，就真正‘按图索骥’，寻找小平大哥被贬谪以后具体住的地方。”

卓琳大嫂给栗前明画的图画得真好，栗前明一下子就找到了小平大哥的住地——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步

兵学校。

从1966年“文革”开始后，邓小平就没有见到过栗前明了。

六年后在江西与栗前明一见面，邓小平十分兴奋，但平时说话就不多的他，见面时只说了一句话：

“前明拢了（四川土话，‘到了’之意）！”

卓琳见到前明也十分兴奋，但她同时又责怪起这个妹夫：

“先群早就从天津写信给我们说你要来看我们，可是十几二十天了都没有消息。我还以为你掉到长江里喂鱼去了呢！”

全家人大笑的时候，栗前明把四瓶川酒给了邓小平：

“我到成都去看了先芙二姐，这是她带给你的四川好酒。我又去了武汉，想去看邓垦二哥，结果没有见着。”

邓小平接过酒后，说：

“先芙给我带的四川家乡好酒来了，真是太好了。前明，我们四川酒硬是巴适哟！你是河北人，可能不晓得‘川酒云烟’这句话。云南的烟草好，我们四川的酒好。”

把酒放好以后，邓小平对栗前明说：

“前明，红卫兵可以大串联，可是我们这一大家人，因为我连累了你们大家，毛毛她们三姊妹要想过一过当‘红卫兵’的瘾，都只能偷偷在家里戴一下‘红卫兵’的袖套，更没得‘大串联’的资格。我们这个大家庭，只有你一



邓小平与二妹邓先芙

个人有条件大串联，你看你把天津的三妹先群，成都的二妹先芙，武汉的二弟先修，特别是我那个残疾儿子朴方都给串联起来了。”

栗前明少将讲到这里，笔者向他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小平同志要说只有你才有串联的条件呢？”

栗少将作了说明。

原来，1933年出生的栗前明，父亲是老红军，母亲是“三八”式干部。1944年，他只有11岁时，一个四川人让他当上了“小八路”。他永远记得，这个四川人叫王文清，红军长征路过四川时参加了红军，后来到了陕北。

栗前明11岁时，王文清担任晋察冀边区抗日联合会主席。栗前明永远感谢这位把小小年纪的他引上革命道路的四川人。栗前明说他从不相信迷信，但是他和四川人是有缘分的——先是一位四川人把他引上革命的道路，后来他又和一位四川女子邓先群结了婚。

解放后，栗前明的父母一直在北京工作。“文革”开始后，妻子邓先群因受株连失去了人身自由。可他却因为有老红军的家庭背景，处境就比妻子好一些，凡是需要从天津去看当时在北京的侄儿邓朴方等人时，用上“回北京家里看我爸我妈”的借口，就能去了。

栗前明、邓先群夫妇与小平大哥一家的关系很不一般。

笔者在采访解放军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原部长、解放军中少有的几个女将军之一的邓先群时，她说：

“四川解放时，我14岁。小平大哥派了一个叫吴长友的警卫员到广安来接我们去重庆。吴长友这个人好像现在还在北京一



本书作者与邓小平三妹、解放军总政群工部原部长邓先群少将合影。

个生产电子管的厂里。我1950年从广安到了重庆以后，一直在大嫂卓琳的照顾下，因为小平大哥从来都很忙，没有时间照顾我。我先与邓林侄女一起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上学，后来才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从小到大，自己的一切，包括我和前明的婚事，都是卓琳大嫂一手操办的。我基本上是在小平大哥家里长大成人的。我与邓林、邓楠、邓榕三个侄女从小在一起玩。我和前明跟小平大哥、卓琳大嫂的关系就特别亲。”

栗前明少将说：

“侄儿邓朴方的小名叫胖胖，小时候与父母一起生活在四川重庆。在胖胖要上学之前，小平大哥请当时与他们住在同一栋楼的刘伯承元帅帮助取个学名。刘帅就用‘胖’的元音和辅音，给他取名‘朴方’，意即朴素、方正。小平大哥到北京工作以后，朴方先在北京市第十三中学读书，后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当朴方上大学四年级时，‘文革’开始了，小平大哥成为斗争核心。‘四人帮’之流试图从小平大哥的长子朴方身上拿到罪证，便对朴方进行批判、管制，先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后又把他打成反革命，进行各种残酷的迫害。1968年8月，朴方侄儿因不堪虐待、不愿再受凌辱，跳楼自杀时

·238·

摔成脊椎骨折。受伤后开始被送到北医三院。在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没有做手术，后来就送回北京大学校医院。因作为“第二号走资派”的儿子，不能及时得到治疗，最后作了高位截瘫。小平大哥给毛主席写了信，1969年才送到五棵松解放军三〇一医院治疗。这样，我便经常从天津到北京三〇一医院去看邓朴方。去的次数多了，就和他同室住院的另一位姓黄的因车祸致残的瘫痪病人认识了。

有一次我在天津接到黄姓病人的来信，说邓朴方已被‘组织上’派人从三〇一医院的病床上强行抬出去，听说是送到北京市救济院去了。

接到信的当天我就赶回北京，结果打听到北京市救济院在市郊、离市区很远的清河镇。

那是1971年春节前，天气很冷，我从西单骑自行车走了很久才到达。

在清河救济院，邓朴方住的是一个大屋子，里面挤着12个人。照顾他们的是同屋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儿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傻孩子。只有这两个人能走动，其余10个人都是不能动的。每天，邓朴方他们都要编纸篓，编一个得4分钱。后来，邓朴方还是想治伤，就一个人摇着手摇车，从清河摇到中南海去找‘领导’。穿上棉袄的他，摇了很长时间，才摇到中南海西门。他对门卫说：‘我想见一见领导。’门卫让他‘靠边站’。当然，他是不可能见到‘领导’的，最后还是被强迫拉回清河救济院了。

人们说，男人有泪不轻弹，当我在清河救济院看见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侄儿邓朴方时，泪水止不住就流出来了。朴方侄儿对我说他不想活了，我劝他：



邓小平与三妹邓先群

‘你要顽强地活下去，要像你爸爸一样顽强地活下去！’

眼看这样一个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大小便功能丧失的瘫痪的年轻人，竟不准治疗、竟被从三〇一医院给赶出去，我当时真是义愤填膺！

我和邓先群立即给小平大哥写信，报告了朴方侄儿的悲惨状况。

小平大哥收到我们的信以后，在亲笔写给汪东兴的信里（当时小平大哥不能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只能写给汪东兴）说：

‘我的妹妹邓先群最近去看了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现将她的信附上，……’”

栗前明少将对笔者说：

“我给你举出这一件事，讲这些例子，既可以说明我们夫妇与小平大哥的关系特别亲，还可以说明为什么小平大哥讲，只有我有条件把包括朴方在内的一家人串联起来了。”

栗前明少将讲到这里，把话题转到了笔者特别想听到的、他于1972年6月23日，提上四瓶川酒给了小平大哥以后，小平大哥还说了些什么话的内容上来。

栗前明少将说，他坐下以后，小平大哥赶紧给这位妹夫先倒水喝，然后亲自下厨房，说：

“前明是北方人，爱吃饺子，包点饺子，我再做点四川菜。”说着就拿盆舀面。

栗前明少将说：“我看见小平大哥为了欢迎我，不顾天气热，亲自舀面给我包饺子，我也就帮着去和面。可是由于我平时在天津时没有做过饭，都是先群弄饭弄菜。这一次在小平大哥这里帮着和面，又把水加多了，我就干着急，没有办法。小平大哥走过来，说：

‘不会弄，掺点干面就得行了。’

小平大哥穿了一件破了几个大洞的老头汗衫，虽然满头大汗，却熟练地切菜炒菜做饭，又让我饱餐了一顿他做的川菜。”

“小平大哥没按约定的‘暗号’ 发电报到成都，硬把我急惨了”

栗前明离开江西之前，告诉小平大哥说，二姐邓先芙也想来江西见一见大哥大嫂，并且交代了在成都与邓先芙商量好发电报的“暗号”——“同意”与“不同意”：如果小平大哥处境好一点了，到江西见大哥不会给大哥带来麻烦，就给她发个只



写“同意”两个字的电报去；否则，电报就写三个字“不同意”。

邓小平也急于想见一见已经六年没有见过面的二妹了，他叫小女儿毛毛马上去给二姑姑邓先芙发电报：

不要说啥子“同意”、“不同意”，电报上就写“速来”。

在成都的邓先芙接到电报一看，不是原来与粟前明约定好的“同意”、“不同意”的“暗号”，而是变成了“速来”。

邓先芙说：“小平大哥没有按约定好的暗号发电报到成都，硬把我急惨了，我也不知道小平大哥在江西发生了什么事，赶紧想法子买了四川牛肉干、苹果，连面包也买了不少。我要让蒙难中的大哥起码把肚子填饱。”

当时从成都到南昌的火车票很紧张，邓先芙的丈夫张仲仁好不容易才把车票给她买到。但是上了火车以后见车厢里挤满了人，邓先芙就在车厢里站了两天两夜，才到达南昌。这一次真把她累得不行，因为她提了两大包沉甸甸的东西。虽然累，但一想到很快就会见到大哥邓小平，也就觉得无所谓。

邓小平接到邓先芙离开成都前发的电报，知道她7月1日从成都上火车，3日到达南昌，便派小女儿毛毛去南昌火车站接邓先芙。

由于邓先芙和毛毛有六年没有见面了，原来16岁的毛毛这个时候已经22岁了，邓先芙在火车站几乎认不出“女大十八变”的毛毛了。

幸亏“二姑姑没有怎么变”，毛毛一下子就认出了邓先芙。

毛毛把邓先芙提的两大包东西接过手，带她去邓小平居住



1972年7月，邓先芙从成都去到江西看望蒙难的大哥邓小平时，与大哥、大嫂及侄儿飞飞合影。

的南昌步校。

邓先芙回忆说：

“我和毛毛到了南昌步校，看见小平大哥穿着满是洞洞眼眼的烂汗衫站在大黑门里等我，大嫂卓琳和侄儿飞飞也在迎接我。大哥见到我高兴得很，他说：

‘来了就先休息几天，我给你做点川菜吃。’

那几天正是很热的时候，因为快到‘小暑’了。

小平大哥满头大汗的，给我做红烧肉、做狮子头，他做的川菜确实很地道，但是他蒸馒头就差劲了——面粉没有发过酵，蒸出来的馒头硬邦邦的。看见我和毛毛都不吃硬馒头，他就说：

‘二妹，你晓得我在法国住了那么几年，让大哥给你做法国的面条。’

我劝阻他说：

‘大哥，你看你累得一身都是汗，你做的川菜这么好吃，就不要再忙了，这个南昌又硬是比成都还热得多。’

小平大哥说：

‘所以我喜欢成都，喜欢四川，喜欢我的家乡，二天退休了，我要回四川养老。’

卓琳大嫂看见大哥硬要去给我做法国面条，也劝阻他：

‘二妹又不是外人，端午节发的20个皮蛋你叫给二妹留着不能动，今天就拿出来给二妹洗尘。还有二妹托栗前明从成都给你带的四瓶四川酒，你说六年多了都没有喝到过这么好的家乡美酒了，便舍不得喝，这么多天过去了才只喝了两瓶，说要等二妹来了再喝。’

小平大哥还是不听劝，他说：‘二妹来了，我要让她吃安逸，一家人几年没有团聚过了，今天好好团聚团聚。二妹带来的酒，我今天肯定是要喝的。成都大曲酒很不错，比江西的酒好了很多倍。二妹，二天要是有机会，再给大哥带两瓶四川酒来。’

我回到成都以后，又买了八瓶四川酒，托人给大哥带到江西。可是，小平大哥在江西收到我带去的八瓶酒以后，不但没有表扬我，反而批评我，说我当时的工资低，不应该一下子就买八瓶酒，最多再买两三瓶。他对卓琳大嫂说：‘写信批评先芙二妹，太浪费了！一下子就买八瓶酒。’我收到第一封批评我的信不几天，又收到第二封信：‘再批评先芙二妹，太浪费了！’”

“我上峨眉不许封山。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一个四川省委书记工作变动， 三位中央副主席轮流谈话，可见 小平对四川的重视

1980年7月初，邓小平回到了四川。

四川和安徽，是中国改革之初的两块试验田，邓小平对此倾注了极大的心血。1979年底，改革初见成效，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调两省的第一书记赵紫阳、万里到中央工作，派谭启龙、张劲夫分别到四川、安徽主持工作。

谭启龙时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由于赵紫阳、万里的任职须经中央全会讨论决定，故他到四川的职务是省委第二书记。李先念代表中央征求其意见时会半开玩笑地说：“中央决定把你的工作变动一下，到四川去

做第二书记，对你是明降暗升，你有意见吗？”谭启龙欣然从命。

谭启龙入川前，邓小平特意把他叫到家里谈了一次话，给他传授了两条经验。

邓小平说：“四川的形势发展很好，发展很快。讲经验有两条：一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拨乱反正。包括过去曾经批判错了的东西，敢于纠正过来。另一条，是省委的领导经常



1980年7月，76岁的邓小平登上峨眉山。

到下面去，倾听群众呼声和意见，制定了符合实际、受群众拥护的政策。四川的情况，我了解不太多，看来主要是这么两条。紫阳同志还在那里，你去后，具体情况由他给你介绍。听说你也是很喜欢经常往下面跑的。多到下面去跑跑看看，确实好处很多。”

接着，邓小平又要谭启龙约张劲夫一起去看看叶帅，听听叶剑英的意见。

一个四川省委书记工作的变动，中央的三位副主席轮流谈话，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四川的重视。

现在半年过去了，赵紫阳已经离开四川，谭启龙干得怎么样？四川家乡有什么变化？邓小平急于想去看一看。

蜀道艰难，此时正值雨季，铁路线险情不断。1980年7月3日，西安至成都铁路线上，四川江油雁门斑竹园坝路段因山洪暴发，形成泥石流，冲垮了路基，淹没了铁轨。幸发现及时，铁路部门紧急征调800多民工突击搬运泥石，抢修路基，才使邓小平的专列安全准时通过。听到这个消息，谭启龙等省委领导惊出了一身冷汗。

当日，邓小平一行抵达成都。由于在此之前，中央警卫局已经打来电话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不迎送、不请客、不断绝交通。所以，只有一些工作人员把他们接进了金牛坝宾馆。

金牛坝宾馆地处成都西郊，占地300亩，是四川省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国宾馆。虽称国宾馆，条件却很简陋。偌大的园子，到处种的是红苕、水稻和蔬菜，住房是20世纪50年代的建筑，硬件与市内的大宾馆相比相差甚远。正因其自然气息浓厚，深得邓小平喜爱。每次来成都，他都住在这里，而且执意要住平房。

登峨眉是邓小平的夙愿

7月5日，在谭启龙的陪同下，邓小平乘火车从成都前往峨眉山。谭启龙正在主持召开研究贫困山区休养生息、陡峭山坡退耕还林问题的省委工作会议，对如何进一步放宽政策，扶持贫困山区的发展形成了一些想法，急于向邓小平讨教。所以，他抽出身来，坚持要陪邓小平同往。

登峨眉是邓小平的夙愿。建国初期他在西南工作多年，以后又多次来四川视察，都因事务繁忙，不能成行。1961年春，康生带着一帮文人在成都准备中苏两党会谈文件，中央让邓小平和彭真来主持定稿，几个人约定同上峨眉。谁知刚到山脚下，



中央突然来电话把邓小平召了回去，结果还是未能如愿。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他心情格外舒畅，表示要在山上住几天，登金顶，再顺道看看乐山大佛。

火车上，邓小平与谭启龙和接待人员约法三章，强调这次上峨眉，就是参观休息，不是视察，不谈工作。邓小平说：“不能因为我来了影响地方工作，影响别的游客。我上峨眉不许封山，大家都是游客，要一视同仁，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互不干扰。”

邓小平还说：“这次出来前就让中央警卫局通知地方，不搞迎送，外出不安排小轿车，一律乘面包车。这次在西安就是面包车，坐的人多，既热闹，又舒适、节约，目标也小。”谭启龙等表示一一照办。

到了峨眉火车站，果然只有打前站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滕和松带着一名导游田家乐和一辆面包车前来接站。邓小平一行没有休息，径直驱车驶向山林。正是从这一年这一次开始，中央领导同志外出视察工作，都一律由以前的小轿车改乘面包车了。

山行了十余里，峨眉清风扑面而来，山之门户“天下名山”牌坊已在眼前。邓小平无需别人介绍，一眼就认出了郭沫若的手迹，转身对家人说：

“郭沫若的字写得不错，书如其人，潇洒得很啊！”

进了山门，车便拐进了一所校园。田家乐介绍说：这是1965年从内地迁来的唐山铁道学院，1972年改建为西南交通大学，已有90年历史了。这个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中就有人参加了詹天佑设计修建的中国第一条铁路。由于行车无路，我们现在需假园而行。

邓小平闻之来了情绪，接过话头继续向大家介绍：这所学



1980年7月，邓小平在峨眉山。

校可出了不少人才。杨杏佛，江西靖江人，毕业后考入美国的哈佛大学，回国后与鲁迅一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蓝衣社特务杀害，鲁迅写的那首《悼杨铨》的诗就是悼念他的。竺可桢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他创立了中国的现代物候学。还有一个茅以升，中国的第一座钱塘江大桥就是他主持设计搞起来的。谁也没有想到，从来没有来过峨眉山的邓小平竟然会对这里一所学校的人才如数家珍。邓楠大声说道：“老爷子，干脆您来给我们当导游吧！”顿时，一车的笑声惊出了丛林中的几只飞鸟。

**“你们去检查，看与我们同进万年寺的
几百游客吃住问题解决没有”**

出校园，过龙门峡口，穿龙洞，便上了景区的土路，坑坑洼洼，颠簸得厉害。没走几里，车就熄了火。邓小平一挥手：正好，我们下车边走边看。没走多远，树丛中突然钻出一群在



1980年7月，邓小平在峨眉山与当地教师亲切交谈。

山上实习的四川林学院的大学生。学子巧遇伟人，呼天号地兴奋不已，连忙采来山花献上。邓小平亲切询问：山上的生活很艰苦，和城市大不一样，你们习惯吗？几个学生抢着回答：“要是能在这儿搞一辈子，我们都乐意。这个世纪仅峨眉山就发现了一千多种新植物，大有搞头呀。”邓小平连连点头赞许，由衷地说：大自然是不同寻常的课堂，也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啊。

车到了双水井，就没有路了。此地是峨眉北坡，与城区相对高差1900多米，气候潮湿，云雾缭绕，似云中小岛。这里离金顶，还有10公里。昨晚一场暴雨，山上一片泥泞，尤其是从这里到雷洞坪一段，原本就是用小木棍横铺成的险路，经雨冲和游人践踏，早已泥滥如羹，无从落脚。乐山地区和峨眉县的领导闻讯赶来，力陈山路险情，极力劝说邓小平暂时放弃登顶。邓小平感谢他们的好意，一一握手后，便催促他们赶快回去，

不要耽误了工作。然后，他独自走向一边，思考着计划。此时，云海滚滚，林涛阵阵，已是人在云中，不见地面了，人们都在等待邓小平的抉择，谁也不敢轻易说话。

邓小平沉思片刻，突然问道：“这里有多高？”

田家乐答：“海拔2355米。”

“比黄山高吗？”女儿邓楠明白父亲的心思，连忙抢答：黄山最高处也不过1800多米，峨眉比它高三分之一，就是这里也比黄山最高处高500多米呢，比您去年爬的高多了。邓小平听了笑了笑，摇着头说，那好吧，今天我就不上金顶了，你们姐妹俩上去。说完，他又叉着腰不服气地大声说：三年后再来，我一定要登上金顶。

听到这话，谭启龙和警卫人员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决策已定，邓家便兵分两路。邓林、邓楠向金顶冲刺，邓小平夫妇则带着孙儿孙女坐车下到净水乡，然后从桂花场穿“峨眉大断层”，过青杠坡、珍坪，徒步攀四公里陡坡，直至夕阳西下，才抵达“白水秋风”的万年寺。

万年寺是峨眉六大古寺之一，始建于公元4世纪。初称普贤寺，到了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为庆祝其母70寿诞，在此修了一座无梁殿，题额“圣寿万年寺”，便改称万年寺。万年寺历来香火很旺。寺内红叶如醉、丹桂飘香、琴蛙和鸣，堪称峨眉绝景。寺内住持宽明和尚以最高礼节将邓小平恭迎入行愿楼，献上一盏峨眉名茶竹叶青，并准备了一席别具特色的晚餐：四川豆花、红烧雪蘑芋、苦笋酸菜、红椒嫩姜，个个菜鲜美可口，使邓小平食欲大增。当晚，下榻寺内巍峨宝殿客房。洗漱完毕，已近10点，邓小平突然想起一件事，叫来了随行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孙勇和四川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毕清林，吩咐道：

“傍晚我们进万年寺时看见有几百游客，这么多人，吃住问题解决没有？请你们去检查一下，千万不能因为我们来了把人家赶出去。”

孙勇和毕清林随即叫上寺内的管理人员，打着手电筒四周巡查了一遍，了解到留宿的320多名游客均吃了大锅面条，租了凉席睡下了，便回来如实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这才放下心来，安然入睡。

“使不得，老太太快起来，我俩同岁是老庚”

次日上午，邓小平游览了万年寺后便下山前往另一景点



1980年7月，邓小平在峨眉山万年寺。

“双桥清音”。两地相距3公里，高差150米。这一路与昨日截然不同，大多是苍苔满阶的红砂石板下山道，走起来松软、清爽、适履，加上山清水秀，风景如画，凉风习习，令人心旷神怡。正值旅游旺季，游人摩肩接踵，往来如织。游人中有人认出了邓小平，便主动过来打招呼、祝福，警卫也不阻拦。邓小

平春风满面，时而向游人挥手致意、拱手答礼、合影留念，时而走向路边的药材摊，与药农们攀谈，不知不觉就过了象牙坡、功德林，来到了白龙洞前。警卫人员搬来两个草墩子，劝邓小平夫妇稍事休息。卓琳见两旁陡峭山坡上的一块块玉米林，打趣道：四川农民真勤劳，把庄稼都种到天上了。邓小平抬头看了一眼说：有啥子好嘛，这叫“大字报田”，长得稀稀拉拉，会造成水土流失的。人在上面种地，摔下来更了不得。小谭（谭启龙）呀，我看不要种粮，改种树吧。

谭启龙见机行事，连忙摊开《峨眉山风景区总体规划图》向邓小平简单汇报退耕还林的计划和实施情况。当听到峨眉山第一期退耕还林已有2500亩时，邓小平高兴地说：对头，风景区造林，要注意色彩搭配，就像人穿衣一样。林子下面可以种茶，四季常绿，还有经济效益。种黄连也可以嘛，何必非要种那几棵玉米？

这时，迎面走过来一群到峨眉山进香的老太太，有人认出了邓小平，连声高喊：邓大爷好，邓大爷好。邓小平连忙起身致谢。突然，一位老太太冲向前来，对着邓小平扑通跪下，口中念念有词：邓大爷，你才是活菩萨呀！

邓小平连忙双手将老人扶起：使不得，使不得，老太太，快起来，你老高寿呀？老太太答：76岁。

邓小平开怀大笑：好啊，我也76，我俩同岁，是老庚呀。老人家，日子过得好吗？

老太太乐不可支地说：比以前好多了。现在政策好，大干大发，小干小发，得你的福喽。

邓小平连连点头：好、好、好。



领袖和人民无拘无束融为一体， 峨眉美景又添亮丽风景线

中午，邓小平来到素有峨眉山十景之胜的清音阁。这里后枕牛心岭，左倚龙升岗，右靠钵孟峰，黑龙江、白龙江绕牛心岭分左右而出，水击牛心，浪花飞溅，如碎玉落珠，水流谷底，声如琴韵，依山势跌落。楼、阁、亭、台，依次序列，与邻近的延福寺、广福寺、白龙峡、黑龙楼、一线天、九桥十跨，组合成纵横3000平方米的山野佛寺园林胜境，宛如立体的画，有声的诗。邓小平完全被这幅美景陶醉了。他流连忘返，足足呆了两个多小时。邓小平的到来，使游客们兴奋不已。清音阁内，数百群众自发地夹道欢迎，齐声高呼：“欢迎你，敬爱的邓副主席！”成都308厂的一对夫妇刚与邓小平合影后，立刻就近冲出底片，四处奔走相告：“我见到邓小平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我们曾经下放云南支边8年，今天有了幸福生活，打从心里感谢邓小平。”

就在这画一般的美景中，领袖和人民无遮无拦、无拘无束地融为一体，给峨眉美景又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直到日光渐西，邓小平才念念不舍地告别游人，沿宝砚溪、种玉溪幽谷走下山去。太平桥边，邓小平感慨地对谭启龙说：峨眉山是一个文化型的风景区，要好好保护，要做好规划，要合理开发，综合开发，加强管理。傍晚，邓小平住进了峨眉山脚下的红珠山宾馆，并与从金顶下来的邓林、邓楠会合。红珠山宾馆是抗战时期蒋介石、宋美龄的行宫，环境十分优雅。两天来，邓小平在峨眉山往返130多公里，但他毫无疲劳感，身体舒适，精神

愉悦，对峨眉美景赞不绝口，表示要在这里多住两天，再去乐山看看大佛。谁知，老天不遂人愿。当夜，成都方面传来气象消息，近日峨眉地区会有一次大的降雨过程。成昆铁路地形险恶，隧道奇多，一旦山洪暴发，塌方、泥石流等将接踵而至，铁路线随时都有被淹没、冲垮的可能，到那时，邓小平就将被困在峨眉。为



1980年7月，邓小平在峨眉山游览。

了保证安全，中央办公厅和四川方面都力劝邓小平迅速离开峨眉。万般无奈，邓小平再次服从了组织安排，很不情愿地于7日上午9时乘火车返回成都。

对邓小平来说，要做到绝对的休息是很难的。这不，在返蓉的列车上，谭启龙就向邓小平汇报他上任半年来下乡调查研究及对四川工作的一些体会。谭启龙说，四川的农民负担太重，生活穷困，省委正在开会讨论加快发展山区经济的政策，准备拿出10万吨粮食，首先用于减免长期缺粮队的负担，不征过头粮，山区实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发展多种经营，让农民休养



生息。邓小平非常赞成，鼓励谭启龙解放思想，大胆地放手干，给全国的改革树立榜样。谭启龙乘机提出，这次参加省委工作会议的同志大多来自边远山区，很少见到中央领导，迫切希望能与小平同志见上一面。邓小平笑着说，见见面是可以的，但话就不讲了。你们的想法很好，就大胆地干吧。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主任、研究员龙平平）

“不要老让人家觉得我们四川人是土包子”

“不要老让人家觉得我们 四川人是土包子”

笔者写作《小平蜀乡情》，一直得到小平同志的二妹邓先芙的鼎力相助。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和《文革岁月》中是这样评价她的：“二姑姑邓先芙是在我妈妈的‘领导’下长大的，她的工作，她的婚事，都是我妈妈安排的。她的两个孩子，生下来后都是放在我们家，由奶奶和妈妈带大的。直到‘文革’爆发，家里的情况越来越坏，妈妈才让我把两个幼小的弟妹送回四川。”“她是个热心肠的人，又爱管闲事，一天忙于各项公益事业，所以四川的同志们都亲切地叫她‘邓大姐’或者‘邓娘娘’。”

笔者十分赞同毛毛对邓先芙的评价——她的确是个热心肠的人。当然，笔者属于晚

辈，不能妄称她“邓大姐”，而是发自内心尊称她“邓娘娘”。她多次对笔者说：“你这本《小平蜀乡情》的选题，我觉得很好。小平大哥的家乡情结我是相当了解的。我原来在四川省委工作时，不管‘文革’前、‘文革’后，大哥每次回四川，多数时间我都奉省委的指示去陪。我的两个孩子出生不久，也按小平大哥的要求，送到北京，一直在小平大哥家里长大。我退休到北京去生活以后，和大哥相处的日子就更多了，对他思念四川家乡的情况也就更清楚了。你要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只管问我。我还可以找妹妹邓先群，侄女邓林、邓楠、邓榕她们，我们会帮助你把这本书写好，写真实。”

笔者曾在“邓娘娘”家里向她提过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小平同志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说的‘不要老让人家觉得我们四川人是土包子’这句话？”

邓娘娘说：“那是1980年7月初，小平大哥在成都金牛宾馆

1980年7月，邓小平在成都金牛坝与四川美术界人士合影。



讲的。这一次随大哥一同回川的，还有大嫂卓琳，母亲夏伯根，侄女邓林、邓楠和孙子孙女。大哥在金牛宾馆每一天饭后都要散步，每一次散步，他都要我这个最熟悉四川情况的人去陪。

有一天，小平大哥午休后，我陪他去散步，路过金牛宾馆的一个建筑工地时，向他介绍宾馆正在扩建，修东、西楼。他问我要修多高。我说，四川一般都是修三层高。

他听后说：‘太矮了嘛！既然修新楼，就要多修几层，还要安装电梯。金牛坝这么宝贵的地，咋个才修三层喃？所以我听见有人说我们四川人是土包子。’

第二天，大哥带上我们全家老小，要与在宾馆作画的十几位四川画家合影。当我们一大家子走出大门时，大哥看见了在门口迎候他的四川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毕清林，便与他走到金牛宾馆的建筑工地，指着正在盖的新楼，对毕清林说：

‘你们盖的这座新楼，要修就多修几层嘛。今后，盖三层楼以上的都要装上电梯，不要老让人家觉得我们四川人是土包子。’

小平倡议组建四川省诗书画院

邓先芙谈起小平同志与十几位四川著名画家合影的事，我便问起她有关小平同志倡议组建“四川省诗书画院”并亲自题写院名的事。

邓娘娘说：“我昨天刚从北京回川，过几天，我带你去见一位小平大哥与四川画家合影时就站在他身边的巴蜀画坛泰斗，让他和我一起把你提的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几天后的一夜秋雨，把蓉城的尘埃荡尽。邓先芙打电话叫我去她的住地。我一进她的门，她就说：“已经联系好了，88



岁高龄的巴蜀画坛的泰斗岑学恭大师，在家里等我们。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你把这盒月饼帮我提起，我们去他家里。”

汽车在成都市西安北路一个公寓门口停下。我们上了楼、入得室内，一位精神矍铄、步履稳健的耄耋老人说：“欢迎欢迎！”

邓娘娘说：“这就是享誉中外艺林的山水画家岑学恭大师。他是徐悲鸿大师的入室弟子，是黄君璧大师的高足。从当代美术史来看，能受此两巨人同时力举的真是太少了。小平大哥很喜欢他的画，所以几张与四川著名画家的合影，小平大哥都要请岑大师在他的旁边。岑大师和我，已经在昨天把你了解的情况在一起进行了回忆。”

对巴蜀画坛泰斗岑学恭的大名，我是早已如雷贯耳。虽然笔者对画一窍不通，但知道岑大师不仅是三峡画派的创始人，而且他写嘉陵，画峨眉，描绘雪山、大渡河、九寨沟都具特色。今天能聆听他和邓娘娘两位长辈对笔者的答问，晚辈便认真作了记录。

1980年6月，小平同志回四川之前，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邀请了四川美术界岑学恭等十几位知名画家到金牛宾馆义务作画，用以布置宾馆的房间、会议室。小平同志一大家人在金牛宾馆下榻之后，十几位画家仍然在宾馆作画。小平同志的大女儿邓林，是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的。那时，正好她的老师黄永玉在成都办画展，黄永玉到金牛宾馆看望四川画家，就把邓林介绍给四川同行。邓林带着她的一儿一女，常和她在四川省委工作的二姑姑邓先美来画家们所住的五号楼串门，聊天，一起画画。

有一次由邓先芙发起，要画一幅“不管黑猫白猫逮到耗子就是好猫”的画。画家们在一起，坦诚相见，兴之所至，画了不少的画，真开心。

与邓林同处几天后，画家们觉得她和老熟人邓先芙一样没有架子，很随和，有一位画家便开玩笑说：“邓林，我们是决不对你爸呼‘万寿无疆’的。”

邓林听了连想都不想一下，便快嘴答道：“老爷子什么时候接受这种呼喊，他就什么时候完蛋！”

画家们对于能与他们发自内心尊敬的世纪伟人同住一个宾馆，自感幸运。便与老熟人邓先芙和同行邓林商量，想将已经画好的作品集中起来办展览，请小平同志来参观，向他作一次汇报。次日，邓先芙向画家们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小平同志要亲临展厅，看四川家乡画家们的画。画家们便又作出决定：每位画家为小平同志画两幅精品。

内部画展是不正规的。作品全没有托裱。有的挂在绳子上，有的就摆在会议室的拼木地板上，除了留下一条通道外，满满



1980年7月，邓小平观看四川书画家的书画作品。



的放了一屋子的画。

那天，小平同志在蓉的全家老小一齐来到展厅看画。他仔细地听了省里负责同志对画家的介绍和每一位画家对自己作品的介绍。他感谢画家送他的画并对四川国画的创作实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回到住的房间，小平同志对邓先芙说：“二妹，家乡画家送给我的这些画，都是上乘之作，是很值钱的，我不能剥削家乡的画家呀！应该付钱。”

邓先芙说：“人家是真心诚意送你的。你要是付钱给画家，他们肯定会生气。你再抽出时间专门去看望画家们一次，就比什么都重要。他们还都想和你一起照个相。”

在看望这十几名四川画家的时候，小平同志跟每一位画家亲切握手。他对老画家们了如指掌：岑学恭的三峡，冯建吴的峨眉山水，吴一峰的剑门雄关，阎松父的虎，周北溪的猴，幅幅栩栩如生。邓先芙和邓林又向他介绍了中青年画家的详细情况。

然后，小平同志说：现在，我们先找个地方，在一起照几张相作个纪念吧。

小平同志健步走到五号楼前通往礼堂的小桥头站着，对大家说：我在这个地方照相，就很好嘛。

接着他向摄影记者说：“今天照的这些照片，给画家们每个人都放成一大张一大张的，你还要负责送到每一位画家的手里。”

在小平同志亲自选景拍摄了多张合影照片以后，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对省委领导和十几名画家说，我们的家乡四川是个



1980年7月，岑学恭陪同邓小平观看四川画家的作品。

大省，书画家又多，应该建立一个“书画院”。

小平同志以其对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发展的深刻洞察力和对四川历史文化的精深了解，亲自提出了设立四川书画院的倡议。四川籍的其他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亦以同样的卓识远见，支持并落实了这一着意深远的重要举措。在书画院的筹办中，又吸取了时任国防部长的川籍上将张爱萍的建议，在定名上添加了“诗”字。小平同志亲自题写了“四川省诗书画院”的院名。1984年，以原省委书记杨超为院长的“四川省诗书画院”正式成立。

画院以“诗书画”冠名者，全国仅四川独有；以一代伟人邓小平题写院名者，举世独享。这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在小平同志的亲自倡议和支持下，实现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中国



美术现代转型的有力举措。

“四川省诗书画院”成立20周年时，《人民日报》于2004年9月5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小平同志亲自倡议和支持的‘四川省诗书画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画院史上又一个崭新的阶段，其重要意义在于，既在开放的形势下放眼世界，又自觉地将中国绘画的现代转型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它理所当然地昭示了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发展中国（包括发展中国美术）的正确道路。”

“到成都不去杜甫草堂，等于没到成都”

“到成都不去杜甫草堂， 等于没到成都”

1978年2月1日，小平同志第二次来到杜甫草堂参观游览。他第一次来杜甫草堂参观游览以后，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到成都不到杜甫草堂，等于没到成都。”那是20年前的1958年3月。

杜甫草堂位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是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故居。它具有1000多年的悠久历史。

现在的杜甫草堂，基本上保持了清朝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重修的布局，并将其东邻的梵安寺和西邻的梅园并入，组成一组纪念性园林，总面积达300亩左右。

草堂珍楠参天，梅竹成林，溪桥交错，亭榭穿插，诗情画意中更显出一派清雅，园

林景色更胜往昔。草堂的主要建筑有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祠和“少陵草堂”碑亭等。工部祠是奉祈杜甫的地方。祠前两侧厢房和诗史堂内陈列有纪念杜甫的大量文物、作品，主要有宋代至近代的各种杜诗版本和15种外文译本。工部祠东侧，是“少陵草堂”碑亭，系清代康熙第十七子果亲王允礼手书，游人喜欢在这里摄影留念。

1978年2月1日下午3时40分，小平同志到达杜甫草堂。他刚刚结束对友好邻邦缅甸的访问，从百忙中来到这里。

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五日，再过四天就是春节了。

春节前夕的杜甫草堂，翠竹森森，红梅冉冉，花径回廊，顿添春色。小平同志来到“杜甫诗意画陈列室”，仔细观赏了杜甫诗意画展览。这里展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叶剑英以及



1986年2月，邓小平与家人在杜甫草堂合影。

著名书法家谢无量、沈尹默等人书写的杜诗和知名国画家傅抱石、吴作人等根据诗意创作的国画。它们具有民族特色和不同风格，十分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人民疾苦的关怀和对当时社会离乱的控诉。诗与书画珠联璧和，更加使人流连忘返，品味欣赏。

小平同志仔仔细细浏览了叶剑英书写的杜诗名篇《前出塞九首》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两句和陈毅书写的集杜句联：“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后说：

你们这里的展出变化不大嘛！

接待的同志回答：“展出的内容这几年没有作大的调整。”

小平同志说：陈毅老总写的杜诗都还在哩！

在看近代思想家和著名学者章太炎写的杜诗《光禄坂行》时，小平同志问：“是什么时候写的？”

接待的同志回答：“是他早年写的，它是解放后我们在北京买到的。”

“这两个杜甫的像太胖了”

小平同志对《三吏》、《三别》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诗意画，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在“工部祠”，小平同志仔细端详了杜甫的两个像，一个是清代杜甫的全身泥塑像，另一个是明代杜甫的石刻像，然后说：

“这两个杜甫的像太胖了。当年杜甫生活那么艰辛，怎么会有这样胖。”

接待的同志指着旁边清代南熏殿石刻像说：“那个像瘦一点。”



小平同志说：“那个像接近真实。”

在“草堂书屋”内，小平同志极其认真地阅览了杜诗各种不同类型的版本，包括这里陈列的我国宋、元、明、清历代精刻本、手写本和解放后的铅印本。他还浏览了英、法、德、日、俄、罗、朝、越等15国外文译本以及研究著作120多种。这也充分说明，小平同志对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爱国诗人的肯定——杜诗不仅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对世界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小平同志对朱德、陈毅等领导人题签的、也是最早的（南宋咸淳年间）刻印杜诗，很感兴趣，还流露出满意的微笑。

在“少陵草堂”碑亭，接待的同志介绍说：“这是果亲王允礼手书的。”

小平同志说：“他是康熙的第十七子、雍正的弟弟嘛。”

接待的同志对于小平同志知识面之广、记忆力之好十分佩服。

“盖碗茶和薛涛干都是四川特产， 四川的名小吃过去集中在一条街上”

小平同志经“盆景园”，穿过“花径”，兴致勃勃地来到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到草堂、而特地开辟的“毛主席来草堂”和“毛主席诗意图”陈列室参观。

这里陈列的有毛泽东主席1958年3月7日视察草堂时拍摄的三张巨幅照片。其中，有毛泽东在当时的“杜诗版本陈列室”阅读杜诗的情景。毛泽东曾在这里对杜诗作了这样的评价：“政治诗！”

小平同志观看了陈列在玻璃柜内毛泽东翻阅和圈点过的12部杜诗等书，特别对其中的一部英文版《杜诗》进行了认真阅览。

小平同志对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郭沫若、周建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知名书法家书写的一张张毛泽东诗词，以及著名国画家精心绘制的一幅幅具有崇高意境和磅礴气势的毛泽东诗意图，表示十分赞赏。他还问道：

这里的陈列，是什么时候增设的？

接待的同志回答：“是前几年才新增辟的。”

小平同志听了显得非常高兴。

当小平同志看见沈尹默书写的毛泽东主席诗词时，用赞扬的口吻说：

沈尹默是当代有名的书法家。

在接待室里，小平同志一边喝茶一边品尝薛涛干，一边说：

“盖碗茶和薛涛干都是四川特产。过去，薛涛干还要硬一点。”

说着，他招呼与他同行的外交部的同志：

“大家来尝尝吧！四川的名小吃，过去集中在一条街上，以后在一定时间内要恢复。”

“成都和灌县可以连起来，20美金一个客位”

在参观过程中，小平同志曾十分关切地问：

“‘文化大革命’中，这里没有受到冲击吧？”

接待的同志回答：“这里文物保存完好，没有遭到破坏。”

小平同志听后，非常高兴：“你们的园亭，保护得很好嘛！成都的文化古迹，主要是参观杜甫草堂。我20年前来这里看了以后，就认为到了成都，如果不来草堂，就等于没有到成都。”

谈到成都开放时，小平同志说：“成都和灌县可以连起来，去游览可以乘汽车，也可以坐直升飞机去嘛，20美金一个客位。票贵一点没有关系，人家有钱，就怕你没有直升飞机让人家坐。”

稍事休息后，接待室的同志送来了笔、墨和题词簿，请小平同志为毛主席来草堂题词。

小平同志欣然提起笔问道：“题啥子？”

接待的同志说：“毛主席来草堂文物陈列室。”

小平同志又问道：“写横的吗？”



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在杜甫草堂题词：“毛主席来草堂文物陈列室”。

“写横的。”接待的同志回答道。

小平同志运着如椽的笔，题写了十一个苍劲挺拔的大字。

接着，草堂的工作人员又送来了另一本题词簿，再次请小平同志题写了“毛主席诗意画”几个大字。

在场的人都十分佩服小平同志那精湛的书法艺术和字体的独特风格。

临行前，接待同志请小平同志观赏接待室后面，

中式客厅墙壁上悬挂的由朱德、董必武、徐向前、周建人四位领导人书写的四幅毛主席诗词手迹，小平同志看了不断点头赞许。

这时，一位省委负责同志说：“请邓副主席给草堂写张条幅吧！”

小平同志十分谦逊地说：“我的字写不好。”

卓琳同志开玩笑说：“他的字，是二百五。”

接待的同志说：“你写的‘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和‘重庆日报’都很好。我们把纸准备好，送去请你写吧。”

省委负责同志说：“你们送去吧。”

小平同志听后，脸上露出了愉快的笑容。

“这位就是参加布置人民大会堂 四川厅的老花工”

小平同志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关心人民疾苦等优良作风的种种传说，早已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开来。他到达成都的消息像春风一样，立即传遍大街小巷。人们都希望能一睹这位在中国政坛上几起几落的伟大人物的风采。

当小平同志刚进入草堂的大门，就被游园群众发现，顿时全园一片欢腾，人们奔走相告。大家自发地夹道排队，热烈鼓掌欢迎，并不断发出“欢迎邓副主席”和“邓副主席好”的欢呼声。

小平同志神采奕奕、和蔼可亲，微笑着向两旁的欢迎群众不断挥手致意，极为生动地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

在接待室休息过程中，小平同志的二女儿邓楠领着草堂的老花工李忠玉来到小平同志身边，并向他介绍说：

“这位就是草堂参加布置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的老花工。”

李忠玉向小平同志问好。小平同志像对待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和李忠玉握手。这位在旧社会当牛马、做奴隶，干了大半辈子活，自己和一家人却吃不饱、穿不暖的“花儿匠”，在新社会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亲切关怀，此时此刻，他真是百感交集，说不出话来。小平同志还询问了草堂的一些情况，大家看到小平同志亲切的态度，平易近人的作风，就像同亲人聚合一样，彼此都无拘无束地进行着交谈，气氛非常融洽。将近5点钟，小平同志走出接待室，通过“毛主席来草堂”陈列大厅的人群夹道，十分亲切地抚摸着站在欢送行列中两个小女孩的头；她们四只大眼睛放射出幸福的光芒，良久地凝视着邓爷爷。小平同志跨出大门，和欢送的群众频频致意，挥手告别。



1978年2月1日，李谊（右一）陪邓小平参观杜甫草堂“杜甫诗意画”陈列室。

大家望着那远去的汽车，依依不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以后，小平同志于1980年、1982年和1986年，又三次来到杜甫草堂参观游览。

（本文由杜甫草堂当年接待小平同志的李谊与吴后权合写）

“武侯祠有些塑像对四川人太不公平了”

读史使邓小平知孔明 首称四川为“天府”

邓小平的蜀乡故里，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物华天宝，钟灵毓秀。历代蜀人利用“蜀江水碧蜀山青”的自然条件，前仆后继，辛勤耕耘，顽强拼搏，创造了“天府之国”的历史文明，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闻名遐迩的成都武侯祠，是纪念“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祠堂（诸葛亮生前封“武乡侯”，死后谥“忠武侯”，故名）。

邓小平先后5次游览了武侯祠。

小时候，邓小平最喜欢读罗贯中展示三国历史画卷的小说《三国演义》。年纪稍大一些，他就反复阅读《三国志》。《三国志》是西晋史学家、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陈寿（公元233~297年）所著。邓小平知道，



成都武侯祠

陈寿在晋灭吴后，集三国时官私著作，考订异同，考核史实，在编了《蜀相诸葛亮集》24篇后，写成了取材谨严、头绪清楚、文笔简明的历史名著《三国志》。《三国志》和以前的《史记》、《汉书》，以后撰写成的《后汉书》，合称《四史》。南朝宋时史学家裴松之（公元372~451年），又奉宋文帝之命注《三国志》。裴松之博采群书200余种，以大量史料，大大丰富了《三国志》。二者形成一个整体，成为后人了解三国历史的最主要的依据。

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我们家的藏书，什么都有。中国历史方面的，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文革”开始后，邓小平在江西蒙难，最初没有把所有书籍运去。后邓小平写信给中央周恩来、汪东兴等人：“书籍没有来。”以后，包括《三国志》在内的《二十四史》等“差不多全部书籍终于运到江西”。毛毛写

·274·

道：“一本本新旧不一的书呈现在眼前，这是千里迢迢从北京运来的书呀。有了书，生活的内容，顿时增加了不少色彩。”

邓小平对于《三国志》、《三国演义》里面的人物、故事非常了解，可以说是烂熟于胸。《三国志》、《三国演义》中一些提供封建社会战争的有价值的研究材料，具有辩证法因素的战争事例，对于邓小平在长期革命战争生涯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起到了一些借鉴作用。比如，《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注意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用不同的战术解决不同的战役。《三国演义》写战争，不是千篇一律地写双方对阵，而是写出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的千变万化，各有特色，反映了战争的矛盾特殊性，和解决矛盾的战略战术的多样性。“火烧赤壁”、“水淹七军”，一是火攻，一是水攻，采取两种不同战术，都是根据天时、地形和特定的具体战争条件决定的。再比如，曹丕发大兵50万五路并进，攻打蜀汉，引起全国震惊。由于诸葛亮善于具体地分析实际情况，了解每一路将领的才能、特点，以及他们内部矛盾的关系等等，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和措施，终于化险为夷。而马谡奉命主守街亭，不是具体分析街亭的攻守形势，敌我情况，作出切合实际情况的战斗布置，却不用脑筋地背诵古兵法上的公式：“兵法云：‘凭高视下势如劈竹’，‘孙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照书本上的公式画瓢，作出违反实际情况的错误决定，结果街亭失守，破坏全局的战略部署。

邓小平在阅读《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和《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时，进一步了解到诸葛亮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诸葛亮之所以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比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曹操



必败，这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经作了比较。

日理万机的邓小平5次到武侯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第一次称四川为“天府”的明确记载，是出自中国历史杰出人物诸葛亮之口。邓小平在阅读《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时知道，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一心想成帝业的刘备，三顾茅庐，找到英才诸葛亮出谋划策。诸葛亮在与刘备分析天下形势时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这里的“益州”，主要指的是今天的四川。当年刘备入蜀击败刘璋，便“自领益州牧”；刘备死后，又是诸葛亮“领益州牧”。

对于武侯祠的修建历史，邓小平也十分清楚。由于《三国志》、《三国演义》的记述、描写，千百年来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诸葛亮已成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青年时躬耕陇亩，不出隆中而知天下三分的“卧龙”先生，“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辅佐刘备、刘禅父子开创了蜀汉王朝。诸葛亮当政期间，励精图治，赏罚严明，推行屯田政策并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有利于蜀汉经济文化的发展；诸葛亮恪守仁义之道的风范，虚怀若谷的胸襟，淡泊名利的情操，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倍受后人敬仰，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封建社会里，人们把希望寄托于诸葛亮这样具有“谨慎”、“谦逊”、“严于律己”等个人品质的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身上。

邓小平知道，公元304年，李雄据蜀称王，就在成都南城修建了武侯庙。到了盛唐，“先主武侯同庙”，武侯祠与刘备的先主庙已结合为一体，成为成都的一大名胜景观。邓小平读过的杜甫诗中就有这方面的佐证：“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

祭祀同。”“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宋代，武侯祠被移到先主庙之西。明初，武侯祠与紧邻的“昭烈庙”（刘备祀庙）合并，祠门悬额“汉昭烈庙”，但是人们仍称为武侯祠。明末，武侯祠毁于战火。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重建武侯祠，奠定了其建筑规模：祠宇南向，沿一条中轴线修建大门、二门、刘备殿、过厅、孔明殿五重建筑。解放后，增设了“武侯祠文物陈列室”。

“这有个倾向，我认为应该把四川人放在前面一些”

1961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着重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问题。会后，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都前往各地对各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邓小平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等人陪同，离开北京，前往南方。邓小平一行途经上海、杭州、福州、广州等南方进行调查研究后，于2月中旬到达成都。在对四川各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以后，邓小平便与杨尚昆利用闲暇来到了武侯祠。

杨尚昆与邓小平都是四川人，杨尚昆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读书时就多次到过武侯祠，不过这还是第一次与邓小平一起到武侯祠。

被红墙环绕的武侯祠，殿宇壮丽，园林清雅，楼榭交错，柏树森然，碧草映阶，有一种宏伟古雅之气势。看到这些触景生情的邓小平，吟起了长期寓居四川的唐朝诗人杜甫的七言律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杨尚昆听到这里，立即与邓小平同声附和：“映阶碧草自



1986年2月，邓小平在成都武侯祠。

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邓小平问杨尚昆：你当年在成都读书时，是先读过了《三国志》、《三国演义》还是先到武侯祠来了以后才去读《三国志》、《三国演义》的？

杨尚昆说：“我是在当小娃娃的时候，先背了杜甫的这首《蜀相》诗，然后才看《三国演义》，再大了一点时才读《三国志》。到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来读书以前，我就决定自己到了成都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看武侯祠。”

谈笑风生的邓小平与杨尚昆，说着说着路过一座茶园。邓小平提议：

“这是地道的四川茶馆，我们到里头去坐一坐，喝碗盖碗

茶。咋样？”

杨尚昆说：“好，我们进去喝盖碗茶。在北京是喝不到这种资格的盖碗茶的。”

他们坐在竹椅上以后，茶馆一位老工人表演了精湛的、四川特有的“掺茶”技术。

喝过“盖碗茶”，邓小平和杨尚昆跨进二门，来到了正殿，看坐落在殿堂正中的刘备的塑像，又看了偏殿关羽和张飞的塑像。刘备殿前两侧排列着蜀汉“文臣武将”的塑像。邓小平和杨尚昆把塑像一个一个数了以后，知道共有蜀汉人物47尊。

邓小平问武侯祠的工作人员：“这些像是啥子时候塑的？”

“从唐代起就有一些塑像，但明末武侯祠毁于战乱，这些塑像是清初重建武侯祠以后，逐步塑的。”

邓小平反复看了这47尊塑像，然后对杨尚昆说：

我看清朝塑的蜀汉文臣武将，存在一个取舍不合理的问题，有的人物应该有塑像，却没有塑；不该塑的，却又塑起来了。比如，被刘备封为“扬武将军”的魏延，以勇猛闻名，累迁为征西大将军，东挡西杀近30年之后，为蜀汉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多次出生入死，冲锋陷阵，坚毅果敢，有勇有谋，常与黄忠、赵云比肩而立。曹操曾“招魏延归降”，但却遭到魏延大骂。论才干，论对蜀汉政权的贡献，魏延比蜀汉的第一员大将赵云都要高出一筹。所以，我认为就应该有他的塑像，但却没有塑。诸葛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也有错误，其中一个错误就是没有用魏延，当诸葛亮出师北伐时，正因为不采纳魏延“出奇制胜”的计策，而导致失败。塑像的人在为诸葛亮打埋伏。

邓小平走到张翼的塑像前说：张翼是犍为武阳人，就是现在四川彭山县人。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地位仅次于姜维，



被封为征西大将军等常设的高级将军，是蜀汉后期的主要将领。诸葛亮还佩服张翼不以个人进退为念，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姜维不顾连年出兵、国力疲弱的事实，又一意孤行要大举出兵，满朝文武只有张翼敢对姜维提出批评。后来的事实证明，张翼确有先见之明。张翼的像就不应该放在第三位。

尚昆呀，这有个倾向，应该把四川人放在前面一些才对，不应该讲老资格。孙乾的资格老，但是哪里比得上张翼的功劳？文臣廊的马良，则不应该因为弟弟马谡失街亭的问题，而放在倒数第二位，不能搞株连嘛！马良与诸葛亮以兄弟相称，马良还提醒诸葛亮要注意国中施政，用人问题。后来马良出使吴国，连孙权都敬重蜀国的这一位大使。马良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上也有功劳。

杨尚昆听后说：小平，你真把《三国演义》背熟了呀！

邓小平说：主要是《三国志》，这是史书，而《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

“刘备是儿坏孙子好，诸葛亮是三代都好”

1963年7月1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的声明：根据已达成的协议，中苏两党将于7月5日在莫斯科会谈。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由邓小平担任，副团长为彭真，团员有康生、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等。

在邓小平率团去莫斯科之前，经中央安排，代表团在四川等地考察了20多天。

1963年6月21日，邓小平一行30多人来到了武侯祠。进入大门，浓阴蔽日，清风徐徐，让人感到特别凉爽。第二次到武侯

祠的邓小平“反客为主”，主动为30多位同行当起了义务解说员。到达武侯祠大门与二门之间的碑亭时，邓小平说：东侧是唐朝时立的碑，叫唐碑；西侧是明朝时立的碑，叫明碑。你们看，唐碑和明碑东西相向。明碑不错，但唐碑更是文物瑰宝。这个唐碑是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建的。你们看它的全称是《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人们称它为“三绝碑”。为啥子叫“三绝碑”呢？因为这个碑，文情并茂的文章是由唐朝中期著名宰相裴度撰写，著名书法家柳公绰（柳公权的弟弟）书写，名匠鲁建镌刻。文章、书法和刻工皆绝，十分珍贵，所以就叫“三绝碑”。四川盆地气候潮湿温润，不利于碑石的保护，唐碑立起后，又战乱频繁，除唐碑外很多石碑都被破坏甚至被毁掉，但历经近1200年的这个“三绝碑”，却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实在是一个奇迹。

接着，邓小平介绍了历代碑碣50余通。

邓小平率领30多人跨进二门，来到“业绍高光”的刘备殿，看殿堂正中的刘备塑像和东偏殿关羽塑像，西偏殿张飞塑像。然后，邓小平说：

你们看见没有，刘备塑像东侧的像龕内，有刘备孙子刘禅的塑像，却没有刘备的儿子刘禅的塑像。这是为什么？等一会儿我要给你们摆这方面的龙门阵。

邓小平指着关羽和张飞的塑像评议道：在陈寿的史书《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可是，宋朝、元朝的统治者，却把关羽尊为“真君”和“武安王”。到了明朝、清朝，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又大大进了一步。自从小说《三国演义》把关羽描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关羽曾几次被封为“大帝”，



到处为他立庙，有的叫“武庙”，有的叫“关帝庙”，享受着跟孔夫子同样隆重的祭祀。义薄云天的关羽是“愚蠢的，可悲的”；而“诚贯金石”的张飞“倒可爱”。

下刘备殿，穿过武侯祠过厅，邓小平一行来到纪念诸葛亮的殿堂——孔明殿。

邓小平说：这里又叫“静远堂”，取意于诸葛亮的自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在诸葛亮的塑像前，邓小平说：这个诸葛亮的牌位名称不完整，完整的应该是：汉丞相益州牧武乡侯知事内外平北大都督诸葛先贤位。

接着，邓小平便对刘备和诸葛亮的家人进行评价：“刘备是儿坏孙子好，诸葛亮是三代都好。”

同行的一位年纪稍轻的人请邓小平讲详细一点。

邓小平便摆起了龙门阵：刘备的儿子刘禅，小名“阿斗”，真正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他信任宦官黄皓，朝政日趋腐败。后魏军迫成都，刘禅准备打开城门投降魏军。刘禅的第五子刘谌坚决反对，希望“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刘禅不听儿子的建议，坚决要献上玺绶向魏军投降。刘谌在刘禅投降之日，于昭烈庙中向祖宗痛哭一番后自杀。刘谌这种与国家共存亡的刚烈，一直受到后人的推崇和景仰。所以我刚才要你们看，刘备塑像后东侧，就有刘谌的塑像。在武侯祠，你们就找不到刘禅的塑像。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从小在诸葛亮“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加强自身修养、确立远大志向的言传身教下，逐渐成长为才华出众、尽忠尽职的军师将军，参与处理蜀国的军政大事。邓艾率18万魏军进攻蜀国，诸葛瞻督率诸军迎战邓艾。邓艾写信向诸葛瞻劝降。诸葛瞻将劝降信撕得

粉碎，策马冲向魏军，战死绵竹，死时只有37岁。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也与敌人顽强拼杀，同样在绵竹壮烈捐躯，死时还不到20岁。后人追思忠烈，在今绵竹县城郊，建有诸葛瞻父子衣冠墓。你们看，孔明殿诸葛亮塑像两侧就塑了他的儿子和孙子的塑像。所以我说诸葛亮三代都好。

同行的30多人除一个人之外，全都认为邓小平分析得有道理而同意他的观点；这另外“一个人”，就是康生。

康生把他的眼镜架扶了一下，对着30多人说：“拿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刘备的儿子孙子和诸葛亮的儿子孙子，都不好，因为他们都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成员。”

对康生的话，邓小平没有搭理。

和毛泽东“英雄所见略同”， 小平同样赞赏“攻心联”

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利用访问缅甸回到成都的机会，第三次来到了武侯祠。这一次，邓小平重点看了该祠的楹联。

邓小平对随行人员说：武侯祠的楹联甚多。浏览其间，品味揣度，是一种很好的文化享受。邓小平最赞赏的楹联，是清末赵藩撰书的“攻心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邓小平要武侯祠的工作人员向他们一行，讲解了“攻心联”诞生的历史：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闻讯后任命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岑春煊尚未入川，便急调与他有师生之谊的云南白族人赵藩到成都相辅。岑还未入成都就接管了川省军权，接着指挥官军和团练对义军展开了血腥镇压。岑不但派出大量军队，动



著名的武侯祠“攻心联”

员各地团练、乡勇追剿义军，同时还大量罢免、撤换、弹劾各种官吏，省内官场人人自危。就在这时，赵藩赶到成都，他向岑春煊建议实施“新政”，如开办各种新学，培养人才等。岑春煊即任命赵藩行“盐茶道”兼管“省厘金”，把当时省府中最重要的两大财源部门交他代管。但当时清廷的一系列巨变，以及赵藩所见的无官不贪、民间普遍的愤恨、各地的起义等情况，都将一个王朝穷途末路的特征暴露了出来。赵藩已从其中隐隐感到清王朝气数已尽，大“势”已去（这是“攻心联”中隐喻的“势”）。他认为岑对四川土著义军、对省内旧吏（也以土著为主）都过于“严”，特别是官军在简阳俘获义军领袖廖观音，押回成都斩杀后，便利用各种机会劝谏岑春煊。一次，得知岑不久后要陪客人游武侯祠，便精心写下了这副著名的“攻心联”，派人刊刻好后

送到武侯祠诸葛亮殿悬挂。

听完故事，邓小平说：1957年7月9日，毛主席在中央于上海召开的干部会议上谈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时说：“刘备得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

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邓小平接着说：第二年，就是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时，毛主席专门来到武侯祠，看了这里的楹联。毛主席特别赞赏“攻心联”。毛主席叫他的秘书、四川新都人田家英托人将武侯祠的楹联全部抄下给他。后来，成都市派人抄录并印成小册子送给毛主席。1972年，毛主席调刘兴元从广东到四川主持工作时，叫刘兴元去成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武侯祠看“攻心联”，叮嘱刘兴元到四川后“要好好治蜀”。

然后，邓小平带领随行人员，去看了他赞赏的另一副楹联“时艰每念联”：

“时艰每念出师表，日暮如闻梁甫吟。”

邓小平对武侯祠的工作人员说：“我刚才把嘴巴都说干了，要休息一下，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副楹联。”

工作人员说：“这一副‘时艰每念联’是清朝瞿朝宗所撰，由赵藩书写。但赵藩书写的已经遗失，由今人舒同补书。此联源自杜甫从阆中回成都后写的一首诗《登楼》，该诗除有‘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外，还有‘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两句。后两句是说武侯祠有先主庙，西有武侯祠，东有后主祠；《史记》注‘梁甫’为‘泰山下小山’，‘人君有德则封泰山’，梁甫比喻小人。‘梁甫吟’是乐府《楚曲调》名，相传诸葛亮隐居时，‘好为梁甫吟’。而此联的意思是说，每当时事艰难，便令人想起诸葛亮的《出师表》；日暮黄昏，仿佛听见诸葛亮在吟诵《梁甫吟》。”



“这样塑像，对四川人太不公平了”

1982年9月21日，秋高气爽，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来到了武侯祠。

邓小平和金日成在武侯祠大门口下车，街道两旁的游人热烈鼓掌欢迎。邓小平和金日成两位领导人也频频向群众挥手致意。

邓小平与金日成先来到了刘备殿。

武侯祠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尊刘备塑像高3米。”

金日成没有听清楚，用中国话问：“几米？”

邓小平用纯正的四川话对金日成说：“3米高。”

工作人员正欲像接待其他贵宾一样，要讲解“刘备托孤”的故事，邓小平制止说：

今天我和金主席事情多，就不讲故事了。

然后，邓小平陪金日成参观殿堂两侧蜀汉“文臣武将”的塑像，邓小平对金日成说：“这个地方的内容很丰富。”

金日成在文臣廊用中文读着名字：“庞统……邓芝、陈震、蒋琬……”

邓小平用他那不改的四川乡音向金日成介绍说：这边文臣廊中，秦宓、杨洪、程畿是四川人，那边武将廊中，张翼、王平、马忠、张嶷是四川人。

邓小平问武侯祠的工作人员：咋个没得法正的塑像？

工作人员回答：“过去是有法正的塑像，清朝道光年间被去除了，认为他并非刘备的‘纯臣’，是投降过来的。”

邓小平说：法正是很有才干的。《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说：“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说：“先主……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法正手握重权，为刘备集团中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重要人物。他献策刘备，为其攻取益州（今四川大部及云、贵、陕、甘等部分地区）谋略。后来法正又献策，攻杀曹操大将夏侯渊，夺取汉中。法正对蜀国是有贡献的。

邓小平对于文臣武将塑像中，没有张松的塑像，也觉得很不对。邓小平对金日成说，张松是益州——今天四川本地的人，史书说张松“识达精果，有才干”，记忆力又特别好。杨修拿曹操写的兵书给张松看，当时正在酒宴上，张松边看边吃，一会儿功夫居然已能背诵。后来张松为刘备夺取益州献出了生命。

邓小平对金日成说：“这个武侯祠大部分塑像还不错。但是，有些塑像，对四川人太不公平了。”

武侯祠二门墙壁上石刻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引起了邓小平的兴趣，他与金日成驻足观看。《出师表》是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经过河南南阳武侯祠时所书，并有他自己写的跋语。但历来又有一种说法，认为石刻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系明代士人白麟所书，假岳飞之名。邓小平对《出师表》究竟是岳飞还是白麟所书这件事的不同说法很清楚，他在反复看了《出师表》以后，问武侯祠的工作人员：

《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的字都写得很好，太漂亮了！不过，究竟是不是岳飞写的呀？

武侯祠的工作人员说：“正在考证。”

邓小平陪金日成来到殿西红墙夹道尽处，对金日成说：

这里是刘备的墓，史称“惠陵”，意思是说刘备生前仁慈爱



民。这个墓是中国皇帝中最朴素的一个墓，也是最小的一个。

邓小平问金日成：你看过《三国演义》吗？

金日成没有回答。

看完刘备墓，邓小平对金日成说：诸葛亮在政治上才能杰出，又精通军事，他的品德言行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形成有积极的影响。由于《三国志》，特别是《三国演义》的影响，武侯祠的名气很大，到这里来看的人也很多。不仅仅中国人来看，东南亚的，日本的，美国的，欧洲的，很多外国人都来看武侯祠。

1986年1月31日至2月14日，邓小平回四川家乡过春节，在成都住了15天。这一年的2月3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五，邓小平第五次来到武侯祠。

这一次，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老人、夫人卓琳、二妹邓先芙、大女儿邓林、三女儿邓榕（毛毛）和四个孙子辈，全都来了。邓小平的好朋友王震全家，也来了。

王震是一个“三国迷”。这一次，邓小平又为王震当起了“义务解说员”，向他的老战友详细介绍了武侯祠。

再有五天就过春节了。这一天，成都很冷，但精神抖擞的邓小平只穿了一件较薄的蓝色中山服，他兴趣盎然地与家人和朋友漫步在武侯祠，并为他们义务解说武侯祠的历史和文化。

邓小平带领他的一行人，游览了大门、二门、文臣武将廊、刘备殿、关张殿。

在邓小平进诸葛亮殿时，武侯祠的工作人员想搀扶他一把，因为诸葛亮殿的门槛比较高。

邓小平见状急忙连声说：“没得关系，不用扶，你看，我

不是就进门来了吗！”

游览了诸葛亮殿，邓小平带领他的一行人又去了桂荷楼、红墙夹道、刘备墓。

“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武侯祠，就这样留下了邓小平深深的足迹。



蓉城初会故里人

小平笑容满面招呼故里人： “大家随便坐”

阔别故土58载的邓小平，首次接见故乡人是在1978年2月2日。

是年1月31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广安县委接省委电话，说有中央首长来川视察，托买点土特产送去。时任县委书记的杨钟与常委们猜测，可能是小平同志回四川过春节，决定送点小平同志喜欢的家乡特产白市柚、锦橙柑和广安曲酒，由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邓欲治和干事黎仁海代表广安县委去，驾驶员张家义开车。

邓欲治三人从2月1日下午2时启程。当时的公路很不好走，抵达成都金牛宾馆时已是翌日凌晨5点过了。

邓欲治等人在金牛宾馆住下后，看见客



1978年2月，邓小平经由成都前往尼泊尔进行访问。2月2日，在成都首次接见了来自广安的故里人。

房放有《四川日报》。拿上报纸一看，头版头条新闻赫然入目：

“新华社1月31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结束对友好邻邦缅甸的访问，今天下午抵达四川省府成都。”

邓欲治等人再翻开《四川日报》，第二版头条“广安迈大步”又跃入眼帘。

黎仁海惊喜欲狂：“欲治主任，小平同志就在这里！”

邓欲治三人倦意顿消，当即“密谋”如何见到小平，哪怕躲在林阴深处远远地偷看一眼也好。

早饭后，三人漫步园中“张望”，发现人流云集球场，个个眉飞色舞。驾驶员老张从金牛宾馆一些陌生司机口中探知，小平要接见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他们灵机一动，决定趁势“混”入被接见的人群。

虽值隆冬季节，但这里竹篁青翠，腊梅盛开，阳光灿烂，一派生机勃勃。突然掌声雷动，欢呼声骤起。

邓欲治看见小平同志由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陪同，来到了球场。小平身上穿了一件深灰呢料中山装，脸色红润，步履轻

快，频频挥手致意。邓欲治三人看得出神，竟忘了“抢”照相的位置，待小平坐定后才挤在最末排，留下了此生旅途最难忘的一瞬间。

合影方毕，人群未散，血气方刚的小黎，年轻敢“冒”，直奔小平秘书跟前说：

“我们是邓副主席家乡来的，想见见他老人家。”

小平秘书点头微笑：“现在不空，等一等吧。”人们簇拥着小平走了，邓欲治三人怏怏地回到客房。

午餐后，一夜未眠的邓欲治三人午休，很快进入了甜蜜的梦乡。突然有人推门相告：“小平同志4点接见！”

他们蓦地翻身下床，竟互撞了个踉跄。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见到小平第一句话说什么呢？屋内空气顿时凝固，只有急促的呼吸声，……

终于，梦寐以求的夙愿得偿了——小平秘书陪邓欲治他们去到宽敞、幽静的一号楼会客厅。

会客厅茶几上摆着烟、茶和糖果。

4时15分，小平偕妹邓先芙和一位50开外的女同志一前一后步入客厅，邓欲治三人一齐上前问好！

小平笑容满面连连招呼故里人：“大家随便坐。”

邓欲治见脚上穿了一双泡沫拖鞋的小平很随和，紧张的心情平静了下来。看见那位50多岁、衣着朴素的女同志在小平右边落座，便坐到小平左方。

“广安今年情况怎样？我离乡时广安60 多万人口，现在是百万出头”

邓欲治对小平说：“特意从广安带了点水果来，表达乡亲们对您敬意。”

小平高兴地说：好。你们带的水果已转到我们手里，中午已经吃过了。

这时，一位姑娘搀着一位老太婆走进厅来。邓欲治认识老太婆是小平继母夏伯根老人，那位姑娘却不认识。坐在小平身边的女同志起身指着夏伯根老人介绍：“这是我的妈妈”，指着姑娘介绍：“这是我的女儿。”

邓欲治懵了，似觉很不自在，忙欠身道：“啊！您就是卓琳同志吗？”

“我就是。”卓琳笑着回答。原来邓欲治错把这位衣着朴素的卓琳看成工作人员了。

接着，小平同志说：“广安今年情况怎样呀？前几年有点差啊！这一年翻了点身，我在报上已经看到了。”

邓欲治汇报到1977年粮食总产6亿多斤，人平口粮由1976年的288斤增加到377斤时，小平边算边说：

“我离乡时广安是60多万人口，现在是百万出头，只有6亿多斤，人平500多斤，每人才分300多斤，而且还是原粮，不是米，才多少斤呀？三七二十一，七七四十九，才二百六七十斤米，口粮很低哟。”稍顿一下又说：

“广安是个大县，报上说现在是90多万亩耕地，人平才8分地嘛，亩产千斤也不够用……”其记忆惊人，令人仰止。



1978年2月，邓小平在成都接见四川省妇女代表。

听邓欲治汇报农田基本建设情况时，小平说：

水利基本建设，要多少年不间断地搞才行。过去多年没搞了，耽搁了。渠道年年垮，这怎么行呢？要搞点水泥、石灰和石头砌，要牢固点。

乡音未改、和蔼可亲的小平继续说：

农业问题，要好好努力，重要的是粮食。人平1500斤，交国家500斤，分配500斤，社、队和个人积累500斤。可以作别的用，养猪、养鸡。

小平又说：全国有些地方去年受了三个大灾害，雹灾、旱灾和风灾，人平产粮1000斤，有的县1500斤。

这时卓琳插话：“问题是看政策对不对头。”

小平说：要看政策对不对头，还要靠基本建设搞得好，过得硬。

“回去带话给县委，把农业搞上去， 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抓好”

邓欲治汇报说：“广安计划明年亩产量要达到800斤。”

小平说：广安人多，土地少，亩产量达到800斤是不够的。广安亩产800斤，每人平均才600斤，只等于全国的平均数，不够，过不了关。

停了一会儿，小平说：广安是个大县，报纸上说现在是90多万亩耕地，人平才8分地嘛，亩产量达到800斤确实不够用。

小平似乎想到了什么，稍微沉吟了一下，接着说：

种子很重要。种子的地位要提高，要培育种子基地。广安这个大县，种子要经常更新换代。种子好的，每亩要多产百多两百斤。现在，全世界都在搞种子，资本



1986年2月，邓小平在成都金牛宾馆接见广安的党政负责同志。



主义国家也在搞，他们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每年卖种子。美国有种子公公司，每年出卖种子。我们是收起来，选一下，第二年又种下去。那不行，种两年就退化了，必须换新的种子。

邓欲治汇报说：“广安石笋区种杂交包谷效果就好。”

小平说：杂交包谷第二代最好，第三代就退化了，不行。要经常换种，必需有种子基地。

小平乡音未改，用地道的广安话，与邓欲治讲家乡的发展问题。他深入浅出地将农业的地位、种子的重要和靠政策、靠科学、靠农田基本建设夺取农业丰收的道理讲得十分精辟，句句扣人心弦。

谈兴正浓，秘书进来了，估计又有什么安排，小平慢慢起身说：

“别的就没有啥子了，见一见面嘛。回去带话给县委，把农业搞上去，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抓好！”

这时忙于笔记的邓欲治怀着激动的心情请求：“广安百万人民都希望您回乡视察指导工作。”

卓琳接话说：“他很忙。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回去向百万父老兄弟姐妹表示感谢！”

小平对其母夏伯根及夫人卓琳说：“你们再谈谈吧。”

慈祥的夏伯根老人对乡土的眷恋之情溢于言表。她连屋后树、门前田，坎坎种什么瓜豆都问到了。

当谈到邓小平的幺舅淡以兴老人的生活近况时，卓琳说：“我们年年都给幺舅寄了钱的，每月10元。他好喝酒，寄多了就浪费了。你们在生活上不要给他东西，教他好好遵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

在和小平互相握手道别时，邓欲治看了看手表，正好4点45

分。邓欲治三人听说小平吸烟厉害，在会见尼克松时会说：“吸烟请自便。”然而在这半小时的谈话中，竟一口未抽。

当晚，邓欲治他们整理记录，给县委拍发电报，报告小平接见的情况。这天晚上，他们三个人都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光阴荏苒26年，老张和小黎至今还在“埋怨”邓欲治；邓欲治本人也懊悔不已——因为当时小平接见邓欲治他们之前，小平秘书曾提出与小平合影，可老实巴交的邓欲治却回答说：“上午已经合过影了。”

虽然邓欲治是因为怕耽误小平的宝贵时间，但他们三人失去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又不能不说是“终身遗憾”。

（本文作者为“邓小平青少年时代和邓氏家谱”研究专家、广安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蔡世武）



总设计师一锤定音：“四川是改革之乡”

蜀乡是总设计师改革的 试验田和根据地

人们说“春华秋实”，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每年秋高气爽的日子，正是茫茫蜀乡，大地流丹、香桂迎户的日子；每逢大雁南飞的时候，正是泱泱天府，六畜兴旺、鱼米丰收的时候。1982年9月21日，农历八月初五。这一天，四川又迎来了永远值得骄傲的美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锤定音，在成都市锦江大礼堂举行的四川省和成都市欢迎金日成的大会上，用他那不变的四川乡音宣布：“四川是改革之乡”，“因此，我曾不止一次建议金日成主席来这里看一看。”

永放光芒的雄文《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8页，又记录了1987年6月12日总设计师



邓小平与金日成在成都

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谈到中国改革时说的话：“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

几度风雨，几度风流。

生在四川，长在四川的邓小平，对哺育了他的蜀乡沃土太熟悉了。他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时，又在这里工作了两年零八个月，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与西南与四川的具体实际成功地结合起来，制定了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既具体领导了西南和四川人民进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又积累和创造了一系列新鲜经验。为恢复和发展四川经济，他付出了巨大的

辛劳。到中央工作以后，他又常常回到四川的工厂、农村指导工作，一直不懈地关注着父老乡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境遇，与他们同喜同悲，并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得到了不少第一手资料。茫茫蜀乡大地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

四川之所以会成为“改革之乡”，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不论他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纠正“左”的错误中，还是他第二次复出后反思“文革”的错误时；不论他在与倒行逆施的“四人帮”作斗争中，还是他即使蒙难也始终没有停止对整个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对改革与发展思想的酝酿、进行深思熟虑时，他都把蜀乡作为调查研究、冷静思考的一个联系点；四川家乡的亲友、老部下，也经常通过各种方式，向他提供他当时不容易得到的真实消息。



1965年11月，邓小平视察泸州农村。

尘埃落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又亲自出马到蜀乡点燃改革之火，同时又把四川这个联系点，改作他在中国进行改革的试验田和根据地。

邓小平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智慧。作为政治家，他不是为了构筑理论体系而提出理论，而是在实践中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措施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目的是为了更好指导今后的实践，他的改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也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

“微风始于青萍之末。”当蜀乡“包产到组”的改革思想刚刚发端的时候，邓小平就坚定支持四川大胆探索、进行各方面改革，使四川从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到多种改革举措，走在全国的前列，产生示范的历史性作用；也是因为邓小平，才使国家出台的许多改革措施率先在蜀乡试点。

四川，是邓小平在中国发起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的成功试验田和根据地；

邓小平，使四川赢得了“改革之乡”的美誉。

“曾经沧海难为水”， 引蜀乡农谚纠“左”，肯定“包产到户”

邓小平和毛泽东，在理论性格上，都反对教条主义，体现不固守本本和陈规的发展的思维特征，突出强调中国特色。毛泽东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正确提出了“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没有找到

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反而在1957年以后，头脑发热，使“左”的错误抬头，并且很快占了上风，导致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等错误，直至毛泽东发动了使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成为一场人为的灾祸。

“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一代伟人邓小平，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三年困难时期和以后一段时期活生生的现实，以及纠正“左”的错误的实践，为邓小平改革与发展的初期思想的产生、生长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邓小平改革与发展思想酝酿的过程。



邓小平对四川农民特别关心。1965年11月，他到泸州化肥厂视察，了解农民使用化肥的情况。

1962年4月，中央发出对“反右倾”等进行甄别平反的文件后，主持这项工作的邓小平当即主张对批错了的同志“一风吹”。他说：“首先……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不留尾巴，一次解决，……四川也是采取这个办法。”“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一个错误，承认我们过去搞得不对。”

历史证明，“文革”前“左”的错误中，“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农业造成的问题最严重。不少农民呼唤“包产到户”。1962年以前，短短的几年中，“包产到户”经历了“三起三落”（和邓小平“三起三落”的政治生涯一样，虽然两个“三起三落”的时间不一样）。“包产到户”每次“起”，都是农民群众自发的；每次“落”，则都是通过搞阶级斗争，被批、压下去的。

在呼唤“包产到户”、与那个年代的政治口号唱反调的“始作俑者”中，竟有一位邓小平的同乡人，居然敢在《四川日报》上发表文章为“包产到户”唱赞歌。1957年2月2日，《四川日报》刊登了芦山县人民银行干部吴明玉写的文章：《包工包产到户能更好地贯彻责任制》。文章说：“土地包产到户后，社员便会专心经营”，“工分包到户后，社员们出工便不会你等我、我等你了”，“这样不仅可以刺激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还可以防止社员只图活路搞得快而不顾质量。”

邓小平的这位四川同乡，敢于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公开站出来为“包产到户”唱赞歌，是有胆有识的。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是唐朝诗人元稹在题为《离思》的诗中写下的名句。比喻曾经经历过很大的场面，眼界开阔，对比较平常的事不放在眼里。

超群绝伦、有雄韬伟略的邓小平，饱经沧桑，他所经历过的场面之大、之多，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1962年、在他对20世纪50年代末农业遭受严重破坏的反思中，也大胆讲“包产到户”、肯定“包产到户”。1962年7月7日，他在一个会上讲到“包产到户”时，引用了四川人耳熟能详的农谚，他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谨慎引用刘伯承讲的四川农谚，形象化阐释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选择哪种形式的实事求是的道理（比如选择邓小平在同一讲话中举出的“现在出现的不只是百分之二十的”“包产到户”这种形式）。邓小平引用的四川农谚通俗易懂，最容易被农民所理解、所接受。邓小平引用的四川农谚，是他对“包产到户”的肯定，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的充分体现。当然，他引用四川农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问题所讲。

邓小平在他引用四川农谚肯定“包产到户”的前五天，也就是1962年7月2日，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恢复农业生产的会议上，也谈到了对“包产到户”等问题的看法。他说：“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个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就用哪一个方法。”邓小平的这一讲话，和1957年2月2日《四川日报》刊登的芦山县人民银行干部吴明玉为“包产到户”唱赞歌写的文章，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只不过邓小平高屋建瓴，站得更高，考虑得更远。

1962年7月邓小平两次在公开场合，引用四川农谚，肯定“包产到户”；16年后的1978年，蜀乡广汉金鱼公社西高大队一个生产队，偷偷摸摸搞起了“包产到组”，他就坚定不移地给予支持，终归使“包”字在茫茫蜀乡大地上崛起。

“我是四川人，经常听到家乡人反映菜少肉少”

“文革”开始后，邓小平被打倒，以后又被“疏散”到江西。他在蒙难的日子里，并没有停止对整个国家命运的担忧，也没有停止改革与发展思想的酝酿。

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北京。在此之前，他很难得地被安排到井冈山去看了一看。当他看到老区人民依然是衣衫褴褛，群众生活依然贫苦时，心情十分难受。他对当地的干部说：“你们在这里很辛苦。过去毛主席在这里干革命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促使他思考“穷”与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表明他对国家、对未来充满信心。

第二次复出后，以务实著称的邓小平，力挽狂澜，对“文革”所造成的困难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75年7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报告》中说：“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还在邓小平准备大刀阔斧进行整顿的1975年春天，他把其时正在北京开会的四川省委书记许梦侠，叫到他当时办公的京西宾馆，向许梦侠了解四川的情况。

为了弄清小平同志找许梦侠书记谈话的具体内容，笔者在



春雨潇潇，新绿爬上窗台的时候，采访了许梦侠书记。

1919年出生的许梦侠书记，虽然85岁了，但精神矍铄，思路敏捷，提起那次小平同志单独与他谈话的情景，特别兴奋，谈锋亦健，让历史跳回到了1975年。

那是1975年2月和3月，许梦侠作为四川省委的代表，到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开的13个重点企业汇报会。这之前不久结束的四届人大会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接着，邓小平又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首先要抓的工作，是恢复受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乱和散。邓小平意识到，在纷繁复杂、积重难返的问题面前，必须狠抓整顿。

许梦侠出席的这个会议，就是邓小平扭转局面、揭开整顿序幕以后确定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邓小平很重视这个会，还亲自莅临会议。有一天，邓小平参加了会议回去以后，就派人通知许梦侠去他当时办公的京西宾馆。

许梦侠是邓小平几十年的老部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许梦侠就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解放战争时期，许梦侠是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的“二野”第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刘邓大军解放了四川以后，许梦侠先后担任川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四川省委常委、省委书记。

一见面，邓小平就问这位25年来一直在四川工作的老部下：“你被关押了几年？”

许梦侠作了回答以后，老领导诙谐地说：“在劫难逃哇！你当过多年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书记，你把四川的干部被解放的情况谈一下，都还有哪些没有被解放？我们现在需要大批的干部。”谈完干部问题，邓小平重点了解了四川工农业生产、城

乡人民生活等许多方面的详细情况。然后说：“回去转告省委，要集中力量抓整顿，把铁路运输搞上去，把重点企业搞上去，要注意抓好农业。”

许梦侠临离开时，对老领导说：“小平同志如果有时间，回四川老家看一看嘛。”

邓小平回答说：“如果有时间，我一定回去。”

1975年7月，邓小平推动的整顿进入了高潮，而“四人帮”加紧抢班夺权也发展到了高潮。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又回到了四川，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了更多的第一手资料。7月11日，他在成都接见四川省负责人，强调四川要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他说：四川没有肉吃，没有菜吃，到很远的地方去拉菜，就很不安定；根据国家计委6月份统计，四川农业增长比例在全国倒数第一，农民分配水平倒数第二，农业机械化程度倒数第三，四川人均农业产值倒数第二；四川管农业的班子要加强；要研究农业方面的政策，包括养猪政策；政策不能随便改变，改变了群众就不信任；四川在几年内要把农业搞上去。

又掌握了四川家乡的情况以后，1975年8月3日，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说：“我是四川人，经常听到家乡的人反映，蔬菜少，猪肉少；不仅是四川，还有好多地方都有这个缺乏副食品的问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重庆附近，可以专门划出一部分地种菜。”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就是说连天府之国的四川家乡，都是“蔬菜少，猪肉少”，另外那些自然条件比四川差的省区，就不仅仅是“蔬菜少，猪肉少”的问题了。那么，不改革行吗？

邓小平下定决心，要以新的思路，迈向新的目标，铸就新



的辉煌。

大寨斥江青，“四川倒数第二， 人均一年九十几块钱，这行吗？”

邓小平在酝酿改革期间，掌握了四川的许多基本情况，也掌握了故土广安的许多基本情况。1975年他在接见外宾时谈道：“我的家乡广安，人平占有粮食200多斤，一个农民年平均收入才几十元，我的家乡就是那个样子！”

1975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毛泽东很重视这次会议，他提议：凡是能去的政治局委员都要参加这次会议，并委托邓小平代表中央作重要报告。

既然毛泽东委托邓小平代表中央作报告，邓小平就不能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他认真负责地作了准备，计划重点报告全面整顿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不把全面整顿继续发展下去，“文革”以来受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恢复，更谈不上发展。他十分明确，从以1966年《“五一六”通知》为标志而开始的“文革”，已经对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造成了近十年的破坏，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初期还差。邓小平心中有本账，从1957年到这个时候，18年间农村人口来自集体的人均分配收入只增加了33.3元，年平均只增加了1.67元；全国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1957年为306千克，1975年为311千克，即18年后仅增加了5千克。

邓小平到山西省昔阳县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之前，又把他从全国、从四川调查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熟悉了一遍，基

本上可以说是烂熟于胸。

由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许多方面的工作，都需要当时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处理，9月15日，就是全国农业学大寨会召开的当天，他才匆忙赶到山西省昔阳县。

而准备在此次会议上与邓小平恶战的江青，则提前于9月8日就到了昔阳。她带了50多名随行人员、一卡车评《水浒》的印刷品和电影、电视片等，就是没有农业学大寨和怎样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东西。她下车伊始，就接见大寨的干部，只字不提农业，却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评《水浒》的报告。她说：“《水浒》的要害是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架空了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直奔主题”，矛头直指邓小平。可惜大寨的干部当时没有读懂她讲的《水浒》。

一个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变成了邓小平与“四人帮”直接交锋的战场。

邓小平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主席台上代表中央作报告的时候，台下来自全国的3700多名与会代表，对他们久违了的副总理邓小平的报告，



1975年9月，邓小平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



多次报以热烈的掌声，有的干脆站起来为邓小平鼓掌，大家的脸上都绽开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面对这种状况，主席台上坐在邓小平旁边的江青难受极了，如坐针毡。但她也不甘心，便恼羞成怒，多次冷言冷语地插话，妄想挽回败局。

邓小平在与江青面对面直接交锋的时候，特别引用了他从四川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去痛斥这个想当女皇的狂妄女人。当邓小平讲到不少县、不少地区粮食还不如解放初期时，江青插话说：“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

“个别的也是了不得的事呀！”邓小平提高了嗓音严肃地说：“据23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口计算，平均124元。”“四川倒数第二，人均一年九十几块钱，这行吗？”

不懂装懂的江青插话说：“（四川）8000万人口。”

邓小平用浓重、清晰、地道的四川乡音说：“9000多万啰！”他故意把“啰”字的发音拖得既高又长。

邓小平接着说：“类似四川这样，一个社员一年产值才100元左右的还有好几个省。可能有的没有在农村工作过的人并不晓得，这个100元还只是讲产值，不等于社员的收入。社员的实际收入还拿不到100元，许多地方社员从早干到晚，一天才两三分钱。这种状况，我们能满意吗？”

农业学大寨大会上邓小平的务实和坚定，江青的狂妄和丑态，给几百名四川省的参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回到四川后，都十分高兴地向蜀乡各族父老汇报：“我们的小平同志，用我们的四川口音、以我们四川的例子，把江青驳斥得哑口无言，狼狈不堪，好安逸哟！”

“我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四川被选为改革试验田

邓小平在大寨，以四川社员一年产值才九十几块的实例，驳斥江青：“这行吗？”——参加农业学大寨会议的3700多名代表都知道，答案只有一个：“当然不行！”

那个时候四川农村社员的“九十几块”也是来之不易的，它是经过邓小平在全国搞整顿，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国民经济有了较大的好转，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的情况下才得来的。邓小平搞的整顿，像一股暖人的春风，吹遍了蜀乡大地。四川经过整顿，1975年全省社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6.7%，国民收入增长15.3%，工农业总产值创新中国建立以来最高记录。

那么，当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以后，国民经济又受到了更大的破坏，邓小平的家乡四川也当然就更“不行”了。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自从有了都江堰，2000多年来，“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在“文革”以前，四川每年要调出大批粮食去支援其他省，要出口大批粮食到许多国家。可是，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倒后的1976年，四川反而调入粮食12亿斤——这对9000多万人口的四川是杯水车薪，每人平均10斤多一点。饥饿再次降临“天府之国”。在邓小平的故里广安，出现了这样的顺口溜：“我是广安叫花子，最恨江青几爷子，小平同志快出来，免得我们饿肚子。”

广安的饥民在呼唤：“小平同志快出来，免得我们饿肚子！”

四川的父老乡亲在呼唤：“‘九十几块，倒数第二’是不行



的，要改革！”

全国各族人民在呼唤：“时代需要改革的播火者！”

尘埃落定，历史又一次选择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他，则果敢地选择了一场新的革命。他从旧体制最薄弱的环节入手，从农村改革开始，进行组织和领导。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正准备发动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1978年9月17日，他在沈阳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邓小平到成都“点火”，是1978年1月底至2月初。他听取了四川省委的汇报，作了指示。他尤其强调政策问题，特别是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他肯定了省委正在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指出能解决的问题就地解决，不要等。他还强调要抓好领导班子建设。他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一下，各地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邓小平在成都“点火”时，指出以养三只还是五只鸭子来区分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用四川话来讲是“怪得很”。他平常还爱讲一句四川俗语：“摸着石头过河”。他用“摸着石头过河”这句通俗易懂的四川俗语是要说明，我们要实事求是，要摸着历史的脉搏，历史的趋势，到实践中去摸群众的意愿，群众的要求。



1978年2月初，邓小平在成都视察。

既然历史的脉搏，历史的趋势，群众的意愿，是要改革，而要让神州大地燃起改革的大火，邓小平就要去“到处点火”，而四川则是他首选“点火”区之一。

邓小平谙熟一句古话：“天下未乱蜀先乱。”

他到四川来，撒播上改革的火种，让“左”的“方寸”、让一切不适宜于改革的“方寸”，首先在这里“乱”起来。

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

搞改革，首先要突破原来的思维定式，将原来指导工作的若干陈旧准则扬弃。习惯性的、僵化半僵化的思想认识，包括“左”的以及右的思想倾向的转变和解决，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邓小平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带头改革的四川省，率先在全国“搞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



邓小平说：“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占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如前所述，四川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四川改革前的197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而由“文革”前的1965年的155元减为154元，人均消费水平从112元降为109元，许多农民离乡背井出外逃荒乞讨。

四川的改革先锋是广汉县。广汉地处“天府之国”的腹地，自然条件好，古有“大旱不旱，蜀有广汉”的民谣。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20多年来实行单一公有制和统一经营，在生产规模上追求“大”，在所有制上追求“公”，在分配办法上搞平均主义，导致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被严重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被严重阻碍。特别是“文革”的破坏，更使广汉经济雪上加霜，1976年全县人均产量反而比1966年下降了77斤，劳动日值由0.62元下降为0.43元。

被称为“四川包产第一乡”的广汉县金鱼公社，114个生产队有80%的队，1977年春天靠借粮或“吃救济”度春荒。一些基层干部不得不对“出门一条龙，下田一窝蜂”的生产模式产生了疑问。他们苦苦思索，这么好的自然条件，群众那么辛苦，到头来，却“连肚子也填不饱”，这种结果归根结底是不是体制方面的问题？

一场农民渴望已久的体制大变革，势不可挡地来到了四川。1977年，四川把大寨式的评工记分，改为定额记分。仅仅这么一改，就使1977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76年增加53亿斤，社员人均分配口粮增加66斤，人均分配收入增加9.6元。

尝到了甜头的四川人，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继续去冲破旧体制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广汉县金鱼公社西高大队的

一个队，偷偷摸摸搞起了“定产”（实际上是“包产”）生产，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生产大变样。县委“三分之一”工作队向县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在那个谈“包”色变的年代，能不能突破这个禁区？会不会因改革现有的生产模式而戴上“右倾”的帽子？会不会因此而违反宪法？县委一班人通过激烈的讨论，认为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只要能使群众摆脱贫困，又有什么顾虑和害怕呢？在县委召开的有公社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上，对“定产”和“包产”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定产”和“包产”其实都是一样的，西高大队偷偷摸摸搞起了“定产”的那个队，生产上去了，群众吃饱穿暖了，有什么不敢搞呢？于是，县委决心突破这个禁区，正式向温江地委和省委请示，先在金鱼公社、后在全县推行



1980年7月，邓小平在成都簇桥农家调查。



“定产（包产）到组”的新生产管理模式：“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地委和省委都支持广汉县委的这一大胆举措。省委领导先派人、后亲自到广汉考察，看到按新方案组织起来的作业组社员，欢腾的劳动场景，感到农村改革势在必行。这一年，金鱼公社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加500万斤，收入增加75万元。金鱼公社搞改革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县、社“想吃饱饭”的人都纷纷前往取经学习，拉开了四川打破农村旧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序幕。

1977年12月10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四川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在听取了关于四川情况的汇报后，邓小平强调要抓政策，要把现有政策、特别是农村政策理一下，因为只有政策才能管得长、管得宽。省委负责人返川后，立即布置着手研究从四川实际出发的农村经济政策问题。

1978年1月29日，在省委支持下，广汉县委正式批转了《关于金鱼公社整顿经营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的试点报告》。很快，省委不但批转了该报告，还在向全省下发的省委办公厅《工作简报》上全面介绍、推广金鱼公社“包产到组”取得成功的改革经验。省委领导又执笔撰写《编者按》，明确表示：这种办法是可行的。

当四川省委正根据金鱼公社改革等情况，制定充分肯定全川自发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等方法的《中共四川省委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时，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在成都听取了四川省委的汇报，肯定了该《规定》。

有了邓小平的明确指示和强有力的支持，四川省委吃下了“定心汤圆”。“包产到组”的改革迅速推开。到1979年7月，全省57.6%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省委同时还推广了新都县

在农村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生产上的“三包”（包产、包工、包成本）承包责任制。接着，省委正式批准广汉、新都、邛崃三县为县级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县。197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终于将原有的“不许包产到户的文字”删去。这显示在实际进程中，“包产到户”已难以阻挡。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四川广汉在全县推广“包产到组，以产定工，超产奖励”的办法和经验，肯定了四川广汉金鱼公社的改革。

无独有偶，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20户人也冒着风险，悄悄地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1979年夏天，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心里有了底，专程去了一趟凤阳，回去后就推广凤阳“包干到户”的经验。

就这样，1978年初四川广汉金鱼公社的“包产到组”和1978年底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包干到户”，不约而同地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导。

但是，农村改革步履维艰，旧体制的观念不会一下子就从人们的头脑中去掉。“包产到组”在四川的出现，无疑是落在旧的农村经济体制上的重磅炸弹，无疑会对旧的经营模式产生强大的冲击。虽然邓小平肯定了四川和安徽的“包产到组”和“包干到户”，但与邓小平要求广东搞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样，仍然引来各种非议、指责和攻击。不少人视“包产到组”离开了公有制的“经”，背叛了社会主义的“道”，“是历史的倒退”，“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张浩”的读者来信，对“包产到组”提出疑义，同时还配发《编者按》批判“包产到组”。这样的事情竟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几个月后发生，当然就引起

了四川全省强烈的震动，许多干部群众心有余悸，怀疑“是不是中央的政策又变了”？

吃了“定心汤圆”的四川省委“我自从容”，在讨论《人民日报》的文章后，先于3月19日紧急向各地、市、州委书记发出电话指示，21日又以省委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出通知，重申中央的政策没有变，重申省委肯定广汉金鱼公社的“包产到组”。

1979年4月，中央转发《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用中央文件形式，肯定了四川广汉金鱼公社的改革。5个月后的9月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

决定》，正式写进了“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这样，金鱼公社的“包产到组”终于得到了中央的正式认可。

以占全国4.8%耕地、养育占全国6.8%人口的四川，在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1977年至1984年，7年间粮食总产量增加926.4万吨，年递增5.4%，平均每年增产132.3万吨。这些数字，是邓小平以生产力标准理论指导四川改革成功的最好说明。

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四川的广泛推行，越来越与人民



1980年7月，邓小平视察川西农村。

公社的体制发生矛盾和冲突。敢不敢变革人民公社体制，成为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否在四川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人民公社是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又是国家基层政权组织，是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实践证明，这种存在着严重弊病的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人民公社是列入宪法的，改革有风险，而且当时中国的文件中，没有可以借鉴的方法。那么，以什么方式、怎样改呢？这时候，一些四川人想起了邓小平曾经对四川省委领导讲的话：要对政策进行突破，建立新的经济体制。

又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在四川悄悄进行着。1979年7月，广汉县向阳公社成立了企业公司，设立了董事会，由董事会聘请厂长、经理管理企业。随后，改为“商业、农业”两个公司。两个月后，又成立了工业公司，同时进行了几个较大的改革：改公社办工业为社队联办；改任命干部为选举、聘用干部；改“吃大锅饭”为“定、包、奖”责任制，把生产队干部、社员的经济效益同生产经营好坏直接挂起钩来。这样，就有效地解决了社队企业经营管理上长期存在的领导工作乱、财务开支乱、人员安排乱的“三乱”问题。“农、工、商”三个公司的建立，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桎梏，使经济发展有了新的突破。但“农、工、商”三个公司，完全是带经济性质的组织，日常行政工作又怎么办？1980年8月初，向阳公社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冲破“左”的禁区，在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挂起了“中共向阳乡委员会”、“向阳乡人民政府”、“向阳乡农工商联合公司”三个牌子，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不久，四川省委在广汉、新都、邛崃三县进行人民公社改革的试点。再以后，四川省委又把农村改革的试点，扩大到40



1980年下半年，广汉县向阳乡在全国第一个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正式挂起了“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

一乡”的美誉。

个县。

向阳摘下“公社”牌子的大胆行动，轰动全国。全国人大及其政法委员会都派工作组前来了解。国内外许多杂志都刊登《开启中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先河——四川广汉向阳公社改革政社合一体制的调查》之类的文章。向阳摘下“人民公社”牌子两年多以后，中央和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这项以向阳为开端的体制改革在全国推开，向阳因此获得了“中国第

“愿‘改革之乡’更上一层楼”

邓小平在赞扬“四川是改革之乡”的同一讲话中还说：“我希望四川人民……充分发挥‘天府之国’的优势，愿‘改革之乡’更上一层楼。”四川的干部群众没有辜负邓小平的期望，他们在改革的道路上继续探索了下去。在农村改革的同时，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也开始了。

1978年9月，省委首先选择了分别属于不同行业、各具代表性的宁江机床厂、四川化工厂等6家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在逐个核定这6家国有企业的利润指标之后，给它们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的目标，并在年终完成计划后，允许提留少量的利润作为企业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额的奖金。经过3个月的实践，6家企业的利润均获得了较大的增长，收到明显的效果。——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最早的城市体制改革，并取得了成功。

接着，四川省委又于1978年11月选择了成都市人民商场等3户商业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试点。1978年底，省委及时总结了宁江机床厂等6家扩权试点单位的经验，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1979年2月，省委把试点企业扩展到100个工业企业和40个商业国有企业，制定了《十四条》改革意见。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把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在利润分成上实行全额分成。到1979年底，试点的国有企业比1978年总产值增长14.7%，利润增长33%，上缴利润增长24.2%。1980年初，全省扩权企业达到412个。1980年底，412个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单位完成总产值比1979年增长9.7%，实现利润增长7.9%。

1979年2月，四川举行关于价值规律的理论研讨会，提出要高度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会议还突破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竞争等传统观念。不久，四川召开机电产品预拨订货会，开创了生产资料作为商品自由交易的先例，在实践上冲破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禁区。

1979年3月9日，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与省内经济理论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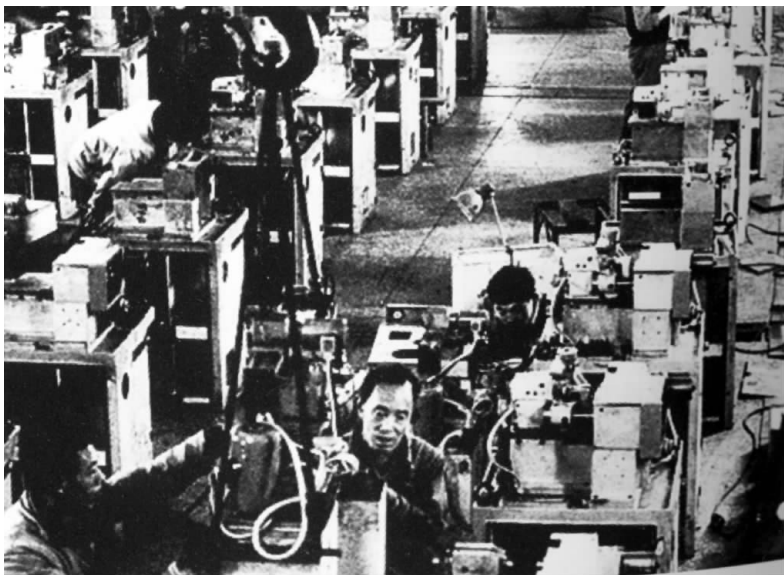
者，在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同时，探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问题。认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这两个概念不是绝对对立的，是可以结合的，要使企业生产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企业之间要搞点竞争，要用经济办法来管理经济。这些观点在当时属于理论突破。

1979年6月26日，四川宁江机床厂第一个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产品推销广告。此后，四川媒体的产品广告开始解禁。8月29日，省委主要负责人在成都市国防工业民用产品汇报展览会上提出，军工企业生产民用产品这条路非走不可，军工企业应发挥人力、技术、设备等各方面优势，走出一条生产民用产品之路。几个月后，军工企业绵阳长虹机器厂引进日本技术、设备，成为国内最早建成彩电进口生产线的企业。

1979年9月4日，省委发出文件，强调要重视集体（民营）经济，要与全民所有制一视同仁。学习了省委有关政策后，新津县刘永好一家四兄弟，从种植业、养殖业起步、发展，很快奠定了立足四川、面向全国、走向海外求发展的基础。20年后，刘永好已资产上亿，他所带领的希望集团，位居中国五百家最



1979年6月26日，四川宁江机床厂第一个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产品推销广告。



宁江机床厂的机床产品总装车间

大规模民营企业之首。

也在1979年，省委经过调查和预测，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改变原来的统收统支办法，实行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的建议。次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纳了四川省委的建议，决定在四川等15省（市）推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

以后，四川省委报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四川省重庆市在全国率先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实行计划单列，享受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接着，成都市也实行市领导县体制，过了一年，成都市也被列为国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不久，省委选择了自贡铸钢厂和嘉陵机器厂等部分国有工业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再以后，四川省嘉陵公司被国家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嘉陵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集团，是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模式而进行的一项改革试验。它在股份制、军民结合、领导体制、分配制度、职工入股及职工民主管理等方面都具有特点，被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称为“嘉陵模式”。

1980年，四川省委、省政府作出在全国率先实行全省猪肉一律敞开供应的决定。

四川人的日子好过了，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蜜果实，他们从内心深处感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四川，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成功的试验田和根据地；

四川，是因为总设计师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才赢得了“改革之乡”的美誉。

“蜀江水碧蜀山青。”“改革之乡”的蜀乡父老，永远都会牢记总设计师的叮嘱：“愿‘改革之乡’更上一层楼”，使蜀江的水更碧，让蜀乡的山更青。

小平关怀下，川剧壮川魂

邓小平用纯正的四川话在联合国发表演说



对妹妹和女儿说：“看不懂川剧的人，就是没有文化”

邓小平用纯正的四川话在联合国发表演说，在天安门广场阅兵：“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邓小平到处讲“我是四川人”，“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

邓小平的蜀乡情结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他酷爱带有蜀乡泥土气息的川剧，又是他蜀乡



邓小平用纯正的四川话在联合国发表演说

部群工部部长。她对我们说：

“我们最早和小平大哥一起看川剧是在怀仁堂，那时我们不懂川剧，对川剧的高腔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什么也没看明白，回来就说只看到台上乱吼一气。大哥听了不以为然的说：‘你们没文化。川剧都看不懂的人，就是没有文化。’后来我们（川剧）看得多了，也渐渐懂了一些，我们就对大哥说：‘现在有一点点文化了。’”

邓小平的女儿邓林也对我们说：“我们原来太

情结的一个例子。

为纪念邓小平100周年诞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联合拍摄8集电视片《邓小平与四川》，笔者为该片的两位总撰稿之一和策划人之一，多次采访了邓小平的家人。

邓小平的妹妹邓先群是少将，原解放军总政治



20 世纪初，成都《通俗画报》刊登的“可园”上演川剧图。

不了解、也看不懂川剧，所以就不喜欢川剧。老爷子说：‘不喜欢川剧的人就不懂得文化。’所以后来我们一有机会就看川剧，逐渐看得懂了，领略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川剧就像一幅幅优美的天府画卷，艺术地展示了勤劳智慧的四川人美好的内心世界。我们现在认识到，川剧的确是一件丰富的文化遗产。”

蜀乡大地人杰地灵。自古以来文人学士云集，杰出人才迭起，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为博大精深的川剧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它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文化品位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川剧是我国西南地区影响最大的地方戏曲剧种，流行于四川、重庆及贵州、云南、湖北部分地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融合了高腔、昆曲、胡琴（皮黄）、弹戏（梆子）及四川的民间灯调等多种唱腔，在巴蜀文化的熏陶中形成独特鲜明的剧种风格，在全国300多个戏曲剧种中独树一帜。

据考古资料证明，在大约3000多年前，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便有了较多的交融。四川的“巴歌渝舞”是关于我国歌舞艺术最早的记载之一。之后，汉代百戏盛行，隋唐及五代，蜀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元代就流行起来的四川民间端公戏，一直延绵到明、清。蕴藏丰厚的巴蜀文化、源远流长的四川民间小戏，在明、清时期融合改造各种外来声腔，发展成为川剧。

邓小平从小就喜欢有300多年历史的川剧。他认为川剧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浓郁的生活气息、独特的演唱技艺和雅俗共赏的丰富剧目。1978年初他在成都看川剧时，知道当时有本可查的川剧传统剧目就有2000余种，而变脸、藏刀、吐火、踢慧眼则是川剧表演艺术的四大绝招。

在孩提时代，邓小平就爱在故里协兴乡和广安县城看川剧



“打围鼓”。“打围鼓”是川剧一种坐唱形式，演唱者不化妆，不走台，只随伴奏鼓乐清唱，内容多系“折子戏”（唱段）。无论男女老幼，不分专业或业余都可以参加。这种遍及广安和整个四川城乡的川剧坐唱形式，是蜀乡人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娱乐活动。茶馆、会馆，乃至婚丧寿诞的聚会中，都有“打围鼓”。

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邓小平还把川剧里的故事和课堂上、书本里的内容联系起来。不少川剧的著名段子，邓小平都很熟悉。

笔者采访过一些刘邓大军的老战士，他们也讲到了四川刚刚获得解放时，邓小平有关川剧的谈话。

邓小平当年要求，解放四川的刘邓大军的干部战士和随军南下的非四川籍的干部，要学习讲四川话，要学会看懂川剧，这样才能逐渐培养起对四川人民的感情，密切军民和干群关系，才能更好地在四川开展工作。邓小平还举出周恩来关心、重视川剧的例子：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其他领导同志，多次在重庆观看川剧演出，鼓励川剧界人士投入到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去。

四川刚刚解放，在刘邓大军中就流传了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川剧是文化，不看川剧，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那时候，获得解放的四川人民，为了慰问解放军，多次举办川剧晚会。但一些外省籍战士不懂四川话，更看不懂川剧，特别是更不会欣赏川剧高腔，有人便中途退场。据说有的解放军干部，便把剧场的大门关上，命令战士硬着头皮也要把所演川剧看完，否则“就是不尊重川剧演员的劳动”。

1952年7月，邓小平调到中央工作以后，只要有川剧在北京演出，他总是每场必看，饶有兴趣地观看家乡戏。

1957年，成都市川剧团在怀仁堂演出成功，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带头走上舞台向川剧演员表示祝贺。

邓小平关于“川剧”与“文化”的谈话，在原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那里也可以得到证实。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习仲勋是一个风云人物。还在1979年，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就如何发挥广东优势，吸引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来广东投资办企业问题，向中共中央常委会汇报了准备在邻近港澳和沿海地区划出一些地方，设置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当邓小平听完习仲勋向他汇报以后，说：“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就按邓小平的指示办了，“杀出了一条血路”，先在深圳、珠海，后在汕头办起了特区。广东的经济一下子就上去了。1980年，成都市川剧院应邀到当时经济起飞的广东演出，向广东观众上演了《王熙凤》、《破铁券》、《鸳鸯谱》等传统川剧。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率领省委一班人看完川剧演出后，一起上台接见川剧演员。习仲勋还发表讲话，其中专门讲道：

“小平同志说过，不看川剧，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川剧演员只管唱戏，若硬要弄到乡坝头劳动，莫把田土踩板了”

邓小平与他的亲密战友刘伯承率师回川，解放了家乡以后，在重庆、在成都看了多场川剧演出。

1951年12月5日，在邓小平的过问下，全川600多名川剧艺人欢聚重庆，切磋技艺，交流川剧改人、改制、改戏的“三改”经验和成绩，举行川剧观摩演出。邓小平只要挤得出时间，就要去看这些川剧观摩演出。

1952年7月，邓小平到中央工作以后，又与北京有关部门联系，使川剧于1952年9月、10月首次到北京演出，川剧艺术家阳友鹤、陈书舫、周企何等为首都人民献上了《柳荫记》、《秋江》、《评雪辨踪》等传统川剧，使川剧一炮走红京城。邓小平多次与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吴玉章、杨尚昆等川籍领导人一起观看。

“文革”以前，邓小平多次回到四川视察工作，只要条件允许，他都要“一面喝盖碗茶，一面看川剧”。

1957年11月7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的陪同下，视察了德阳工业区。在听取汇报后，邓小平就德阳的工业建设、城市规划等三个问题作了指示。从德阳回到成都以后，邓小平、杨尚昆这两个四川人就在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等人的陪同下，去春熙路“三益公”剧院看川剧。

观看演出之前，四川省有关方面负责人向邓小平、杨尚昆汇报，1954年成立的“四川省川剧传统剧目鉴定委员会”，已经

发掘和整理了大量的川剧传统剧目，收集了2000多个川剧手抄本。从1954年到1957年，经过三年的工作，已编印《川剧》系列88辑。邓小平听后，十分高兴。

戏间休息时，邓小平到休息室抽烟。他发现连演川剧的“三益公”剧院，也贴满了“大鸣大放”的大字报。这里的大字报和其他地方的大字报一样，充满了火药味。有的大字报还点名攻击一些著名的川剧演员“有反党言论”，“应该划为右派分子”。邓小平看后，先找来剧院负责人。剧院负责人说，他们本身带着赴京汇报演出的喜悦回到成都，却被派到剧院的“反右派工作组”命令人人都要补上“反右派斗争”这一课，人人都要写大字报，而且要按照5%的比例，划出川剧演员中的右派分子。邓小平就和杨尚昆一道，找来四川省委负责人和省文化部门负责人，对川剧名演员阳友鹤、曾荣华、陈书舫、竞华、周企何、周裕祥、杨淑英等说：

你们是唱戏的，把戏唱好就行了。不要搞这个名堂（指在川剧演员中划右派分子）。

邓小平这样讲了以后，在川剧演员中便停止了“鸣放”，也没有再划“右派分子”。

1958年10月27日到11月4日，邓小平又在杨尚昆的陪同下，来到四川，视察了成都、重庆、郫县、彭县、江油、德阳、昭化、剑阁等地。视察中途，回到成都，邓小平便要去看川剧。

当时，“大跃进”、“大炼钢铁”，在四川也搞得风风火火的。连川剧演员在演出结束后也要到“土高炉”去“大炼钢铁”。

邓小平有一次看川剧演出，听一位川剧演员悄悄告诉他，演完川剧后，他们还要去“大炼钢铁”，十分劳累。



邓小平便当着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面，对川剧团的负责人说：

川剧演员只负责演川剧，他们炼得来啥子钢铁嘛！再说，即使是专门学过冶炼钢铁的，演了川剧以后那么累，哪里还有精力去炼钢铁？

邓小平的话一言九鼎，从此，成都的川剧演员再也用不着演完川剧后再去“大炼钢铁”了。

在1958年这个“大跃进”如火如荼的年代，四川许多城镇居民都被赶下乡，到农村种田，四川城乡数以万计的茶馆被强制关闭，一切是为了“不准有人在城里吃闲饭”，能够上山下乡的都要上山下乡，能够在农村里安家落户的都要到农村安家落户。平日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四川城镇街道，这个时候大白天也几乎是一片寂静，行人很少。因此，很少有“在城里吃闲饭”的观众来看川剧演出，川剧戏院门可罗雀。许多川剧演员没有戏演，也成了“在城里吃闲饭”的人。这样恶性循环，不少川剧演员也被动员要去“上山下乡，从事农业劳动，不要在城里吃闲饭”。

邓小平听到川剧演员向他反映了这一情况后，他又当着四川省委书记和川剧院的领导及演员说：

“川剧演员只管唱好川剧，若硬要把他们弄去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做活路，莫把乡坝头的田土踩板了哟！”

邓小平说了这个话以后，川剧团再也不动员演员到农村去种田了。

这些“小事”都足以说明，为什么川剧演员对邓小平的感

激之情，是真正发自内心的。

邓小平关心川剧事业，邓小平关心川剧演员，川剧演职人员就不会辜负邓小平的期望。他们把川剧这个在我国西南地区影响最大、在全国300多个戏曲剧种中独树一帜的地方戏曲剧种，推陈出新，使其锦上添花。1961年8月，峨眉电影制片厂首次把川剧《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搬上银幕。公映后，受到全国观众的交口称赞。

1978年初来川看川剧，使全国戏剧都解禁

笔者在采访邓小平的女儿邓林时，她还谈到了关于她在“老爷子”（指她父亲）这个“川剧师傅”的直接培训下，学会了看懂川剧的情况。

她说：老爷子特别赞赏川剧的传统表演艺术。他说：我给



本书作者在邓小平办公室里采访邓小平长女邓林后，与她合影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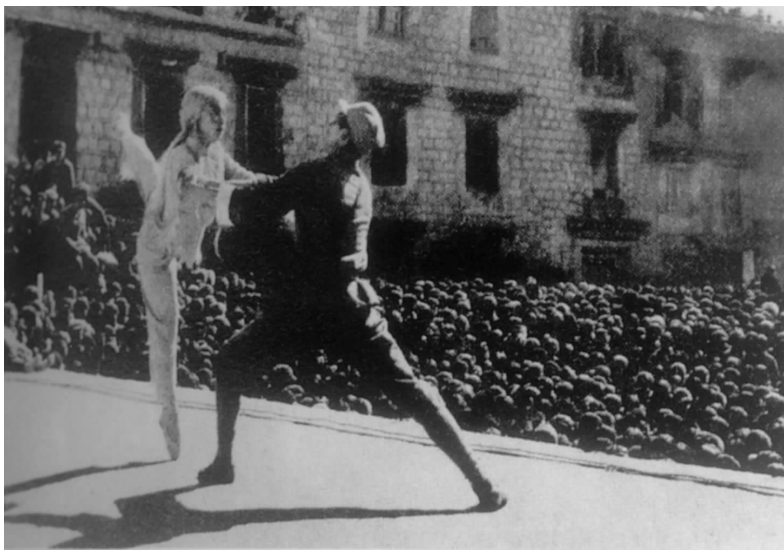


你讲“不喜欢川剧就不懂得文化”，不是随便说的，是有道理的，你连川剧都看不懂，就更不懂川剧是着重用“写意”的手法，给人物形象传神，在道具那么简单的舞台上，渲染出生动的故事情节。而那些最巴适（精彩）的演唱，又常常使观众融入情节，同演员喜忧相濡，回味无穷，硬是安逸得很哟。我经常老爷子指点，后来看川剧看多了，知道川剧植根于四川民众的土壤，以四川人熟悉的方言演唱，最接近社会普通大众的生活习俗，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四川人乐观诙谐的性格禀赋，豁达坦然的生活态度，劳作生息的风俗习性，这些特殊的气质，在川剧中被鲜明地表现出来。我有一次问老爷子：“你乐观诙谐等性格的形成，是不是也受到过川剧的影响？”老爷子说：“可以这样说，是有影响。”

可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大革文化命”的灾难开始后，邓小平蒙难了；他即使没有蒙难，要想看传统川剧，也看不成了，为什么呢？

传统川剧和全国所有传统戏剧，全被灌以“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宣扬才子佳人”、“宣扬封、资、修”的罪名，在“大破封、资、修，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出舞台”的口号声中，被禁锢了。而且一被禁锢，就长达十多年，导致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极大破坏。全国上下只有8个“革命样板戏”，全中国的文艺整天只能宣传这8个“革命样板戏”。各地方剧种如果要想演出，也只能移植这8个样板戏。原本百花盛开的文艺园地，这时一片凋零。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都知道，邓小平在第二次复出以后，有一次和江青等人看“革命样板戏”，邓小平没有等戏演



在四川阿坝藏区，“文革”时期也只能演出“革命样板戏”。

完，便中途拂袖而去，并且气愤地说：

“这是什么百花齐放？是一枝独放！”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回到四川家乡看了传统川剧，就打破了戏剧长达15年“万马齐喑”的局面。

1978年1月31日，新华社播发了一则电讯稿：“新华社1月31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结束对友好邻邦缅甸的访问，今天下午抵达四川省府成都。”

邓小平回到成都的当天晚上，就在金牛坝招待所小礼堂观看了川剧演出。接着，2月1日、2月2日两个晚上，他接连在金牛坝看川剧。

三个晚上的川剧是由成都市川剧团、四川省川剧团联合演出的。三场都演的是邓小平自己点的传统折子戏。



1978年1月31日晚，邓小平在成都金牛坝小礼堂观看川剧传统折子戏后，走上舞台，祝贺演出成功。

由于当时是农历腊月下旬，大寒刚过，成都还比较冷。演出川剧的金牛坝招待所俱乐部当时既没有暖气，更没有空调。邓小平三个晚上看川剧，都在脚上搭上毛毯。他一面看戏，一面喝着“盖碗茶”。因听力欠佳，凡没有

听清楚的唱段，他还不时问坐在旁边的人。每场演出结束以后，邓小平都要上台去祝贺演出成功，与川剧演员一起照相。参加演出的演员，当“邓小平副总理”在舞台上与他们握手时，都激动得雀跃欢呼，热泪盈眶。

1997年2月19日，小平同志与世长辞。笔者为了写一篇悼念小平同志的文章，曾采访过著名的川剧表演艺术家竞华。竞华怀着对小平同志的由衷怀念，打开了回忆的闸门，她说：“我们戏剧界成为重灾区，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我记得1962年，‘阶级斗争天天讲’以后，江青就提出‘舞台上牛鬼蛇神和鬼戏问题严重’。1963年，上面又发出‘停演鬼戏’的决定，文件说‘戏剧界是死人在统治，有一条文艺黑

线’。从那个时候起，我当小娃娃起就开始学的传统川剧，先是逐渐不准演出；到了以后，就完全被封杀了。传统川剧被禁锢了15年。我们不少很有才华的川剧艺术大师和青年演员一样，不但不能登台演出，反而被多次批斗，被关进‘牛棚’，横遭各种迫害，人格和尊严受到极大的侮辱。有的川剧表演艺术家还含恨而死。要想演川剧，也只能移植‘革命样板戏’。许多川剧演员只好改行。想不到小平同志1978年1月底到了成都以后，不但要看已被封杀了15年的传统川剧，而且他还点了我和其他一些演员的名字，点了他喜欢的传统折子戏，要我们演出。演完以后，又上台来跟我们握手，祝贺演出成功，跟我们一起照相。我们当时多么激动啊！——我们四川老百姓喜欢的传统川剧又可以演了，我当小娃娃起就开始学的传统川剧又可以演了，小平同志真伟大。我们人人都很激动，都高兴得流泪了，那个场景，我会永远铭记在心间。我们川剧艺人对小平同志是发自内心的佩服、敬意和爱戴。”

1978年1月31日至2月2日三个晚上，邓小平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小礼堂，连续观看三场川剧演出的时候，还问四川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这些戏，为什么只作内部演出？为什么不上广播、电视？”

邓小平连看三场川剧的行为本身，邓小平对传统川剧所讲的这一席话，在当时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川剧便在全国第一个上了广播、上了电视。

就这样，被禁锢了15年的传统川剧，从此获得新生；就这样，一批川剧老艺术家获得解放，重返舞台；就这样，川剧成为拨乱反正之后，全国最早解放的地方剧种。



1978年2月2日，邓小平在成都金牛坝小礼堂连续第三个晚上观看川剧演出。

紧接着，川剧优秀传统戏的公演，受到了观众极其热烈的欢迎，出现了罕见盛况。

新闻媒体迅速将邓小平在成都连看三场传统川剧、接见川剧演员，并发表重要谈话等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神州大地。

以此为契机，全国戏剧纷纷解禁，迎来了真正的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文化艺术的春天。

邓小平在成都连看三场传统川剧并发表重要谈话一年以后——1979年2月28日，十多年来一直被诬蔑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有一条文艺黑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也得到了彻底平反。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代表演川剧， “那我也再看一场”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有关部门通知四川调川剧到北京为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代表演出。

从四川省委领导到省文化厅的负责人，从川剧表演艺术家到演职人员，听到这一消息后，都很兴奋：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代表演出川剧，真是太幸福了！他们认为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代表演川剧，“肯定小平同志亲自定的”。

四川省选派了一流的川剧演员，带上了小平同志最喜欢的



1978年11月，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演出的川剧演员。



传统剧目，由时任四川省文化厅厅长、小平同志的堂弟邓自力带队，一支庞大的演出队伍到了北京。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代表演出川剧，地点在人民大会堂。

演出当晚，邓小平到人民大会堂观看来自家乡的川剧演出。为了让全国各地的代表都能看得懂川剧，邓小平在演出前亲自点了几折传统喜剧。因为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一特大喜讯，代表们又看川剧喜剧，就会“喜上加喜”。

从开场到落幕，小平都是乐呵呵的，有时还笑出声来。他不时向与他坐在一起的王震讲解每个折子戏的剧情。王震是湖南人，在邓小平的影响下，也爱上了川剧，此前也曾多次与小平同志一起观看川剧。

时年74岁的邓小平，耳朵听力欠佳，舞台上有些唱腔听不清楚的，他就向身边的女儿询问。

参加演出的川剧演员都知道，正因为几个月前邓小平在成都看了川剧，才使全国戏剧解禁，才迎来了文化艺术百花齐放的春天。他们找到领队的省文化厅厅长邓自力：

“邓厅长，你是小平同志的堂弟，去向他老人家报告一下，说我们来一趟北京不容易，许多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代表也希望再看一看川剧，是不是让我们再为他们演出？”

邓自力找到大哥邓小平，把川剧演员的想法说给他听。

小平同志说：“既然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代表还想看，就再演嘛。那我也再看一场。”

邓自力把传统川剧折子戏的节目单递给他，请他点戏时，小平同志第一个就点了《点将责夫》。

小平同志对邓自力解释说：杨淑英的戏演得好，她演《点

将责夫》中的穆桂英，演得有气魄，唱词清楚，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其他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可能都听得懂。

本来邓自力在把罗列了许多川剧折子戏的节目单递给小平同志之前，就希望他不要点杨淑英的拿手戏。因为正在这个时候，杨淑英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她的配角又回四川去了。

谁知小平同志偏偏第一个就点杨淑英演《点将责夫》。这可使邓自力犯难了。但是既然小平同志已经点了，邓自力就只有去给杨淑英做工作。令邓自力想不到的是，杨淑英的工作很好做。杨淑英对邓自力说：“小平同志几个月前到成都来看我们演传统川剧，使川剧解禁，使我们获得新生。我觉得小平同志才是我们川剧艺人的真正知己，‘士为知己者死’。既然小平同志点了我演《点将责夫》，我一定要为小平同志、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代表把戏演好。使小平同志、使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代表都很满意。”

与此同时，杨淑英也担心自己生病了，会不会影响演出质量。她对邓自力说：“今年春天，就是几个月前在成都金牛坝给小平同志演出之前，我的身体状况也不大好，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就给我服了几颗进口的药片，使我演出效果达到了最佳状态。邓厅长，你是不是帮我在卓琳同志那里再要几片药，免得我演出时体力不支。”

邓自力立即去到小平同志家里，找到卓琳大嫂。

卓琳拿给邓自力一盒进口药说：“杨淑英生病了，服这种进口药最见效。”

当邓自力把药拿给杨淑英以后，杨淑英只服了两片，余下的放在一边，留作纪念，一直舍不得吃，保存至今。

直到2004年，在小平同志百年诞辰的日子，杨淑英把1978



年卓琳拿给她的这一盒进口药又展示给许多人看：“不要小看这几片药，它凝聚了小平同志夫妇对我们川剧和川剧演员的关怀！我要永远保存下去！”

小平同志还特别喜欢著名川剧丑角周裕祥主演的《晏子说楚》这出小戏。当小平同志看到楚王及众臣讥笑晏子身材矮小、晏子却回答“你们须知秤砣虽小能压千斤，舟桨空长终为水没”时，非常高兴地笑出声来。小平同志过去在成都就看过周裕祥主演的这出小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他又点了此戏，大概一是和当时的时局有关，一是喜爱晏子这个其貌不扬的人才，还有就是那些诙谐而高雅的台词，使人感到既紧张又轻松愉快。

小平同志主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忙，他就多次委托卓琳去川剧演职员住地看望。

原本在成都生活惯了的川剧演员们，以为12月的北京与成都一样不会很冷，便都没有带棉衣等御寒的衣服去。

当卓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告诉了小平。小平同志马上安排给川剧演职员，每人送去一件军用棉大衣御寒。

军用棉大衣穿在川剧演员的身上，小平同志的关怀暖在他们心里。他们太感谢小平同志了，就又向卓琳和小平同志的小女儿毛毛提出了一个要求：想见见小平同志，想再给小平同志专门演一场。

卓琳和小女儿毛毛向小平转达了川剧艺人的要求以后，小平爽快地答应了：对嘛！不少川剧演员年纪都大了，其中还有七老八十的人，他们和我见一见也不容易，那我就再看一场，同时把聂荣臻、胡子昂、杨尚昆、王震也请来看。这一次，演



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

职人员不受人数限制，全团都参加，也可以自带照相机，我们一起照相，他们也好留作纪念。

这一天，红日西沉，夕阳洒满北京古城。邓小平披着金色的晚霞，提前来到演出剧院的休息室，迎候他请来的客人聂荣臻、胡子昂、杨尚昆、王震，向客人介绍他点的几折传统川剧折子戏。

演出结束以后，邓小平与聂荣臻、胡子昂、杨尚昆、王震等人一起走上舞台，与老艺人一一握手，交谈，合影。

川剧演员在北京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问浙江省委书记：“你看过川戏不？”

春雨潇潇，南国春早，迎春花含苞欲放。1983年2月9日，邓小平来到杭州。住进位于西湖边上的刘庄宾馆一号楼。这是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第一次到杭州。

第二天，杭州的天气一改连日阴沉，毫不吝啬地送来灿烂的阳光。邓小平起了个大早。他像往常一样去散步。回到宾馆一号楼，看见自己的外孙萌萌在背诵古诗：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邓小平问外孙：

萌萌，这首诗是哪个人写的，你晓得不？

“是宋朝苏轼写的。”

他是哪个地方的人呢？

“不知道。”

萌萌，他是我们四川的人哟。他这首诗的题目是什么？

“爷爷，我忘记了。”

小平叫出外孙女眠眠：

眠眠，你今年冬天就11岁了，你帮弟弟回答一下。

眠眠听了弟弟再背了一遍诗以后，说：“这首诗的题目是《饮湖上初晴后雨》。”

邓小平听后，十分惬意。他又对两个孙孙说：

这首诗是我们四川人苏轼900多年前在这里写的。因为他的诗中多次把西湖比喻为中国古代的美女西施，也就是他说的西子，后来人们就把西湖称为西子湖。

2月13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邓小平在西子湖畔出席了浙江省委、省政府举行的春节团拜会。

团拜会在杭州饭店的小礼堂举行。

上午10时，邓小平等人在浙江省委书记铁瑛等人陪同下，

来到这里与来自浙江全省各地的干部、知识分子、英雄模范的代表一起，共贺新春佳节。

邓小平一边看戏，一边与坐在身旁的铁瑛交谈。

邓小平问：“浙江主要有哪些剧种？”

铁瑛回答说：“主要有越剧、绍剧、甬剧、婺剧和瓯剧等十多种。”

邓小平走到哪里都忘不了家乡的水，家乡的戏，他接着又提了一个问题：

“铁瑛同志，你看过川戏不？”

“看过几个川戏，但印象不深了。”铁瑛说。

演出结束后，邓小平和铁瑛等人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

而恰好在距此的五年以前的2月，正因为邓小平在成都看了川剧、发表了“这些戏为什么不上广播、电视”的谈话，与川剧演员合影留念，才使包括浙江的越剧、绍剧等十多种浙江地方剧解禁。

小平重视川剧，是重视蜀乡文化传承

川剧文化底蕴深厚，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蜀人的历史和文化，物化在川剧里。

在邓小平的亲切关怀下，蜀风卷大浪，川剧壮川魂。

1982年7月23日，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省文化局党委《关于振兴川剧的请示报告》，发出了振兴川剧的号召，提出了对川剧实行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方针，在全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83年和1984年，在四川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和省文化厅

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挽救了一大批川剧珍贵资料，特别是对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代表剧目进行了录音录像；整理、撰写、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川剧书籍，各种川剧音像制品等销路畅通；从1983年起举行了全省性川剧汇演9届，培养、造就了晓艇、刘芸等一大批优秀中青年演员；打开了川剧走出国门、对外演出的道路，每年的对外友好演出和商业性演出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仅1987年5月在日本东京演出18场《白蛇传》，观众就达3万多人，川剧团抵达东京之前戏票已被抢购一空。川剧团到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也很受欢迎。

为了支持川剧的振兴，日理万机的邓小平于1983年秋天，在大地流丹、香桂迎户的季节，观看了“四川振兴川剧赴京汇报演出”。邓小平还接见了川剧表演艺术家阳友鹤、杨淑英、周



川剧“吐火”



川剧“变脸”

裕祥、许倩云等演职人员，鼓励他们带头振兴川剧。许倩云后来回忆说：“当我们进京汇报演出结束后，小平同志上台来接见我们，他不住地对我们说：‘振兴川剧，好哦，好哦！’”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关怀下，川剧再一次名声大噪，再次成为全国戏剧界新的注目点。一大批新编传统剧目，受到海内外观众的欢迎。以《死水微澜》、《变脸》、《中国公主杜兰朵》、《山杠爷》、《巴山秀才》、《金子》、《四川好人》为代表的优秀剧目，从一个方面代表着戏曲发展的潮流。川剧在面临时代的挑战、在转轨变型的过程中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在积极探索前进。以后，又由川人一手打造了中国第一部川剧音乐电视剧《中国公主杜兰朵》，注入大量西洋乐器和音乐元素，令人耳目一新。

在邓小平的关怀下，川人感悟小平同志对川剧发展的殷切希望，川人重新审视曾被忽略的、绵延数百年的传统川剧文化。有几百个演出团体，在演出带有浓厚蜀乡原汁原味、艺术形式



丰富的川剧。极具权威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认为川剧5种声腔发展相当完善，表演形式丰富，变脸、吐火等绝活享誉世界，3000多个优秀传统剧目保存完好，因此把川剧与昆曲、古琴等，列为我国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备选项目。

小平重视川剧，是重视蜀乡文化传承。

蜀乡人民一定会使邓小平关心川剧的遗愿，化作宏图，让具有旺盛艺术生命力、带有与生俱来的蜀乡泥土气息的川剧，跻身于现代艺术的行列。

“蜀道难，要搞就搞个西南航空”

为纪念小平同志一百周年诞辰，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共四川省委联合摄制大型电视专题片《邓小平与四川》。笔者作为该片两位总撰稿之一和策划人之一，在参加拍摄时，又一次采访了原四川省省长杨析综。



四川航空公司飞机飞越长江峡谷



笔者这一次到杨省长的家里时，他正在书房挥毫泼墨。这位生于四川大邑县、解放前在中学和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就从事进步革命活动的省长（以后又任河南省委书记），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少有的具有大学本科文凭的省委书记。四川省另一位省委书记多次对笔者说：“析综同志是当时我们四川省委领导班子中唯一‘科班出身’的。”

杨析综书记从来就平易近人，在我们这些晚辈面前从来不摆架子。我们在他面前也很随便。

看见我进入他的书房，他很有礼貌地说：“对不起，只有3个字了，你先喝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四川省温江地区广汉县金鱼公社搞起了“包产到组”，这一大胆行动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发端。而时任温江地委书记的杨析综和温江地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是坚决支持金鱼公社“敢为天下先”的改革行动的（此前他也在广汉县委任过书记）。笔者第一次采访杨省长主要是上述内容。

而这第二次采访主要涉及小平同志关心四川交通（航空）方面的情况。

杨省长“完成了”他的“书法作业”后，便对笔者侃侃而谈。

他先来了个“开场白”：“估计我们很多四川人，可能都不知道日理万机的小平同志，还特别关心我们四川和西南的航空事业这件事。”

那是1984年春末夏初，杨析综与四川代表团其他同志一道去首都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

作为四川省的二把手（省委副书记、省长），杨析综是“有备而去”的——除了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之外，还要找到小平同志，报告四川省委、省政府为了改善四川的交通问题，在搞好陆地交通的基础上，计划在四川组建全国第一个地方航空公司，搞空中交通。

杨析综本人也没有想到，天随人愿——他不但见到了小平同志，而且胡耀邦、万里、杨尚昆、张爱萍等好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这一天都和小平同志在一起。

兴高采烈的杨析综，便向小平同志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汇报：“1000多年前，李白就惊呼‘蜀道难’。为了适应四川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彻底改变‘蜀道难’的问题，我们除了要进一步搞好陆地交通和川江航运之外，还想搞空中交通，我们计划在四川组建一个地方航空公司。”

与杨析综一道，见到小平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何郝炬、聂荣贵等四川省的负责同志作了补充。

小平同志听后，立即表示支持。他说：析综呀，蜀道难的问题是应该解决。李白写《蜀道难》这首诗，应该是在唐朝开元、天宝年间，距今1200多年了。李白在这首诗中，一开头就用了我们蜀地的方言惊叹词“噫吁嚱”，接着十分感慨：“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1200多年了，四川的交通虽然大大改观，但是“蜀道难”的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之所以我们第二野战军1949年底解放了四川以后，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修建成渝铁路，接着修了川藏公路。30多年前，我在四川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交通问题。

小平同志接着说：四川的交通是个大问题，不彻底解决，就会影响四川的改革开放，影响四川的经济发展，影响人民群

众的生活。你们四川省委、省政府考虑得周到，和我30多年前的想法一致，我们这是“英雄所见略同”哟！你们现在除了要搞好陆地交通，搞好川江航运之外，还想搞空中交通，想搞个地方航空公司，这个想法好哇！不过，交通问题不仅四川存在，贵州也存在，云南也存在，西藏更存在，因为在西藏高原上修铁路难度不小。我支持你们搞个航空公司，不过，不叫“四川省航空公司”，而应该叫“西南航空公司”，把西南几个省区的航空都搞起来，公司可以设在成都。

小平同志说到这里，便对胡耀邦、万里、杨尚昆、张爱萍等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说：“各路英雄，有何见教？”



1980年7月，邓小平在成都飞机公司观看新产品。

胡耀邦、万里、杨尚昆、张爱萍等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表示支持。

办事向来认真的小平同志，为了把解决蜀道难的问题、解决西南其他省区的交通问题而建立西南航空公司这件事落到实处，专门托付给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

小平同志对万里同志说：你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西南航空公司这件事我就托

付给你了，你硬是要支持哟！

万里同志表态“一定落到实处”后，小平同志很高兴地对在场的所有人说：

“对头！蜀道难，我那个四川家乡自古以来就蜀道难，要很好解决这个蜀道难的问题，要搞（航空公司），就搞个西南航空（公司），同时也解决了西南其他省区的空中交通问题。”

邓小平接见杨析综的当天晚上，杨析综便向在北京出席全国人代会、政协会的四川代表作了汇报。接着便向云南、贵州、西藏等省区通报小平同志关于“搞西南航空公司”的意见，这几个省区都表态愿意参加。

不久，由于小平同志的关怀，在国务院和国家民航总局的支持下，很快成立了“中国西南航空公司筹备小组”，由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副省长的顾金池同志担任筹备小组的组长。不久由四川省政府和贵州省政府担保，中央有关部门批准了贷款额度（四川省是通过中国银行贷款几千万美元），共引进了6架波音737飞机。由于1985年4月，杨析综奉调河南任省委书记，他对于他离开四川后“西南航空”的情况便不清楚了。

笔者又采访了参加过“西南航空”筹备工作的周正权同志，他当时担任中国民航成都管理局副局长。

周正权副局长介绍说：

“的确如杨析综省长所讲，正因为有了小平同志的关怀，西南航空公司才得以正式成立起来。当时引进的6架波音737飞机，是300型的，贵州省1架、四川省1架、中国民航成都管理局4架。除了西南几个省都参加西南航空公司之外，当时计划单列的重庆市也申请加入了。

以后，国务院下文，民航要改制，进行改革。根据国务院



的文件精神和各省市的具体情况，云南省首先退出了西南航空公司，接着重庆市退出了，以后贵州省也退出了。

到1987年，原来的西南航空公司正式解散。

这以后又正式成立的西南航空公司，是根据后来国务院的有关文件精神，重新组建的。至于四川航空公司（川航），据我所知，那是原成都飞机公司（132厂）一些老同志大约在1985年下半年开始策划筹建的。川航从筹建到以后正式成立，也是‘好事多磨’。

后来正式成立的四川航空公司，和1984年杨析综省长最初向小平同志提出的想建四川航空公司是两回事；后来正式成立的西南航空公司，和1984年小平同志提出的‘蜀道难，要搞就搞个西南航空（公司）’也是两回事。”

周正权副局长最后对笔者说：

“小平同志是一个世纪伟人，国内那么多事，国外那么多事，但我们四川省的省长一经向他提出，为了彻底解决蜀道难问题，想发展空中交通时，他不仅立即表态支持，而且马上落到实处。这说明小平同志不仅关心四川的交通，关心西南的交通，而且关心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作为一个从事了一辈子民航工作的人，我觉得很幸福，很自豪。”

“回到四川，我就回家了”

时光流逝，物换星移，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们对于很多事都淡忘了。但是，蜀乡人对于邓小平于1986年2月最后一次回到四川住了15天的记忆，却挥之不去，如饮陈酿，历久更醇。

一进金牛坝宾馆就说： “我回家了”

1986年1月31日傍晚，灰蒙蒙的雾霭笼罩着川西坝这块民风纯朴的田野。

晚上7时，成都西郊的金牛坝宾馆彩灯怒放，光华灿烂的各式灯火耀出熠熠光芒，骤明的灯光使金牛坝万物生辉，一位尊贵的客人邓小平在火树银花中来到了这里。

一进金牛坝宾馆的大门，邓小平就对迎接他的四川省委和成都军区负责人说：



“我回到家了！”

类似这样的话，邓小平说过多次：

“回到四川，我就回到家了。” “回到成都，我就回到家了。”

笔者曾在采访邓小平的两个妹妹和女儿时，问过她们为什么小平同志从15岁离开广安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广安？

二妹邓先笑说：“大哥邓小平原来的名字叫邓先圣，我和先群妹妹就是按家里的辈分谱系排列规矩取的名字。我对大哥说，广安多次请你回家去指导工作，你为什么不去？大哥说，回老家干什么？我们一回广安，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成都也是老家，四川也是老家，中国也是老家。我们是共产党，不能学广安出生的大军阀杨森，杨森说：‘广安，要广为安排我们广安的人，’凡是杨森的亲戚，他都要照顾，都要安排职务。我们共产党不能搞这一套。”

三妹邓先群少将说：“我也向大哥提出过这个问题。大哥说，广安老家也没得啥子人了，回去干啥子？不就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宣扬自己嘛！有一次广安家乡来人向大哥提出要整修邓家老院子，大哥说：‘修它干什么，是啥子样子就是啥子样子，有钱去整修，不如去修个学校。’”

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说：“父亲自己不回老家，也不许我们回去。他说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扰乱地方。直到1989年我才和二姑姑邓先笑一起回了一趟广安。”

与各族家乡人在家乡过虎年

1986年2月8日是农历新年除夕。回到家乡的邓小平在成都

金牛坝宾馆与各族家乡人一起过虎年。

占地300多亩，有楼台亭阁、湖光山色、拱桥轩榭的金牛坝宾馆一片春意盎然。600多名党政军干部和各族群众代表喜气洋洋，来这里参加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举办的春节团拜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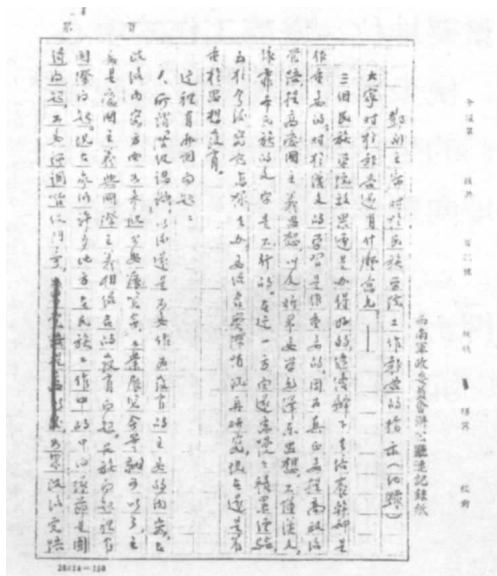
笔者的侄儿吴贤哲，有幸作为羌族代表，参加了与敬爱的小平同志一起过虎年的团拜会。他讲述了令他终身难忘的情景。团拜会的前一天，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任和他任教的西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就通知他，由他作为羌族代表，参加在金牛坝宾馆举行的团拜会，和小平同志一起过年。当天晚上，他兴奋得夜不能寐。四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小平同志在西南局工作时，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西南民族地区的实际，成功地结合起来，制定了适合当时



1950年12月，邓小平和少数民族代表在一起。

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使包括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的羌族在内的民族问题全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与此同时，对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有远见卓识的小平同志，还亲自关怀“集中力量，在成都创办西南民族学院”事宜。小平同志专门派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负责西南民族学院的筹备工作，以后又由王维舟兼任西南民族学院的院长（这种规格在全国都是最高的）。想到这里，吴贤哲从床上翻身下来，从书架上拿出《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很熟悉地翻到第168页，重温一段重要指示：“西南人才缺乏，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然后又从玻板下面取出一张小平同志手迹的影印件。这张手迹是1952年7月10日，也就是小平同志即将去中央工作的前几天挤出时间与贺龙、

王维舟一道参加西南民族学院第二期开学典礼为学院题的词：“团结各民族于祖国大家庭的关键之一，是在于各民族都有一批热爱祖国并能联系群众的干部。”西南民族学院一直按照小平同志1951年为该院规定的任务办学：“培养西南各兄弟民族的区域自



邓小平对民族学院工作报告的指示



1986年2月，邓小平在成都金牛宾馆出席四川省委、省政府举办的春节团拜会。

治和管理政权的干部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人才。”从此以后，该院共为全国45个少数民族培养出各类人才7万多人，包括全国第一个藏族博士生和第一个羌族博士生。吴贤哲自己在西南民族学院执掌教鞭以后，又被作为访问学者送到北京大学深造，这些全都是托了小平同志的福。

第二天一大早，吴贤哲坐上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车，到了金牛坝。看见这里彩灯高挂，花满春浓，一片喜庆的节日气氛。9时15分，满面春风的小平同志在王震同志和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万海峰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金牛坝宾馆俱乐部大厅。小平同志精神焕发，步履稳健，含笑走到每一位代表面前，与大家一一握手。

“小平同志您好！”“祝愿您老人家健康长寿！”这是与小平



1986年2月，邓小平、王震在四川省春节团拜会上。

同志一起过虎年的每一个情绪激荡的人，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表达了四川家乡各族人民的心声，道出了全国人民的深深祝愿。

日理万机的小平同志，一分一秒都万分珍贵，而他竟然用了将近两个小时，兴致勃勃、精神矍铄地和家乡各族人民欢度虎年。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他对蜀乡、对蜀乡各族人民的情结。

11点过钟，虎年团拜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小平同志离开俱乐部大厅以后，人们依然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刚刚过去的这将近两个小时，虽然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极其短暂的一瞬间，但它却是蜀乡各族人民永远值得记忆的一瞬间。

“终于见到了家乡的父母官”

1986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五，邓小平在金牛坝宾馆接见了来自广安县的“父母官”。

笔者采访了当时担任广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的王仁全，他回忆了受到小平同志接见的幸福情景。

王仁全和广安县委书记、县长等人从广安到了成都以后，被省委办公厅安排住在市内的滨江饭店。2月12日下午，省委办公厅通知他们，要他们次日早上9时到达西郊的金牛宾馆。接到通知后，他们非常兴奋，立即给广安县委、县政府打电话：“我们明天就可以见到敬爱的小平了！”打完电话，几个人又把小平从小就爱吃的家乡特产烘糕、桃片、白市柚，爱喝的奎阁酒和其他饱含着家乡人民深情厚谊的广安特产重新收拾了一下。

当天晚上，这几个广安人异常兴奋，都睡不着觉，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凌晨4点钟，几个人干脆从床上坐了起来，只恨时间过得太慢，怎么不快点天亮呢？

他们又像两天前在广安县委会议室开会时一样，再次商量：无论如何也要请小平同志回广安去一次，哪怕一天也行。当然，他老人家日理万机，特别忙，那么，半天也行。

王仁全在不经意中打开窗户向窗外一望：糟糕，白茫茫的雾霭笼罩着大地，楼下往常明亮的街灯也黯然失色。他们几个人面对大雾，更加忐忑不安起来：这么大的雾，肯定会影响原计划安排的要和小平同志合影。如果不能和小平同志合影，特别是如果不能把小平同志请回广安去看一看，他们就这样回到

广安，又怎么向重托于他们的百万故里人交代？

古话说：“智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这几个愁得焦头烂额的广安县领导干部，凌晨5时，就把驾驶员喊起来，要他开车去金牛坝。驾驶员说：“小平同志住的金牛宾馆，我们半夜三更去，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会让我们进去吗？”

没有办法，王仁全和县委书记、县长，又只有等到7点钟，才在白茫茫的一片大雾中去金牛宾馆，在那里焦急地等待大雾快点散去，等待省委办公厅通知的9点钟快点到来。王仁全对县委书记说：“不要着急，我相信雾会散去的，太阳是会露脸的，因为我们今天是代表百万家乡人民来看望小平同志。你想，世界上只有一个小平同志。我们县委办公所在地的‘涵虚园’那棵铁树，平常隔几年要开一次花，可是1966年小平同志被作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打倒以后，天怒人怨，就不再开花了。而1977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之后，千年铁树又开花了，并且从那一年起到现在，每年都开花，从来也没有间断过。这是众望所归、众心所向呀！”

县委书记说：“莫开玩笑。这么大的雾，把人都要急死了。你平时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咋个今天相信迷信了？我们还是要想想办法，看如果大雾不散去我们咋个办？”

王仁全说：“我不是相信迷信，我知道铁树开花与人事无关。不过这个季节成都这种天气我很清楚，傍晚和凌晨雾大，九十点钟以后一般就会云开雾散见太阳。所以昨天省委通知我们九点钟到金牛坝。”

王仁全这么说，原本是想宽大家的心，虽然他对成都的天气比较了解，但他也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成都这一天是不是会出太阳。谁知王仁全的“宽心话”

竟变为“一语成谶”。两个多小时过去后，果真“天随人愿”。这正如蜀乡眉州人苏东坡1073年写的诗《新城道中》所描述的那样：“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上午9时过后，春风浩荡，把成都上空的浓雾吹散，明晃晃的太阳终于露出了笑脸，一下子把金牛坝照得亮堂堂的。金牛坝浓密树林里不知名的小鸟啁啾欢唱，高亢的，婉转的，声声悦耳，似乎在述说王仁全他们几个广安人此时此刻欢喜欲狂的心情。

10点过钟，在金牛坝宾馆东楼前，敬爱的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同时出现了。

小平同志满面笑容，风趣地说：

“好啊！我今天终于见到了家乡的‘父母官’了！”

他在和每一位从广安来的同志握手时，都要问起姓名、年龄、文化程度。

小平同志说：我今天特别高兴。你们年纪轻，有文化，有希望。

王仁全回忆说，当时小平同志还问了关于广安如何发展方面的问题：

广安有什么优势？广安今后怎么发展？广安怎么样子发展科技？

小平同志、王震同志与大家合影以后，小平同志有事先走了。王震同志招呼广安的同志：

“你们跟我来。”

到了王震同志的住地，他兴致勃勃地翻开地图册，询问了广安的交通、农副土特产品、矿藏、农民收入等情况。最后，



王震同志告诫大家，要扬长避短，发挥广安矿藏、水利、劳力等优势，尽快把广安建设好。

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同志也接待了广安来的同志。当广安来的同志请小平同志和卓琳同志回广安视察时，卓琳同志说：

“他（小平同志）很忙。再说，回到四川，就算回到了家乡。请你们代向家乡人民问好！”

“幺舅，我两个难得见面，合个影吧”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道：“我们在北京有一大家子人，而在广安故乡只有父亲的一个亲舅舅名叫淡以兴。”“爷爷与祖母淡氏是在1901年成婚，1902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长女邓先烈出生。那时爷爷才16岁。1904年他们的长子邓先圣出生，这就是我的父亲。”

邓小平的亲舅舅淡以兴，生于1900年9月26日。淡以兴还在襁褓中时，就常常被姐姐（邓小平生母）带到邓家去。淡以兴学走路以后，去邓家玩的时候更多了。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时，他的幺舅淡以兴已满4岁。邓小平从牙牙学语时起，也常常被大人带到舅舅家去。小时候的舅甥俩常在一起玩。那时候的外甥邓小平和幺舅淡以兴虽说是两辈人，但他们在一起捉迷藏、玩耍时，从来没有顾及辈分不一样，而完全像一对志趣相投的小伙伴。舅舅比邓小平大，处处护着邓小平；邓小平机智聪明，舅舅有了事他就主动帮忙。邓家老院子有一座神道碑石乌龟，是当年朝廷为表彰担任乾隆皇帝的大理寺正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的邓时敏的功绩而赐立的。广安乡人对这位大人物及朝廷赐立的神道碑石

乌龟都很尊崇，不敢随意触摸，更不敢攀玩，怕因此而亵渎神灵罹难。可是，邓小平却说要爬到碑座上去玩，小伙伴们都劝小平莫要妄动，妄动了，不但肚子要疼，家里还要遭灾。小平却不信邪，硬是爬到石龟探出的脑袋上。小平的幺舅淡以兴也学着外甥小平的样子，坐在石龟背上，还踢打着两腿嬉戏。其他小伙伴见状，都说邓小平和他的幺舅淡以兴是不信神灵的“捣蛋鬼”。

1986年2月，邓小平回成都过虎年，很想见见他的幺舅淡以兴。

2月8日，就是邓小平在成都金牛坝与600多位家乡人除夕团拜的这一天，远在300多公里外的淡以兴一家正在准备团年饭。广安县委的一位同志推门而入，来到淡家，说小平同志现在在成都，希望见一见幺舅和幺舅妈。

淡以兴一听，就说：“我们在老家守了一辈子，小平怎么不回老家来呢？再说，我是他的舅舅，他是我的外甥，应该他回广安来见我。”

县委的同志只好给淡以兴做工作，主要讲小平同志日理万机，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到广安。做了半天工作，淡以兴还是不愿去成都。县委的同志突然想起了淡以兴和邓小平一样特别喜欢川剧，便说，小平同志在成都已经把川剧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们舅甥一起好好看几场川剧。淡以兴听说看川剧，一下子来兴趣了：“我是要和小平一起好好看几场古戏哟！”这样，同意大年初二（2月10日）出发去成都。广安县委不但有负责人陪同淡以兴去成都，而且考虑86岁高龄的淡以兴身体不好，专门安排了广安县人民医院的白裕群作为保健医生全程照顾他。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道：“我的

这个舅公很有意思，他和父亲少时的感情很好。他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但却一辈子愚弱寡智，无能无才。年轻的时候抽鸦片烟，把家产都卖光了，连孩子都差点卖给了别人。”

笔者有一次采访小平同志的三妹邓先群少将时，她也讲起过么舅谈以兴：“么舅是个老实农民，没什么见识，他听别人说我大哥当了‘大官’，有一次竟闹着要去北京。有人问他：‘你怎么去北京呀？’他说：‘我坐火车去。’别人问他：‘你坐火车有车票钱吗？’他却回答：‘我是国舅，川剧里演的国舅是好了不起的人哟，未必国舅坐火车还要钱哪门（四川土话，反问词）？’”

谈以兴和老伴到了成都的当天，就对陪同他的广安县委的同志说：“我今天就要见小平外甥。”

广安县委的同志说：“今天我们好好休息，汽车走了一天一夜，你老人家也累了。省委和中央警卫局安排你明天见小平同志。”

第二天，谈以兴到了金牛宾馆的一个大客厅，坐了一会儿，几个人进客厅来了。86岁的谈以兴平时眼睛不太好，但今天却一眼就认出走在最前面的是他的外甥邓小平，走在后面的有小平的二妹邓先芙和小平的继母夏伯根老太太。谈以兴只是不认识另外一个老太太。

邓小平见到么舅，马上与他握手：么舅，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两个爬到其他人都不能爬的神道碑乌龟背上去，那些小朋友都喊我们两个是“捣蛋鬼”？

谈以兴说：“咋个记不得呢？”

然后，邓小平说：好、好！么舅记得就好。我们两个有67

年没有见面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一直关心你、按时给你寄生活费的卓琳。

舅甥相见以后，免不了回忆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往事，免不了谈及几十年的沧桑岁月。邓小平说：人们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我们都老了，儿时的美好时光仅成记忆了。

淡以兴的老伴特别向邓小平讲道：1966年和1976年，邓小平两次蒙难时，淡以兴虽然受株连，在广安受尽了苦，但他在每次被残酷批斗时都要把身板伸直，挺起胸膛，扬起头说：“我们小平打不倒！”

舅甥共进午餐之前，邓小平说：“幺舅，我两个难得见面，合个影吧！”

一张表现邓小平乡情、亲情的珍贵照片，就这样在照相机闪光灯闪亮后产生了：邓小平和淡以兴站在中间，淡以兴旁边



邓小平夫妇和幺舅、幺舅妈及继母夏伯根、二妹邓先笑合影。



是卓琳和邓先芙，邓小平的旁边是小孙女、幺舅妈和继母夏伯根老太太。这张照片，以后被国内外许多刊物争相使用、登载。

“幺舅曾写信给小平大哥： ‘你要好好教育老婆卓琳，莫把钱寄丢了’”

在成都和邓小平见了面7天以后，淡以兴和老伴从成都回到了广安老家。邻居们发现，淡以兴老两口都穿了一身新衣服。便问淡以兴：“淡爷爷，你们的衣服既巴适（好看）又合身，是不是小平同志亲自给你们买的哟？”

淡以兴说：“小平一天硬是忙得很咧！他哪有时间去给我买衣服，这是我的外甥媳妇卓琳给我买的。我这个外甥媳妇可好哟！”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道：“解放后，我的母亲每月给舅公淡以兴寄一些生活费，他常常拿来就约上几个好友，一顿花光。‘文革’开始后，我们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直到‘文革’结束，我们才惊奇地听说，他居然还在！真不知十年动乱之中，他是怎么活过来的。后来，县里面照顾他，让他当了个县政协委员，每月发点生活费。我们也照旧给他寄些零用钱。1989年我和二姑姑邓先芙从成都去广安他家去看他的时候，他入很清瘦，眼已花了，耳也聋了，长着一脸的白胡子。他居然还认得二姑姑，但一点儿也不知道我。”

笔者有一次采访毛毛的“二姑姑”邓先芙时，她谈起了他与小平大哥、卓琳大嫂的关系，也谈到了老实巴交、心地憨厚的幺舅淡以兴的一件趣事。

二妹邓先芙与小平大哥、卓琳大嫂自1949年12月初在四川

重庆见面以后，几十年来关系一直处得非常融洽。

1949年11月初，广安中共地下组织的同志拿了一张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穿上军装的照片给邓先芙说：“刘伯承司令员和你的大哥邓小平政治委员快率刘邓大军解放四川、解放广安了。”11月底，广安中共地下组织的同志又告诉她：“重庆已经被刘邓大军解放了，你大哥邓小平已经在重庆了。”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邓先芙便和14岁的妹妹邓先群、母亲夏伯根老太太一道，把邓家老院子的大门锁了，坐上外公的木船（外公是渠江上的船工），从广安东门码头出发，顺渠江而下去重庆。由于木船在渠江中划行得很慢，划行了将近20天才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上了岸，她们便向解放军打听邓小平大哥的住地。知道了小平大哥住在重庆上清寺以后，邓先芙三母女便和另外几位从广安到重庆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大”的朋友一起，去到上清寺。

到了上清寺邓小平住地，邓小平却出差不在家，是邓先芙、邓先群和母亲夏伯根老太太都没有见过面的大嫂卓琳出来接待她们的。

面对好几个人，大嫂卓琳问：“哪两位是我们的妹妹？年纪大的老太太不用问，一定是妈妈了。”

第一次和卓琳大嫂见面，就给邓先芙三母女一个非常亲切的感觉。母女三人就在卓琳大嫂的安排下住了下来。

当小平大哥出差回到重庆家中，见到从未见过面的继母和两个妹妹以后，显得非常高兴，他说：你们终于到了，我也就放心了。我本身安排谢富治带了几个坐汽车到广安来接你们。谢富治几天后回重庆对我说，你们已经坐木船来重庆了。

第二天，小平大哥对邓先芙、邓先群两个妹妹说：“你们

和母亲既然来了，就不要回广安去了，不要广安那个家了。你们两个人都年轻，就进‘军大’学习。”

过了两天，邓小平又对两个妹妹讲：“我们都要好好改造思想，要先把‘我’字去掉，要像毛主席说的，我们要为人民服务。”

邓先笑告诉笔者：“1957年5月，小平大哥到成都出差，就来我家里看我。我那时住在成都商业街励志社那个古代建筑房子的后面。那时，我刚刚生了孩子几天，小平大哥说：‘娃娃再大一点，你就把娃娃送到北京来，由奶奶照顾孙孙，你就腾出手来好好工作。’当我的老大8个月大的时候，我真的就送到小平大哥家里去了。以后生下老二，也是才几个月我也就送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小平大哥、卓琳大嫂，是无话不说。有一次我到北京小平大哥家里去，那个时候是小平大哥第三次复出以后了，大概是80年代初，卓琳大嫂笑着给我看了一封广安幺舅淡以兴寄的信，这封幺舅托人写的信中说：‘小平外甥，你要好好教育老婆卓琳，莫把寄给我的钱弄丢了，上个月我就没有收到生活费。’”

“在成都省见到了小平外甥， 就是‘嘎嘎’（肉食）吃得太少了”

淡以兴从“成都省”回到广安以后，特别爱向邻居讲的一件事是：“小平当了那么大的官儿，吃饭的时候嘎嘎（肉食）只有一点点，太少了，还不够塞牙齿缝缝，更莫得我们广安人爱吃的、也是小平外甥小时候爱吃的膀扣肉。”

邻居们听后都笑着说：“膀扣肉在我们广安也是农村里娶

媳妇嫁女办席时才会有，在成都省当然吃不到。”

笔者在采访邓小平的三妹邓先群少将时，她也谈到了“嘎嘎”这件事：“小平大哥那次从成都回到北京以后，有一次闲谈时，给我讲了一件有趣的事：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吃饭时，幺舅看见餐桌上没有几样菜，就撇着嘴说：‘你当那么大的官儿，就吃这样的菜呀，只有一点点嘎嘎，你我都爱吃的广安膀扣肉连影子都看不到。’大哥听后，就说：‘那就添菜，再弄点嘎嘎来吃。至于膀扣肉，成都没得人做。再说，我们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多吃膀扣肉对身体也不好。’幺舅看见餐桌上摆的红颜色的酒，他说：‘未必连广安的奎阁酒那种白颜色的酒都没得吗？’大哥又给他解释，桌上摆的是红葡萄酒，比奎阁酒贵得多，老年人应该多喝点这种酒，而幺舅喝习惯了的广安奎阁酒一类白颜色的酒，则应该少喝一点。但大哥考虑舅甥难得见一面，为了不扫幺舅的兴，还是叫人拿了一小杯白酒来给幺舅喝。幺舅喝了一杯说不过瘾，还要喝，便连喝了三杯，喊服务员再倒酒来。大哥说不能再喝了，川剧里演的武松在景阳冈也是三碗不过冈。大哥这一招还挺管用，因为对幺舅来说，川剧里的台词是‘一句顶一万句’，他也不再要白酒喝了。”

1989年10月，刚过了89岁生日的淡以兴生病住院了。他的邻居、好友和广安县委、县政府、县政协的负责人都去医院看望他。消息传到当时管辖广安县的南充地委后，地委书记、地区政协负责人也到广安医院去看望政协委员淡以兴（广安1993年设立地区，1998年撤地建广安市）。

1989年11月14日，淡以兴因病重治疗无效去世了。广安县委考虑淡以兴和小平同志的特殊关系，便将淡以兴病逝的消息和住院治疗的病因、治疗过程等通过地委、省委，报告了邓小



本书作者与邓小平三妹邓先群少将留影

平同志办公室。后来广安县委收到“邓办”转达的小平同志的三句原话：

“知道了。”“规格够高的了。”“不再送什么了。”

这三句话都用了“了”，说明时年85岁的邓小平虽因岁月的风尘染白了他的双鬓，真正如唐朝诗人贺知章所说“少小离家”的他已经“鬓毛衰”，但又是真正的“乡音未改”，乡情依旧浓，因为地道的广安乡音，说话时是离不开用“了”的。

这三句话又可以解读为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处理亲舅舅的丧事，“规格”已经“够高的了”，连花圈、唁电之类也“不再送了”。

**“你们要研究将川菜推向市场，
让川菜的名气更响”**

邓小平喜欢川菜。红军长征时期，他在川西北雪山草地搞

“精神会餐”时，就大谈“四川回锅肉最好吃”。

笔者在采访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时，她曾对笔者说：“老爷子最爱吃四川家乡风味的菜，特别是回锅肉、粉蒸肉、竹林白肉、扣肉。奶奶做的四川豆腐乳、二姑姑（邓先芙）做的四川腌胡萝卜丝，是我们家的看家小菜，全家大小都特别喜欢。”

1986年2月，邓小平在金牛宾馆用餐时，除了每天要吃一次回锅肉之外，其余都是比较清淡的豆花儿、豌豆尖、青椒拌皮蛋、小青菜、折耳根、红苕饼之类的家常川菜，汤一般是酸菜粉丝汤或酸菜肉丝汤。有一天中午，厨师要给他换换口味，没有做回锅肉，给他做了一个清炖蹄花，一共只有两小节。他吃了一节后，对服务员说：“这节猪脚脚，搁到下一顿再吃，不要浪费了。”因此，邓小平的幺舅要说他“当了那么大的官儿，只有一点点嘎嘎吃，连塞牙齿缝缝都不够”。

虽然邓小平自己的生活很节俭、朴素，但是，他多次向四川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指出：“川菜是我国的四大菜系之一，你们要好好研究如何将川菜推向市场，走向全国，让川菜的名气更响。”

四川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原主任孟薇同志保存了许多邓小平夫妇吃川菜的照片。她向笔者谈到了一件令她终身难忘的事：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以后，受四川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之邀，来到西单南边的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品尝地道的四川菜。之前，邓小平要身边的工作人员告知四川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一定不能浪费，就餐采用分餐制，菜的分量减少。四川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和“四川饭店”的负责人与厨师一道，经过反复考虑，开出了一份特别的菜单，既尊重了小平同志节约的意愿，又保持了川菜的特色。厨师为邓小平一

家准备了夫妻肺片、棒棒鸡、川北凉粉、家常海参、鱼香大虾、麻婆豆腐、小笼蒸牛肉等四川菜。小平同志一面品尝川菜，一面对四川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孟薇和“四川饭店”主管厨政的副总经理袁森说：今天能在北京品尝到地地道道的四川菜，非常高兴，川菜这么好，应该走出去，走向全国，走向国门。

邓小平喜欢川菜，也会做川菜，他的夫人卓琳就比他差远了。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写道：二姑姑邓先芙从成都到江西去看望蒙难中的大哥小时：“二姑姑来了，全家又是一阵兴奋。二姑姑特会干家务活，她要帮父亲做饭，父亲不让。要知道，现在做饭可是父亲一个人的‘专利’



四川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原主任孟薇，1984年10月与邓小平夫妇在一起。

呀。父亲给二姑姑又做红烧肉，又做狮子头。”这里的“红烧肉”、“狮子头”都是邓小平爱吃、会做的川菜。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又写道：“轮到妈妈做饭那一天，大家都不爱吃她炒的菜。哎，没办法，我那个妈妈呀，这一辈子也没学会炒菜的手艺。”

笔者有一次采访邓小平的三妹邓先群少将，她讲到了一件事：“大哥走到哪里都要说川菜好。有一次，我和他一起作客去吃鱼。他尝了一口就说：‘吃鱼，还是豆瓣烧鱼才好吃，而且还要正宗的四川郫县豆瓣。’”

邓小平不但吃自己做的川菜，还要到陈毅、聂荣臻等川籍战友家里去吃川菜或四川小吃。

毛毛说：“陈毅与我父亲都是四川人，都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四川人的通病就是嘴馋。”“聂荣臻，又是一个四川人，又是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50年代初刚到北京时，我们就住在聂伯伯家隔壁。聂伯伯常请我们家去他家吃四川小吃。父亲也不客气，一去就带上七口八口一大家人去吃‘冤枉’。”

不管走到哪里，邓小平对川菜始终有割不断的情缘。所以，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道：陈毅和邓小平，“一个司令员，一个政委，两位都乃开国元勋，但仍脱不了四川人那爱下馆子的脾性，而且是随时随地的，竟连时间也不看看，半夜了还上街去……”

邓小平的二妹邓先芙对笔者说：“小平大哥到四川，特别喜欢家乡的豆花儿。我陪大哥在成都，在峨眉山，在四川很多



地方，他都要吃豆花儿。白嫩嫩的四川豆花儿端上桌来，还有丰富的佐料，切得小小的黄色榨菜，切得细细的绿色葱花儿，扯得碎碎的黑色紫菜，尤其那诱人的‘麻’和‘辣’。大哥在北京是不容易吃到我们这种正宗的四川豆花儿的。”

邓小平之所以对川菜这么情有独钟，之所以提出“你们要研究如何将川菜推向市场”，是因为他了解川菜。“川菜”，作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以其历史悠久，风格独特，制作精美，味别多样而享誉国内外。据资料介绍，川菜形成独特的菜系，至少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发展至今已有3000多个菜品，300多种名菜。川菜的制作，特别讲究烹饪技艺，以不同的刀功、火候、佐料和不同的烹调方法，如腌、卤、酥、熏、酱、糟、风、煮、焖、醉、煊、炒、爆、炖、煨等，经过历代厨师的实践、创新、发展，才形成如今的川菜大系。川菜以味多、味广、味原、味长著称，比如麻辣味、鱼香味、糖醋味、腌腊味、五香怪味等，同时又不乏清淡鲜雅的品种，比如各式清蒸、甜烧、黄焖肉食和“白油”爆炒，以及各式汤菜。

20世纪的伟人邓小平与川菜结缘，历史上有不少名人也与川菜结缘。川菜名菜中的“东坡鱼”、“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豆腐”等清美可口的佳肴，就是北宋一位卓越超群、博学多才的大文豪和爱国恤民、享誉民间的政治家苏东坡最先烹饪出来，流传至今的。与川菜有缘分的还有杜甫寓居成都时就赞扬过的“五柳鲢鱼”。而国画大师张大千（四川内江人）创作的“大千鸡块”也流行于日本和巴西。革命战争年代曾担任中共川康特委军委负责人的车耀先，在成都金河路办了一家大餐厅“努力餐”，以餐馆老板的公开身份掩护革命活动：



1984年10月，邓小平和在京工作的多位四川籍老同志，在北京绒线胡同“四川饭店”，与川菜厨师合影。（后排左起站立者：杨钟、卓琳、孟薇；前排左起：罗青长、李伯钊、李一氓、魏传统、陈野苹、邓小平、王震、杨尚昆、田纪云、段君毅）

“烧什锦，名满川，味道好，努力餐。”1935年秋，爱国名将张学良路过成都时，特别向四川省主席刘湘提出想要品尝他早已风闻的川菜“姑姑筍”的要求。张学良品尝后，赞扬川菜“庖艺绝精”。

1978年2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不久，他在成都杜甫草堂就讲过：“盖碗茶和薛涛干都是四川的特产。”“四川的名小吃过去集中在一条街上，以后在一定时期都要恢复。”

邓小平说这个话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

而传统的川菜技艺，因为有了邓小平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才能在传统饮食文化的基础上走出盆地，博采众长，发展自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川菜遇到了极好的机遇。川菜宴席上出现的川味海鲜、精作蔬菜、小吃佐餐、药膳食品等的纷纷推出，即是很好的例证。

在邓小平的关怀下，川菜这项饮食文化，成为吸引海内外旅游者的重要资源，成为四川的优势产业。1911年创办于成都的



川菜馆“荣乐园”的许多名菜被收入中、日合编的《中国名菜集锦（四川）》一书中。1980年6月，“荣乐园”川菜馆落户美国，成为四川与美国商人合营的第一家川菜馆。1981年12月，中泰合资川菜馆“四川楼”在泰国曼谷开业。1983年4月，成都饮食服务总公司与日本东京株式会社合作，在东京开办川菜馆。1991年5月，川菜在美国烹饪锦标赛上分别获得冷菜、热菜两枚铜牌，第一次代表川菜获国际大奖。至于在国内各个省、市、自治区，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做到了如邓小平所讲的“将川菜推向市场，走向全国，让川菜的名气更响”了。北京的一张大报《光明日报》，有一次在首都作了一项调查，发现竟有42%的北京人喜欢川菜，名列中国四大菜系之首。随着时间的推移，川菜饮食文化定会扬昔日之光辉，写今朝之风采，铸未来之辉煌，其名气会更响，以告慰特别关心川菜发展的小平同志的在天之灵。

“回到四川，回到家乡， 才能吃上真正的豌豆尖”

对邓小平来说，家乡的景最美，家乡的水最甜，家乡的鱼最鲜，甚至连家乡的豌豆尖也最好吃。

1986年2月，邓小平在金牛坝说过这样一句话：“回到四川，回到家乡，才能吃上真正的豌豆尖。”

邓小平与金牛宾馆的工作人员摆龙门阵时，讲了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的缘由：他喜欢家乡的东西，家乡人会吃，特别有口福。

邓小平到广西桂林和其他一些地方时，好几处的豌豆尖都

不像四川这样只掐豌豆苗的嫩尖尖，而是把豌豆苗的茎也掐下一大截，因而显得比较老，很不好吃，一边吃一边还要把老的豌豆茎吐出来，不吐不行，吐时又很不雅观。因此，他每次回到四川，都要带些家乡的鲜菜回北京，分给老师们共享。在冬天和初春，成都豌豆尖上市时，他就带豌豆尖去北京；蒜薹上市时，就带蒜薹。

“都是四川老乡，就大家一起照相嘛”

邓小平每次到成都，都是住金牛宾馆。他与金牛宾馆服务人员的关系很融洽。宾馆的服务人员看见邓小平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便都想和这个“世界级的大人物”合个影，以作纪念。所以在陪小平同志散步之前，服务人员都要事先秘密约好，以便悄悄照相。

小平同志知道这个“秘密”以后，不但没有责怪，反而笑着对他们说：

“都是四川老乡，就大家一起照相嘛！而且要照两张，有个‘双保险’好一些。”

邓小平在成都金牛宾馆乐意与“四川老乡”合影，在峨眉山也是这样。

1993年春天，笔者受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邀请，协助他们拍摄12集大型文献片《邓小平》，在峨眉山认识了两位与邓小平合过影的人。

峨眉山市教师进修学校教师杜光秀对笔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1980年7月6日，杜光秀与5岁的女儿马千里在峨眉山游玩。



1980年7月6日，邓小平在峨眉山和旅游群众在一起。

当她们在从净水寺步行前往万年寺途中，听说小平同志刚刚离开万年寺前往清音阁。杜光秀很想见一见这位世纪伟人，便背上女儿快步往清音阁方向走去。功夫不负有心人，母女俩终于在通往清音阁的石梯路上与许多游客一道见到了邓小平。

5岁小女儿马千里走到小平同

志面前，喊了一声：“邓爷爷！”

小平同志很高兴，笑着问她：小朋友，你叫啥子名字？

“我叫马千里。”

你今年几岁了？

“5岁。”

在哪里读书？

“我在（峨眉山市）南门幼儿园读书。”

小平同志与杜光秀母女分别后，一面与周围群众亲切交谈，一面向清音阁方向慢步走去。

杜光秀与女儿在万年寺游玩后，也到了清音阁。凑巧，在清音阁双飞桥，母女俩再次遇到了小平同志一行。

天真的马千里又跑到小平同志面前喊道：“邓爷爷！”

小平同志第二次见到这位小姑娘，很高兴地说：我晓得，你叫马千里，在南门幼儿园读书。马千里小朋友，你过来，我们一起合个影，好不好？

小平同志搂住5岁的马千里，与在场许多群众一道，在清音阁合了影，邓小平对摄影的人说：

要照两张，有个“双保险”最好。

合影后，马千里高兴地对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说：“邓奶奶，我和邓爷爷一起照了相了！”

卓琳笑着夸奖她：“好孩子，真乖。”

当小平同志从清音阁下山来到象牙坡时，兴致很浓地察看了象牙坡两旁数十家中药店铺摆设的峨眉山天麻、黄连等100多种药材。

小平同志在老药农张大爷的摊位前，耐心听着老药农介绍峨眉山的各种名贵中药材及其特性。

听完介绍以后，小平同志拉着老药农张大爷的手说：来，把你的小孙女也拉过来，我们合个影，一起照个相，留个纪念。

2003年秋天，笔者到峨眉山拍摄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联合摄制的《邓小平与四川》时，虽然没有能见到与小平同志合影的老药农张大爷，但见到了与小平同志合影的杜光秀。杜光秀向笔者展示了她们母女俩及其他游客在清音阁与小平同志合影的照片。

“我要把这张珍贵的照片永远珍藏下去。”杜光秀如是说。



“我还是再写个‘金牛宾馆’， 比‘芙蓉宾馆’名气大”

笔者在采访邓小平的二妹邓先芙时，她谈到了大哥邓小平为金牛宾馆题写馆名的事。那还是1978年1月底2月初，小平同志出访缅甸、尼泊尔回国后，都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下榻。

1978年1月31日下午，邓先芙和邓林陪午休起来的小平同志在金牛坝园子里散步。散步回来，看见房间桌子上摆着纸、笔，连墨都研好了。金牛坝招待所的工作人员提出，想请小平同志题写一个馆名。

小平同志笑着说：硬要写嗦，我的字太差，写出来见不得人哟！

邓林说：“人家金牛坝招待所给你服务那么多次，你都说每次回到金牛坝就回到家了。应该帮他们写个馆名。再说，你的字是见得人的。”

小平同志便问：“要我写啥子字？”

金牛坝招待所的负责人说：“我们这个金牛坝招待所始建于1957年。创建时定名为‘省委金牛坝招待所’。出于安全考虑，1958年10月又改名为‘成都市第26号信箱’，以后又改名为‘省委第五招待所’。1975年6月，尼泊尔国王到四川访问，鉴于‘省委第五招待所’的名称不利于对外接待（这个名字对外国人来说不伦不类），便把它改为‘芙蓉宾馆’。现在请您老人家留下墨宝，帮我们题写‘芙蓉宾馆’几个字。”

小平同志听后说：也对。“金牛坝招待所”、“省委第五招待所”这些名字是不好，特别是不利于对外接待，是应该改成

宾馆了。叫“芙蓉宾馆”可以。我晓得，五代十国时，孟知祥在成都当后蜀皇帝。他称帝才半年就死了。他的儿子孟昶即位。孟昶当了30年后蜀皇帝，他命人在成都城上遍植木芙蓉，深秋开花，上下相照，有如锦绣，成都从此在“锦官城”之后，又有了一个“芙蓉城”的名称。你们想把金牛坝招待所改为“芙蓉宾馆”也好。”

于是，小平同志写了“芙蓉宾馆”四个字。

当宾馆负责人要把小平同志题写的字拿走时，他却制止了。

小平同志说：莫忙，虽然成都叫“芙蓉城”、“蓉城”，但金牛坝的名气大，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和许多老师到四川都在金牛坝住，北京很多人都晓得金牛坝。我想还是叫“金牛宾馆”，不要叫“芙蓉宾馆”。店招还是要名气大的，才吸引人。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如蒙同意，我就再写“金牛宾馆”。

金牛坝招待所的负责人认为小平同志考虑得很周到，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小平同志便挥毫题写了“金牛宾馆”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这四个字一直用到现在。

“金牛宾馆也要对外开放， 不能还是老样子，搞封闭式服务”

长期以来，金牛宾馆主要用于接待中央首长和外国来宾。

1980年7月，回四川视察的邓小平仍然下榻金牛宾馆。有一天午休起来，邓小平按惯例喝了一杯服务员早准备好的温茶，就和二妹邓先英等人一道，去宾馆园子里散步。当他们走到宾馆西楼时，邓小平望着对面的施工工地，问陪同的省委领导同

志：“这里修啥子房子？”省委领导同志回答说：“金牛宾馆目前只能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连参加扩大会议的人都住不下，更不要说县委书记会议了。现在这里正在修宴会厅，以适应接待外国元首来访的需要。下一步就准备修一幢5层高的楼，以便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时好接待。”

邓小平问：“有没有电梯？”

听回答说没有电梯时，邓小平说：“5层高的楼，没有电梯，哪个去爬？大楼（东楼）要修，就修高一点，修好一点。10年不落后，20年用得上。你们这个金牛宾馆只用于接待中央领导同志和外国来宾，长期不住人，这种状况要改变，要开放，或者先来个半开放，要对外。”

1986年2月，邓小平在金牛宾馆，又对四川省机关事务管理



1986年2月14日，最后一次回到四川的邓小平在离开成都时，怀着对故乡的依恋之情，挥手再见。

局的负责人说：作为后勤接待工作，你们也要改革，也要开放，逐步实现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的分离，以服务职能为主，管理职能为辅，后勤管理工作才能有生机。而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下面管辖的金牛宾馆也要逐步实现对外开放，不能还是老样子，只限于接待中央领导同志和外国来宾，一味搞封闭式服务。

自从邓小平作了这个指示以后，金牛宾馆和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管辖的四川宾馆等，都逐步向社会开放了。

自贡龙灯会在北京展出：“这是家乡的龙”

1988年6月，
自贡龙灯会在北京
北海公园展出。图
为龙灯会一隅。

对孙孙说：“这是家乡的龙，
好好看一看家乡来的龙”

北京的北海公园，始建于金大定十九年
(公元1179年)，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
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如画，亭台楼阁，塔桥



轩榭，应有尽有，是保存较完好的皇家园林，素有人间“仙山琼阁”的美誉。它又位于市中心，便兼有历史和地理优势。

1988年6月5日，四川自贡龙灯会在北海公园揭幕展出。到7月20日，在45天的展期内，尽管受到上海等地流行甲肝的影响，但仍有国内外的250多万游客参观了灯会，《北京日报》说平均每天有3万人次左右（平常，北海公园游人不到30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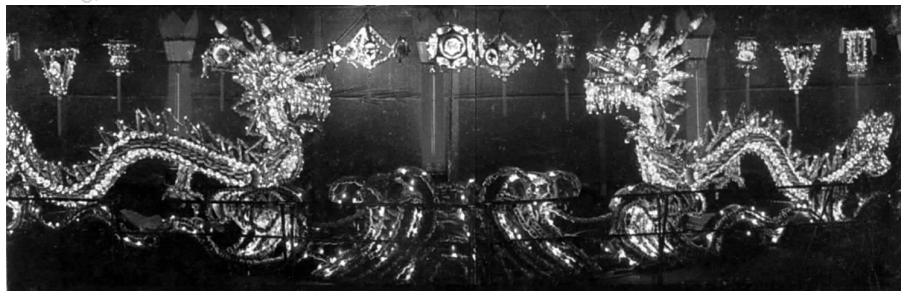
灯会展出的第三天，自贡市委副书记、灯会办公室负责人胡德思等人被请进了中南海，商讨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举办专场的事宜。决定6月16日晚，灯会为中央领导机关举办专场，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央机关的负责同志200多人前往北海观灯，同时，北京市的600多名优秀教师也要来。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指出，6月16日的专场灯会，准许报道、宣传，欢迎各报社、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前往北海采访。

灯会的工作人员，多么盼望尊敬的小平同志也能来看一看家乡的灯会。

6月16日，红日西沉，微风吹拂，酷暑渐消。8时30分，随着北海公园琼岛之巅的白塔灯火的骤明，整座公园彩灯怒放，亭台楼榭、山水湖光笼罩在一片“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灯海之中。十里环海相布的3000余盏工艺灯，仿佛为这座古老的皇家名园束上一道光的玉环；47台形、色、光、动、声兼备的大型灯组，宛如这道玉环中璀璨的明珠。9时许，4辆黑色轿车在北海东门（陟山门）戛然而止。小平同志身着白色短袖上衣，面带微笑，神采奕奕地从第二辆轿车中走了出来。

首都优秀中小学教师赵志强、李素静等4人迎了上去，向小平同志问候。

小平同志首先来到了琼岛东面的石桥。胡德思向小平同志



邓小平对孙女说：“这是家乡的龙。”

介绍说，这里是自贡市木材公司制作的“瓜果棚灯组”。小平同志看见“瓜果棚”上，挂着一串串晶莹欲滴的葡萄、一个个又大又圆的西瓜、一条条翠绿的丝瓜和一个个红橙色的苹果，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而且还传来阵阵悦耳的蝉鸣、鸟叫，简直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小平同志兴致很浓，一面观灯，一面还不时向周围群众点头微笑。

“九龙壁”原本在北海西岸天王殿右侧，自贡灯会的能工巧匠却在东岸的陟山桥半月城下布展了《九龙壁》灯，虽然其整体小于西岸的真“九龙壁”，但形状色彩均无多大差别，而且九条蟠龙在机械传动的操纵下，“形、色、声、光、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别具神韵，这又是一个“以假乱真”，把不少多次来过北海公园的土生土长北京人都给搞糊涂了。九条昂首欲飞的“活龙”，翻腾起舞，呼之欲出，追波逐浪。

小平同志在“九龙壁”灯前驻足观看。他的8岁小孙女羊羊附在爷爷的耳畔，兴奋地喊起来：“爷爷，这也是龙。”

小平同志对孙女说：“是呀，这是家乡的龙。羊羊，好好看一看家乡来的龙。”

“你们自贡在北京搞灯展，应该与北京实行分成”

小平同志看了《九龙壁》灯以后，来到了《音乐喷泉》灯组。这里，随着500多个喷头和300多只彩色水下灯悠扬婉转的乐曲声同步而起，水柱随音乐翩翩起舞，忽高忽低，忽远忽近，几百支水柱在五彩灯光映照下色彩斑斓，动人心弦。小平同志和孙女羊羊看了这组灯，觉得特别有趣。

在《荷花仙女》灯组，小平同志看到了一位眉清目秀的荷花仙子，时而站在高大的莲花宝座上，时而羞涩地躲进宝座内，像正在尽享着人间的快乐。

在《游龙戏水》灯组前，小平同志情不自禁地连声招呼孙子：“羊羊，快来看，快来看，好巴适啊！”

9点15分，小平同志一行来到南岸码头，由四川省省长张皓若、北京市旅游局局长薄熙成和自贡市负责人等陪同，登上了等候在这里的龙舟，继续乘船观灯。

湖面凉风习习，沿岸灯组交相辉映，波光粼粼。

小平同志在船上举目四望，兴致勃勃。他问自贡灯会负责人胡德思：

安装这些灯用了好长时间？

“用了一个多月。”

当小平同志听胡德思介绍说，这次在北海展出的灯，仅仅是自贡灯会的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没有运来时，小平同志惊讶地“哦”了一声。

胡德思对小平同志说：“欢迎你明年春节到自贡来观灯，那里的灯会更精彩。”



小平同志高兴地说：我去过自贡两次，有机会一定还要来。

“人逢喜事精神爽”，小平同志看到了来自“家乡的龙”，精神特别好。他把3岁的小孙子小弟儿抱在膝上，一边向小孙子介绍，一边观灯。

北京市旅游局局长薄熙成向小平汇报说，自贡利用灯会促进经济建设和文化交流，收效很好。

自贡市副市长胡泽轩向小平同志报告：“今年春节自贡办灯会，经贸成交额达到28个亿。”

小平同志听后说：这就是做生意好。

当龙舟开到自贡铸钢厂做的《五龙戏水》灯组时，小平同志站了起来，转过身子仔细观灯。只见5条巨龙披金挂银，造型生动，有的出没于碧波之中，有的昂首向天，气势磅礴。小平同志说：“这个灯好！这个灯好！”

40多个扎制在湖中的大型灯组，多姿多彩，已经引起了小平同志的极大兴趣，而4个孙子辈的眠眠、羊羊、萌萌、小弟儿“爷爷看这里，爷爷看那里”的亲切叫闹，更使得小平同志应接不暇，祖孙三代都发出爽朗的笑声。

随行人员告诉小平：“这样精美的龙灯，都是恐龙之乡四川自贡扎制的。”

小平同志用纯正的四川话说：“晓得，晓得。”

龙舟上就这样响起一串串欢快的笑声。

小平同志要四川省省长张皓若坐在自己的身边“好摆龙门阵”。

张皓若介绍说：“我们与北京市商量好了，以后自贡市与北京市合作继续办灯展。”

小平同志插话说：“你们自贡在北京搞灯展，应该与北京



1988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北海游艇上观赏自贡龙灯会。

市实行分成。”

张皓若告诉小平同志：“实行四六分成。”

小平同志说：“对头，四六分成。”

龙舟上的人听小平同志这样说，又哈哈大笑起来。

龙舟即将靠岸，来自四川家乡的人请小平题词。

小平同志站起来，愉快地挥毫写下了苍劲洒脱的字：

“邓小平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六日”

9时50分，小平同志乘坐龙舟靠上了西岸，他弃舟步行，步履稳健。许多观灯群众围了上来，向小平同志热烈鼓掌，小平同志也向群众频频挥手。沿途，胡德思又向小平同志介绍了自

贡市卫生局用20万只废旧玻璃药瓶，灌注透明彩色水捆制而成的《二龙夺宝》、《孔雀开屏》等4个灯组。小平同志目睹孔雀在音乐声中缓缓开屏，小鸭划波戏水、金鱼在吐泡等艺术造型，连声说：

“好！好！”

在小西天内，小平同志看到了用3万多件杯、盘、碗、勺、碟、盅、壶组成的瓷器灯。

小平同志一行走到《水中捞月》灯组面前，发觉了这里才是小朋友的乐园：在巨幅的天幕之下，圆圆的月亮倒映在碧波荡漾的荷池中，几只天真活泼的小猴甚感惊异，它们一个拽着



自贡龙灯会在北京北海公园展出的一个场景

一个的尾巴，从高处树枝上荡下，打捞水中的月亮。

看到这里，邓小平的心都溶化了，陶醉在童真的情趣之中，他按年龄大小，招呼他的4个孙辈：“眠眠、萌萌、羊羊、小弟兄，快点过来看猴子捞月亮哟！”

10点20分，小平同志在北海西门的轿车旁，和陪他观灯的家乡人一一握手道别。

在流光溢彩、烟波淼淼的北海，一条条璀璨夺目的“来自家乡的龙”仍在戏波逐浪……



剪不断白云缠绕的蜀乡情

**“我不想改我的籍贯，
我还做我的四川人”**

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左传》，在其《昭公十五年》一文中有一句话：“数典而忘其祖。”2000多年以来，“数典忘祖”这句话便被比喻成忘本。

从四川走出的“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

不论走到哪里，他都要主动作自我介绍：“我是四川人”、“家在川北广安”；在他乡遇到了老乡，他要主动上前去用浓重而亲切的川音说：“我们是老乡。”自贡龙灯会在北京展出，他对孙子讲：“那是家乡的龙。”一进成都金牛宾馆，他说：“我回到家了。”当“四人帮”肆虐、家乡民不聊生

时，他伤感地对外国友人说：“我的家乡广安人平占有粮食200多斤，一个农民年平均收入才几十元，我的家乡就是那个样子。”当家乡成为中国的“改革之乡”以后，他自豪地向外国友人介绍：“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

笔者在采访小平同志的大女儿邓林时，邓林讲到了这样一件事：

“当初筹建三峡省时，拟将广安划归重庆。因为广安到重庆只有100多公里，而到成都则有300多公里。爸爸说，我不想改我的籍贯，我还做我的四川人。我们三妹毛毛1950年1月25日生于四川重庆，所以她赞成广安划到重庆去，三妹说：‘我是重庆人。’但老爷子还是说：‘我还做我的四川人，我不想改我的籍贯。’”

为了了解三峡省筹建的情况，笔者采访了当时被国务院任命为三峡省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辛文同志。

辛文同志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曾担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又是四川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他这个德高望重的特约研究员可不一般，除带头写论文外，每年还要带上我这个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的专职副秘书长去找省委书记、省长和财政厅长，为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申请划拨研究经费，以使邓小平家乡的邓小平理论研究工作，有比全国各省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更宽裕的经费保障。

谈到三峡省的筹建，勾起了笔者很尊敬的前辈辛文同志的回忆：

“据我所知，小平同志原来有个想法，搞个川东省，以西南中心城市之一的重庆为川东省省会，更好地发挥重庆和成都两个中心城市的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全国人口最多的



四川一分为二，促进经济更好地发展。以后，听说是李鹏他们汇报后，小平同志便同意成立三峡省。国务院决定我任三峡省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这件事，最初我不知道，是我在法国考察时碰到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时，他通知我的。回国后我才看到国务院任命我为三峡省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正式文件。筹建三峡省是国务院1984年正式定下来的。1986年6月份以前，我都在三峡省筹备领导小组工作，虽然三峡省因故最终没有正式建立起来，但小平同志多年以前就打算从四川分出一个川东省，重庆市、万县地区、涪陵地区、黔江地区都在川东，因此1993年，川东这4个市和地区正式建成中国第4个中央直辖市——重庆市，我认为这还是小平同志原来的想法，只不过不叫川东省，而是成为中央直辖市，这样对于原属四川管辖的重庆市、万县地区、涪陵地区和黔江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有益的。川渝分治这11年来，事实证明，对于四川的经济发展也是有益的。至于讲到筹建三峡省时征求小平同志的意见，愿不愿意把广安划到重庆去，我听说过这件事。小平同志说他不改他的四川籍贯，他还做四川人。他的四川情结很浓。”

笔者想，如果小平同志愿意把广安划到重庆去，那么他就不是“还做我的四川人”了。

不过，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带动王震、杨尚昆、刘华清、 宋任穷也爱上四川布鞋

1000多年以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35岁时写了一首著名的

诗，其中有一名句：“蜀江水碧蜀山青。”这位原籍太原并非生于蜀乡的大诗人，竟这样赞美山清水秀的天府之国。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1000多年以后，他赞美过的地灵人杰的蜀山蜀水，孕育了20世纪一代伟人，这是大诗人白居易不会预料到的。他更不会想到20世纪的伟人，连穿的布鞋都要认定是“蜀江水碧蜀山青”的家乡人做的。而且这位世纪伟人不但自己穿四川布鞋，还要带动王震、刘华清、宋任穷等非四川籍的中央领导人爱上四川布鞋。

笔者在采访邓小平的二妹邓先芙时，她说：

“小平大哥特别喜欢穿四川布鞋。虽然北京布鞋在国内外都有名气，但大哥认为四川布鞋比北京布鞋更柔软、更舒适。‘文革’以前，大哥穿的四川布鞋一直是由母亲夏伯根给他做。1969年10月，大哥到江西蒙难，要从事体力劳动，更喜欢母亲给他做的布鞋。1972年，母亲夏伯根要到天津去给三妹邓先群



本书作者采访邓先芙后与她留影纪念。

带孩子，就暂时没有四川布鞋穿。1972年6月我到了江西以后，就对大哥说：‘你以后穿的布鞋，都由我给供应。’我先从成都花牌坊那个著名的三江布鞋厂，给他买了第一双布鞋带给他，他穿了以后觉得很舒服。从那时起我就给他一直买成都三江布鞋厂的布鞋。每年都买。结果他不但自己喜欢成都布鞋，还把杨尚昆、王震、刘华清、宋任穷等好多人都带动了，他们都喜欢上了成都布鞋。他们穿鞋的尺寸我全掌握了，就给他们定期从成都买好带到北京去。以后成都三江布鞋厂倒闭了，我和丈夫张仲仁就到郫县唐昌布鞋厂去给大哥和王震、杨尚昆、刘华清、宋任穷定做。”

1997年2月19日，小平同志与世长辞了。之后，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三家联合拍摄了一部悼念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电影《丰碑》。笔者有幸受邀协助拍摄。摄制组曾专门去了郫县唐昌镇布鞋厂。拍摄了布鞋厂为小平同志定做的布鞋。

不久前，笔者为了编写《小平蜀乡情》这本书，又去到郫县唐昌镇，找到了1997年笔者就熟悉的布鞋厂厂长余腾清，向他详细了解他们为小平同志做布鞋的情况。

余腾清厂长介绍的情况，和笔者采访邓先芙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致的。

在成都三江布鞋厂倒闭以后，1993年10月28日，小平同志的妹夫张仲仁（时任四川省档案局局长）和妻子邓先芙来到郫县唐昌，说打听到唐昌布鞋厂做的鞋子也远近闻名，便请他们为小平同志做布鞋。张仲仁、邓先芙夫妇还特地带去了一双小平同志曾经穿过的四川布鞋。这双小平同志曾经穿过的四川布鞋，是传统手工布鞋，圆口型，鞋面是黑色直贡呢，鞋底是全

新纯棉白布。余腾清立刻亲自和厂里手艺最好的老师傅一起做鞋。第一次为小平同志做的5双鞋送到北京时，小平同志接过家乡人一针一线制作的鞋，非常高兴，不断称赞做得漂亮、做得“巴适”，立即穿了一双。但美中不足的是，鞋子有一些紧。余腾清他们以后做鞋，就做得宽松一些。从那时起，郫县唐昌布鞋厂就一直为小平同志精心做布鞋。当然，同时也为一些喜欢四川布鞋的中央领导人王震、杨尚昆、刘华清、宋任穷等做布鞋。余腾清说，全厂职工能为敬爱的小平同志做布鞋，感到非常自豪。以后，小平同志生病了，脚有些肿了，张仲仁和邓先芙夫妇就把小平同志脚肿的大小尺寸，从北京带到郫县唐昌，以便做适足的鞋子。

199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小平同志曾经说过，香港正式回归后，他老人家要亲自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因此，郫县唐昌布鞋厂在1997年春节前（笔者查了一下百年日历表，知道1997年的春节是公历2月5日），精心为小平同志做了5双特别柔软的布鞋，以便小平同志穿上后到香港去走一走，看一看。当余腾清他们正在等待张仲仁、邓先芙夫妇来取这5双布鞋的日子里，2月20日，他们听到了小平同志逝世的噩耗，全厂的职工放声痛哭，……

2004年8月，当广安的“邓小平纪念馆”落成以后，余腾清在纪念小平同志100周年诞辰的日子，把7年前为小平同志做的鞋送到了广安“邓小平纪念馆”。



蜀乡的一草一木都成为他魂牵梦萦的回忆

西子湖畔也是纯正的川音：

“这娃儿长得好胖哟”

1983年2月11日上午，邓小平坐着面包车，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出现在杭州西湖畔的灵隐寺。灵隐寺位于西湖西北面的北高峰南麓，面对飞来峰，是我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人们说：“到杭州不游灵隐寺，等于没有到杭州。”这是因为灵隐寺位列西湖风景区四大丛林之首。

邓小平到灵隐寺天王殿看弥勒佛像时，那里的游客认出了他。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邓小平向人们挥手致意，还不时握握游客的手。

邓小平来到单层重檐的著名古建筑之一的大雄宝殿，看见殿内正中有金装释迦牟尼

像，很高，便问陪同人员：“这个像有好高呀？”

陪同人员说：“释迦牟尼像高9.1米。”

邓小平说：“哟！这么高！”

说完这句话，邓小平发现一个小女孩在大人的怀抱里拍着可爱的小手在欢迎他。

邓小平一直特别喜欢小孩子，和小朋友在一起，他总是无比开心。邓小平笑着走上前去，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小脸蛋，用四川话说：“这娃儿长得好胖哟！”

然后，邓小平问抱着小女孩的母亲：“她叫啥子名字？几岁？你们是本地人吗？”

小女孩的母亲回答说：“两岁。我们是从南京市来杭州探亲的。”



邓小平和小朋友在一起，总是无比开心。

孩子的父亲教孩子说：“快喊邓爷爷好！”

“邓爷爷好！邓爷爷好！”两岁的小女孩接连喊了两声。

邓小平高兴地笑着说：“小朋友乖！小朋友乖！”

无巧不成书。次日，邓小平乘船到西湖的小瀛洲游览时，又碰巧与小女孩及她的父母相遇。邓小平又笑着招呼这个见了他就拍着可爱的小手欢迎他、喊“邓爷爷好”的小女孩，然后用手抚摸着小女孩的脸蛋：“来，跟邓爷爷亲亲！”

孩子高兴地在邓爷爷的脸上亲着。在场的摄影记者拍下了这珍贵的镜头。不久，《浙江日报》以《亲亲邓爷爷》为题，刊登了这张照片。邓小平知道了小女孩的父母分别叫王正环和岳华。两次邂逅，邓小平和这一家三口已经成为“熟人”了。

在杭州岳王庙：“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

1983年2月12日下午，邓小平来到西湖西北岸的岳王庙。这里是民族英雄岳飞被害后的长眠之地。后人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修建了岳王庙。岳王庙的南面是岳王坟。

邓小平一进入岳王庙的大门，看见迎面是“忠烈祠正殿”。大殿正中为岳飞坐像，红缨帅盔，金甲紫袍，左手按剑，右手握拳。上端挂着“还我河山”四个大字。陪同邓小平游览的西湖文物保管所所长骆寄平向邓小平介绍说，相传这四个字是岳飞手迹。邓小平看见大殿墙上还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

当邓小平看见正殿檐中间高悬“心昭天日”的横匾上没有署名，便问骆寄平：

“咋个横匾上没有署名呢？”

骆寄平介绍说：“这是叶剑英元帅在1979年岳王庙全面整修时题写的。题词的出处是岳飞临刑前，宁死不屈，挥毫在狱案上写下的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邓小平十分敬佩岳飞，在这里留了影。然后，骆寄平带领邓小平一行来到北碑廊。

北碑廊陈列着岳飞的诗词、奏折、手书刻石。在岳飞手书的《满江红》碑前，骆寄平不由自主地诵起了碑文：“怒发冲冠，……”

邓小平笑着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呢！”说罢，他情不自禁地吟了起来：

“……凭栏处，潇潇雨歇，……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邓小平口中一面吟诵着岳飞的词，脑海里一面又浮现起了古朴淳厚的蜀乡民居，浮现起了他在广安中学读书时背诵《满江红》的情景，……

吟罢岳飞的《满江红》，邓小平去到岳飞手书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碑文前，诵读碑文。

然后，邓小平一行来到岳坟。

邓小平看见岳飞墓前面，两边铸有4个铁像，都反剪双手，向岳飞墓跪着。

邓小平问：这4个跪着的铁像除了秦桧和他老婆，那两个是哪个？

骆寄平说：“是两个佞臣，一个叫张俊，另一个读作‘莫其谢’。”

在秦桧的跪像前，邓小平给外孙女眠眠和外孙萌萌讲述800多年前，南宋民族英雄岳飞英勇抗击金兵、收复失地的故事，



以及皇帝赵构与秦桧用“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的故事。

邓小平讲得越起劲，两个孙子听得越入神。

在上海，他乡遇老乡：“川扬菜好嘛”

1983年2月21日，邓小平在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和市长汪道涵等人的陪同下，到曲阳新村视察。

曲阳新村是上海市政府筹划建造的13个新村之一，其规模仅次于浦东的潍坊新村。邓小平一行的汽车上午9时50分在曲阳新村菜市场门口停下。

下车后，邓小平走进了曲阳菜场。这时早市已过，一些柜台仍在营业。

邓小平问：这个菜场是国营的吗？

虹口区委书记沈敏康回答说：“这是知青办的合作菜场。”

在猪肉柜台前，邓小平用四川话问一个青年女营业员：你宰肉宰得动吗？

青年女营业员没有听懂四川话“宰”的意思，邓小平的陪同人员给她解释以后，她回答说：“还可以，还行。”

菜市场卖冬笋的个体户姜安如是四川人，听到有人在用四川口音说话，抬头一看，高兴地跳了起来：“我们的家乡人邓伯伯来了！”

陪同人员带邓小平走到一个餐馆的门口，指着“曲阳酒家”的店招说：“这里是四川人主厨的川扬菜。”

邓小平笑眯眯地说：他乡遇老乡，川扬菜好嘛！我们四川人在这主厨，走，到里头看一看去。

邓小平的话音一落，人群中发出阵阵笑声。

邓小平进入曲阳酒家，这时有两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挤出人群，操着地道的四川口音，激动地对邓小平说：“楼上还有，请邓副主席到楼上去看看。”

曲阳酒家的经理向邓小平介绍说：“这两位是我们聘请来的四川老师傅，他们的川菜做得好，我们的生意也火爆。”

邓小平一边健步登上二楼，一边用家乡话同两位四川老乡攀谈。

邓小平对两位四川厨师说：这里的人也喜欢我们的川菜，说明我们川菜的确巴适，到处都受欢迎。

其中一位厨师说：“邓副主席，这里的人吃‘麻辣’川菜的时候，有的人对‘辣’还可以接受，就是有点怕花椒太麻了。”

邓小平听后说，这倒不仅仅是上海人可以接受“辣”而怕花椒太麻，很多外省人都是这个样子，不过习惯了也就不怕麻了。

邓小平在离开曲阳酒家时，鼓励两位家乡人“好好干”。

“从我们四川家乡来上海建设的 同志们，我问候你们”

1984年2月15日，邓小平在王震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宝山钢铁总厂。

邓小平在详细听取了冶金部副部长、宝钢工程总指挥黎明及总厂的负责人汇报后，十分高兴。宝钢的负责人希望留下邓小平的墨宝，邓小平很爽快地说：

“好！没得问题！拿纸和笔墨来。”



邓小平拿起如椽的大笔，挥毫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随后，邓小平在宝钢负责人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驱车巡视了13平方公里的厂区。

在高炉建设工地，邓小平总觉得许多人在讲四川话，便问：“在高炉施工的这些工人是哪个省的？是不是四川的？”

陪同人员回答说：“承建高炉的冶金部第十九建设公司，很多职工都是四川人。”

邓小平高兴地走上前去，对四川工人说：

“从我们家乡四川来上海建设宝钢的同志们，我问候你们：同志们辛苦了！”

说完话，“他乡遇老乡”的邓小平，又和在场的四川工人亲切握手。

冶金部第十九建设公司的四川人，先听到敬爱的小平用亲切的乡音向他们问好时，已经很激动了。现在又和他们握手，他们便鼓掌、欢呼，不少人还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在南京植物园：“哦，这是我们四川峨眉山的東西”

1985年2月1日，邓小平乘坐专列到达南京。

在南京火车站迎候邓小平的，除了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副书记沈达人之外，还有邓小平的两位老部下——他们是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政治委员郭林祥。

邓小平和江苏省委、南京军区负责人一同乘坐汽车到了邓小平下榻的中山陵5号。住下以后，邓小平向江苏省委的两位书

·406·

记摆起了他和向守志、郭林祥的“龙门阵”。

邓小平说：郭林祥在担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以前就是我的老朋友了。

郭林祥马上说：老首长，我是你的老部下。我们十八兵团进入四川，我就一直在你任第一书记的西南局领导下。我是1950年2月起任川北区党委常委、川北军区副政治委员。以后，老首长于1952年7月调中央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以后，川东、川南、川北、川西四个行署撤销，恢复四川省，我先担任四川省委常委，以后又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成都军区政委。

邓小平说：至于谈到小向，向守志，我们就更熟悉了。我们既是四川家乡人，又从1938年起就在一个师里，以后一直在二野。

向守志说：我是四川宣汉人。

邓小平说：宣汉离我们广安不远，从广安经过大竹、达县就可以到宣汉。宣汉可是个出人才的地方。王维舟就是宣汉人。毛主席都曾经说过，王维舟同志的资格最老。当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时，王维舟于1920年5月就在上海参加了朝鲜共产党，然后去苏联学习了两年。

向守志说：我是1933年在宣汉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从红军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二九师。

邓小平说：小向在一二九师的资格比我还老，他比我早到一二九师。他去一二九师时，是刘伯承同志担任一二九师师长，林彪的叔叔张浩任政治委员。我是1938年1月由八路军总部任命接替张浩同志的工作，任一二九师的政治委员。从这个时候起，我就一直和刘伯承同志并肩作战，直至解放了四川，一共13个



年头。

向守志说：我在伯承同志和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担任过太行军区的团长、旅长。

邓小平说：小向杀敌勇敢，指挥果断，渡江战役时担任师长、师政委。刘伯承同志多次表扬过他。1950年初，我和刘伯承同志要向守志同志率部，由西昌进军四川南部，围歼国民党残兵和土匪武装。朝鲜战争爆发后，小向又率部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从朝鲜归国后他先到炮兵部队当副司令员，后去第二炮兵部队任司令员。

向守志说：“文革”中小平同志被打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我这个小平同志的老部下，不但被诬陷为“叛国投敌”，被撤了职，而且还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进监狱。我的岳母和妻子以及四个孩子受到株连，被赶回四川农村。

2月3日，邓小平在韩培信、向守志、郭林祥等人陪同下，来到中山植物园参观。这个植物园的前身是1929年建立的“孙中山先生纪念植物园”，1954年在此基础上重建了中国科学院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园共700余亩。

在植物园参观时，邓小平看到了一盆标名“峨眉海棠”的植物，便问中山植物园研究所所长贺善安：“这真是峨眉山的？”

植物园研究所所长贺善安、副所长杨志斌同时回答：“这是在峨眉山发现的，而且是在野外环境下偶然发生的一个自然变异，是海棠属科中很难得的珍品。”

邓小平听了很高兴地对向守志说：“哦，这是我们四川峨眉山的東西。”

向守志听后，很感叹地说：“小平同志，你的四川家乡情

结比我这个老部下还浓哟！我也曾多次到过这个植物园，由于植物园太大了，在这700余亩园内，既有苗圃试验区、药用植物园、材用植物园，还有松柏园、树木园以及分类系统园，我每次来都是走马观花，没有你老人家那么认真，更没有发现还有我们四川峨眉山的珍品。”

“我是四川人，你们深圳悄悄从我们四川引种，我要罚你的哟”

1992年1月19日，88岁的邓小平南巡到了深圳。这是他在事隔8年之后，又一次踏上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这片热土。

1月20日，邓小平乘车去深圳先科激光电视有限公司参观。先科公司引进荷兰飞利浦公司的先进生产技术，当时是我国唯一生产激光唱片、视盘和光盘放送机的公司。

在参观时，先科公司一位四川籍的业余歌手赵敏当场用先科生产的音响为邓小平唱了一首卡拉OK《在希望的田野上》。

邓小平对这位老乡的歌喉及音响效果十分赞赏，听完后带头鼓掌。他一边起身，一边说：“很好，声音很好，不走调，我听得很清楚，音响效果也不错。”

1月22日，邓小平来到深圳仙湖植物园。

先到这里的国家主席杨尚昆，走上前去与邓小平热烈握手。

邓小平对杨尚昆说：“我们在一起几十年啰。”

“我们虽然都是四川人，但是，是1932年才认识的。”杨尚昆扳起指头数起来，“1942、1952、1962、……1992，60年了！”

这时，身背三部相机的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走过来，握着邓小平的手说：“邓伯伯，新年好！”



1992年1月22日，邓小平在深圳仙湖植物园。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说：“杨绍明是全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呀！”

邓小平诙谐地说：“你们杨家有两个主席啰！”

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

邓小平和杨尚昆在植物园负责人陈潭清的陪同下，来到湘妃竹前参观。

陈潭清介绍说，毛主席的诗词“斑竹一枝千滴泪”中的斑竹，就是指这种湘妃竹。

邓小平听了以后说：“成都竹子很多，有红的、黑的、紫的、黄的，也有方的。”

陈潭清说：“我去过成都望江公园，那里各种竹子都有。”

在场有人说这里有些竹子就是从成都弄来的。

邓小平一听，就开起了玩笑：“这也属知识产权问题啊！”

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啊。”

周围的人全都笑了起来。

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邓小平看到一种十分特殊的竹子。

陈潭清向邓小平介绍说：“这是悄悄从四川宜宾的蜀南竹海引种来的。竹节似人面，所以叫人面竹，号称每株价值1万元。”

邓小平听后说：“我是四川人，你们深圳悄悄从我们四川引种，我要罚你的哟！”

“我说四川的柚子最好，但我家里统一不起来”

1992年1月23日，邓小平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飞的陪同下，要离开深圳去珠海。

上午8时30分，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代表深圳人民送邓小平到蛇口港码头。

汽车到了蛇口，李灏就向邓小平介绍说：“深圳南山区管蛇口这一片。南山区发展势头非常好，南山的荔枝很有名。全世界荔枝最好是中国，中国荔枝最好是广东，广东荔枝最好是东莞、增城、深圳。”

这时候，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插话：“那么，全世界的柚子哪儿最好呢？”

邓小平对李灏说：“我说四川的柚子最好吃，我们广安和白市柚子最好，但是我家里的认识统一不起来。毛毛就说沙田的柚子最好。”

毛毛说：“家里说沙田柚子好的人多，说四川柚子好的人少。”



原来，平时在北京家里，邓小平对孩子们夸耀四川的柚子最好，但女儿毛毛等认为沙田柚子好，所以邓小平说：“我家里的认识统一不起来。”

笔者有一次在采访小平同志的大女儿邓林时，向她提出“广东柚子和四川柚子哪个好吃”的问题，她是这样回答的：

“关于老爷子讲‘四川柚子好吃、广安白市柚好吃’这句话，是有一个来历的。有一次，叶剑英元帅把广东的沙田柚子给我们家送来。我尝了以后，觉得广东的沙田柚子比较干，水分少，但比较甜。相对而言，广安白市柚子水分多，酸甜适中。老爷子喜欢广安的白市柚，但毛毛喜欢沙田柚子。至于我本人嘛，还是喜欢广安的白市柚。”

白市柚是广安市名特水果，20世纪初开始在广安市镇一带栽培。由于白市柚果汁较多，果肉脆嫩化渣，酸甜适度，香气浓郁，享有“摆一个，满屋香”的盛誉，便成了贡品和礼品的代名词。那时能吃到白市柚的人，无疑是有身份有地位的。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广安才大面积地种植开来。以后，白市柚在国家工商局注册，又被国家农业博览会评为优质产品。

小平同志非常热爱和关心家乡人民，家乡人民也深切地爱戴着领袖和亲人。为了表达对小平同志的敬爱之情，广安每年都要从白市林场柚子林中，精挑细选最大最好的白市柚，给小平同志送去。但小平同志每次都坚持通过在成都工作的二妹邓先芙，给广安付柚子钱。

当白市林场的工人知道每次小平同志都要按市价付柚子钱以后，生气地问：“小平同志日夜为全国人民操劳费心，给我们制定了好政策，我们白市林场的柚子才每年都丰收，我们的

日子才一天比一天好。小平同志吃几个家乡柚子，县上还收钱，像话吗？”使得广安县委也很为难。

而一些不了解真情的群众听说白市林场收了小平同志的柚子钱，更不满意，说：“你们白市林场的人见钱眼开。你们要收小平同志的柚子钱，就不要送了。我们私人给小平同志送！”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大娘把孙子领到自家的园子里，指着味道最好的柚子树说：“那棵树的柚子又大又好，一定要给邓小平爷爷留着，千万不能像林场那些人忘恩负义，小平爷爷吃几个柚子还要收钱。”说得孙子直点头。可是，他们都不了解林场并未收过钱。

“美不美，乡中水。”邓小平年年亲口品尝家乡的白市柚，就会更加思念家乡和故里人。所以他说：“四川的柚子最好。”

从浙江省委书记的话中听出四川口音： “我们可是老乡哦”

1992年12月15日，邓小平最后一次来到了浙江杭州。

下午4时，邓小平在女儿毛毛的搀扶下走出专列。他头戴一顶鸭舌帽，身穿皮夹克，显得精神焕发。

早已等候在火车站的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和省长郭洪升迎了上去，和邓小平握手问候。李泽民说：“我代表浙江省委欢迎您来杭州。”

邓小平从李泽民短短的一句普通话中听出了四川口音，他便问：你是哪里人啊？

李泽民回答说：“和您老人家一样，我是四川人，老家在



苍溪。”

邓小平听到这句话可乐了，笑着说：是嘛，我从你的话里已经听出了四川口音，就猜你是四川人，所以才问你是哪里的人。我们可是老乡哦！而且苍溪在川北，我也是川北广安人，我们都是川北的小老乡哟！

然后，邓小平在科斯塔车子里，和李泽民用四川话亲切地交谈起来。

邓小平问李泽民在浙江工作了多久，习不习惯。

邓小平又问了有关浙江和杭州的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李泽民一一作了回答。

邓小平对李泽民说：你这个四川人在这里当省委书记，一定要保护好西湖名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是个好地方。要把西湖保护好、建设好，发展旅游业。900多年前四川人苏东坡在这里任杭州知州，写下“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与西湖相媲美的著名诗词，在西湖上主持修了苏堤。我来这里，加上这一次已经是第15次了，对这里的情况还算了解。

李泽民说：“是的，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赈饥施药，兴修水利，政绩斐然。西湖原本是泻湖，但后来泥沙杂物淤积，钱塘江的水不通了，西湖变成一潭死水，很不干净。1089年苏东坡主持疏浚西湖，利用湖泥葑草筑成苏堤，在堤上种植垂柳等大量植物。用现在的话说，苏东坡这样做，既保护了西湖的生态环境，又为老百姓造了福。苏堤的风光最美，因此‘苏堤春晓’被列为‘西湖十景’之首。我一定按您老人家的指示去办，把西湖保护好，建设好，把旅游业抓好。”

“是我选拔了四川的大地主刘文辉 当中央政府的部长”

1992年12月17日，邓小平在省委书记李泽民和省长葛洪升的陪同下游览西湖。

邓小平说：“杭州好，这里的气候适合我。我在这里睡得很好，起夜都没有。”

李泽民说：“我们想要简单汇报一下浙江的情况。”

邓小平点头表示同意。李泽民在邓小平面前，不再用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而改用地道的四川话。于是，满船听见的都是四川口音。

李泽民后来回忆说：“在游船上，小平精神很好，兴致很高，他谈吐幽默、诙谐，从古今中外谈到现在，说了很多话，大多数跟工作有关。”

李泽民汇报后，提议“与小平同志合影留念”。

邓小平说：“好嘛，跟我的家乡人在西湖照个相。你们拿把椅子坐下来。”

李泽民说：“不用了，我和葛洪升就站在后面。”于是，李泽民和葛洪升站在邓小平和卓琳身后合了影。

合影以后，李泽民才发现，在李泽民汇报和游湖的过程中，邓小平的二女儿邓楠一直在给邓小平拍照，几乎把邓小平的每个表情都拍了下来。邓楠对李泽民说这是她的“专利”。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浙江省省长葛洪升向邓小平汇报荣毅仁副委员长领导的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决定支持浙江大榭岛的开发。

邓小平听后，很高兴地说：“荣毅仁名声大，会办实业。”

停了一下，邓小平说：“我管干部的时候，是我选拔了四川的大地主刘文辉和上海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当中央政府的部长。刘文辉管林业，荣毅仁管工业。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他们都干得很好。”

然后，邓小平问李泽民：你这个四川老乡，晓不晓得四川刚刚解放时，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我提议刘文辉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最后中央同意了。刘伯承同志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王维舟和我作为共产党的代表任副

主席，刘文辉、熊克武两个四川人和云南人龙云作为民主党派的代表任副主席。

李泽民说：我小时候在四川读书时就喜欢阅读四川的史志书籍，到了大学，也很喜欢党史，知道是小平同志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选拔刘文辉于1959年担任中央政府林业部部长，兼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邓小平说：你这个四川人对于刘文辉



1950年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合影。右起：邓小平、贺龙、熊克武、龙云、王维舟、刘文辉。

本人的情况晓得多不多？

李泽民说：我知道刘文辉是四川大邑人，国民党陆军上将。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川康边防军总指挥、四川省主席、西康省主席及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等职。红军长征时，刘文辉曾协助蒋介石追剿红军。蒋介石为了控制四川、削弱四川军阀势力时，与蒋介石发生了根本利害冲突的刘文辉，于1938年夏天在成都方正街寓所，会见了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等人，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所了解。1939年夏天，刘文辉又到重庆与董必武、林伯渠会晤，商谈抗战问题。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秘密与刘文辉会晤。是年6月，在刘文辉的邀请下，中共中央特派王少春常驻刘文辉处，还设有一个秘密电台从雅安与延安直接通报。王少春每天把中共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通报给刘文辉，同时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中央汇报。在刘文辉的掩护下，这个电台一直工作到雅安解放。抗日战争结束后，周恩来又亲自与刘文辉会晤，加强对刘文辉的统战工作，从而使刘文辉与共产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刘文辉决定配合解放军行动，为解放川康贡献自己的力量。1949年11月初，当您老人家和刘伯承同志率领的刘邓大军进入四川境内后，刘文辉故意邀请蒋介石的几个亲信到成都玉沙街他的官邸开会，商定“保住蒋委员长的复兴基地四川”的事宜。刘文辉在张群、胡宗南、顾祝同、王陵基等蒋介石的心腹面前说：“我是大军阀，和共产党打了多年的仗，又是大官僚，当了那么多国民党的大官；又是大地主，我和我的五哥刘文彩在大邑、在四川、在西康都有田地；又是大资本家，搞了那么多实业，样样占齐了，共产党搞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哪里会要我？”刘文辉的这些话，连张群听了以后都



夸奖“说的是真心话”。不久以后，按照刘文辉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的原定计划，他们三人在四川彭县联名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起义通电，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决裂，听候共产党调遣。朱德总司令收到电报后，立即复电刘文辉等三人，祝贺起义成功。1950年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小平同志与刘文辉都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起在重庆工作。小平同志1952年奉调中央工作以前，专门请刘文辉与他一起，坐在成渝铁路通车典礼的主席台的前排。

邓小平听后说：想不到你对于刘文辉还这么了解。你这个四川人也谈到刘文辉自己说他是大地主。事实证明，我选拔刘文辉这个四川大地主当中央政府的部长是对的。

谈过了刘文辉以后，邓小平指着西湖上的景点问了一些问题，还问西湖上游船、交通船的价格贵不贵，来西湖的老百姓承不承受得了等等，李泽民都一一作了回答。

游船劈波斩浪，在西子湖上划出一道浪花飞溅的银涟。

游船上邓小平与四川老乡李泽民谈笑风生，谈兴正浓。

邓小平1986年2月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四川。7年多过去了，1993年12月17日这一天，他把7年多来对蜀乡的感情积淀，在“他乡遇老乡”的时候，淋漓尽致地在西子湖上挥洒了出来，……

**“以后退休了，我还是要回到四川养老，
我喜欢家乡四川”**

落叶归根，客居他乡的人，终要回到本乡。许多老百姓往住是这样想的，一代伟人邓小平也曾有过这种想法。



1986年2月，邓小平在成都望江公园。

笔者采访小平同志的二妹邓先芙时，她说：

“大哥多次对我说，‘以后退休了，我还是要回四川，回到四川养老、过晚年，我喜欢家乡四川’。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中苏两党论战、大哥负责写《九评》的文章时，他们先在浙江杭州，后来还是搬到成都来写，大哥说成都好，杭州太

潮湿，又闷热，他习惯在成都生活。”

长期在四川省委工作的邓先芙，还谈到了一件她认为很遗憾的事：

“1986年2月，大哥在成都过春节住了15天。他认为这15天过得最满意。所以1987年春节还是想回四川来过，但有人给大哥说金牛宾馆在大规模维修，不好住，他就只好到上海去过春节了。他连续七年都在上海过春节。”

这件事，不仅仅对邓先芙来说是遗憾的事，对千千万万四川家乡人来说更是大可惋惜的事。难道不是吗？



本书主要参考和摘录书目

《邓小平文选》（第一至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毛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毛毛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邓林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的历程》（刘金田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视察纪实》（刘金田、张爱茹著，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回忆邓小平》（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丛书》（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小组

编，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巴蜀情——邓小平与四川》(秦玉琴主编，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与四川》(赵庆东、刘文耀、吴启权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若干重大的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刘海藩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伟人邓小平》(袁水松主编，红旗出版社出版)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陈文斌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理论宝库》(邢贲思主编，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

《谭后龙回忆录》(谭后龙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许梦侠八十回眸》(许梦侠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陈文斌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巴地草》(蔡世武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冷眼看中国》(白智清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华阳国志》(常璩撰，巴蜀书社出版)



《三国志》（陈寿撰，中华书局出版）

《古代的巴蜀》（童恩正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志·盐业志》（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志·旅游志》（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史》（英国李约瑟著，科学出版社出版）

《三国漫话》（沈伯俊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写《小平蜀乡情》这本书，是笔者多年的愿望。在小平同志90多年的人生旅途中和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里，无论是在与83位川东弟子同乘一条船去到法兰西的岁月，还是在联合国用四川话进行演讲的时候；无论是在“三起三落”的传奇日子里，还是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浓浓的蜀乡情总是伴随着小平同志的整个一生，而且往往溢于言表。

20世纪70年代末，生在蜀乡、长在蜀乡的小平同志，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我们一批四川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利用是小平同志的家乡人、又一直在他留下过深深的足迹的四川生活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小平同志的生平入手，开始了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80年代末，笔者与几位志同道合的理论工作者一道，在原省委书记、著名学者杨超和原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原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陈文的倡导和组织下，成立了“四川省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研究小组”（它实际上是全国的第一个“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以后，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批准了“四川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的成立（该“中心”的历届主任均为省委书记或副书记）。接着，有19个省市的同行前来取经，回去后都相继成立了他们的“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笔者自担任“四川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的专职副秘书长以来，不管是在该“中心”十多年的日常工作中，或是在与人合作主编《邓小平与四川》一书时；不管是从1993年起在受邀协助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拍摄12集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和另一大型电视片《丰碑》时，或是在担任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联合摄制的8集电视专题片《邓小平与四川》的两位总撰稿之一和策划人之一拍摄该片时，无时无刻不为小平同志浓浓的蜀乡情结所感动。“十年磨一剑”，根据十几年的资料积累，笔者便选择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写作，将拙著《小平蜀乡情》奉献给我最敬爱的小平同志，奉献给我一样热爱小平同志的读者朋友。

拙著从酝酿到脱稿直至出版的整个过程中，小平同志的家人（女儿、妹妹、妹夫）一直鼎力相助；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文献研究室、原石油工业部、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等许多单位的领导和同志给予了热情的关怀与支持。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邓小平传组）的几位负责同志，或者毫无保留地提供资料，或者亲自拨冗撰写文章，或者在百忙之中挤时间审稿；四川出版集团总编辑何志勇教授、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出版处处长张成行挚友、省委讲师团王素团长、四川大学新闻系主任周啸天教授、《邓小平青少年时代和邓氏家谱》研究专家蔡世武学兄、

原《四川党史》总编辑刘建中学兄等人给予了指导和帮助；本书责任编辑陈小梅女士和四川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蒲其元主任，更是倾注心血，付出了很多辛劳，才终于使拙著得以顺利付梓面世。在此，谨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由于笔者占有的资料和笔者的水平局限，疏漏实属难免，衷心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斧正。

作 者

2004年12月28日